碳汇交易的激励偏差与调整策略

——基于对效率导向与标准化管理模式的反思

罗必良　钟文晶　洪燕真

摘要：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关系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实现碳中和已从基本共识上升到全球行动。本文从土地管理的标准化和林业管理的科学化等代表性事件入手，探讨经济学效率目标与工业革命开创的标准化管理模式可能带来的挑战与影响。本文在梳理生态产品概念、类型和定价机制的基础上，剖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化逻辑及其现实路径，揭示传统经济学的效率导向及其标准化管理模式可能会造成市场价值对非市场价值的排挤。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林业碳汇交易为例，分析市场交易隐含的激励偏差：激励大规模植树造林，而不注重天然林和成熟森林碳汇潜力的有效发挥；激励营造人工针叶纯林，导致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多样性显著削弱。由此，本文从完善林业碳汇的量化体系、强化林业管理的本地知识、重视生态发展的长期目标、构建林农参与的享益机制、关注林业碳汇背后的政治经济学等方面提出调整策略，以期实现林业碳汇市场规则的改进与匹配，避免生态不平等所导致的国民福利损失。

关键词：碳汇交易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市场机制　激励偏差

中图分类号：F326.20；F062.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纵观历史，人类生活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低迷的“马尔萨斯陷阱”状态。走出陷阱，摆脱贫困，走向富饶，是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核心议题。直到最近 200 多年，人类才迎来了经济大爆炸的新纪元。在经济学家的思维里，经济增长、财富积累，几乎等同于人类进步。这一理论传统与分析范式，

［资助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南方集体林区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基于需求和供给视角的实证”（编号：72473021）；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特别委托项目“农民共同富裕的生态逻辑及其实现路径”（编号：GD22TWCXGC08）。

［作者信息］　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电子邮箱：luobl@scau.edu.cn；钟文晶，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电子邮箱：wjzhong@scau.edu.cn；洪燕真（通讯作者），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电子邮箱：hongyanzhen1984@163.com。

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众所周知，亚当·斯密的巨著《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彼时欧洲尚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夜，社会普遍面临资源短缺与贫困问题[①]。亚当·斯密所奠定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深受这一时代背景的影响，其主要任务是探讨如何通过分工、市场交易与效率提升实现经济增长，从而推动社会摆脱贫困与匮乏，并最终走向富饶。

经济增长是人类摆脱贫困、走向丰裕的重要路径。但与此同时，引发了经济学传统话语以外的众多问题，如财富不平等、“伊斯特林悖论”、生态环境恶化等。19世纪，欧洲工业化进程催生了大量低收入工人群体，但其绝对贫困人口规模仍小于亚洲、非洲等农业社会地区。20世纪中叶以来，在工业化、技术革新和福利制度的推动下，欧洲和北美的收入水平大幅提升，其人口在全球最低收入分位中的占比已降至极低水平。巨大的经济差异推动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富人俱乐部”总是企图对后发国家进行打压，包括军事威胁、制造粮食与石油“战争”、操纵国际货币体系、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等，这些已成为国际强权政治中使用的基本工具（恩道尔，2008）。

隐藏在政治格局背后最为激动人心的话题之一是“气候与环境问题”。这一议题的全球化讨论始于20世纪中期，特别是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②]的发布和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③]的签署，使气候问题逐渐成为国际共识。经过发达国家多年的话语传播，碳排放限制成为全球广泛接受的政策框架。但是，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时代，而发展中国家仍处于依赖化石能源的工业化时代。由此，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掌控“碳政治”话语权，将“气候与环境问题”作为遏制后发国家经济增长与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手段。事实上，处于“生态帝国主义”笼罩之下的“碳政治”，使得碳排放越发成为一种政治化的限制（郇庆治，2016）。另一方面，建立在传统“增长经济学”基础上的碳汇市场及其交易逻辑，蕴含着重要的行为导向与激励偏差，从而不断加剧经济与生态、增长与福利之间的矛盾。传统经济学理论范式诱发了后发国家的增长冲动，而“碳政治”又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桎梏。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保护环境诚然重要，但也要警惕所谓的“环境陷阱”。

本文通过对传统经济学效率导向及标准化管理模式的理论反思，以林业碳汇为例，揭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化逻辑可能存在的激励偏差，及其对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多样性造成的潜在损伤。在此基础上，阐明生态保护中市场手段校正的可能性策略。

二、经济效率与标准化：反思传统理论

历史学家黄仁宇（2020）在探讨历史的“大分流”时指出，中国历代未能实现“数目字管理”，即可度量的精准管理，发展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缺乏工业化的流水线、精细化与可控性的组织运作，成为妨碍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症结。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尊为“科学管理之父”

[①]如果说1785年瓦特改良蒸汽机是工业革命起源的标志性事件，那么就可以认为，亚当·斯密在写作《国富论》时，尚未见到由工业革命引发经济增长的基本事实。

[②]资料来源：《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https://docs.un.org/zh/A/CONF.48/14/Rev.1。

[③]资料来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convchin.pdf。

的泰勒在19世纪末提出了科学管理原理，为标准化管理奠定了理论基石。泰勒通过对劳动过程的科学分解与测量，建立可度量、可控制、可复制的标准，将传统经验主导的模糊性生产转化为基于科学方法的系统化管理，使组织运作的精确性与资源利用的最优化成为可能（泰勒，2013）。这一管理范式不仅大幅提升了物质产出效率，更塑造了现代经济的核心逻辑，即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的工具理性。从逻辑上来说，国家与民族发展路径的选择本来是可以多样化的，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全球扩散、国家治理对效率至上的制度性依赖，以及市场经济的扩张对资源可计量性的强烈需求，标准化逐渐超越单纯的技术范畴，演变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性手段。黄仁宇所批判的“数目字管理”缺失，与泰勒倡导的标准化控制，实质上共同揭示了现代化的双重性：一方面，标准化是突破传统社会低效桎梏的技术杠杆；另一方面，标准化的工具理性逻辑也压制了多样性价值，使发展路径被简化为单一化的“效率竞赛”。

国家控制尤其是税收获取的便利化，更是加剧了“标准化”的普遍性。斯科特（2019a）按照“政治”标准将农作物分类为“集权主义”作物和“无政府主义”作物。例如，就征税便利性而言，作为“集权主义”作物的谷物，具有看得见、可分割、可估算、可储存、可运输等多方面特点。正是由于在集约生产、税收评估、土地利用、地籍调查、存储以及配给上的效率优势，谷物被赋予不可替代的“标准化”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而作为“无政府主义”作物的马铃薯、木薯等，因长于地下，成熟期近一年，无须过多人力且易于隐藏，收获相对费力、运输不便且容易腐烂变质，作为课税对象隐含着高昂的征收成本（罗必良和耿鹏鹏，2022）。由此，国家的“征税偏好”需要依赖可计量和标准化的方式，一方面改造自然，驯化植物与动物，进而驯化整个自然生态；另一方面改造人类，通过规制与监督，进而驯化整个人文生态。“双向驯化”无论是在技术进步的导向上还是在组织方式的治理上，都表现明显的“标准对行为的殖民”。

代表性事件之一是土地管理的标准化。土地管理是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其核心工作不仅在于丈量面积的大小，更在于通过精细化管理水肥和种子以追求单位面积产出的最大化。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土地被更多地视为一种生产要素，其生态、文化等多样性功能则容易被忽视。虽然在产权等制度安排下，不少土地管理实践也在探索土地多功能开发与长期可持续利用的可能性，但主流管理制度和目标总体上仍更倾向于短期经济效率目标，对土地的生态与社会功能重视不足。尽管“土地是财富之母”，人们却常常只关心它能够挤出多少“奶水”。

代表性事件之二便是林业管理的科学化。早期欧洲国家对待森林的态度是，最具效率特征的木材应具有可度量、可交易、可变现的特性。在国家的“管道式视野”（tunnel vision）中，政府对森林的兴趣只在于木材每年能够带来多少财政收入。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森林的多样性功能与林木的多种用途，被单一的木材及燃料的“体积”这一抽象又实用主义的标准化计量概念所取代，国家通过统计表格和示意图得到了整个“林木”的概貌。由此，作为栖息地的森林“消失”了，涉及人类与森林相互影响的事务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能够被效率计量的经济产品，森林被改造为木材商品的“生产机器”，关于森林的概念也只是满足国家需要的实用主义（斯科特，2019b）。

众所周知，德国是林业科学管理的著名典范。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的这一时期普遍被认为

是“科学林业”兴起的时期。在通往“科学”的漫长道路上，最根本的见解之一是认识到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基础是资本经济学。这个时期，为了满足工业化生产过程所需要的大量木材产品，定量和标准化的森林调节和森林管理规划模型大量产生，科学林业和现代林业经济在同一领域出现和发展（Viitala，2016）。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森林永续经营理论，在欧美国家的林业实践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过去 100 多年间实施同龄林经营和追求森林资源永续利用的理想森林结构模式。该理论强调通过标准化生产实现森林资源的“永续”利用，其核心在于始终只采伐林地在各个时期新增的木材生长量，从而确保木材产量的持续性和稳定性[①]。最突出的例子是德国林学家马丁·弗斯特曼在 1849 年提出了著名的 Faustmann 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想是，林地（自然资本）的价值可以从预期永久收益的折现净现金流中得出，当林分的边际价值增长量等于森林资本（包括立木和裸地）的边际成本时，采伐林分是最优的（Viitala，2016）。问题是，Faustmann 模型仅根据基本木材价值增长函数计算林地期望值和最佳生产周期，没有考虑木材继续生长所产生的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空气以及后来广受重视的碳汇等非传统意义上的多样化价值。与之同样著名的是，德国也是标准化的科学管理遭遇严重挑战的典型案例。在整个 19 世纪，科学林业的原理被严格或变通地应用于德国大面积森林的管理实践中。其中，由于材质坚固、生长迅速且木材价格高，挪威云杉成为德国商业化森林的主要树种。事实上，最初挪威云杉是作为补种树种以恢复过度开发的混交林，但是种植第一轮就带来了很好的商业利益，因此人们清理了混交林，在林场中只营造单一品种的人工纯林，以标准化的种植力求“提供可能的最大恒定木材量”。德国曾经拥有的多样性森林中阔叶林至少占 3/4，但这一比例不断下降到不足一半，针叶林反而占大部分，甚至成为单一树种（斯科特，2019b）。像农田中成行成列的标准化农作物种植一样，那些新的针叶林确实提供了数目惊人的单一商品木材。然而，在混交林积累下来的土壤肥力逐渐消失后，标准化树林难以为土壤补充肥力，也无力抵抗专门侵害挪威云杉的害虫、锈病、介壳虫和枯萎病等病虫害。对于农民来说，人工纯林极大地削减了生物多样性，也剥夺了他们在过去的森林生态系统中可以从事的狩猎以及获取食物、原材料和药品等活动。

后代科学家通过历史验证的方法证明，建立经济林的思想及其经营技术恰恰不是永续的，“土地纯收益理论”也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饱受批判。科学家们深刻反思：19 世纪德国在 Faustmann 模

[①]森林永续利用的原则最早由卡洛维茨（Hans Carl von Carlowitz）于 1713 年在其著作《林业节约论》（Sylvicultura Oeconomica）中提出。他指出，“……努力组织营造和保持能被持续地、不断地、永续地利用的森林，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事业，没有它，国家不能维持国计民生，因为忽视了这项工作就会带来危害，使人类陷入贫困和匮乏”。随后，1826 年德国林学家洪德斯哈根（J. C. Hundeshagen）提出的“法正林”（Normal Forest）学说进一步奠定了森林永续经营理论的重要基础。其核心思想在于通过科学规划和管理，维持森林资源的均衡结构，实现持续利用和稳定产出。森林永续利用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明确了森林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有在科学培育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开发和利用，才能确保森林资源长期为人类发展服务。然而，该理论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木材经营，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功能和整体稳定性的考虑较为有限。这一局限性源于其形成时期的历史背景，反映了以木材为核心资源的时代特征。因此，该理论还不能完全被称为现代意义上的可持续经营理念。

型的指引下，举全国之力发展人工针叶纯林，一口气毁掉了99%的天然林，这无疑是一个世纪性的错误。虽然有部分人通过人工林赚得盆满钵满，但德国民众仿佛失去了精神寄托，不得不忍受单调、黑暗、死寂的人工纯林环境（邵青还，2017）。20世纪中叶，德国林业在“未来属于混交林”的口号下逐步统一思想，开始向更为生态友好的“近自然林业”转型。然而，这些努力本质上是对19世纪林业政策失误的修正，但这一纠偏过程异常艰难。事实上，德国标准化、集约化与商业化的林业模式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标准模式。实用主义者在短期内取得的胜利使单一树种的森林成为德国林业向外输出的主要模式，并最终成为法国、英国、美国以及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林业管理技术的基础。德国的林业成为将“杂乱”的自然转变为“有序”的科学建构的一个原型。以效率为目标、以标准化为手段的“林业科学管理”，不仅鼓励了数学上的实用主义，而且反过来又将几何学上的完美作为森林管理良好的外在标志，从而破坏了生物多样性（Viitala，2016）。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在人类依存于自然的事实面前，将一个尚未被理解的复杂关系体和过程割裂开来，从而试图得到单一工具价值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斯科特，2019b）。

代表性事件之三是生产的集中化与规模化。与效率目标及其标准化紧密关联的大规模生产，其核心特征在于通过生产的集中化与规模化来实现聚集经济与规模经济的效率提升。众所周知，加利福尼亚中央山谷的理想气候条件，被认为是“杏树种植最理想的地方”。世界上超过80%的杏仁产自该地区。然而，这种高度集中的生产方式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环境挑战。首先，加利福尼亚的杏树开花时只有一个非常短暂的季节性授粉期，需要在这个时间窗口将蜂箱从美国各地运送到中央山谷地区。但近年来，美国各地的蜜蜂成群死亡。仅在2018年、2019年两个冬天，美国就有超过1/3的商业蜂群消失，但蜂群死亡的原因尚不明确。这一现象表明，将杏树种植高度集中于一个地区虽然在最初是高效率的，但面临着极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其次，杏树的耗水量极大（每生产1个杏仁就需要消耗约4.16升水），使得该地区每年杏树的灌溉用水占加利福尼亚州农业总用水量的近10%，这比洛杉矶和旧金山的总人口每年消耗的水量还要多（里夫金，2022）。更糟糕的事实是，气候变化已经把曾经肥沃的中央山谷变成了干旱区。可见，为了谋求大规模生产与规模经济，把所有“杏仁”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虽然眼前的效率提高了，但缺乏足够的韧性来应对不可知的未来。应该强调，效率并非经济活动的唯一追求，增长并非改善人类福祉的唯一路径。

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市场化逻辑及其缺陷

中国广泛使用的“生态产品”概念与西方国家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具有共通性。生态系统服务最早可追溯至Marsh（1864）对罗马地区土壤保持和淡水供应服务退化的描述，随后经历了从环境服务到自然服务再到生态系统服务的延展过程。20世纪末，康世坦等生态学家提出，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生态系统通过其功能为人类提供的直接或间接利益，包括物质产品（如食物、水）以及调节、文化等服务（如气候调节、废物处理、娱乐价值）（Costanza et al.，1997）。联合国2001年启动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MEA）进一步将生态系统服务概括为供给功能、调节功能、

文化功能和支持功能，为国际社会提供了生态系统服务分类与评估的理论基础[①]。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把生态产品的概念界定为：生态系统为经济活动和其他人类活动提供且被使用的货物与服务贡献，包括物质供给、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2022）。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化逻辑被视为诱导生态保护行为的重要机制。根据产品的市场属性和公共属性，生态产品可分为私人产品、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三类。本文以森林生态产品为例，分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化逻辑。私人森林生态产品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产品形式主要为木制和非木制林产品，以及林果、林药、林菜等森林物质产品。这类产品产权清晰、行为主体明确，可直接或通过开发经营进入市场交易来实现经济价值，其价值实现路径为通过生态产业化以直接的市场交易方式实现价值转化。准公共森林生态产品，在满足产权清晰的基础上，对外存在排他性和竞争性，产品形式主要为林业碳汇、森林康养、森林旅游等，一般由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来实现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其价值实现路径主要是通过搭建生态资源权属交易平台实现生态资源资本化与生态权益交易。纯公共森林生态产品有较强外部性，存在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产品形式主要为调节服务，难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其价值，需通过政府提供政策支撑、财政转移支付与补贴等方式保障其生态价值的实现。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在于定价机制，而定价的有效性直接受到交换价值与福利价值之间权衡的显著制约。依据经典经济学理论，生态产品价值既可以基于供方的交换价值进行衡量（如成本加成法），也可以依据消费者对福利增量的主观感受进行评价。然而，后者往往涉及隐性与非量化因素，使得以市场价格为核心的定价机制在实践中面临显著局限。例如，调节功能或文化服务的价值往往难以通过单一定价模型量化（Costanza et al.，2017）。非使用价值（如遗赠价值和存在价值）由于其非物质性和跨越时空的特性，始终难以被纳入完整的价值评估体系。此外，市场化逻辑中的定价机制遵循“均衡价格理论”，以供需关系为基础，但在实际运行中极易受市场规制力不足或交易规则不完善的影响。这种局限不仅难以准确反映生态产品的真实价值，还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加剧公共物品“供优不足、供劣有余”的问题，从而对生态系统健康与社会福祉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在市场化的生态产品交易中，碳汇交易尤为典型。碳定价机制通过将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为碳减排提供了明确的价格信号和激励路径，成为全球生态产品市场化的核心实践之一。世界银行发布的《2024 年碳定价现状与趋势》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共有 75 种碳定价机制正在运行，碳税和排放交易体系（ETS）已覆盖全球排放量的 24%；2023 年全球碳定价收入更是达到创纪录的 1040 亿美元，其中，ETS 仍然是直接碳定价收入的主要来源，贡献了全球碳定价收入的 70%以上[②]。这充分体现了市场化减排路径的重要性。然而，碳汇交易的实际运行效果却充满争议。一方面，碳定价机

[①]资料来源：“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A Framework for Assessment”，https://www.millenniumassessment.org/documents/document.48.aspx.pdf。

[②]资料来源：“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24”，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server/api/core/bitstreams/253e6cdd-9631-4db2-8cc5-1d013956de15/content。

制在减排效率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价格信号的有效性仍面临挑战。例如，2021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关于碳排放大国国际碳价格下限的提议》，建议 G20 成员等碳排放大国实施国际碳价格下限制度，并提出，2030 年前将全球碳价水平提高至 75 美元/吨，方可实现 1.5℃温升目标[①]。然而，尽管全球碳价格在过去十年中有所增长，但截至 2024 年，仅有不到 1%的温室气体排放被覆盖在达到或超过 63 美元/吨的碳价格之下，而这一价格水平是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所需的最低标准[②]。另一方面，国际碳定价政策在责任分配上隐含了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减排责任的倾向，弱化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王际杰，2024）。IMF 将 G20 高排放成员（美国、欧盟、加拿大、英国、中国、印度等）划分为发达经济体、高收入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新兴经济体，并分别设定 75 美元/吨、50 美元/吨和 25 美元/吨的碳价格下限，此举实际上赋予 IMF 在国际碳定价决策中的主导权。这种政策逻辑不仅淡化了历史排放责任的差异，也可能加剧全球范围内的生态不平等。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化逻辑建立在效率导向的标准化管理模式之上，并试图通过价格信号来优化资源配置。然而，这一逻辑在生态产品交易实践中的局限性尤为突出。一方面，表达市场效率生成逻辑的科斯定理，是建立在低交易成本和产权清晰的假设基础上的，但由于生态产品的非排他性、外部性和复杂性，这些假设条件在实际运作中往往难以满足。另一方面，市场化定价机制倾向于简化生态产品的多维价值（如存在价值、遗赠价值和文化意义），并将其转化为单一经济指标。这种估值方式不仅强化了对交换价值的依赖，还可能将关键的非市场价值边缘化，削弱生态保护的整体目标。此外，市场机制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生态服务功能的过度货币化，加剧对生态资源的短期开发与利用，从而威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韧性。更深层次的理论反思来自罗尔斯（2001）的正义理论，即资源分配不仅需要考虑效率，更要注重对多样性与弱势价值的保障。但事实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化逻辑在缺乏有效规制的情况下，往往演变为以增长为导向的交易体系，忽视了生态系统的综合功能与动态平衡。这种偏离不仅会在定价机制中排挤生态产品的非市场价值，还可能带来“公共物品困境”（Ostrom et al.，1999），即生态资源在受资本化驱动时会因制度设计缺陷而面临不可逆的生态价值损伤。碳汇交易就是在这一市场化逻辑框架下，为实现减排目标提供经济激励所设计的最为典型的市场机制，但其可能隐含着重要的生态损伤与价值失衡问题。但很长时间以来，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与讨论。

四、经济激励背后的生态损伤：以林业碳汇交易为例

（一）为什么是林业碳汇：比较优势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碳汇是指从大气中清除温室气体、气溶胶或温室气体前体的

[①]资料来源：“Proposal for an International Carbon Price Floor among Large Emitters”，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staff-climate-notes/Issues/2021/06/15/Proposal-for-an-International-Carbon-Price-Floor-Among-LargeEmitters-460468。

[②]资料来源：“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24”，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server/api/core/bitstreams/253e6cdd-9631-4db2-8cc5-1d013956de15/content。

任何过程、活动或机制。中国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即通过“碳去除技术”抵消企业、产品、活动或个人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从而实现本国温室气体“净零排放”[①]。“碳去除技术”主要有两类：一是工程类技术，如碳捕集、碳封存和利用类技术；二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NbS），即通过对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和可持续管理，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同时保护生物多样性并改善可持续生计（徐晋涛和易媛媛，2022）。大气、海洋、陆地生态系统和岩石圈是地球四大碳库，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NbS中，利用森林生态系统吸收CO_2从而降低大气中CO_2浓度的森林碳汇是技术最成熟、成本最低、潜力最大的途径。不同于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森林碳汇，林业碳汇是指通过造林再造林、森林管理等活动，产生碳汇增量，并按相关规则开展碳汇交易的过程（李怒云，2016）。

林业碳汇具有三个独特优势。第一，林业碳汇效益高。在考虑了粮食安全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约束条件后，多位科学家估算：到2030年，全球NbS的最大潜力可达每年238亿吨CO_2当量，潜力最大的5个路径分别是造林、避免毁林和森林退化、天然林管理、泥炭地恢复、泥炭地保护，这5个路径的NbS最大潜力之和占全部20个路径的NbS最大潜力总和的69.3%[②]。第二，林业碳汇成本低。徐晋涛和易媛媛（2022）依据荒山荒地造林补贴、退耕还林补贴、生态公益林补贴的成本数据测算：中国森林每生长1立方米平均可吸收1.83吨CO_2，并释放1.62吨O_2，每吸收1吨CO_2的边际成本约为13元；即使是成本较高的退耕还林地，其80元/吨的边际碳减排成本也远低于工程类技术的碳减排成本（如在现有水平下，火电行业在减排幅度达到15%时碳价格需上升到约200元/吨，减排幅度达到80%时碳价格将达到500元/吨）。第三，可持续采伐的木材在替代能源密集型材料方面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潜力。树木具有碳中性特点，但其碳库会随着时间推移达到饱和。例如，对于成过熟林，如果不进行采伐，可能导致森林退化、林火增多，甚至使碳汇转变为碳源。据测算，木材可以替代水泥或砖等高碳材料，每立方米等量替换可以减少0.8吨CO_2的排放。通过采伐成过熟林，木质产品不仅能继续固碳，还能通过替代其他能源和原材料，每年为中国带来1.2亿～2.5亿吨的新增碳汇（徐晋涛和易媛媛，2022）。中国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是保障生态安全的有效蓄水池，也是发展森林碳汇的强大物质基础。因此，关注林业碳汇交易及其生态后果是重要而有价值的议题。

（二）林业碳汇交易与行为激励

经济学家经常强调“激励很重要”，其基本的信念是更高的激励会导致更多的行为努力。自从Costanza et al.（1997）开创性且有争议地量化地球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ES）的经济价值总量以来，关于ES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PES）的研究文献呈指数级增长。PES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环境治理的典范，是目前使用市场方法最广泛的土地保护政策（McElwee et al.，2014）。Pagiola et al.（2002）提出，出售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包括单独或捆绑形式）

[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0/24/content_5644613.htm。

[②]资料来源：《基于自然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https://tnc.org.cn/content/details41_736.html。

作为一种市场化的保护与发展机制，能够通过创造经济收益的方式来弥补市场失灵，其收益可通过两种路径发挥作用：一是增强森林管理者的私人保护激励（如提高其保护动力）；二是为公共或私人保护项目提供可持续资金支持。然而，尽管 PES 计划已在全球多元地理背景下迅速扩散，但其概念框架与实践模式始终面临系统性批评。政治生态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批判性学者指出，PES 机制过度关注 ES 的商品化价值，这种倾向必然会使其他非市场价值和保护动机边缘化或被排挤。尤其是从“正义即承认”（justice as recognition）的视角，对 PES 的批评通常集中于：PES 可能通过强加新的霸权性认知框架和排挤非金钱化的保护动机，从而限制了其他愿景和机会（Martin et al.，2014）。

根据经济学逻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金应优先投向单位支出预期收益最大的项目。然而，若项目的复杂性或相应的评估方法缺失导致整体利益被系统性忽视，资金将不可避免地流向收益更易货币化的干预措施和项目（如简单的个体商品），而非流向真正能够产生最大潜在效益的项目（通常与复杂的社会商品相关）。人们在验证简单个体商品价值方面的成功，可能无意中扼杀了对产生重大社会和环境效益的复杂社会商品和服务的关注（Stoeckl et al.，2018）。生态系统服务社会评估是当今生态和环境经济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因为要实现这样的估价就需要理论和方法上的多元化，以理解和把握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全部价值（Parks and Gowdy，2013）。在这一过程中，人类行为的复杂性需要被纳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考量。人类行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利己利人、利己损人、损己利人和损己损人。这些行为类型在生态系统管理中呈现情境依赖性。例如，利己利人的行为（如通过合理的资源管理，既使个人获益又使生态环境改善）可以通过市场激励机制广泛推广，而损己利人的行为（如为保护环境或文化遗产牺牲个人经济利益）则往往需要强有力的社会支持和文化维系环境。假设利益本身具有，这意味着个体可以在不降低生态系统服务整体价值的前提下，选择放弃自身的利益。然而，以社会建构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如未经开发的自然环境对土著传统所有者的文化意义）为例，这类价值依赖于利益的共同体验和个体价值的整体性，本质上无法被分解为各自独立的部分价值。这便展现了一种极端情形，即损害某个人的个人利益就意味着损害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同时，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逻辑对生态价值的估计建立在以个体化激励为基础的权衡之上。这种简化的框架掩盖了社会利益的真正本质，并可能导致复杂社会公益价值被忽视。一个人应该以什么代价放弃自己的文化、宗教或社会身份？试图通过量化评估将复杂的社会公益商品化的做法，可能无意间扼杀其内在的文化完整性与社会共享价值（Stoeckl et al.，2018）。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主流的价值评估方法只能呈现一小部分效益（Kenter et al.，2015），并且完全关注“市场”和市场激励的做法，反而可能会削弱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在动机和相应的行为（Gneezy et al.，2011）。生态系统作为复杂系统，具有不确定性，并展现自组织和自适应的特性。如果将生态系统服务视为一组独立的项目，而非系统性公共物品，这种视角可能会影响其逻辑上所隐含的规范性问题。从单个项目的角度看，它们可能被视为商品；然而，从动态过程的角度看，它们本质上是公共物品，其存在对所有人都有影响。在将生态系统服务视为公共物品的视角下，一个人的行为会直接影响他人获取这些服务的机会。成本效益分析的制度化排挤了能够处理复杂自然资源管理的系统和机制（Ostrom et al.，1999），环境问题的货币框架可能导致对支持环境的社会产品、制度和规范

的削弱（Gneezy et al.，2011）。例如，环境管理的货币激励机制已被证明会破坏支持性动机和行为，并增加自然资源管理和社区变化过程的成本。Agrawal et al.（2015）通过对印度北部可持续发展干预的准实验设计，验证了环境保护过程中显著但有条件的动机挤出效应（motivational crowding）。他们的研究表明，那些获得私人经济利益的村民更倾向于将保护森林的环境动机转变为经济动机。为了实现山地种植作物的经济价值，中国“田尽而地，地尽而山”所形成的“低层次平面垦殖体系”，也是生态系统服务的可交易价值排挤不可交易价值的典型案例。

基于林业碳汇的经济激励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2007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COP13）通过《巴厘行动计划》，就“与减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有关问题的政策方针和积极激励办法；以及发展中国家森林养护、可持续森林管理及加强森林储存的作用”达成共识[①]。在此基础上，作为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成果之一，《巴黎协定》（2015 年）将林业条款单独列出，要求 2020 年后各国采取行动，保护和增强森林碳库和碳汇，通过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引发的碳排放，以及通过可持续管理、造林与再造林等措施增强森林碳汇能力（REDD+），以推动森林保护和可持续管理[②]。中国更是将森林增汇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三大行动目标之一[③]。

然而，林业碳汇市场交易也可能导致激励偏差。这主要与现行规则的设计逻辑有关。根据当前的林业碳汇交易规则，作为中国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之一的林业碳汇项目仅将造林再造林纳入交易，未覆盖森林经营等项目，天然林碳汇项目的开发尚缺乏成型的方法学。同时，林业碳汇交易有基线和额外性原则，如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只纳入 2005 年 2 月 16 日之后在无林地实施的造林项目，森林经营项目则必须在人工中幼龄林中开展。这些规则的设立植根于碳汇交易的经济属性，其核心逻辑在于市场交易的确权原则，即碳汇增量必须与明确的管理行为和责任主体挂钩，方能构成交易的基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林业碳汇交易可能会诱导如下行为响应。一是激励大规模植树造林，而不注重天然林和成熟森林碳汇潜力的有效发挥。在幼龄林、中龄林和近熟林中，树木通过光合作用固定 CO_2 促进木质部生长，其蓄积量（立木材积总量）的持续增长是衡量森林碳汇能力及评估碳中和贡献的核心指标。这也意味着，一个处于稳态的顶极群落的森林生态系统，是几乎不可能有碳汇增量的。顶极群落的生物量趋于稳定，积累等于消耗，但其对地球生态系统的长期生态功能和稳定碳储存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这样的规则框架下，林业碳汇市场可能无意中激励“砍伐林木－植树造林－砍伐林木”的循环行为。此外，根据林业碳汇项目的开发条件，造林用地具有“至少三年不符合森林定义”的要求。对于森林基础条件好、覆盖率高的地区而言，符合开发林业碳汇项目的造林地少、成本高，由此形成的行为激励也是“砍伐林木－造林用地－植树造林”。二是激励营造人工针叶纯林，而非营造符合近自然经营理念的复层异龄混交林。根据现行规则，仅对通过人为干预（如补植补造、

[①]资料来源：“Bali Action Plan”，https://www.preventionweb.net/files/8376_BaliE.pdf。

[②]资料来源：《巴黎协定》，https://unfccc.int/files/meetings/paris_nov_2015/application/pdf/paris_agreement_chinese.pdf。

[③]资料来源：《我国提交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https://www.ndrc.gov.cn/xwdt/xwfb/201506/t20150630_955646.html。

灌溉施肥、修枝打叶等措施）产生的超出基线情景的碳汇增量予以核证，而森林自然演替的固碳效益则被排除在交易体系之外。这种规则设计通过碳汇收益的激励机制，客观上放大了人工针叶纯林的经济优势（如造林和育林技术简单，单位面积主要树种蓄积量较高，便于机械化作业且营林成本较低），从而促使林业经营者优先选择此类林分。然而，人工纯林通常采用炼山、全垦等整地方式，存在过量施用化肥和除草剂的风险，从而导致生态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下降及生态稳定性弱化等问题。相较之下，近自然林业践行生态系统整体经营理念，强调通过复层异龄林的经营方式，充分利用森林天然更新和天然整枝过程，减少人为干扰；遵循适地适树的原则以保护地力；采用单株择伐为主的多种采伐方式替代皆伐，以维持森林的原生结构和长期生态稳定性。有研究表明，在1750－2010年的两个半世纪里，欧洲的土地利用变化使森林面积增加了10%，并使85%以上的森林得到了管理，然而，这些变化并未实现预期的气候减缓目标（Naudts et al.，2016）。木材采伐释放了本应储存在生物量、枯枝落叶和土壤碳库中的碳，而树种转换（大量的阔叶林被改造成速生针叶林[①]）更是引发了森林表面反射率、粗糙度、冠层和蒸发量的变化，从而降低了欧洲森林的碳封存能力（Naudts et al.，2016）。因此，过于偏重木材生产和林业碳汇的现行规则可能会导致其他生态系统功能的破坏。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激励效应是碳汇核证规则在实际应用中可能出现的非预期后果。理想状态下，木材生产与碳封存目标之间实现平衡，能够满足人类对森林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的需求。这不仅需要在规则设计中进一步优化激励机制，还需加强对森林生态系统整体功能的保护和管理，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

（三）中国林业碳汇交易背后的行为逻辑

2011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和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②]。2012年，《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出台[③]，为经过备案核证的CCER项目参与碳交易市场敞开大门，标志着国内林业碳汇试点交易正式启动。2013－2016年，首批批准的7个省市和福建省相继开展ETS试点；自2021年7月16日起，中国启动全国ETS，一跃成为全球覆盖碳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赵书博等，2024）。2023年，生态环境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随后，生态环境部正式发布新的CCER造林碳汇方法学。2024年，CCER市场正式重启，至此，中国林业碳汇市场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市场交易格局形成。在强制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CCER标准作为最主流、最权威、审核最严格的自愿碳交易标准，是最主要的碳市场抵消机制。在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除了全国性林业碳汇项目，地方性自愿碳交易标准（如福建顺昌“一元碳

[①]Naudts et al.（2016）的研究表明：1750年，欧洲森林中阔叶林占比为70%，未经干预的天然林占比为37%，轻度干预的天然林占比为27%；到2010年，阔叶林的占比下降至43%，未经干预的天然林和轻度干预的天然林占比均降至14%。

[②]《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1〕2601号），https://zfxxgk.ndrc.gov.cn/web/iteminfo.jsp?id=1349。

[③]《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发改气候〔2012〕1668号），https://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qtwj/201611/t20161115_1162096.html。

汇”、贵州单株碳汇、广东等地方政府主导的碳普惠标准）也为市场提供了多元化选择（蓝虹和杜彦霖，2024）。

从经济属性看，森林碳汇是一种全球性的公共物品，其生产总量取决于最弱环节的最低投入，也需要大量、持续“最优注入”。中国林业碳汇交易背后的市场逻辑需从供给、需求和价格形成机制上考量。第一，中国林业碳汇潜力巨大，但市场供给不足。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的有关规则，只有通过营造林与育林等手段额外增加的碳汇量，提供可核查的有效证据证明，并获第三方审定机构核实的，才可进行碳汇交易。中国 CCER 项目的核算和计量主要沿用 CDM 的开发流程，项目方法学的技术标准繁复且不统一（彭红军等，2024）。截至 2024 年 12 月，生态环境部仅签发了造林碳汇方法学，森林经营和避免森林转换的方法学尚未公布。由于缺乏统一的市场标准，林业碳汇市场呈现区域分割的碎片化格局，各地碳市场抵消机制、林业碳普惠标准等规定各不相同，限制了林业碳汇项目的流动性。同时，CCER 市场准入机制在项目分类精细化、土地面积评估标准化以及碳泄漏风险防控等方面的不足导致项目审查流程冗长。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周期长、资金负担重，林业碳汇经营者面临巨大压力，存在转向国际碳汇项目从而产生固碳效益区域转移的风险（彭红军等，2024）。此外，林业碳汇项目开发过程中涉及林农、村集体、林场、林业企业、林业主管部门等多个利益相关主体，实际运作中产权主体和产权界限有待进一步厘清。第二，现行碳排放管理制度下林业碳汇市场需求不足。林业碳汇市场需求主要来源于政府强制性限排规定，企业是主要需求方。目前，国际上大部分地区均允许对林业碳汇通过抵消机制间接交易获取补偿，但交易标的为“碳排放配额”而非“碳中和服务”，且设置了林业碳汇抵消比例。目前，中国的全国 ETS 配额 100%免费分配，但碳配额过于宽松，不足以刺激企业的林业碳汇需求。同时，缺乏有效信息披露的林业碳汇市场使交易的不确定性加大，企业履约成本增高，从而导致企业对林业碳汇的需求降低。第三，中国林业碳汇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尚不健全。首先是政策不确定性对碳价影响较大。由于涉及木材生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出于审慎对林业碳汇市场进行严格管制，于是中国现行的林木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公益林管理制度、天然林禁伐政策等都对社会资本进入林业碳汇行业产生了制度性障碍，使项目收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林业生长周期长、生产规模改变难度大等特点决定了林业碳汇供给缺乏价格弹性。因此，林业碳汇交易双方均面临较大的风险。其次是市场买卖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例如：CCER 交易模式主要采用协议转让方式，市场交易主体不熟悉林业碳汇交易流程使中间商赚取高额差价；较高的信息搜寻成本也使林业经营主体和买方在价值评估中处于劣势。

（四）对林业碳汇交易生态损伤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林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森林覆盖率由 1981 年的 12%上升到 2024 年的超过 25%，人工林面积居世界首位，成为全球增绿最多的国家[①]。但中国依然是一个缺林少绿的国家，森林覆盖率低于全球 31%的平均水平[②]。中国发展林业碳汇值得关注和反思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①]资料来源：《我国森林覆盖率已超过 25%》，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11/content_6989076.htm。

[②]资料来源：《2020 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https://www.fao.org/interactive/forest-resources-assessment/2020/zh/。

第一，既要关注外延扩大再生产，更要关注内涵扩大再生产。造林和再造林作为提升森林覆盖率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在当前及未来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单纯依赖外延扩大再生产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也是不争的事实。目前，中国森林蓄积量平均为86.19立方米/公顷（乔木林为94.83立方米/公顷），远低于世界131立方米/公顷的平均水平。全国林地质量处于中、差等级的比例达60.04%，幼龄林、中龄林面积合计占乔木林总面积的63.94%[①]。这表明，在快速扩大森林面积的同时，人工林和天然林的整体质量未能同步提升。此外，中国天然林面积1.39亿公顷（占比63.55%），其中52.68%为国有林[②]，但退化和毁林问题依然严重。2017年，全国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旨在遏制天然林退化，实现森林资源增长。然而，对于部分退化的天然林，单纯禁伐并不足以恢复其碳汇功能；通过积极管理和科学经营，将退化的天然林转化为净碳汇应该是林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在造林再造林的基础上，内涵扩大再生产（如提高森林质量、优化经营管理）是提升林业碳汇潜力的关键路径。根据《全国森林经营规划（2016－2050年）》，到205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稳定在26%以上[③]。但即便中国森林面积再增加4%～5%，也仅能在当前每年8亿～9亿吨森林碳汇量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不到1亿吨。但若通过内涵扩大再生产提高森林质量，使中国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达到国际平均水平，则森林碳汇年增量有望达到15亿吨（徐晋涛，2024）。这不仅需要政府在政策和规划中加大对森林质量提升的引导力度（如通过制定科学的森林经营规划、提供专项资金支持低产林改造），还需要通过市场化交易激励林业经营者主动改进林地经营技术（如通过碳交易价格差异奖励混合林或高质量天然林经营）。通过科学的政府引导和碳交易市场的充分激励，形成“数量与质量齐升”的良性机制。

第二，木材供应缺口大带来的木材安全问题值得关注。中国森林生产力长期较低，加之对森林保护的重视导致砍伐行为受到严格限制，以及社会上“伐木即破坏生态”的认知偏颇，均使中国木材产量徘徊不前。为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进口木材逐渐超过国产木材，成为国内木材市场的主要供给来源。据《中国林产品贸易回顾：2011－2020年》统计，2011－2020年，中国木材供应缺口增加了60%；2020年，按净重计算，中国林产品进口量占全球有记录的林产品进口总量的近30%[④]。2021年，中国林产品进口额达到928.8亿美元，同比2020年增长25.1%；其中，林产品进口价格水平上涨23.35%[⑤]。这种木材供给现状带来了以下主要影响。一方面，由于高度依赖进口且成本偏高，木材作为优质可再生资源未能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高碳原材料和能源产品的过多使用掣肘国家绿色发展速度。此外，随着更多国家引入或实施原木出口限制，中国木材供应来源的稳定性也面临挑战。另一方

[①]资料来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19：《中国森林资源报告（2014－2018）》，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第4-8页。

[②]资料来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19：《中国森林资源报告（2014－2018）》，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第22页。

[③]资料来源：《全国森林经营规划（2016－2050年）》，https://www.gov.cn/xinwen/2016-07/28/5095504/files/b9ac167edfd748dc8c1a256a784f40d5.pdf。

[④]资料来源：《中国林产品贸易回顾：2011－2020年》，https://www.forest-trends.org/wp-content/uploads/2022/07/CHN-China-Trade-Report-3.pdf。

[⑤]资料来源：《2021中国林业和草原发展报告摘要》，https://www.forestry.gov.cn/u/cms/www/202306/15150946bkff.pdf。

面，不利于中国在“碳政治”博弈中提升国际话语权。2011－2020 年，中国主要的木材进口来源国包括俄罗斯（24%）、加拿大（9.4%）、越南（8.2%）、美国（7.8%）、欧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7.4%）、澳大利亚（7.3%）和泰国（5.7%），其中，约一半的进口木材来自被评估为木材合法性风险较高的国家[①]。这些国家的大部分木材以阔叶原木形式出口至中国，这一情况引发的国际关注进一步加剧中国在国际政治博弈中的压力（徐晋涛和易媛媛，2022）。这表明，林业不仅需要关注生态安全，还要重视木材安全，以林业高质量发展为基础推动林业碳汇发展。为此，政府与市场的协同治理尤为关键，体现在：政府通过立法完善木材利用结构和进口监管，运用财政补贴和技术标准化等工具降低市场主体进入优质人工林培育领域的门槛；在此基础上，市场通过价格信号和高效的资源配置，推动优质人工林项目可持续发展，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向转化。

第三，必须高度重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多样性。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多样性是里约三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②]和《生物多样性公约》[③]的基础。生态系统完整性是指生态系统具备支持和维持与自然栖息地相当的物种组成、多样性及功能组织的能力。当其主要生态特征（如组成、结构、功能和生态过程）处于自然变化范围内，并且能够承受由自然环境动态或人为破坏造成的大多数扰动且从中恢复时，该生态系统被视为具有完整性（Parrish et al.，2003）。具有高度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森林比同类型的改造森林能够提供更高水平的多种效益。相对于人工林，原生原始森林或恢复的原生森林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流失控制和涵养水源方面具有更强的协同效益。在造林或再造林工作中，应优先选择混合树种或自然恢复的原生树种，而非单一的人工林（Hua et al.，2022）。中国 48%的天然林为纯林，81%的人工林为单一树种，中国森林每公顷生态系统服务的年价值估计仅为德国或日本的 40%[④]。林业碳汇只是森林生态系统所提供的诸多生态服务中的一种，而且这些服务供给是整体不可分割的。由此，发展林业碳汇的同时要注重发挥森林生态系统的综合效益。政府可探索制定碳汇方法学标准，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碳汇价值评估，并通过价格差异化反映天然林和混交林的生态服务价值，从而更有效地激励生态系统多样化价值的实现。

因此，中国在林业碳汇的市场化进程中，也需要警惕生态交易的市场陷阱。从广义层面来说，市场价值通常会排挤非市场价值，从而导致商业规则取代道德义务；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维度来讲，市场机制显然难以表达生态学所涵盖的功能性指向，而从经济效益维度进行的市场出清必然会偏离保护生态价值的根本目的。因此，亟须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确保市场交易始

[①]资料来源：《中国林产品贸易回顾：2011－2020 年》，https://www.forest-trends.org/wp-content/uploads/2022/07/CHN-China-Trade-Report-3.pdf。根据森林趋势的国家治理相对风险排名，在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俄罗斯、越南、巴西、老挝、柬埔寨和印度被评估为木材合法性风险较高的国家。

[②]资料来源：《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A-AC.241-27。

[③]资料来源：《生物多样性公约》，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cbd。

[④]资料来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19：《中国森林资源报告（2014－2018）》，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第 18 页。

终置于生态保护的制度框架内。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认识。这一理念至少可以做两类表达：一是存在论，即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其存在不会损伤生态的整体价值；二是手段论，即绿水青山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转换为金山银山，但这有可能会导致生态价值的结构性偏差。在谋求增长的经济学信念中，分工与交易是财富积累的根源，但在社会公平与生态伦理的维度上，并非所有的交易都有助于人类福祉的进步。因此，对于生态产品价值及其市场化路径，应抱有警惕的态度，并通过政府监管与市场激励相结合的机制设计，为生态保护留有合理空间。

五、调整策略：交易规则的改进与匹配

从理论层面看，经济学所推崇的效率目标及其标准化管理模式，固然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也不可避免地催生了急功近利的思维，忽视了整体社会福利，甚至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韧性造成长远的损伤。从实践层面看，这种对“效率最大化”或“物质最大化”的执着追求，逐渐演变为“现代化”运行的主要逻辑，“标准化”则被工具化为社会管理和资源分配的重要手段。然而，以保护生态为目标的碳汇市场及林业碳汇量化体系，在这一逻辑下明显偏离了生态系统服务的多目标特性，过于依赖单一化、可量化的价值指标，导致生态多样性和系统完整性被忽视，同时也加剧了生态价值实现与社会福祉改善之间的结构性偏差。基于上述理论反思与实践观察，本文将重点聚焦林业碳汇市场的交易规则，并从操作层面提出相应的改进与调整策略。

（一）完善林业碳汇的量化体系

气候变化影响自然资本的存量以及自然的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首先，碳减排价值的量化需要综合考量生态系统服务所承载的生态成本。然而，生态系统提供的许多产品具有独特性和非市场性，其价值很难被估计。因此，林业碳汇及其交易体系不能孤立运行，必须与多样化的生态产品连接起来，通过扩展碳汇计量指标和建立完善的碳汇技术标准体系实现整合。其次，政府需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应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方法学规则，为市场提供明确的操作框架；另一方面，需激励市场主体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碳汇量化的效率和灵活性。有研究表明，通过扩展成本效益综合评估模型，将自然资本作为一种财富形式纳入分析框架，既体现其非使用价值（涵盖生物多样性、文化传承等与直接消费无关的固有价值），也量化其使用价值（作为生态系统服务和市场商品生产的必要投入），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估自然资本对人类福祉的贡献（Bastien-Olvera and Moore，2021）。再次，林业碳汇量化体系应该具有弹性，即关注技术创新和环境变化。Yu et al.（2024）通过模拟中国实施最佳森林管理措施带来的碳汇增量，发现将传统经济意义上的木材最佳采伐年龄推迟5年，用材林的碳汇可增加2.5%～3.3%；若在2025年将不适宜的树种替换为本地树种，则碳汇可额外增加0.1%～0.6%。最后，要完善林业碳汇方法学。结合中国森林资源实际，政府可探索采用动态碳基线设定方法，增强碳基线设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细化额外性评估标准，强化林业碳汇项目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额外性的定期审核机制；简化并建立统一的碳储量核算标准，鼓励市场主体使用遥感、感应器等数字化设备增强核算能力；开展林业碳汇项目的碳泄漏风险评估，设定合理的碳泄漏值，确保碳减排量的真实可靠。

（二）强化林业管理的本地知识

本地知识对森林资源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已得到广泛认可。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8（j）条要求，所有缔约方尊重、保存、维持土著和地方社区那些体现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久使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做法，并促进其广泛应用[①]。基于此，政府可通过制定地方性生态保护指南，引导市场主体在造林实践中整合本地知识与现代技术，结合自然规律与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实施科学造林。同时，政府可建立基于本地知识的碳汇评估标准，并通过市场机制激励企业采用适地适树原则，提高新造林的固碳能力。在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方面，政府需完善高碳储量森林管理技术的推广政策，并鼓励市场主体利用碳汇交易收益等经济杠杆，推动成过熟林及时采伐以优化林龄结构，提高森林整体固碳速率；用本地珍稀高碳汇树种取代外来和不合适的树种，优化树种结构；科学规划培育大径材，将原木的径级经济与增汇效应联动。

（三）重视生态发展的长期目标

人类社会的演化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谋求生存”，摆脱“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以满足物欲的经济增长；二是“财富积累”，目的是追求平等的社会发展；三是“超越增长”，目的是实现以人为本的人性解放。超越经济增长，从 GDP 与财富积累的最大化转向人与自然的融合，从而谋求人类福祉最大化及其持久性，或许就是物质文明（财富）、精神文明（自由）、政治文明（平等）、生态文明（天人合一）的高度统一。在现实的社会中，人们有望达成的基本共识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生态系统服务与其他商品得到更一致的对待。环境经济学家的态度是，碳总量核算模型需结合政策工具，为长周期林业碳汇项目的林业经营者提供安全可预期的信贷渠道（Galinato and Uchida，2010）；同时，可结合林业碳汇项目的历史碳汇基线，制定合理的碳储量水平，以降低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此外，在森林管理层面，还须关注森林碳汇量会随森林年龄增长而发生的变化。由于中国森林中幼龄林和中龄林所占比例很大，未来 15 年左右森林将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但随着森林的老化，其净初级生产力将不断下降（Shang et al.，2023）。因此，有必要将制定科学的森林管理规划提上议事日程。

（四）构建林农参与的享益机制

当前，全世界参与碳汇交易的农户数量非常有限。已有研究表明，制度供给的有效性对于遏制“资源诅咒”的负面传导效应至关重要。因此，政府需制定强制性法律法规，保障林业碳汇交易的安全和交易主体的权益，以满足林农对林业碳汇交易的制度需求（杨博文，2021）。中国集体林地面积占林地总面积的 60%，直接或间接参与林业经营的农户达 1 亿多户[②]。构建林农参与的享益机制对于中国碳汇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政府保障林农的收益分配权益，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并赋予生产者更多自主权；同时，市场通过完善碳交易机制和引入社会资本，支持林农通过与有资质的

[①]资料来源：《生物多样性公约》，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cbd。

[②]资料来源：《国家林草局：我国有集体林地 25.68 亿亩 占林地总面积的 60%》，https://www.eco.gov.cn/news_info/66892.html。

企事业单位、组织合作参与碳汇项目开发[①]，解决资金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从而更高效地落实“谁造林谁受益、谁保有谁受益”的原则。在政府提供保障框架和政策激励的同时，市场机制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促进碳汇收益分配的公平性。例如，新修订的造林碳汇项目方法学明确指出，“鼓励项目减排量收益至少不低于90%返给具体实施了造林活动并拥有林木的所有权或经营权的项目实施主体”[②]。此外，加强针对退化森林经营管理的激励机制建设，以及通过产权保障和碳汇交易收益提高林农参与的公平感与获得感，也是推进碳汇发展的关键。

（五）关注林业碳汇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1997 年的《京都议定书》被视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定。随后，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欧洲气候交易所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相继成立了碳排放权交易场所。随着碳金融的兴起和碳交易市场规模的扩大，碳排放权已经逐渐演变为一种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围绕碳排放权，发达国家构建起一套较为完善的碳金融体系，其中包括碳交易货币、直接投资融资、银行信贷、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品。碳交易的金融化无疑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新的路径，但也引发了新的风险。金融衍生工具的扩展结合美元霸权与地缘政治垄断，可能导致以下后果。第一，制造生态经济“韭菜”。发展中国家可能因市场机制的不对等而成为生态金融体系的牺牲品，被迫承担更大的减排成本。第二，形成生态经济霸权。发达国家通过技术优势和资本积累，掌控碳交易规则，在国际生态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也可能进一步压缩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第三，引发环境经济泡沫。由于碳排放权的过度金融化，其价格波动可能脱离实际减排目标，导致资本市场的动荡，并对真实的生态保护形成干扰。因此，在上述背景下，政府与市场的结合是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政府通过制定强有力的政策框架，规范碳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交易，防范市场失灵对生态保护目标的冲击；同时，市场通过创新机制提升碳金融产品的生态效益，确保资本流向真正有助于减排和生态保护的领域。在国际层面，提升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生态政治领域中的话语权，是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在政治导向上，要反对全球碳市场规则中的歧视性，维护包容与公平的国际规范；在技术手段上，要反对碳市场作为资本逐利的工具，强化市场机制对生态保护的实际意义；在治理方式上，要通过政策国际合作和磋商机制，构建充分考虑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监管机制与治理体系。只有这样，全球生态保护才能真正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恩道尔，2008：《粮食危机：运用粮食武器获取世界霸权》，赵刚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第 15-36 页。

2.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2022：《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1-12 页。

[①]根据《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林农个人不能够作为碳汇项目开发业主，但可通过成立公司或委托具有法人资质的企事业单位、组织作为项目业主进行碳汇项目开发。

[②]《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造林碳汇（CCER-14-001-V01）》，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310/W020231024631535201815.pdf。

3.郇庆治，2016：《“碳政治”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批判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第24-41页。

4.黄仁宇，2020：《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北京：九州出版社，第21页。

5.蓝虹、杜彦霖，2024：《自愿碳交易市场：产权量化标准与生态价值实现路径》，《改革》第4期，第77-92页。

6.李怒云，2016：《中国林业碳汇》（修订版），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第5-6页。

7.里夫金，2022：《韧性时代：重新思考人类的发展和进化》，郑挺颖、阮南捷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第14-16页。

8.罗必良、耿鹏鹏，2022：《乡村治理及其转型的产权逻辑》，《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188-204页。

9.罗尔斯，2001：《正义论》，何怀宏、廖申白、何包钢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48-253页。

10.彭红军、刘奕辰、吴祎扬、徐笑、窦逗逗，2024：《林业碳汇市场化交易机制研究》，《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https://link.cnki.net/urlid/32.1161.S.20240902.1634.002。

11.邵青还，2017：《德国林业经营思想和理论发展200年》，北京：中林联林业规划设计研究院，第11-20页。

12.斯科特，2019a：《反谷》，翁德明译，台北：麦田出版社，第95-119页、第147-184页。

13.斯科特，2019b：《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4-22页。

14.泰勒，2013：《科学管理原理》，马风才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第40-65页、第78-95页。

15.王际杰，2024：《国际碳定价：进展、形势与应对策略》，《气候变化研究进展》第6期，第773-781页。

16.徐晋涛，2024：《中国绿色低碳转型的几个关键问题》，《新金融》第12期，第22-27页。

17.徐晋涛、易媛媛，2022：《“双碳”目标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森林碳汇的潜力和政策需求》，《农业经济问题》第9期，第11-23页。

18.杨博文，2021：《“资源诅咒”抑或“制度失灵”？——基于中国林业碳汇交易制度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第51-70页。

19.赵书博、姜明耀、李昂，2024：《全球碳定价的发展趋势、改革路径及中国借鉴》，《亚太经济》第5期，第13-24页。

20.Agrawal, A., A. Chhatre, and E. R. Gerber, 2015, “Motivational Crowding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9(3): 470-487.

21.Bastien-Olvera, B. A., and F. C. Moore, 2021, “Use and Non-Use Value of Nature and the Social Cost of Carbon”, *Nature Sustainability*, 4(2): 101-108.

22.Costanza, R., R. d’Arge, R. de Groot, S. Farber, M. Grasso, B. Hannon, K. Limburg, S. Naeem, R. V. O’Neill, J. Paruelo, R. G. Raskin, P. Sutton, and M. Belt, 1997, “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 *Nature*, 387(15): 253-260.

23.Costanza, R., R. Groot, L. Braat, I. Kubiszewski, L. Fioramonti, P. Sutton, S. Farber, and M. Grasso, 2017, “Twenty Years of Ecosystem Services: How Far Have We Come and How Far Do We Still Need to Go?”, *Ecosystem Services*, 28(Part A): 1-16.

24.Galinato, G. I., and S. Uchida, 2010, “Evaluating Temporary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in Reforestation and Afforestation Programs”,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46(1): 111-133.

25.Gneezy, U., S. Meier, and P. Rey-Biel, 2011, “When and Why Incentives (Don’t) Work to Modify Behavior”,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5(4): 191-209.

26.Hua, F., L. A. Bruijnzeel, P. Meli, P. A. Martin, J. Zhang, S. Nakagawa, X. Miao, and W. Wang, 2022, “The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 Contributions and Trade-Offs of Forest Restoration Approaches”, *Science*, 376(6595): 839-844.

27.Kenter, J. O., L. O’Brien, N. Hockley, N. Ravenscroft, I. Fazey, K. N. Irvine, M. S. Reed, M. Christie, E. Brady, R. Bryce, A. Church, N. Cooper, A. Davies, A. Evely, M. Everard, R. Fish, J. A. Fisher, N. Jobstvogt, C. Molloy, J. Orchard-Webb, S. Ranger, M. Ryan, V. Watson, and S. Williams, 2015, “What Are Shared and Social Values of Ecosystems? ”, *Ecological Economics*, 111: 86-89.

28.Marsh, G. P., 1864, *Man and Natur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14-15.

29.Martin, A., N. Gross-Camp, B. Kebede, and S. McGuire, 2014, “Measuring Effectiveness, Efficiency and Equity in an Experimental 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Trial”,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8: 216-226.

30.McElwee, P., T. Nghiem, H. Le, H. Vu, and N. Tran, 2014,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Contested Neoliberalis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ase Study from Vietnam”,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36: 423-440.

31.Naudts, K., Y. Chen, M. J. McGrath, J. Ryder, A. Valade, J. Otto, and S. Luyssaert, 2016, “Europe’s Forest Management Did Not Mitigate Climate Warming”, *Science*, 351(6273): 597-600.

32.Ostrom, E., J. Burger, C. B. Field, R. B. Norgaard, and D. Policansky, 1999, “Revisiting the Commons: Local Lessons, Global Challenges”, *Science*, 284(5412): 278-282.

33.Pagiola, S., J. Bishop, and N. Landell-Mills, 2002, *Selling Forest Environmental Services: Market-Based Mechanisms for Conservation*, London: Earthscan, 1-10.

34.Parks, S., and J. Gowdy, 2013, “What Have Economists Learned About Valuing Nature? A Review Essay”, *Ecosystem Services*, 3: e1-e10.

35.Parrish, J. D., D. P. Braun, and R. S. Unnasch, 2003, “Are We Conserving What We Say We Are? Measuring Ecological Integrity Within Protected Areas”, *BioScience*, 53(9): 851-860.

36.Shang, R., J. M. Chen, M. Xu, X. Lin, P. Li, G. Yu, N. He, L. Xu, P. Gong, L. Liu, H. Liu, and W. Jiao, 2023, “China’s Current Forest Age Structure Will Lead to Weakened Carbon Sinks in the Near Future”, *The Innovation*, 4(6), 100515.

37.Stoeckl, N., C. Hicks, M. Farr, D. Grainger, M. Esparon, J. Thomas, and S. Larson, 2018, “The Crowding Out of Complex Social Goods”, *Ecological Economics*, 144: 65-72.

38.Viitala, E. J., 2016, “Timber, Science and Statecraft: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Forest Resource Economic Thought in Germany”, *European Journal of Forest Research*, 135: 1037-1054.

39.Yu. Z., S. Liu, H. Li, J. Liang, W. Liu, S. Piao, H. Tian, G. Zhou, C. Lu, W. You, P. Sun, Y. Dong, S. Sitch, and E. Agathokleous, 2024, “Maximizing Carbon Sequestration Potential in Chinese Forests Through Optimal Management”, *Nature Communications*, 15(1): 3154.

Incentive Deviations and Adjustment Strategies in Carbon Sink Trading: Reflections on Efficiency-Oriented and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Models

LUO Biliang[1] ZHONG Wenjing[1] HONG Yanzhen[2]
(1. National School of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 and Develop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Summary: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re critical to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d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has evolved from a fundamental consensus to a global action. This paper begins by examining representative events such a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land management, the scientification of forestry management and the centralization and scaling-up of production, exploring the challenges and impacts that the efficiency goals of economics and th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model initiated b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y bring.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concept, types, and pricing mechanisms of ecological produc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rket-driven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revealing how the efficiency orientation and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traditional economics may crowd out non-market values with market value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takes forestry carbon sink trading as an example for further analysis. First, it identifies three major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forestry carbon sink: high effectiveness, low costs, and significant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otential through the use of sustainably harvested timber as a substitute for energy-intensive materials. Second, it analyzes the behavioral incentive mechanisms of forestry carbon sink trading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rguing that attempts to commodify complex social goods through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ly fully on "markets" and market incentives may, in turn, undermine people's intrinsic motivations and corresponding action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Third, drawing on the practice of forestry carbon sink trading in China, this paper distills the underlying behavioral logic: (1) while China has significant potential for forestry carbon sink, market supply remains insufficient; (2) under the current carbon emission management system, market demand for forestry carbon sink is inadequate; (3) the pricing mechanism for China's forestry carbon market is still underdeveloped. Finally,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potential ecological damage triggered by forestry carbon sink trading, analyzing the incentive biases inherent in such market transactions: prioritizing large-scale afforestation while neglecting the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carbon sink potential in natural and mature forests; and promoting the creation of artificial monoculture conifer plantations, which significantly undermine ecosystem integrity and biodiversity.

In response to these issues, the paper proposes adjustment strategies,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quantification system for forestry carbon sink,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localized knowledge in forest management, emphasizing long-term ecological development goals, constructing benefit-sharing mechanisms for forest farmers, and consider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behind forestry carbon sink.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improve and align the rules of the forestry carbon sink market, thereby avoiding national welfare losses caused by ecological inequality.

Keywords: Carbon Sink Trading;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Market Mechanism; Incentive Bias

JEL Classification: Q58; Q57; D62

（责任编辑：黄　易）

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的促农增收效应

——来自脱贫县的证据

闫昱睿　张军涛

摘要：发展地理标志特色产业是实现富农兴农的长远之计，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全国 610 个脱贫县 2005－2021 年的面板数据，检验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的促农增收效应。研究发现：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可以显著提升农民收入，并且在脱贫县摘帽后仍能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可以通过在微观层面吸引农产品加工企业落户、在中观层面促进农业产业集聚两条路径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农村电商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强化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的促农增收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充分释放脱贫地区特色资源潜能、增强农村脱贫人口内生发展动力提供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地理标志　农产品　脱贫县　乡村振兴　农民增收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地理标志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重要领域，最早源于 1883 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关于原产地名称保护的条约，随后在 1994 年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被正式提出。中国拥有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灿烂悠久的农耕文明，孕育出众多独具特色的地方特产。古人编纂的地方志往往会记载当地的“物产”或“土产”等资源，如今的地理标志多源于此。从 1985 年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开始，中国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工作已经走过 40 年的历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地理标志保护工作，在 2021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发展地理标志农产品，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和《“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中提出实施地理标志保护工程。2024 年 2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和《集体商标、证明

[资助项目]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大项目“产业协同集聚的微观机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政策工具研究”（编号：L23ZD025）。

[作者信息] 闫昱睿，东北财经大学东北全面振兴研究院，电子邮箱：yanyurui1019@126.com；张军涛，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电子邮箱：jtzhang001@163.com。

商标注册和管理规定》开始施行，在地理标志产品认定、管理和保护三个方面强化地理标志保护，标志着中国地理标志保护工作步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政府保护的地理标志绝大多数是涉农产品，占总数的98.24%[①]。地理标志是与“三农”问题联系最紧密的知识产权，保护好、管理好和发展好地理标志是实现富农兴农的长远之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强调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最基本的任务是促进脱贫人口的持续增收。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历史节点，探索农村脱贫人口的可持续增收路径，具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独特价值，对于守牢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地理标志保护在富农兴农中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二、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对地理标志保护的经济效益进行了全面分析。一些学者提出，地理标志保护将农产品的地位从“商品”转变为“原产地产品”（Galtier et al.，2013），是解决产销之间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的政策工具（Cei et al.，2018），可以为农产品带来溢价（Moschini et al.，2008；蒋玉等，2023），在促进减贫增收、推动产业集聚和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地理标志保护的减贫增收效应方面，许多研究表明，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实施地理标志保护政策是促进生产者增收的重要途径（Jena and Grote，2012；Wang et al.，2021），可以提升农民福利、缓解农村贫困（Jena et al.，2015）。然而，部分学者认为，地理标志保护产生的溢价可能被中间商而非生产者获取，因此地理标志保护政策实施对农民收入的提升作用十分有限（Galtier et al.，2013）。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市场体系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和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地理标志保护减贫增收效应的发挥受到严重制约（Bowen and Zapata，2009）。影响农民收益的另一个潜在问题是：地理标志保护会增加农户在农产品生产中的农资投入（薛彩霞和姚顺波，2016），从而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成本，这必须通过产品的大幅溢价销售来抵消（Hajdukiewicz，2014）。基于印度香米和法国布里奶酪的案例研究显示，地理标志保护尽管会使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加，但其销售价格也更高，因而可以提高农民的净收入（Bouamra and Chaaban，2010；Jena and Grote，2012）。当前，考察中国地理标志保护减贫增收效应的文献相对匮乏。刘华军（2011）基于省级数据的分析表明，地理标志保护对农民收入有正向促进作用；邰秀军等（2017）以山西省110个县为研究对象，发现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化有助于促进农村减贫。还有部分文献对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的减贫增收效应进行了考察。Zhang et al.（2023）研究发现，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对本地和邻近地区农民的相对贫困具有缓

[①]资料来源：《第四次全国地理标志数量调研报告》，https://www.china-county.org/?list_7/2348.html。

[②]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0-31页。

解作用；Yin et al.（2024）基于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显著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此外，也有文献运用单个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微观调查数据展开研究，发现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能够给生产者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李赵盼和郑少锋，2021；李翠霞和潘雨桐，2024）。

在地理标志保护的产业集聚效应方面，一些学者认为地理标志产品具有高附加值属性，可以吸引资金、人才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农村集聚，实现有机融合，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结构优化（Bowen and Zapata，2009），还可以增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为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扩张提供动力（Qie et al.，2023），有助于提升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形成区域专业化生产格局（Tashiro et al.，2019）。在地理标志保护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有研究表明，地理标志保护不仅能够增加就业岗位，有效遏制农村劳动力外流（Cei et al.，2018），还有助于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促进传统文化遗产的推广（Airriess，2020），并对打造乡村精品旅游品牌、形成区域软实力具有积极作用（张亚峰等，2019），被视为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良好政策工具（Crescenzi et al.，2022）。此外，地理标志的品牌效应可以提高外贸农产品的竞争优势，提升农产品出口价格，对地区出口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张米尔等，2022）。近年来，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为地理标志产品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Trivelli et al.，2019）。电子商务是数字经济发展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为消费者提供详细的地理标志产品信息，为生产者提供在线销售渠道，促进地理标志产品市场拓展（Lee et al.，2019）。同时，电子商务也为买卖双方提供了方便交流的平台，可以使地理标志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建立直接联系，促进信息互动和共享，提高交易便利性和市场透明度（Bartoli et al.，2022），有助于保持地理标志产品的价格稳定和提高农民收入（Zhang et al.，2023）。作为一种新兴的电子商务模式，直播电商已经成为中国部分消费者购物的新常态。有研究表明，在具有地理标志产品的县域，政府领导干部参与直播带货的频数和活跃度更高，且经济效益较好（丁志伟等，2023）。

综上所述，已有大量文献对地理标志保护的经济效益进行了探讨，但多数文献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或基于小规模的抽样调查数据展开分析，缺少大样本数据的定量研究。有关中国地理标志保护的减贫增收效应的研究主要使用省级层面数据或以某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对脱贫县进行研究的文献甚少。此外，关于数字经济赋能地理标志产品产业发展的研究主要围绕电子商务对地理标志保护的影响展开，鲜有文献提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地理标志保护促进农民增收中的作用。因此，本文将脱贫县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手动收集的地理标志农产品数据，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验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的促农增收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讨论农村电商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促农增收效应的调节作用。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促进脱贫县农民增收这一独特视角出发，揭示地理标志保护在脱贫县摘帽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进一步深入挖掘培育地理标志、带动脱贫人口持续增收提供决策依据。第二，在实证分析中，以全国 22 个省（区、市）的脱贫县作为研究样本，避免研究视角过于聚焦于某个特定区域的片面性，同时也与地理标志保护地域以县域为主的特征相适配，为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的促农增收效应提供更具代表性的证据。第三，结合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求，从数字经济与地理标志联动的视角揭示

农村电商和数字普惠金融在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促进农民增收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为数字经济时代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新思路。

三、概念界定、制度背景与理论机制

（一）概念界定与制度背景

地理标志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①]。地理标志产品以“产地名+产品名”命名，如“金华火腿”“五常大米”“山西老陈醋”“阳澄湖大闸蟹”等，一般具有特定的生产方式，对产地范围、品种选择、生产规程及产后处理等方面均有特殊要求。中国政府加强地理标志保护，逐渐形成分别由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原农业部管理的三套并行的地理标志保护体系，分别是始于1995年的地理标志商标注册保护体系、始于2005年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保护体系和始于2008年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体系。三类地理标志在申请主体、产品范围、品质规范、日常监管和有效期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如表1所示。从产品范围来看，地理标志商标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存在部分陶瓷器皿、玉器珠宝、烟花爆竹等非涉农产品。本文的研究范畴包括涉农地理标志商标、涉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以及农产品地理标志，将其统称为地理标志农产品[②]。

表1　　三种类型地理标志的对比

名称	地理标志商标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农产品地理标志
申请主体	地理标志所标示的地区范围内的团体、协会和其他组织	产地范围内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团体、保护申请机构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择优确定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业协会等组织
产品范围	涉及初级农产品及其加工品、手工艺品、矿产品、工业品等多种产品	来自本地区的种植、养殖产品；原材料全部来自本地区或者部分来自其他地区，并在本地区按照特定工艺生产和加工的产品	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
品质规范	申请材料需要说明地理标志所标示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	申请材料包括产品的理化、感官等质量特色的说明，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报告以及拟申请的地理标志产品的技术标准等	申请材料包括相应产品品质鉴定报告以及产地环境条件、生产技术规范和产品质量安全技术规范等
日常监管	由商标注册人自发进行	由当地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负责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有效期	10年，有效期满前可以申请续展注册	长期有效	长期有效

资料来源：《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规定》，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226/202403/content_6940044.html；《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226/202403/content_6940042.html；《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http://www.moa.gov.cn/govpublic/CYZCFGS/201006/t20100606_1532749.htm。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https://www.gov.cn/guoqing/2020-12/24/content_5572941.htm。

[②]后文所提到的地理标志商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均指涉农地理标志商标和涉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01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开展地理标志商标注册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登记工作。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19 年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专用标识，同时涵盖地理标志商标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两大类地理标志。农业农村部在 2022 年 2 月公示了最新一批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信息后，当年 11 月发布公告称停止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工作，三套体系并行的地理标志保护格局自此成为历史。

中国政府全面推进地理标志保护工作，地理标志培育和管理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地理标志数量稳步提升，生产者市场主体数量持续增加，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截至 2020 年，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总数达 8273 个，是 2005 年的 26.95 倍，十五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 24.56%[①]，地理标志产品相关产值突破 1 万亿元[②]，在带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脱贫地区特色优质农产品资源优势未能有效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情况，中国政府大力支持脱贫地区开展地理标志培育申报工作。脱贫县的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实现了快速增长，2005－2021 年的平均增速达 31.61%，脱贫县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占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的比重由 2005 年的 9.11%上升到 2020 年的 27.40%。脱贫县 2005－2021 年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发展情况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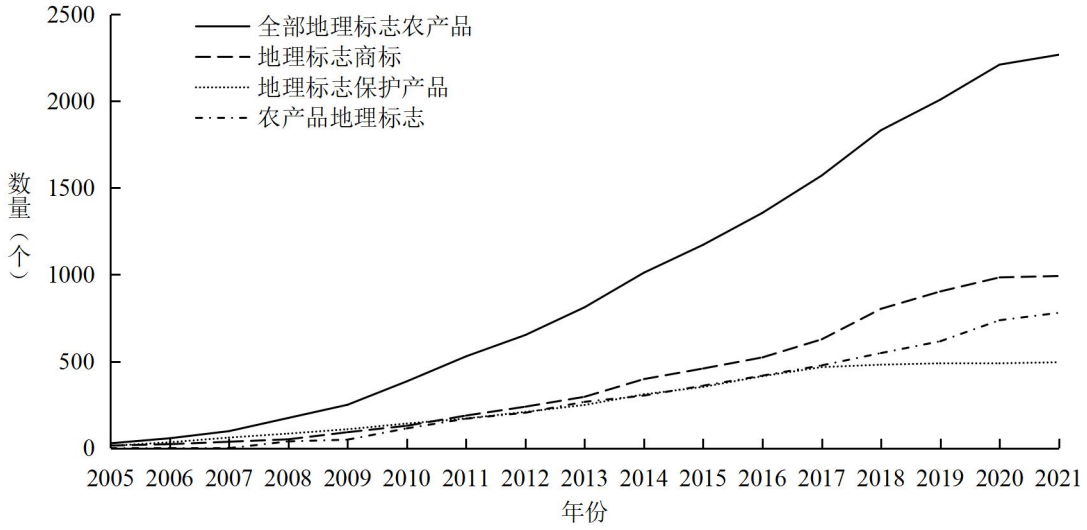


图 1　脱贫县 2005－2021 年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

资料来源：根据笔者收集整理的地理标志农产品相关数据绘制而成。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地理标志代表农产品的独特品质或信誉，可以为农产品提供统一标识认证，赋予农产品“原产地”的标签，提高非原产地生产者“搭便车”的成本。因此，在同质化程度较高的农产品市场中，具有独特性的地理标志农产品相对于普通农产品具有价格优势（Menggala et al.，2021），可以提升消费者对

[①]资料来源：《第四次全国地理标志数量调研报告》，https://www.china-county.org/?list_7/2348.html。

[②]资料来源：《我国地理标志产品相关产值超万亿元》，https://www.gov.cn/xinwen/2020-11/27/content_5565294.htm。

品牌溢价的支付意愿（Bardají et al.，2009），有助于使农民分享产品增值收益。一方面，随着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者的健康意识和文化品位不断提高，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具有独特的风味、口感、质地以及营养价值，而且有独特的区域文化内涵，能够迎合消费者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信任和青睐。另一方面，地理标志农产品采用全产业链标准化生产方式，有利于强化品牌效应，保障产品品质，形成良好声誉。生产者将地理标志专用标识印制在农产品包装上，能够发送质量信号以降低消费者的信息搜寻成本，有效避免农产品交易市场中产销双方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从而帮助消费者克服消费决策中的“有限理性”，使消费者产生更强的购买意愿。此外，从全国范围来看，地理标志农产品均产自特定地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垄断的市场格局（Josling，2006），可以有效避免“谷贱伤农”，不但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的稳定性，还会对农民扩大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规模形成激励，由此使农民获得更多产品溢价，增加实际收入。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1。

H1：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可以提高农民收入。

地理标志农产品从农户到消费者手中往往要经过农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销售推广等流程，农产品加工企业在地理标志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质提升、品牌打造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是推动地理标志农产品由“原字号”向“精字号”转变、提升产品附加值的关键。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化、组织化程度较低，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往往较少。某个农产品获得地理标志认证后产生的溢价效应会使相关农产品加工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盈利能力提升，因此会吸引新的加工企业进入市场。作为初级农产品的主要采购方，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增加会扩大对初级地理标志农产品的需求，进而提升其收购价格，直接促进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同时，新企业进入也会加剧市场竞争，企业为了保障优质原料供应渠道稳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突围”，倾向于采用“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与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并承担绝大部分经营管理风险。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稳定农户收入，还可以增强农户与公司议价的能力，保障农户稳健增收。同时，企业还会在技术层面给予农户统一指导，包括统一规划、统一回购、统一加工的标准化生产流程，可以确保农业生产过程的高效与规范，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让农户更多分享地理标志农产品增值收益。此外，农产品加工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新企业进入可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让更多农民拥有农闲期灵活就业的机会，形成“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的就业模式，增加工资性收入，拓展增收渠道。

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基础薄弱，往往难以支撑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而地理标志可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蕴藏巨大的经济价值。因此，地方政府会加强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力度，组织专业技术团队针对地理标志农产品开展良种培育和技术指导，引导农户扩大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规模，由此推动地理标志农产品在特定保护范围内集中布局，依托产地优势形成优质产业集聚区。这有助于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形成“一县一业”的专业化发展格局，有效避免同质化竞争，从而增强地理标志农产品的溢价能力，优化地理标志农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使农民经营性收入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同时，地

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可以通过良好的市场反馈持续吸引生产要素聚集（Crescenzi et al.，2022），由此不断扩大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规模，推动农业从种养环节向农产品加工流通等环节延伸，形成上下游配套、多链条衔接、协同式集聚的产业集群，带来集聚经济效益。这一方面可以产生知识溢出效应，推动生产经验和新技术推广，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地理标志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不断提升，形成农民经营性收入长效增长机制；另一方面有助于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高仓储、保鲜、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的共享效率，实现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生产，带来规模报酬递增收益，拓展产业增值空间，推动农民经营性收入持续增长。此外，地理标志农产品相关产业集聚也可以创造大量季节性务工机会，使农村劳动力实现多形式、多种类、多渠道就业，提升工资性收入，达到“农业生产+务工就业”的双增收效果。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2a 和 H2b。

H2a：在微观层面，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可以通过吸引农产品加工企业落户提高农民收入。

H2b：在中观层面，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可以通过促进农业产业集聚提高农民收入。

县乡村三级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和物流配送体系不断完善推动了农村电商快速发展，也使地理标志农产品相关产业发展获得了“数字红利”。地理标志农产品与电子商务结合已经成为助推农民增收的新动能。首先，农村电商发展使地理标志农产品销售摆脱了地域和空间限制，与大市场即时对接，缩小了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有助于重塑地理标志农产品的价值链，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农户市场议价能力，使农户直接获得地理标志农产品的溢价红利。其次，利用电商平台，农户能够更精准地了解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和偏好，根据市场反应制订和调整生产计划、改进生产环节，由此提升自身的市场适应能力，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供需不平衡问题，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增强获利能力。再次，电子商务可以使地理标志农产品实现产销对接，有助于拓宽地理标志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为其提供稳定的线上市场（李琪等，2019）。除了传统的网店营销模式外，直播带货和短视频创作等新兴电商模式可以将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特定品质和内涵信息传递给消费者，使地理标志农产品获得市场的广泛认可，从而提高地理标志农产品的消费需求，提升农户经营性收入。最后，农村电商兴起可以促进地理标志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等周边产业发展，有助于吸引配套企业落户，由此衍生新的就业机会和创业平台，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多种就业岗位，提高其工资性收入。

金融资源配置具有向发达地区和高收入群体倾斜的特征，使得传统金融服务存在准入门槛，进而导致农村传统金融服务供需错配。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驱动的普惠金融新模式，使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移动网络便捷地获取金融服务，降低了农户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可以强化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的促农增收效应。具体而言，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生产需要严格遵守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由此带来农户成本的增加（薛彩霞和姚顺波，2016）。当某个农产品获得地理标志认证后，产地范围内的农户倾向于扩大该产品的生产规模以提高收入，却往往难以承担规模扩张所需的投资成本，面临“融资难”问题（余泉生和周亚虹，2014）。此外，尽管开展地理标志农产品电商营销可以为农民增收开辟新途径，但前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超出了多数农户的资金能力范围。数字普惠金融以其产品形式多样性和覆盖范围广泛性改善了农村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部分解决农户抵押不足的难题，精准对接

农户分散化和小额资金需求。这一方面可以有效弥补农户资金缺口，缓解农户资金投入压力，从而助力其突破发展瓶颈，扩大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规模，拓宽增收渠道；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助推个体农户规模化生产提升地区整体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带动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3a 和 H3b。

H3a：当农村电商发展水平较高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能够更好地发挥促农增收效应。

H3b：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能够更好地发挥促农增收效应。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说明

中国共有 832 个县级单位被纳入 2012 年公布的“全国连片特困地区分县名单”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是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在剔除数据缺失较为严重以及样本期内行政区划范围变更的样本后，本文最终选取 610 个脱贫县作为研究对象。在样本期的选择上，考虑到农业农村部在 2022 年 2 月之后不再发布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公示，这可能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本文选取的研究区间为 2005－2021 年。

笔者分别访问地理标志商标查询平台、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产品检索平台和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查询平台[①]，收集并统计各县历年地理标志商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以及农产品地理标志信息，同时查询地理标志农产品的保护范围信息。为获取各县地理标志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本文对 2005－2013 年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进行清洗，从中筛选出与地理标志农产品直接相关的农产品加工企业[②]，然后在县级层面分年度加总企业数量，并将其与县域面板数据进行匹配。本文使用 ArcGIS 软件，在县域层面对全国逐年平均气温栅格数据、降水栅格数据和地表太阳辐射栅格数据[③]进行提取，获得年均气温、年降水量和年日照时数数据。其余样本数据来源于 EPS 数据库和 2006－2022 年的《中国县域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查询脱贫县所在省（区、市）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进行补充。

（二）计量模型设定

尽管农产品获得地理标志认证可以被视作对当地的政策冲击，但不同县域的地理标志农产品的数量存在较大差异，并且具有随时间累积的特征。使用政策施行时间因个体而异的交叠双重差分模型，

[①]地理标志商标查询平台，http://gi.sootm.net/index/landmark/index；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产品检索平台，https://ggfw-dlbzsq.cnipa.gov.cn/dbQuery；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查询平台，http://www.anluyun.com/Home/Search。

[②]具体做法为：根据《地理标志认定 产品分类与代码》（GB/T 43583－2023）中地理标志农产品的代码，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中匹配对应的制造行业代码，由此确定与地理标志农产品直接相关的行业大类代码为 13（农副食品加工业）、14（食品制造业）、15（饮料制造业），行业中类代码为 273（中药饮片加工）、274（中成药制造），行业小类代码为 2674（香料、香精制造）。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相应行业代码下的企业即为与地理标志农产品直接相关的农产品加工企业。

[③]数据来源于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https://data.tpdc.ac.cn/home。

会由于严重的处理效应异质性问题而产生估计偏误[①]（刘冲等，2022）。因此，本文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Income_{it} = \beta_0 + \beta_1 GI_{it} + X_{it}^{'}\gamma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1）式中：i、t 分别代表县域和年份；$Income_{it}$ 表示农民收入水平；GI_{it} 代表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X_{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μ_i 和 λ_t 分别代表县域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_{it} 为随机误差项。β_1 是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反映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对县域农民收入的影响。

为了考察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影响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本文在（1）式的基础上通过识别核心解释变量对不同机制变量的影响，探究可能存在的影响路径，模型设定如下：

$$Mec_{it} = \theta_0 + \theta_1 GI_{it} + X_{it}^{'}\gamma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2）式中：Mec_{it} 代表机制变量，θ_1 为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对不同机制变量的影响，其他变量及参数的含义与（1）式相同。

在明确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促农增收的机制后，本文进一步探究如何才能使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发挥更大作用，即考察哪些因素有助于强化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的促农增收效应。本文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如下：

$$Income_{it} = \beta_0 + \eta_1 GI_{it} \times ad_{it} + \eta_2 GI_{it} + \eta_3 ad_{it} + X_{it}^{'}\gamma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3）式中：ad_{it} 代表调节变量，η_1、η_2、η_3 为待估计系数，其余变量及参数含义与（1）式相同。若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显著，且系数 η_1 为正，则 ad_{it} 的正向调节效应存在。

（三）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是农民收入水平，采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以 2005 年为基期，利用各省份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平减。

2.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以地理标志商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总量衡量。尽管地理标志农产品的保护地域以县域为主，但脱贫县同样可以从保护地域为市域和省域的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中获益[②]。因此，本文在确定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时，除统计脱贫县自身获得认证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外，还将保护地域为市域的地理标志农产品的赋值

[①]根据 Bacon 分解结果，将较早接受处理的样本用作控制组（“坏的控制组”）的权重达到 68.93%。

[②]根据《第四次全国地理标志数量调研报告》，地理标志保护地域为省域的有 78 个，占总数的 0.93%；保护地域为市域的有 834 个，占总数的 9.90%；保护地域为县域的有 7509 个，占总数的 89.17%。

平均分配给保护范围内的所有县[①]。例如，“白城燕麦”在2006年获得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保护范围为白城市下辖5个县（市、区）的行政区域，其中3个脱贫县当年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赋值均增加0.2。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分为两组。一组为经济社会层面的控制变量。参照已有研究（张彬斌，2013；牛耕等，2024），本文选取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自给率、乡村人口从业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农业机械化程度五个变量。县域农民收入水平受当地农产品品质的影响，同时农产品品质也是影响县域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数量的重要因素，并且农产品品质主要取决于土壤质地、气温和降水等自然条件。由于土壤质地等不随时间变化的县域自然环境特征可以被模型的个体固定效应所吸收，因此本文引入的另一组控制变量是地理环境层面的年平均气温、年降水量和年日照时数三个时变因素。

4.机制变量。根据理论分析，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可能通过吸引农产品加工企业落户和促进农村产业集聚两条渠道提高农民收入。因此，本文选取地理标志农产品加工企业数及其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重两个变量，分别从绝对量和相对量两方面衡量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情况。参考已有研究（肖卫东，2012；杨秀玉和乔翠霞，2023），本文采用农业产业集中率和区位熵测算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其中，农业产业集中率以县域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衡量，区位熵计算公式为：

$$LQ_{ij}=\frac{Q_{ij}/Q_i}{Q_j/Q} \tag{4}$$

（4）式中：LQ_{ij}表示县域i第一产业的区位熵指数，其数值越大，农业产业集聚水平越高；Q_{ij}和Q_i分别表示县域i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地区生产总值；Q_j和Q分别表示全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国内生产总值。

5.调节变量。本文选取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两个方面的调节变量。其中，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水平以县域内是否有淘宝村以及是否有淘宝镇[②]两个虚拟变量来衡量，若县域在样本期内有淘宝村或淘宝镇，则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③]衡量，该指数包含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郭峰等，2020）。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所有样本地理标志农产品总量的均值为1.583。

表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观测值数	均值	标准差
农民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0370	4319.314	2162.688
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	县域地理标志农产品总量（个）	10370	1.583	2.370

[①]由于地理标志保护地域为省域的地理标志的数量占比很小，并且所涉及的县域数量众多，平均到每个县的数量可以忽略不计，本文未将其纳入计算。

[②]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网站，http://www.aliresearch.com/cn/index。

[③]该指数的县域数据的起始时间为2014年，笔者向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发送邮件申请得到相关数据。

表 2（续）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10370	1.709	1.242
财政自给率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值	10370	0.179	0.111
乡村人口从业率	乡村从业人口占乡村人口的比重	10370	0.556	0.092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10370	0.898	0.597
农业机械化程度	农用机械总动力与乡村从业人口之比（千瓦/人）	10370	1.871	2.079
年平均气温	日均气温的算术平均值（摄氏度）	10370	12.621	4.955
年降水量	当年累计降水量（毫米）	10370	1171.822	581.015
年日照时数	当年累积日照时数（小时）	10370	1939.122	579.769
地理标志农产品加工企业数	与地理标志农产品直接相关的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个）	5301	5.439	7.727
地理标志农产品加工企业数占比	地理标志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比重	5301	0.201	0.203
农业产业集中率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重（%）	10370	0.031	0.024
区位熵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与全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之比	10370	2.957	1.245
是否有淘宝村	县域是否有淘宝村：是=1；否=0	10370	0.093	0.291
是否有淘宝镇	县域是否有淘宝镇：是=1；否=0	10370	0.144	0.351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4637	88.086	25.212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指数	4637	78.691	21.835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指数	4637	103.634	34.546
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指数	4637	90.916	28.664

本文根据各脱贫县样本期内地理标志农产品总量的均值是否大于 1.583，将样本划分为大于均值组和小于均值组[①]，分别绘制两组样本农民收入水平均值的变化趋势图，具体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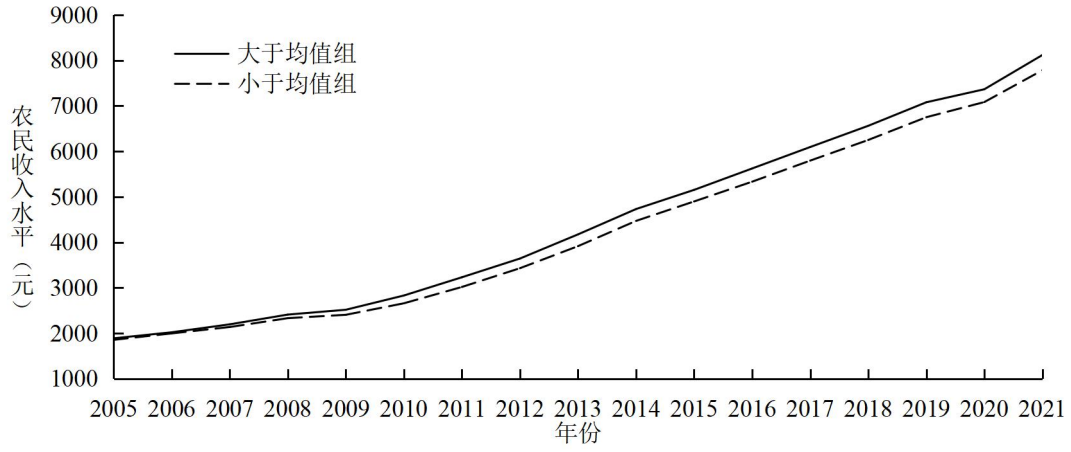


图 2　分组脱贫县 2005—2021 年农民收入水平的均值

[①]其中，大于均值组包含 229 个脱贫县，小于均值组包含 381 个脱贫县。

由图 2 可以看出，两组样本农民收入水平在 2005 年基本没有差异，随后收入差距凸显并呈现扩大趋势，到 2021 年收入差距达到最大值约 335 元。这一结果为后文计量分析提供了初步的事实基础。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利用（1）式估计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表 3（1）列控制县域和年份固定效应，（2）列在（1）列基础上加入了经济社会层面的控制变量，（3）列在（2）列基础上加入了地理环境层面的控制变量。根据表 3 的估计结果，在控制县域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后，无论模型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从（3）列的估计结果可知，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的系数为 33.448，即县域每增加一个地理标志农产品，当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加约 33 元。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能够显著提高农民收入水平，H1 得到验证。为进一步考察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的促农增收效应是否具有持续性，本文在（3）列的基础上，控制脱贫县摘帽情况的虚拟变量（某脱贫县在当年及之后年份摘帽，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回归结果如（4）列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变动很小，表明脱贫县摘帽后，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并不会减弱，可以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农民收入水平							
	（1）		（2）		（3）		（4）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	36.105***	9.607	35.119***	9.244	33.448***	9.212	33.835***	9.138
经济发展水平			116.154***	36.716	119.847***	36.686	115.067***	36.169
财政自给率			93.802	166.150	109.612	167.824	102.878	166.909
乡村人口从业率			−27.353	212.521	−17.065	206.190	−24.445	204.604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23.130	35.208	27.298	34.951	25.190	34.731
农业机械化程度			−32.860**	14.851	−29.735**	14.682	−29.711**	14.638
年平均气温					54.003***	16.145	53.290***	16.056
年降水量					0.047	0.036	0.048	0.036
年日照时数					−0.217***	0.053	−0.216***	0.053
脱贫县摘帽情况							179.205***	36.311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865.701***	25.406	1831.764***	127.427	1515.254***	281.953	1530.219***	280.386
观测值	10370		10370		10370		10370	
R^2	0.940		0.941		0.941		0.941	

注：①***、**分别表示 1%、5%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聚类到县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二）内生性处理

尽管县域获得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可以被视作相对外生的政策冲击，并且本文对可能影响农民收入水平和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的经济社会因素和地理环境因素进行了控制，但模型仍可能因潜在的遗漏变量而存在内生性问题。为排除内生性问题的干扰，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工具变量法估计。

方志是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历代各朝有史，各地有志，其内容统合古今，无不备载。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编修的方志称作旧方志，之后编修的方志称为新方志。改革开放之后，各地新方志编修工作全面开展。县志是方志的基本单元，旧县志对本地物产资源往往有详尽记载，但许多县志所记载物产不下百余种，学者无法从中甄别哪些物产属于当地特色物产资源，并且旧县志所对应的县级行政区划范围与当前的县级行政区划范围不尽相同，而新县志是地情资料和信息的总汇，所载内容通常包含本地土特产的信息。因此，本文对所有脱贫县的新县志进行检索，获取其中所记载的县域的本地土特产品数量[①]，并将其作为工具变量。就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而言，地理标志农产品为获得地理标志认证的土特产品，当地土特产品的数量越多，县域获得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的机会就越多。因此，新县志所记载的土特产品数量与当地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高度相关，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在外生性方面，各县新县志编修完成时间均在县域获得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之前，因此县志所记载的本地土特产品数量属于历史数据，具有高度的外生性，仅能通过影响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对当前农民收入产生间接影响，所以该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假设。

县志所记载的本地土特产品数量是截面数据，仅有区域维度的变化，不能直接作为工具变量应用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为了赋予工具变量年度变异性，借鉴以集体要素构造工具变量的思想（Card and Krueger，1992），本文引入全部脱贫县地理标志农产品年平均数量这一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来共同构造工具变量。在相关性方面，与县域地理标志农产品总量类似，全部脱贫县地理标志农产品年平均数量同样具有随时间累积的特征，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在外生性方面，该变量属于全部脱贫县整体层面的变量，相对于县域层面的农民收入水平是外生的。本文将新县志所记载的本地土特产品数量与当年全部脱贫县地理标志农产品平均数量交乘，作为当年该县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的工具变量（以下简称“交乘项”）。表 4（1）列和（2）列报告了基于工具变量法的两阶段回归结果。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显著，且系数为正，与预期相符。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的 p 值为 0，强烈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远大于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 10%水平下的临界值 16.38，强烈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这进一步证明了本文所选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依然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在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基准回归得到的结论依然成立。

[①]在数字版县志中以“特产”“土产”“名产”“优产”“珍产”等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对于无法通过检索上述关键词获取土特产品信息的少数县域，其土特产品数量记为 0。资料来源：万方地方志数据库，https://fz.wanfangdata.com.cn/。

表 4　　基于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

变量	（1） 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 2SLS 第一阶段		（2） 农民收入水平 2SLS 第二阶段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			99.088***	29.540
交乘项	0.134***	0.01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2.205***	0.661	6889.878***	355.870
观测值	10370		10370	
R^2	0.566		0.939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51.08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	100.681			

注：①***表示 1%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聚类到县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控制变量同表 3（3）列。

（三）其他稳健性检验

1.剔除重复地理标志农产品。三种类型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存在重复注册认证的情况[①]。若一个农产品同时获得两种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两种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的促农增收效应会相互影响。将重复的地理标志农产品计入地理标志农产品总数可能会低估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的促农增收效应。因此，本文剔除重复的地理标志农产品，重新测度核心解释变量，并进行回归。表 5（1）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依然显著，且系数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接近。这表明，地理标志农产品重复注册认证问题并未对本文研究结论产生实质性影响。

2.改变保护地域为市域的地理标志农产品赋值的分配方式。由于不同县域的农业发展基础、地理标志农产品市场推广能力等存在差异，在对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进行赋值时，本文将保护地域为市域的地理标志农产品的赋值平均分配给保护范围内的所有县域，可能无法反映各个县实际从该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中获益的程度。因此，本文以反映县域农业发展基础的第一产业增加值作为权重，分配保护地域为市域的地理标志农产品的赋值，重新确定县域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的赋值。表 5（2）列的估计结果相较于基准回归变动不大，表明改变保护地域为市域的地理标志农产品的赋值的分配方式并不会对核心结论造成影响。

3.考虑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的影响。始于 2014 年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将带动贫困户就业增收作为发展目标，明确要求政策试点向贫困地区倾斜，2020 年实现了对 832 个脱贫

[①]根据《第四次全国地理标志数量调研报告》，注册认证一次的地理标志农产品有 6825 个，占总数的 81.05%；注册认证两次的地理标志农产品有 1398 个，占总数的 16.60%；注册认证三次的地理标志农产品有 198 个，占总数的 2.35%。

县的全覆盖，是具有扶贫属性的政策（张诚和翁希演，2024）。考虑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在样本期内会对脱贫县农民收入产生影响，本文控制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实施情况的虚拟变量（若脱贫县在当年及之后的年份成为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具体估计结果如表5（3）列所示。与基准回归结果类似，核心解释变量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并没有对估计结果造成干扰。

4.剔除部分样本。县级市和市辖区的管理权限与县存在明显差异，并且相较于县，县级市和市辖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城镇化率往往更高。重庆市的市辖县和海南省下辖县在行政区划上是县级行政区，但在人事方面高配厅级干部，具有经济发展的权利禀赋优势。因此，本文剔除县级市、市辖区以及重庆市和海南省样本，具体估计结果见表5（4）列。估计结果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未受到样本改变的影响。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一）

变量	被解释变量：农民收入水平							
	（1）剔除重复地理标志农产品		（2）改变保护地域为市域的地理标志农产品赋值的分配方式		（3）考虑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的影响		（4）剔除部分样本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	35.149***	9.966	37.164***	10.235	33.561***	9.215	29.166***	10.484
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实施情况					−24.384	30.46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534.049***	281.749	1515.254***	281.953	1509.939***	281.775	1373.320**	294.354
观测值	10370		10370		10370		9112	
R^2	0.941		0.941		0.941		0.942	

注：①***、**分别表示1%、5%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聚类到县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控制变量同表3（3）列。

5.纳入控制变量滞后一期。本文所选取的五个经济社会层面的控制变量可能是受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影响的“坏控制变量”，为了排除此类控制变量可能产生的估计偏误，本文将所有经济社会层面的控制变量滞后一期后纳入模型。由表6（1）列的估计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6.被解释变量取对数。对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农民收入水平取自然对数有助于减少数据波动，避免个别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将经过对数化处理的农民收入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回归。表6（2）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7.仅保留拥有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县域样本。在本文样本中，有67个脱贫县在整个样本期内都没有

获得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因此，本文剔除这 67 个脱贫县样本，重新回归。表 6（3）列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十分接近，表明本文所选择的回归模型以及对基准回归估计系数经济意义的解读是合理的。

8.控制地级市－年份固定效应和改变标准误的聚类层级。县域的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和农民收入水平可能与其所属地级市有关，忽略整体环境的影响可能会带来潜在的遗漏变量问题（刘潘和张子尧，2023）。为了排除地市级层面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可能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控制地级市－年份固定效应[①]，回归结果如表 6（4）列所示。核心解释变量依然显著，且系数为正。此外，考虑到残差项可能在不同区域层级存在相关性，本文将稳健标准误聚类到省级层面，表 6（5）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仍然能够显著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进一步佐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二）

变量	被解释变量：农民收入水平				
	纳入控制变量滞后一期 （1）	被解释变量取对数 （2）	仅保留拥有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县域样本 （3）	控制地级市－年份固定效应 （4）	改变标准误的聚类层级 （5）
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	31.221***	0.005**	33.843***	14.877*	33.448**
	（9.027）	（0.002）	（9.575）	（8.031）	（15.18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级市－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常数项	1541.932***	7.660***	1422.384***	7968.074***	1515.254*
	（296.308）	（0.049）	（308.754）	（645.434）	（811.771）
观测值	9760	10370	9231	10285	10370
R^2	0.941	0.968	0.940	0.986	0.941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前 4 列括号内为聚类到县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5）列括号内为聚类到省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控制变量同表 3（3）列。

（四）机制检验

前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具有促农增收效应。本文利用（2）式对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由（1）列和（2）列的估计结果可知，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可以显著增加县域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同时显著提高其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比重，表明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有助于吸引农产品加工企业落户。农产品加工业的持续发展可以扩大对初级地理标志农产品的需求，提高其收购价格（董银果和钱薇雯，2022），

[①]海南实行省直管县体制，在控制城市－年份固定效应时样本不包括海南省下辖县。

也有助于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重组供应链，推进农村产业融合，把就业岗位和农产品附加值留在农村、留给农民，实现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武汉大学乡村振兴研究课题组，2022），使农民分享地理标志农产品增值收益。截至2023年底，脱贫地区依托地理标志农产品等优势农业资源累计发展市级以上龙头企业2.7万家、农民合作社73.3万家、家庭农场69万个，已基本形成龙头企业引领、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跟进、脱贫人口广泛参与的产业带动格局[①]。综合上述分析，H2a得到验证。（3）列和（4）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可以显著提高县域的农业产业集中率和区位熵，表明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对农业产业集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业产业集聚可以推动农业由家庭分散经营向规模化集中经营转变，带来生产的标准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王艳荣和刘业政，2011），有助于充分发挥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的品牌效应，克服同质化竞争和产能过剩问题，增强农户的市场风险应对能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截至2023年底，脱贫地区累计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73个、农业产业强镇446个，当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396元，较上年增长8.5%[①]。综合上述分析，H2b得到验证。

表7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地理标志农产品 加工企业数		（2） 地理标志农产品 加工企业数占比		（3） 农业产业集中率		（4） 区位熵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	0.366***	0.118	0.011***	0.003	0.001***	0.000	0.025**	0.01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5.862***	1.866	0.053	0.064	0.042***	0.003	1.646***	0.330
观测值	5301		5301		10370		10370	
R^2	0.163		0.054		0.160		0.146	

注：①***、**分别表示1%、5%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聚类到县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控制变量同表3（3）列。

（五）进一步的分析

为了分析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与数字经济结合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本文利用（3）式对农村电商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有助于强化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的促农增收效应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由（1）列和（2）列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与是否有淘宝村以及是否有淘宝镇的交互项均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相较于没有淘宝村或没有淘宝镇的县域，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的促农增收效果在有淘宝村或淘宝镇的县域更显著。这表明，农村电商发展显著增强了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的促农增收效应，H3a得到验证。（3）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

[①]资料来源：《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0365号建议的答复摘要》，http://www.moa.gov.cn/govpublic/FZJHS/202407/t20240704_6458381.htm。

情况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交互项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越好。这表明，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能够通过与数字普惠金融的联动对农民增收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H3b 得到验证。由（4）列、（5）列和（6）列的估计结果可知，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以及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交互项均显著，并且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交互项的显著性水平更高、系数更大，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扩大数字金融的覆盖范围和市场规模强化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的促农增收效应。

表 8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农民收入水平					
	（1）	（2）	（3）	（4）	（5）	（6）
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是否有淘宝村	30.545**					
	（14.986）					
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是否有淘宝镇		51.436**				
		（20.155）				
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0.272**			
			（0.122）			
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数字金融覆盖广度				0.273**		
				（0.126）		
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数字金融使用深度					0.215**	
					（0.089）	
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0.167*
						（0.101）
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情况	26.837**	22.359**	−25.289*	−21.028	−24.687*	−14.396
	（10.518）	（9.905）	（14.923）	（13.915）	（13.403）	（13.372）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0.065			
			（1.676）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				0.121		
				（1.186）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					−5.442***	
					（1.224）	
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1.736***
						（0.52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535.415***	1588.050***	3636.922***	3616.597***	3984.133***	3586.696***
	（281.108）	（282.109）	（419.358）	（407.767）	（424.925）	（403.798）

表 8（续）

观测值	10370	10370	4637	4637	4637	4637
R^2	0.941	0.941	0.945	0.945	0.946	0.945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聚类到县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控制变量同表 3（3）列。

六、结论与启示

发展地理标志农产品特色产业是打造脱贫人口收入可持续增长机制的重要抓手，而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本文基于全国 610 个脱贫县 2005－2021 年的面板数据，考察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的促农增收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可以提高农民收入，并且在脱贫县摘帽后仍然可以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既可以在微观层面通过吸引农产品加工企业落户带动农民增收，也可以在中观层面通过提升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增加农民收入。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当县域农村电商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可以更好地发挥促农增收效应。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深入挖掘地理标志特色资源，推动地理标志资源优势转化。县域要通过走访调研、查阅地方史志资料等方式，对地理标志农产品资源进行全面摸底，梳理特色农产品发展历史、社会美誉和独特文化，进一步健全脱贫地区地理标志农产品资源信息库和潜在地理标志农产品资源储备库。完善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与地理标志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间的协调联动机制，按照分级指导、分类施策、梯度培育的原则推进地理标志农产品注册认证工作，支持行业协会等市场主体培育和申报地理标志商标，引导条件成熟的农产品申请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对新获批地理标志商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单位和注册人给予奖补支持，积极为地理标志农产品申报和开发创造良好条件。扎实推动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作，支持和鼓励符合要求的企业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识，不断扩大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识的市场主体数量，促使脱贫地区地理标志农产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带动农民持续增收，助力共同富裕。

第二，持续扩大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的规模，完善地理标志产业惠农机制。充分利用地理标志“金字招牌”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到脱贫县创建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基地，就地就近采购地理标志农产品，推行“公司+农户”的产业化运营模式，为农村脱贫人口提供灵活就业机会。加大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宣传推介力度，推动地理标志农产品进展会、进网络、进餐企、出国门，逐步提高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吸引更多拥有地理标志特色知识产权优势的示范企业落户，促进脱贫地区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规模扩张。发挥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对脱贫地区产品、产业和业态融合的集聚带动效应，以地理标志农产品为纽带，引导地理标志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信息互通、技术共享、品牌共创等方式建立长期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共同推动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上下游链条延伸，打造符合市场预期和需求的优质地理标志农产品加工产业集聚区，带动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和产业发

展，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第三，稳步提升农村电商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强化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的促农增收效应。充分考虑脱贫县农村电商运营基础的差异性，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提升农村电商发展水平。对于农村物流网络尚不健全的县域，要加快农村现代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对具备多种服务功能的末端服务站点给予扶持，打造一批承载能力强、集散效率高的农村物流服务站点，构建满足农村电商发展需求的现代物流体系。对于农村电商运营基础较好的县域，要探索建设地理标志农产品电商直播基地，充分发挥基地的集聚效应，吸引全国各地的网红达人、内容创作者入驻，推动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建设和市场拓展。引导脱贫地区金融机构与互联网科技企业开展合作，整合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主体的金融需求信息，推出与其风险承受意愿和能力相匹配的个性化、定制化金融产品，精准对接有融资需求的农户和企业。同时，依托农商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数字普惠金融便民服务中心，开展面向农村的金融知识普及和数字化操作培训，提升农民的金融素养，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助农增产增收的功能，以数字经济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

参考文献

1.丁志伟、罗婉琳、马芳芳，2023：《中国县域政府官员直播带货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经济地理》第 12 期，第 69-79 页。

2.董银果、钱薇雯，2022：《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的“搭便车”问题——基于数字化追溯、透明和保证体系的治理研究》，《中国农村观察》第 6 期，第 142-162 页。

3.郭峰、王靖一、王芳、孔涛、张勋、程志云，2020：《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经济学（季刊）》第 4 期，第 1401-1418 页。

4.蒋玉、蒲雁嫔、丁玉莲、金少胜、于海龙，2023：《农产品地理标志与企业品牌的溢价及其协同效应——以绿茶茶叶产品为例》，《经济地理》第 9 期，第 179-186 页。

5.李翠霞、潘雨桐，2024：《地理标志品牌参与对生态养殖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品牌收益激励和质量监管约束的中介作用》，《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 9 期，第 50-58 页。

6.李琪、唐跃桓、任小静，2019：《电子商务发展、空间溢出与农民收入增长》，《农业技术经济》第 4 期，第 119-131 页。

7.李赵盼、郑少锋，2021：《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对猕猴桃种植户收入的影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第 119-129 页。

8.刘冲、沙学康、张妍，2022：《交错双重差分：处理效应异质性与估计方法选择》，《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 9 期，第 177-204 页。

9.刘华军，2011：《地理标志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品牌溢出效应——基于中国三部门地理标志数据的实证研究》，《财经研究》第 10 期，第 48-57 页。

10.刘潘、张子尧，2023：《地方公共债务与资源配置效率：企业间全要素生产率分布差异的视角》，《经济研究》第 10 期，第 114-133 页。

11.牛耕、向雪风、周洋，2024：《城乡交通一体化建设的农民增收效应》，《中国农村经济》第 1 期，第 82-103 页。

12.邰秀军、杨慧珍、陈荣，2017：《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化的减贫增收效应——基于山西省 110 个县的实证分析》，《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第 6 期，第 144-149 页。

13.王艳荣、刘业政，2011：《农业产业集聚对农民收入影响效应研究》，《农业技术经济》第 9 期，第 50-57 页。

14.武汉大学乡村振兴研究课题组，2022：《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确保粮食安全》，《财贸经济》第 5 期，第 5-18 页。

15.肖卫东，2012：《中国种植业地理集聚：时空特征、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中国农村经济》第 5 期，第 19-31 页。

16.薛彩霞、姚顺波，2016：《地理标志使用对农户生产行为影响分析：来自黄果柑种植农户的调查》，《中国农村经济》第 7 期，第 23-35 页。

17.杨秀玉、乔翠霞，2023：《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 2 期，第 92-101 页。

18.余泉生、周亚虹，2014：《信贷约束强度与农户福祉损失——基于中国农村金融调查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 3 期，第 36-47 页。

19.张彬斌，2013：《新时期政策扶贫：目标选择和农民增收》，《经济学（季刊）》第 3 期，第 959-982 页。

20.张诚、翁希演，2024：《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缩小了农户消费差距吗》，《中国农村观察》第 2 期，第 46-68 页。

21.张米尔、包丽春、任腾飞，2022：《地理标志对特色农产品出口的作用研究——基于出口市场的国别面板数据》，《中国软科学》第 2 期，第 56-64 页。

22.张亚峰、许可、刘海波、靳宗振，2019：《意大利地理标志促进乡村振兴的经验与启示》，《中国软科学》第 12 期，第 53-61 页。

23.Airriess, C., 2020, “Constructing Durian Terroir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in Penang, Malaysia”, *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41(1): 6-22.

24.Bardají, I., B. Iráizoz, and M. Rapún, 2009, “Protecte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Integration into the Agribusiness System”, *Agribusiness*, 25(2): 198-214.

25.Bartoli, C., E. Bonetti, and A. Mattiacci, 2022, “Marketing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in the Digital Age: A Holistic Perspective”, *British Food Journal*, 124(9): 2857-2876.

26.Bouamra, M. Z., and J. Chaaban, 2010, “Determinants of Adoption of Protected Designation of Origin Label: Evidence from the French Brie Cheese Industry”,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61(2): 225-239.

27.Bowen, S., and A. V. Zapata, 2009,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Terroir, and Socioeconomic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The Case of Tequil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5(1): 108-119.

28.Card, D., and A. B. Krueger, 1992, “School Quality and Black-White Relative Earnings: A Direct Assess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1): 151-200.

29.Cei, L., G. Stefani, E. Defrancesco, and G. V. Lombardi, 2018,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 First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n Rural Development in Italian NUTS3 Regions”, *Land Use Policy*, 75: 620-630.

30.Crescenzi, R., F. D. Filippis, M. Giua, and C. Vaquero-Piñeiro, 2022,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Local Development: The Strength of Territorial Embeddedness", *Regional Studies*, 56(3): 381-393.

31.Galtier, F., G. Belletti, and A. Marescotti, 2013, "Factors Constraining Building Effective and Fair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for Coffee: Insights from a Dominican Case Study",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31(5): 597-615.

32.Hajdukiewicz, A., 2014, "European Union Agri-Food Quality Schem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Traditional Specialities: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Folia Horticulturae*, 26(1): 3-17.

33.Jena, P. R., and U. Grote, 2012, "Impact Evaluation of Traditional Basmati Rice Cultivation in Uttarakhand State of Northern India: What Implications Does It Hold for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World Development*, 40(9): 1895-1907.

34.Jena, P. R., C. Ngokkuen, D. B. Rahut, and U. Grote, 2015,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tection and Rural Livelihoods: Insights from India and Thailand",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29(1): 174-185.

35.Josling, T., 2006, "The War on Terroir: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s a Transatlantic Trade Conflict",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57(3): 337-363.

36.Lee, D., J. Moon, and M. H. Ryu, 2019, "The Effects of Extrinsic Cues on Online Sales of Fresh Produce: A Focus on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Cahiers Agricultures*, 28, https://doi.org/10.1051/cagri/2019014.

37.Menggala, S. R., W. Vanhove, D. R. A. Muhammad, A. Rahman, S. Speelman, and P. VanDamme, 2021, "The Effec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GIs) on the Koerintji Cinnamon Sales Price and Information of Origin", *Agronomy*, 11(7), https://doi.org/10.3390/agronomy11071410.

38.Moschini, G., L. Menapace, and D. Pick, 2008,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the Competitive Provision of Quality in Agricultural Market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90(3): 794-812.

39.Qie, H., Y. Chao, H. Chen, and F. Zhang, 2023, "Do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mote County-Level Economic Growth?",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15(3): 666-681.

40.Tashiro, A., Y. Uchiyama, and R. Kohsaka, 2019, "Impac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Schemes on Traditional Knowledge in Changing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Japa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68: 46-53.

41.Trivelli, L., A. Apicella, F. Chiarello, R. Rana, G. Fantoni, and A. Tarabella, 2019, "From Precision Agriculture to Industry 4.0: Unveiling Technological Connections in the Agrifood Sector", *British Food Journal*, 121(8): 1730-1743.

42.Wang, H. Y., D. T. Anh, and P. Moustier, 2021, "The Benefits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Certification Through Farmer Organizations on Low-Income Farmers: The Case of Hoa Vang Sticky Rice in Vietnam", *Cahiers Agricultures*, 30, https://doi.org/10.1051/cagri/2021032.

43.Yin, X., J. Li, J. Wu, R. Cao, S. Xin, and J. Liu, 2024, "Impacts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n Agricultural Growth and Farmers' Income in Rural China", *Agriculture*, 14(1), https://doi.org/10.3390/agriculture14010113.

44.Zhang, S., Y. Sun, X. Yu, and Y. Zhang, 2023,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port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Agriculture*, 13(2), https://doi.org/10.3390/agriculture13020378.

Impac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n Increasing Rural Income: Evidence from Counties Lifted Out of Poverty

YAN Yurui[1] ZHANG Juntao[2]
(1. Institute for Northeast Full Revitaliz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ummary: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GI) is a typ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at has the closest connection with the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Developing the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of GIs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establishing a sustainable income-growth mechanism for the population lifted out of poverty, and it is also a long-term strategy to enrich farmers and boost agriculture. However,few literatures conduct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GIs on increasing rural income based on large-sample data, and relevant studies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counties removed from the poverty-stricken list.

This paper takes 610 former national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lifted out of poverty across China from 2005 to 2021 as sample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ree typ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GIs, namely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trademarks, protecte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is paper uses a panel fixed-effects model to verify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GIs on increasing rural income and its mechanism. Furthermore, it discusse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rural e-commerce and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GIs on increasing rural inco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GI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rural income and sustainably increase the rural income even after the counties have been lifted out of poverty.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GIs can promote rural income through two paths: attracting the settle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enterprises at the micro-level and promoting agricultur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t the meso-level. Further moderating effect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and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strengthen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GIs on increasing rural income.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vid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fully unleashing the potential of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in former poverty-stricken areas and enhancing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lifted out of poverty.

This paper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 from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GIs increasing rural income in former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lifted out of poverty, it reveals the important role of GI prot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getting rid of poverty of former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providing a basis for decision-making in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the income of the population lifted out of poverty by further exploring and cultivating GIs. Second, i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by taking former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lifted out of poverty in 22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cross China as research samples, it avoids the one-sidedness of overly focusing on a specific region, and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that the protection areas of GIs mainly cover county-level regions, providing more representative evidence for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GIs on increasing rural income. Third,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nabl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t reveals the roles of rural e-commerce and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GIs on increasing rural inco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inkage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GIs,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f agriculture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Keywords: Geographic Indications;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unties Lifted Out of Poverty;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Income Growth

JEL Classification: Q13

（责任编辑：光　明）

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路径和模式

梁 哲 陈善恩 崔彩贤 蔡松锋

摘要：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乡村产业发展是关键。当前学术界对内源式发展、新内源式发展和政府主导的外源式发展关注较多，对市场主导的外源式发展的关注却不够。作为外源式发展主体，数据驱动的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在海量数据挖掘、健全的产业链生态支撑、线上线下市场触达保障等方面拥有显著优势，可以有效助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本文基于对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汪清县木耳产业数字化升级历程的考察，认为海量数据挖掘能够有效捕捉消费者需求、预测消费市场、引导开发特色农产品、规避市场风险，健全的产业链生态支撑能够有效推动供应链建设、打造特色品牌、培训产业人才、触达商超终端，线上线下市场触达保障能够有效触达消费者群体、重塑供应链体系、反哺标准化生产、共享产业链信息。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数据赋能—产业链重塑—市场逆向牵引”三位一体的特色农业产业升级模式。

关键词：外源式发展 产业升级 平台型新零售企业 特色农业

中图分类号：F323.6；F724.6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落实产业帮扶政策，做好‘土特产’文章，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①]。为了做好“土特产”文章，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全国各地开展了丰富的实践和探索。不少地方凭借独特的地域优势和资源禀赋，有效推动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特色农业

［资助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黄土高原旱作适水改土与产能协同提升”（编号：2021YFD1900700）。

［作者信息］ 梁哲，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电子邮箱：liangzhe921003@126.com；陈善恩，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经济司，电子邮箱：chen_shanen@163.com；崔彩贤（通讯作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电子邮箱：ylsn003@163.com；蔡松锋，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综合处，电子邮箱：caisongfeng @126.com。

[①]《习近平出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s://www.gov.cn/xinwen/2022-12/24/content_5733398.htm。

日渐成为促进农村经济振兴和农民增收的重要引擎。

2017 年，在原农业部等相关部门向全国推广的农业产业扶贫经验中，广西百色芒果、陕西洛川苹果、江西赣南脐橙、宁夏盐池滩羊、四川苍溪猕猴桃等范例被认为“立得住、叫得响、推得开”[①]。部分地区在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虽然频繁更替产业结构，但容易出现低水平重复的产业发展模式，并常常陷入“积极的惰性”（刘军强等，2017）的产业发展怪圈。分析其原因，经济发展会受到制度和政策的影响（周黎安，2017，2018；林毅夫，2018），农业产业发展亦是如此。在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导向下，各级政府重视农业产业化发展（符平，2018），基层政府采取强激励和弱惩罚措施（刘军强等，2017），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出现了农业产业发展的低水平重复现象。

关于农业产业发展的案例研究，多聚焦于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模式（刘蓝予和周黎安，2020）。也有研究强调社会基础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例如，安徽六安茶叶（付伟，2020）、福建安溪铁观音（颜燕华，2020）、宁夏黄高县菜心（陈航英，2021）等产业的发展成败，与当地的社会基础（包含观念、伦理、文化传统、人际关系网络等）紧密相关。部分研究进一步指出，政府、市场与社会共同构成“选优扶强”机制，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成功正是得益于这种机制下三者各司其职、协同发力：“选优”阶段依赖政府、市场与社会在互嵌机制作用下相互补位，以培育地方“隐形冠军”；“扶强”阶段则依赖三者在共振机制作用下互惠共生，打造区域“单项冠军”（刘小峰等，2023）。

上述有关农业产业发展低水平重复原因的分析，以及有关“选优扶强”机制的解释，均强调了地方政府在农业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韦德，1996）。褚庆宜和赵祥云（2023）通过案例分析指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党政统合、项目统合、主体统合的“县域统合”机制来促进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然而，地方政府主导农业产业化也存在较多失败的案例。这不仅难以验证政府和市场良性互动的理想模型，还陷入了农业产业发展失败源于政府和市场互为因果的循环论证（唐世平和张雨亭，2021）。

政府可以通过出台制度、建立协会、规划产业布局、研发新品种、改造基础设施、拓展销售渠道、打造品牌等方式，重点打造特色农业产业，推进农业产业发展。然而，这种模式受到不少质疑，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职能的错位。政府并不是市场主体，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并不遵循政府逻辑。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完善农业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在前期投入巨大，因此背上了沉重债务，但产业发展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二是现实经验的挑战。田野调查发现，一些地方政府的农业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导致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调整频繁，以及出现“运动式”发展和“形象工程”等现象，影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刘军强等，2017；姜庆志，2019）。因此，政府在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可能被高估。

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两个核心环节是生产和消费，即生产优质优价的农产品，并将其销售给目标消费者（姜百臣等，2017）。作为市场主体，企业无疑是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核心承载者。但是，在大多数传统农业县域，企业普遍存在经营规模小、经营人才匮乏、生产加工能力不足、销售渠道网络不稳定、品牌化能力不足等缺陷，并且这些缺陷在短时间内难以自我克服，亟需地方政府帮助企业整

[①]资料来源：《农业部介绍农业产业扶贫有关情况》，https://www.gov.cn/xinwen/2017-10/16/content_5232092.htm#1。

合优势资源，并参与特色农业产业的打造。然而，地方政府协同企业共同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并面临较高的风险。学术界对如何在规避产业发展风险的同时实现农业产业升级已有一定探讨（刘小峰等，2023），但相关研究鲜有涉及外源式发展模式下的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吉林省汪清县木耳产业在平台型新零售企业的助推下实现了产业升级，为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区别于地方政府主导模式的典型案例。由此，本文聚焦的核心问题是：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如何建立以消费数据为生产要素的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模式？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深入剖析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模式，以期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一个思路与参考方案。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对象的丰富和研究视角的拓展。已有关于农业产业发展的案例分析，大多聚焦于村庄、龙头企业等微观主体，而以县域产业这一中观主体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相对较少。二是理论视角的深化。内源式发展理论起源于现代化理论，现已被运用到企业发展、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中。当前，学术界对内源式发展、新内源式发展和政府主导的外源式发展关注较多，而对市场主导的外源式发展的探讨较为有限。本文将平台型新零售企业主导的外源式发展作为市场主导的外源式发展的代表，比较与讨论其与内源式、新内源式、政府主导的外源式发展模式在促进特色农业产业升级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

二、文献回顾

乡村产业发展的相关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关于政府和市场各自限度[①]的讨论。有学者认为，市场具备自发的运作机制，政府只需要为市场提供必要的秩序支持。在国际范围内，产业政策被广泛用于促进经济发展（Norton，1986；Chang，2007），而在中国语境下，乡村产业发展通常被置于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内加以讨论。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应从其自身要素结构出发，发展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经济赶超和产业升级（林毅夫，2018）。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地方政府间的“政治锦标赛”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牵引机制（周黎安，2017），“官场+市场”的发展模式（周黎安，2018）解释了一些地区特色农业产业为什么崛起（刘蓝予和周黎安，2020）。然而，现实中也存在诸多政府主导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失败的案例。为解释这一现象，社会分析视角被引入该领域。有研究表明，社会基础所包含的行动伦理、观念心态（付伟，2020；徐宗阳，2022）、乡土文化传统（徐宗阳，2016）、人际关系网络（颜燕华，2020；陈航英，2021）等与产业发展成效密切相关。政府、市场与社会可以形成“选优扶强”机制，即三者各司其职、协同发力，共同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刘小峰等，2023）。学者们的讨论并不限于此，乡村产业的发展不仅与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作用机制相关，也与乡村产业的发展模式相关。

从乡村产业发展的模式来看，既有研究从三种进路对乡村产业发展模式进行概括，分别是外部资

[①]政府的限度主要是指国家对经济干预的过度或不足；市场的限度主要是指市场机制本身无法消除垄断，无法实现经济稳定、均衡的增长，无法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以及无法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

源引入的外源式发展模式、内部力量培育的内源式发展模式和外部资源引入激发内部力量的新内源式发展模式。

第一种是外源式发展模式。该模式强调通过引入外部资源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即依托政府、企业等主体注入外部资源以实现产业发展（张环宙等，2007）。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江艳军和黄英，2018）或实施奖补政策引导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农业企业下乡进行规模化经营可以促进乡村产业发展。陕西柞水的木耳（褚庆宜和赵祥云，2023）、湖北潜江的龙虾（黄锋等，2023）、江西赣州的脐橙（齐文娥等，2021）等特色农业产业的成功案例，都彰显了外源式发展模式在推进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种模式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促进产业快速发展，但也存在弊端。在市场竞争加剧、宏观政策调整等外部因素，以及劳动力不足等内部因素的影响下，一旦出现政府补贴支持力度下降、企业经营效益不佳的情形，“船小好调头”的农户作为家庭经营的主体，为保障生计往往会迅速转向其他农业产业，导致原有产业的相关企业因市场需求不足而经营乏力。政府为支持产业发展所建设的专用性较强的基础设施可能出现闲置，奖补政策的实施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此外，企业经营的逐利性也容易造成乡村的衰落（罗必良等，2021）。外源式发展模式往往忽略了本地特征，剥夺了本地发展的话语权，使得发展成果难以被保留在本地，导致产业发展不可持续（郭占锋，2024）。

第二种是内源式发展模式。该模式指乡村内部的人和组织依托本地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参照外来的知识、技术、制度等情况，自发地进行创造（鹤见和子，1991），并通过调适自身的组织机制激发内生动力，从而推动乡村产业在地化发展（马荟等，2020）。内源式发展模式强调发展过程由本地主导，发展选择由本地决定，发展收益保留在本地（Slee and Bill，1994）。在内源式发展模式下，乡村产业发展的动力是内生性的、可以自我调节的，因此产业发展呈现较强的韧性，可持续性强。然而，仅依靠乡村内部力量推动乡村产业在地化发展显然存在局限，科技要素和产业融合的增效作用容易被忽视（朱启臻，2018）。各地产业发展的实践表明，依靠内源式发展模式实现产业发展升级的成功范例（如袁家村文旅融合产业），难以在其他地区得到成功复制（郭占锋和田晨曦，2023），并非所有按照恰当组织机制激发内生动力的乡村产业都能取得良好发展。内源式发展模式过于理想化，乡村仅凭借自身力量难以完成产业的初始发展（Ray，2010）。

第三种是新内源式发展模式。新内源式发展模式也被称为新内生发展论（Ray，1999）。这种发展模式基于内外主体互补的视角，强调通过引入有益而非掠夺性的外部力量，促进乡村产业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完善乡村产业发展的动员机制，以乡村高效的集体行动激发乡村内部力量，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岳晓文旭等，2022）。新内源式发展模式也存在诸多的问题：一是乡村产业发展涉及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农户等多方主体，主体协同的复杂过程导致产业发展难以实现协同（曲甜和黄蔓雯，2022）；二是政府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有为之手”可能演变为“攫取之手”，在政策压力或政绩驱动下，政府容易过度干预产业发展（吴延兵，2017）；三是产业链整合和健全等可以有效提升产业附加值，但在新内源式发展模式下整合和健全产业链投入资源较多、难度较高，难以落地奏效（朱启臻，2018）。

三种发展模式助推乡村产业发展的方式和存在的局限性如表 1 所示。

表 1　　外源式、内源式、新内源式发展模式助推乡村产业发展的方式和存在的局限性

发展模式	助推乡村产业发展的方式	存在的局限性
外源式发展模式	外部资源引入	容易造成村庄衰落；难以灵活应对市场风险
内源式发展模式	内部力量培育	科技要素不足；忽视产业融合的增效作用
新内源式发展模式	通过外部资源引入激发内部力量	有效协同难；政府过度干预；产业附加值低

数字时代的到来为乡村产业发展赋予了崭新内涵。数字技术通过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嵌入信息化、智能化等现代化手段来促进产业发展（陈锡文，2024）。数字农业运营管理（阮俊虎等，2020）使得农产品生产、流通、仓储、配送、销售全流程数字化得以实现，为乡村产业与市场建立有效且稳定的联系提供了新路径。数据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催生了新零售[①]。新零售在食物体系[②]中引发了新的消费变革（尹瑶和叶敬忠，2024），由此形成了新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陈国军和王国恩，2020，2023），为乡村产业发展开辟出一条新道路。作为数字化、平台化和信息化的承载者，平台型新零售企业作为一种市场主导的外源式发展模式的主体，在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中具有显著优势。

论及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外源式发展模式，必须澄清传统外源式[③]、内源式、新内源式发展对乡村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回顾相关研究，发现三种发展模式的实践形态往往具有相似性，甚至是个别案例研究展示的乡村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剖面。因此，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都可以纳入文献梳理的范畴。从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来看，生产嵌入、关系嵌入、文化嵌入、利益嵌入、经营性嵌入等都可归结为资源输入和主体介入两种作用机制。

资源输入主要通过项目下乡等直接性政策（折晓叶和陈婴婴，2011）、农村医保等间接性保障政策（慕良泽和任路，2010）、鼓励企业和社会投入的引导性政策（郑永君和张茜，2023）三种路径推动乡村产业发展。资源输入对乡村产业发展的作用成效取决于乡村内部的秩序是否平衡（付伟和焦长权，2015；李祖佩，2015）。

主体介入主要通过外部主体或内部主体来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外部主体包括驻村干部、驻村工作队（曾智洪和毛霞维，2020）、科技特派员（章熙春等，2024）、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龚丽兰和郑永君，2019；郑观蕾和蓝煜昕，2021）等，而内部主体包括乡贤、理事会、基层党组织等（杨润峰等，2023）。也有部分学者不认同主体介入对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积极作用，认为主体介入仅能完成乡村产业初创的任务，难以进一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的效率和效益。例如：田先红（2022）指出，外部主体介入不利于建立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体系；张森和叶敬忠（2023）认为，主体介入容易出现形式化和悬浮化。

[①]新零售指企业以互联网为依托，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对商品的生产、流通与销售过程进行升级改造，进而重塑业态结构与生态圈，并对线上服务、线下体验以及现代物流进行深度融合的零售新模式。

[②]食物体系是指由食品的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环节构成的完整系统。

[③]在本文中，“传统外源式”发展模式特指政府主导的外源式发展模式。

综上所述，资源输入和主体介入是传统外源式发展、内源式发展、新内源式发展模式作用于乡村产业发展的两种主要机制。然而，这两种作用机制均存在明显缺陷，包括乡村内部秩序平衡的不稳定性和乡村产业发展的初始性，最终导致三种发展模式呈现表 1 所列的各种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市场主体的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模式，有效克服了上述三种发展模式的弊端。该模式能够充分挖掘消费者需求、补齐产业链短板、激活农户和地方企业主体性，进而助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实现特色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有关传统外源式、内源式、新内源式发展模式和平台型新零售企业主导的外源式发展模式的比较，详见表 2。

表 2　传统外源式、内源式、新内源式发展模式和平台型新零售企业主导的外源式发展模式的比较

项目	传统外源式、内源式、新内源式发展模式	平台型新零售企业主导的外源式发展模式
主要特点	区域性主导	产业链上下游分工
治理模式	当地政府主导、当地企业参与	平台型新零售企业主导、当地企业参与、地方政府支持
市场信息	区域市场信息为主	海量数据资源
产业主体	分散	有本地链主企业
产销环节	生产空间聚集，销售遍布各地	生产空间聚集有序，销售面向中高端市场
市场规模	区域性小规模市场	全国性大市场
价值分配	各环节按劳按资分配价值	特定环节创造更高附加值，平台企业、当地企业、农户获取更高价值
竞争要素	规模生产，价格低廉	农产品品质高，产品种类丰富，成本低，体验好
风险要素	自然风险，价格波动大，市场风险高	自然风险，价格波动小，市场风险低
优势	模式简单，链条短	以销定产，链条长，产品多，风险小
劣势	产品结构单一，产品附加值低，产业风险大，多主体协同困难，政府过度干预	产品增值部分少量惠及农户，部分惠及链主企业，大部分被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取得

资料来源：根据茹玉等（2019）研究中对传统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的比较，结合笔者实地调研后分析总结得出。

三、概念界定和理论分析

（一）概念界定

1.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如盒马鲜生、永辉超级物种等）在供应链、销售、物流履约链路方面实现了完全数字化，并且呈现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大数据驱动、供应链优化、配送服务高效。通过与产业链上游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平台型新零售企业能够对非标准化农产品进行标准化处理，自建物流、仓储、配送体系，通过大数据分析，在自营平台上售卖高标准的生鲜农产品。

2.特色农业产业。特色农业产业是指利用一定区域内独特的农业资源，开发具有独特资源条件、明显区域特征以及特殊用途和功效的名优农产品，并将其转化为特色商品的农业产业。

3.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一般指产业链合理化和高级化（马玉婷等，2023）。产业升级在农业领域是一个重要且持续的过程，它旨在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推动农业向现代化、可持续化方向发展。产业发展与产业升级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产业发展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基础：产业的不断发展，可以扩大经济规模、增加就业机会，进而为产业升级提供必要的资源、市场和动力。产业升级可进一步推动产业发展：产业升级可以提升产业价值链水平，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促进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理论分析框架

基于前文的分析，本文以汪清县木耳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历程为研究对象，借鉴“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构建“功能－组织－结构”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尝试以“海量数据挖掘（功能）－健全的产业链生态支撑（组织）－线上线下触达保障（结构）”为路径，并以“数据赋能－产业链重塑－市场逆向牵引”为模式，对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过程进行总结与反思。本文建构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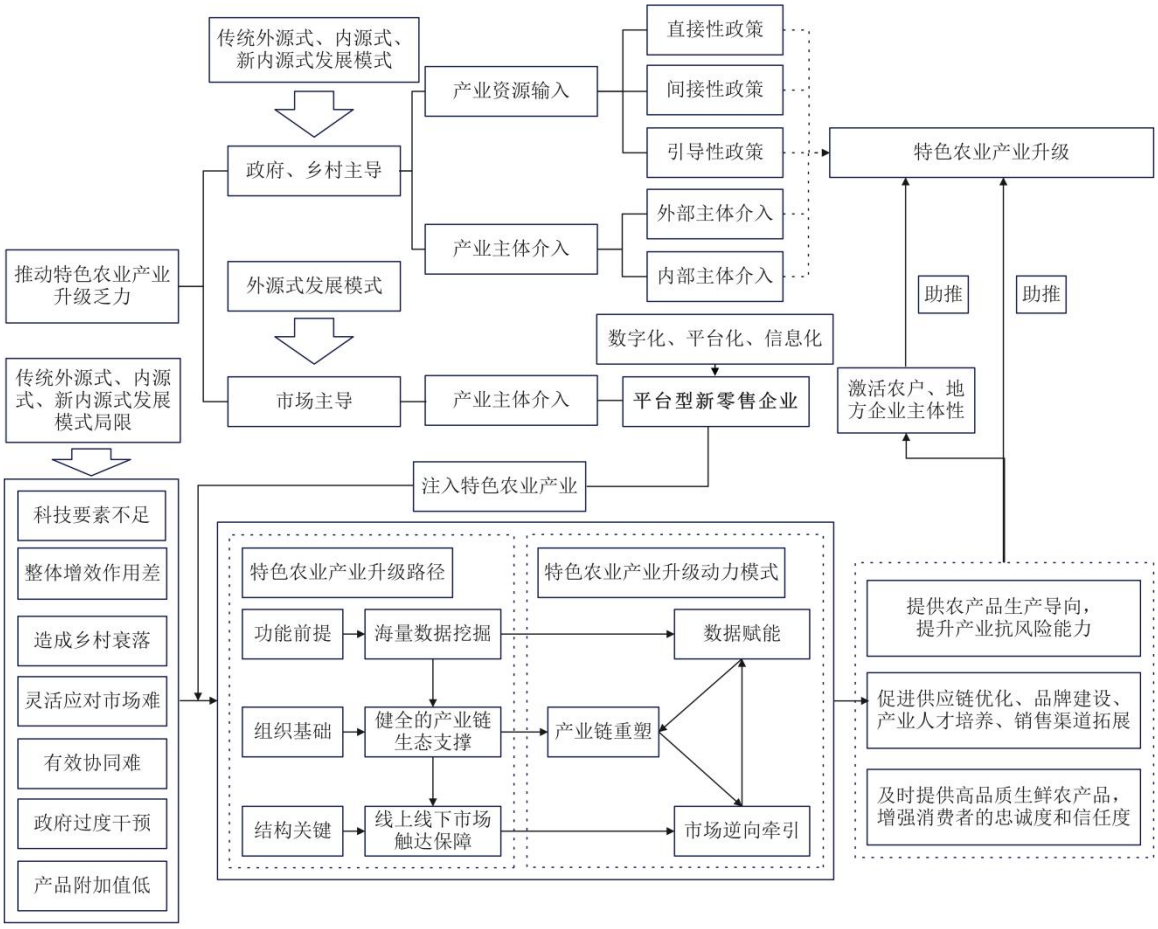


图1　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功能－组织－结构”整合性分析框架

具体来看，作为市场主体的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在“功能－组织－结构”框架下，依托其数字化、平台化和信息化特征，为特色农业产业赋能，形成“海量数据挖掘－健全的产业链生态支撑－线上线

下市场触达保障”的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路径。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已成为传统农业县农业产业升级的关键主体，有效克服了传统外源式、内源式、新内源式发展模式中的局限性。在平台型新零售企业的引领下，特色农业产业构建起以海量数据挖掘实现数据赋能、以健全的产业链生态支撑实现产业链重塑、以线上线下市场触达保障实现市场逆向牵引的三大机制。通过这三大机制，平台型新零售企业为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提供农产品生产导向，提升产业抗风险能力；促进供应链优化、品牌建设、产业人才培养，拓展销售渠道；提高生鲜农产品品质，增强消费者的忠诚度和信任度。在平台型新零售企业主导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产业链上的农户和地方企业的主体性也得以激活，形成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农户和地方企业共同助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良性互动。

四、案例背景和研究过程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嵌入性案例研究法对案例进行分析，以确保案例发掘的深入性和案例细节的完整性，并在案例情景中讨论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路径与模式。案例研究，即对社会中特定的个人、事件、集团或社区进行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风笑天，2005）。考察案例村庄的有益实践，不但能够实现个案调查的目的，而且能够“找到个案研究与理解中国社会的中介”（贺雪峰，2007），使研究有益于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建设。

2023 年 8 月，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共 4 人）前往汪清县，深度调研以盒马鲜生为代表的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在汪清县木耳产业升级中发挥的作用，并收集相关资料。在实地调研过程中，研究团队主要采用了田野观察、会议座谈、深度访谈等方法。

（二）案例选择

本文以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汪清县木耳产业升级的过程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化背景下市场主导的外源式发展模式助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路径与模式。汪清县是传统的优质木耳产区，得益于独特的气候、地理等因素，该地木耳品质较高，木耳产业发展历史悠久，在特色农业产业中具有一定代表性。该县以农业产业为主，工业发展相对滞后，财税基础薄弱，能够代表大部分偏远、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的情形。此外，汪清县的木耳产业升级过程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在平台型新零售企业的助推下，该县成功构建了高效的产业链体系，这与中央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导向高度契合；另一方面，该县在市场需求主导下实现了木耳产业升级，与中西部地区许多县域政府依赖政策和项目资源主导农业产业升级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有效规避了县域政府主导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可能存在的弊端。因此，汪清县的经验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方面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示范性。

（三）案例背景

汪清县位于吉林省东部，与黑龙江省交界，总面积 9016 平方千米，总人口 20.72 万人，辖 8 镇、1 乡、3 个街道和 200 个行政村。汪清县紧邻图们、珲春、东宁、绥芬河 4 个开放口岸，素有“八山一水半草半分田”之称。汪清县早在 1979 年就被国务院授予“黑木耳千担县”称号，1995 年被国务

院命名为“木耳之乡”[①]，先后被评为“全国食用菌行业十大主产基地县”、全国首批“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汪清黑木耳”是2021年中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牌[②]。自2020年3月起，汪清县通过乡村振兴特派员机制，引入平台型新零售企业为核心的企业生态，逐步推动汪清黑木耳产业转型升级，并取得了积极成效。

截至2022年，汪清县采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企业合作经营农业模式与“合作社/村集体+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共打造黑木耳专业镇6个、种植村121个、标准化菌包厂64家，累计培育从事黑木耳产业的省州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7家、专业合作社116家、家庭农场10家，黑木耳栽培总量超过6.5亿袋，实现黑木耳产量3.5万吨、产值34亿元，带动相关从业人员3万余人。仅2022年8月—2023年1月，盒马鲜生开发的新品共计收购汪清县当地农户30吨干木耳，收购价格从每千克约56元上涨至每千克约70元，种植户年均增收2万多元[③]。此外，盒马鲜生直接合作的链主型企业——桃源小木耳公司，其年总产值达到1.4亿元，带动就业300余人次，人均月收入4000～5000元，并间接促进300多户农户增收。

（四）资料来源

本文研究所用相关资料主要来自调研组获取和收集的田野日记、座谈记录、访谈记录、政策文件和新闻报道。其中，一手调研资料主要来源于实地调研。2023年8月，调研组在汪清县进行了深入访谈，访谈对象包括汪清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农业农村局局长、乡村振兴局局长、相关上下游生产企业负责人、木耳行业协会负责人、部分木耳种植村的村干部及村民，共计12人。调研组主要采用现场走访、半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式访谈以及随机开放式问题访谈等调研方式，重点考察以盒马鲜生为代表的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汪清县木耳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模式。最终，调研组整理出约14万字的访谈资料。二手资料主要是有关汪清县木耳产业发展的资料，经筛选和处理，形成约4万字的有效资料。除此之外，笔者还收集了办公文件、汪清县志、相关新闻报道等资料。

（五）资料分析过程

案例研究是一种归纳推理。本文依照案例研究的规范流程，在案例分析中遵循“案例编号整理—案例库构建—单个分析单位分析—跨分析单位分析—尊重案例整体、反复比较”的逻辑（Eisenhardt，1989）。首先，笔者将所有访谈录音和笔记转化为电子文本，形成案例研究的初始资料库，对访谈的所有资料按照日期、对象等进行整理。其次，笔者对资料进行主轴编码，进一步厘清访谈资料中的关键事件和关键内容，以便进行整合分析。最后，笔者比较分析传统外源式发展、内源式发展、新内源

[①]资料来源：《系统破解发展瓶颈 小木耳撑起脱贫大产业》，http://yanbian.gov.cn/zw/zt/tpgj/202005/t20200527_150765.html。

[②]资料来源：《“汪清黑木耳”喜获2021中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牌》，http://www.jl.gov.cn/szfzt/jlssxsxnyxdh/gddt/202112/t20211224_8354008.html。

[③]根据调研数据，木耳价格每千克上涨14元，按照户均生产1万千克木耳计算，理论上户均可实现增收14万元。但实际上，受种植经营水平的影响，农户生产的木耳达到盒马鲜生收购标准的只有2～4成，按照2成计算，实际户均增收约2.8万元。收入的显著提升，极大地激发了当地农户种植木耳的热情。

式发展三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在综合分析已有资料的基础上，引入数字化、平台化、信息化要素，构建“功能—组织—结构”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总结归纳出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汪清县木耳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模式。

五、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汪清县木耳产业升级的案例分析

平台型企业作为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新兴产业组织形式（胡国栋和王晓杰，2019），凭借平台网络效应和平台技术优势，在实施扩张策略的基础上，通常具备超越单个传统企业的巨大能量。与一般平台型零售企业不同，平台型新零售企业采用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模式，深度嵌入消费场景，实现非标准农产品的标准化处理，并与上游农业供应链建立深度合作，在自营平台上面向目标消费群体销售高标准的生鲜农产品。平台型新零售企业以数据和技术为驱动，重构零售产业的“人、货、场”，并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云计算与云服务为支撑，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仓储式销售及精准营销的市场触达体系。以桃源小木耳为代表的汪清县木耳产业链上的企业，便是在盒马鲜生等平台型新零售企业的助推下，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

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汪清县木耳产业升级主要有三方面优势。其一，平台型新零售企业拥有海量消费数据资源。在助推汪清县木耳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平台型新零售企业深入挖掘海量消费数据，根据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消费场景、消费需求，精准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标准化产品。同时，基于木耳生产周期短的特征，平台型新零售企业能够精准捕捉市场变化，有效预测市场趋势，引导开发特色农产品，规避市场波动风险，以消费定生产，降低生产经营风险，提升汪清县木耳产业在同质化竞争中的竞争力。其二，以平台型新零售企业为核心的企业生态拥有健全的产业链生态体系，可以有效调动企业的内外部资源，补齐汪清县农业产业链短板。在助推汪清县木耳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充分发挥其健全的产业链生态体系优势，推动供应链建设，打造特色品牌，培训产业人才，减少产销中间环节，助力农产品进入大型商超终端，促进产销模式转型，为汪清县木耳产业注入新的发展动能。其三，平台型新零售企业拥有完备的线上线下市场触达体系。在助推汪清县木耳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平台型新零售企业依托线上线下市场触达体系，可以及时、准确地感知消费者需求变化，并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倒逼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迭代升级，重塑供应链体系，反哺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提升产业链信息共享程度，促进产供销各环节新技术的应用。具体优势及作用机制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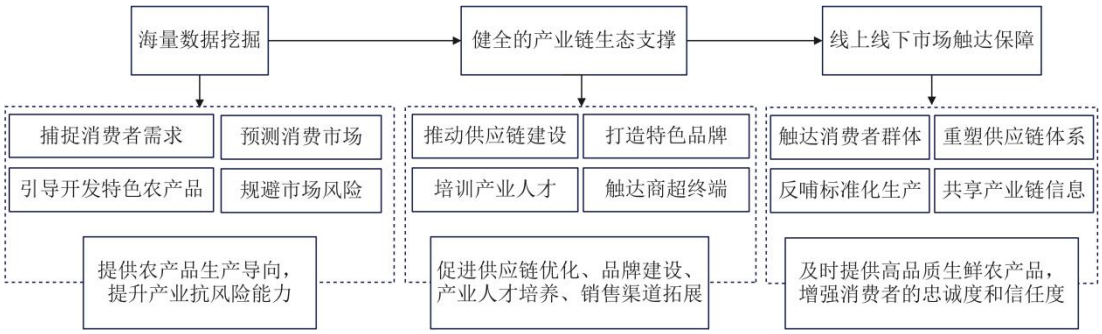


图 2　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优势及作用机制

（一）海量数据挖掘：助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功能前提

平台型新零售企业所掌握的海量数据是汪清县木耳产业升级的功能前提。农业产业发展除了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还受到市场风险的影响，而海量数据挖掘可以有效避免市场带来的风险。通过有效捕捉消费者需求、有效预测消费市场，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可以为农户和企业提供生产建议，帮助其根据市场需求精准调整生产策略，引导开发特色农产品。农户和企业将生产需求反馈至供应链前端的菌包厂，在菌包厂承诺收回废弃菌包和定向收购木耳的前提下，农户和企业能够自主选择效益好的菌包进行标准化生产，从而避免盲目生产带来的损失，有效规避市场风险。

1.有效捕捉消费者需求。平台型新零售企业积累了大量用户数据。在木耳消费过程中，用户的消费数量、频次、偏好等消费数据都有全流程记录。地区消费偏好、地区消费量均可直观体现。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可以精准掌握消费季节偏好、地区偏好、口味偏好等，从而构建消费信息数据库和用户数据画像。平台借助各种定向信息推广技术，多维、全面地向消费者推送个性化的产品信息（尹瑶和叶敬忠，2024）。

2.有效预测消费市场。正是因为拥有大量的用户数据，平台型新零售企业能够对消费者的消费量、季节偏好、地区偏好、口味偏好等有精准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平台型新零售企业能够有效预测市场需求，促进市场需求和生产供应的充分匹配。

3.引导开发特色农产品。平台型新零售企业依托积累的商品消费数据，深谙终端用户的喜好，在挖掘汪清黑木耳天然、有机等特色卖点的基础上，根据消费者习惯，按照脆、糯、润等不同口感，安排研发团队联合汪清黑木耳企业同步进行终端用户标准制定、产品开发、新品市场测试，助力企业开发出适用于不同消费场景、满足不同人群需求的标准化特色农产品。

4.有效规避市场风险。木耳生产周期较短，在汪清县现有技术条件下，40 天即可完成一个生产周期。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对消费市场的有效预测，汪清县的木耳生产才可以灵活响应市场价格波动，及时调整生产策略，有效规避市场风险，使农户和企业的效益得到保障，促使农户和企业在同质化竞争激烈的木耳市场中获得更具韧性的竞争力。

（二）健全的产业链生态支撑：助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组织基础

平台型新零售企业所构建的健全产业链生态体系，构成了汪清县木耳产业升级的组织基础。平台型新零售企业为了应对市场竞争者的挑战和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演化出健全的产业链生态体系。汪清县与大多数尚未实现农业产业升级的传统农业县相似，面临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落后、人才来源匮乏等发展困境。在此背景下，健全的产业链生态体系能够高效整合平台型新零售企业的内外部资源，加强汪清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并补齐缺失环节。

1.有效推动供应链建设。供应链建设是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核心环节。对于市场主体而言，稳定、持续、高效的产品供应能力意味着能够满足消费者在任何时间节点的消费需求。为推动供应链优化，平台型新零售企业的产业链生态体系部门派出 14 人物流科技团队，帮助汪清县设计并建设黑木耳产地仓。该产地仓于 2022 年 12 月部分投产，实现日罐装 1.8 万份，大幅提升了汪清县黑木耳的灌装效率，同时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目前，汪清县已初步形成以本地“链主”企业桃源木耳公司为核心的

黑木耳产业链聚集区。该聚集区具有菌棒全自动化中央工厂、黑木耳种植基地、黑木耳产地仓，并设立了共享加工、灌装、封箱中心等，实现了产业链闭环，完成了从短链到长链、从价值链低端到价值链高端的进化，强化了汪清县木耳产业链接现代市场的能力。

2.有效打造特色品牌。洛川苹果、大同黄花、柳州螺蛳粉、柞水木耳等知名“土特产”品牌，已成为乡土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品牌打造始终是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难点。在汪清木耳产业发展过程中，平台型新零售企业深度参与品牌规划与体系建设，并与地方政府合作制定《黑木耳生产管理质量规范》《黑木耳商品化指引》。按照规范和指引开发的新产品，其销售数据显著增长：单场直播销售的单数从原来的 7000 余单激增到 5 万余单，成交额从 30 余万元增长至 200 余万元。此外，平台型新零售企业优化设计虎豹元素的黑木耳公共品牌，并通过线上低碳减排公益项目、公益助农直播等活动，在丰收节、“双十一”、年货节等关键节点，对汪清县黑木耳公共品牌进行宣传和推广。

3.有效培训产业人才。面对产业人才的缺失，以平台型新零售企业为核心的企业生态系统有效组织资源，系统性开展专业人才培训。该体系不仅引导和督促农户进行线上学习，还派遣工作人员及时为农户授课，邀请专业人员为农户现场示范讲解，并选派人员外出进行专业学习。同时，常驻工作团队为人才技能提升提供技术支持。截至 2023 年 5 月，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已举办多种形式的培训 27 场，累计培训 2800 余人次。课程涵盖数字经济、县域电商、数字治理、电商运营、直播实操、供应链管理、经营管理等，参训人员涵盖村干部、企业管理人员、运营人员、农民网商等。平台型新零售企业通过持续协调企业生态基金会，支持 6 批次 14 名汪清县职高教师前往上海和杭州参加为期 7 天的美工、电商、短视频制作培训，提升职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此外，平台型新零售企业还整合企业资源，为 2 批次 80 余名职高学生提供电商直播培训。

4.有效触达商超终端。在传统经营模式下，特色农产品销售通常需要经过多个中间商环节。农户处于关系不对等的市场结构中，谈判能力弱，往往需要承担主要的市场损失。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具有健全的产业链生态体系，因此可以协调对接销售渠道，减少农产品销售中间环节。平台型新零售企业线下带领多家汪清县惠农企业前往上海市、浙江省、山东省等地，对接销售渠道，还促成汪清黑木耳入驻天猫等电商平台。此外，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利用其市场地位优势，成功对接大润发、海底捞等知名商超与餐饮连锁品牌，推动汪清黑木耳进入主流销售渠道。凭借卓越的品质和不断拓宽的销售网络，汪清黑木耳的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销售收益显著提升。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力汪清黑木耳有效触达商超终端，降低了农户经营风险，增加了其经营收益。

（三）线上线下市场触达保障：助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结构关键

平台型新零售企业拥有的线上线下市场触达体系是汪清县木耳产业升级的结构关键。不同于一般的平台型企业，平台型新零售企业运用大数据、移动互联、智能物联网、自动化等技术和先进设备，建立了涵盖供应链、仓储、配送的完整物流体系，实现了人、货、场三者之间的最优化配置。该线上线下市场触达体系布局了大量线下门店，通过闭环供应系统，能够有效触达消费群体、提升消费体验，并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农产品。然而，正因为线下门店数量较多，供应系统成本高昂，导致平台型新零售企业的整体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为进一步增加经营效益并提升消费者忠诚度，平台型新零售企

业将生鲜农产品纳入经营产品范围。但生鲜农产品不易储存，这就对供应链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总之，平台型新零售企业为降低经营成本、提升经营效益，对农产品供应链、产品标准化、信息共享度等均提出了更高要求，并建立了线上线下市场触达体系。

1.有效触达消费者群体。线上线下市场触达体系可以让消费者对农产品形成更直观的体验和感受，进而促使消费者产生情感化和个性化的消费体验，增强消费者的忠诚度和信任度。平台型新零售企业为消费者提供当日采摘、即时包装的生鲜食材，消费者可通过手机 App 便携下单，线下门店则提供 5 千米范围内的配送服务，同时支持门店自提。此外，线下门店采用超市和餐饮结合的模式，提供海鲜吧和茶饮区等服务。这些安排均有效提升了消费者的消费体验。

2.有效重塑供应链体系。平台型新零售企业经营的生鲜农产品对时效性有着较高要求，需确保供应链上的农产品在质量和数量上均达到供应要求，并且能够及时配送至消费者。为实现这一目标，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力汪清县重塑供应链体系，具体举措包括：推动菌棒中央工厂及分布式育菌房建设，并推进通用菌用物资联合集采，降低 10%～15%的木耳种植成本，同时提升木耳产品质量；指导建设年处理能力 1500 万千克干木耳的自动化产品包装生产线，降低包装成本；帮助设计并建设黑木耳产地仓，保障渠道稳定供给，延长产业链条；帮助优化物流路由，降低物流运输成本，将木耳物流成本由原本的 10 元/千克降低到 7 元/千克。

3.有效反哺标准化生产。线上线下市场触达体系不仅提升了用户消费体验，还增强了对消费群体消费习惯的精准把控。线上线下市场触达体系贯穿产品种植、原料选定、包装设计、物流运输等各个环节，对汪清木耳的生产与供应链提出了细致的标准和要求，进而推动汪清木耳实现标准化生产。在这一体系下，经营模式主要包括两种：一是产业链反馈模式。汪清县本地木耳企业“桃源小木耳”在平台型新零售企业的技术支持下，将市场的需求反馈给木耳产业链上游的菌包厂，由菌包厂提供标准化的特色农产品菌包。在菌包厂承诺收回废弃菌包和定向收购木耳的前提下，合作社、村集体提供技术和农资服务，农户自主选择效益好的菌包进行标准化生产，所生产的木耳由龙头企业收购，再通过平台型新零售企业连接外部市场。二是直供合作模式。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向农户直接提供技术支持、资金投入等服务，农户通过合作社或村集体与平台型新零售企业采购员达成协议，将自身生产的符合收购标准的木耳产品直接销售给平台型新零售企业。

4.有效共享产业链信息。由于线上线下市场触达体系处于生产经营体系的前端，因此可以敏锐捕捉市场的动态变化。平台型新零售企业依托其平台属性，在市场信息从消费端向供应端再向生产端传导的过程中，可以及时获取较为充分的市场信息，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信息共享。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帮助汪清县木耳产业相关主体及时感知市场变化，包括产品生产、流通、仓储等各个环节的变化趋势，使其能够及时调整生产，进而提高经营收益。不同的木耳产品有不同的技术要求，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将上下游产业链信息共享至相关主体，在促使他们及时调整生产的同时，也促进了产供销环节新技术的应用。

总体来看，在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汪清县木耳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海量数据挖掘是功能前提：海量数据挖掘能够精准捕捉消费者需求、预测消费市场、引导开发特色农产品，并有效规避市场

风险。如果缺乏数据支撑来控制市场风险并引导特色农产品开发，即便健全的产业链生态体系和线上线下市场触达体系存在，其作用也难以充分发挥。健全的产业链生态保障是组织基础：健全的产业链生态可以有效推动供应链建设、打造特色品牌、组织资源培训产业人才，并协调特色农产品进入大型商超终端。如果没有健全的产业链生态体系，即便具备海量数据挖掘和线上线下市场触达体系，也难以弥补相关主体在产业链建设、人才培养、品牌塑造和销售渠道拓展等方面的短板。线上线下市场触达体系是结构关键：线上线下市场触达体系不仅有效触达消费者群体、完善供应链体系、反哺标准化生产，还能够促进产业链信息共享，加速新技术在产供销环节的应用。如果缺乏这一体系，海量数据挖掘和健全的产业链生态体系将难以有效感知消费市场的细微变化，也就无法在生产端做出及时的生产调整，进而降低产业发展风险。

六、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汪清县木耳产业升级的模式

传统农业县普遍面临产业结构单一、人才吸引力不足、深加工农产品缺乏、品牌建设乏力等问题，即便拥有优质农产品，也往往因财政自给能力弱、政策配套不足等，难以形成涉农资金持续投入机制，并面临高昂的农业产业发展成本。数字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农业产业获得了发展壮大以及进行产业链整合的重要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海量数据的获取。然而，传统农业县如何突破发展桎梏，顺应数字时代的发展浪潮？如何解决产业发展迟缓、村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在数据要素的支撑下，拥有特色农产品的传统农业县应如何构建有效的产业升级机制？汪清县木耳产业在平台型新零售企业的助力下成功推进农业产业升级，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参考。本文基于汪清县木耳产业升级的实践，总结出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动力模式（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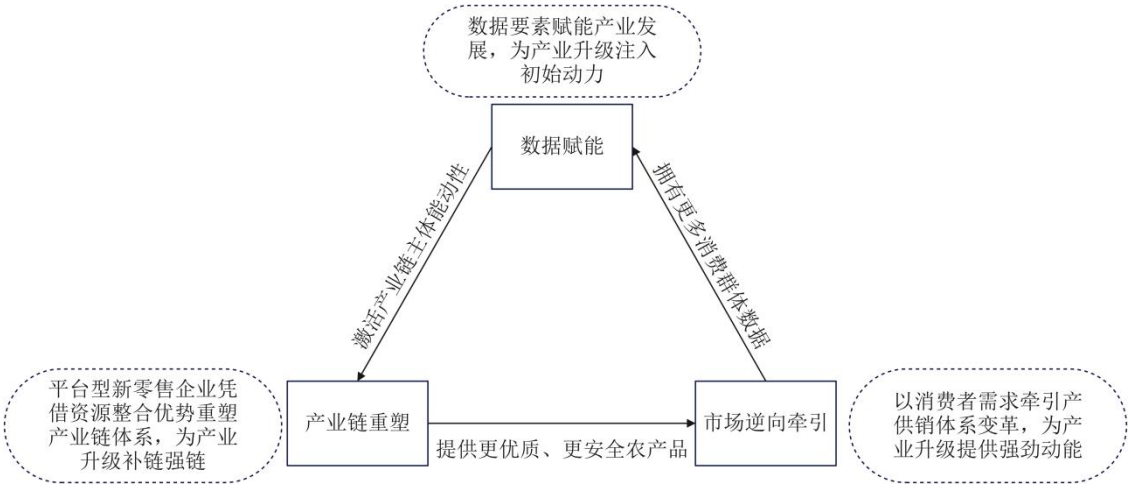


图 3　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动力模式

该模式主要由数据赋能、产业链重塑、市场逆向牵引三大核心驱动力构成：一是数据赋能。以数据要素赋能产业发展，为产业升级注入初始动力，激活产业链主体的能动性。二是产业链重塑。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凭借资源整合优势重塑产业链体系，为产业升级补链强链，确保更优质、安全的农产品供应。三是市场逆向牵引。以消费者需求牵引产供销体系变革，为产业升级提供强劲动能。平台型新

零售企业提供的海量数据挖掘、健全的产业链生态、线上线下市场触达体系相互支撑、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有机且闭环的整体，构建了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长效机制，为农业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与发展模板。

（一）数据赋能：数据要素赋能产业发展，为产业升级注入初始动力

内源式发展模式注重内部资源的开发、整合、重塑，以形成发展的内生动力。但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存在内源式发展所需要的内部要素条件，如红色资源（黄建红，2023）、旅游资源（郭占锋和田晨曦，2023）等。有些地区拥有内源式发展所需要的内部要素条件，但整合难度大、开发投入多，发展的内生动力难以激发。乡村振兴的重点是实现产业振兴，对于拥有优质农业特色产品的传统农业县而言，如何实现产业振兴是关键议题。本文认为，海量数据挖掘是产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能够为产业升级注入初始动力。具体而言，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凭借沉淀的大量用户数据，精准把握消费者需求，并结合木耳生产周期短的特点，以消费定生产，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数量和种类，有效提升农业产业的抗市场风险能力，确保产业链上的小农户、合作社、村集体、企业均能获得稳定收益，增强产业链整体稳定性，为产业发展注入初始动力。

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充分利用自身数据信息集成优势，及时向生产端反馈市场条件变化，探索出一条以数据信息促进产业升级的道路。汪清县以平台型新零售企业为切入点，利用其提供的海量消费数据及消费群体特征分析，将目标消费群体的差异化、精细化消费需求反馈至生产端，组织小农户进行精准生产。这一模式不仅增强了小农户、商户、企业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还降低了产业发展风险，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初始动能。拥有优质农业特色产品的传统农业县要重视数据要素资源的运用，加强与平台型新零售企业的沟通协作，以用户消费习惯与市场特征为切入点，主动将地方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与市场需求特别是目标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相匹配，找准农业产业开发的发力点，加大对特色农业产业的培育力度，规避产业结构单一、品牌培育困难、人才吸引力不足等劣势，充分发挥优质农业特色产品市场需求旺盛的优势，全面激活产业资源。只有这样，才能将有限的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本，为特色农业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积蓄动能。

（二）产业链重塑：利用优势资源重塑产业链，为产业升级补链强链

传统农业县在推动农业产业升级的过程中，经常会缺失产业升级的关键要素。汪清县木耳产业链缺乏供应稳定、品质可控的供应链履约中心，缺乏统一的品牌形象和推广渠道，缺乏高素质的产业人才，缺乏触达大型终端的销售渠道。平台型新零售企业拥有广泛优势资源，可以协助传统农业县有效建立稳定、持续、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可以塑造专业的品牌形象并通过广泛渠道传播，可以培训、培养高素质的产业人才，可以有效接洽大型终端销售渠道。依托平台型新零售企业的优势资源注入，汪清县成功重塑了产业链，实现了农业产业升级过程中的补链和强链。

完整有效的产业链是农业产业升级的必备条件。但大多数传统农业县受制于自然禀赋、交通基础设施、市场结构、人才资源等因素，难以形成完整的农业产业链。例如，汪清县虽具有悠久的黑木耳种植历史和优良的产品品质，但由于地处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东部交界处，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同时，该县黑木耳种植经营较为分散，市场风险难以有效管控，导致对木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的吸引力不足。由此，汪清县黑木耳陷入了“有好货无好价，有意愿无资源，有产量无销量”的困境。在此背景下，以平台型新零售企业为核心的企业生态体系，依托自身优势资源的全面注入，实现了对汪清县黑木耳产业链的重塑，使汪清县黑木耳产业突破了原有困境。

（三）市场逆向牵引：消费者需求牵引体系变革，为产业升级提供强劲动能

不同于政府，企业追求经济效益。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利用自身优势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过程，也符合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一般逻辑，即通过开发满足市场需求的木耳产品，降低木耳产供销环节的成本，以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若平台型新零售企业无法从助推农业产业升级过程中获益，这种农业产业升级模式必然难以持续，也很难有示范推广的价值。正是因为对经济效益的不断追求，平台型新零售企业才会利用自身的数据挖掘优势、组织资源优势、高效触达消费群体优势，通过市场的逆向牵引，有效重塑农业产业供应链体系、反哺产业标准化生产、共享产业链信息，促进产供销各环节新技术的应用，为产业升级提供充沛动能。

优质农业特色产品最终要依靠市场消费。只有市场不断接纳和消费优质农业特色产品，才能够形成产业发展的闭环，产业升级才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为了满足市场中消费者的多样化消费需求和应对市场竞争压力，平台型新零售企业通过提升产供销体系的运转效率，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农产品，同时也增强自身市场竞争力。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在提升产供销体系运转效率的同时，产业链中的生产、包装、物流、仓储、配送、零售等各个环节也得到了整合。农户、上下游企业为了获取稳定且可持续的收益，主动融入这一体系。这有助于完善供应链体系、共享产业链信息、提升技术应用水平和实现标准化生产。

七、主要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一）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对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汪清县木耳产业升级过程的深入考察，提出了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海量数据挖掘（功能）—健全的产业链生态支撑（组织）—线上线下市场触达保障（结构）”路径。其中，海量数据挖掘是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功能前提，可以有效捕捉消费者需求、预测消费市场、引导开发特色农产品、规避市场风险。健全的产业链生态是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组织基础，可以有效推动供应链建设、打造特色品牌、培训产业人才、触达商超终端。线上线下市场触达体系是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结构关键，可以有效触达消费者群体、重塑供应链体系、反哺标准化生产、共享产业链信息。

本文提出的“数据赋能—产业链重塑—市场逆向牵引”的农业产业升级动力模式，在汪清县木耳产业升级的实践中得到了验证。通过海量数据挖掘，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可以精准捕捉消费者需求，有效预测市场变化，为小农户提供生产导向，引导开发特色农产品，提升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健全的产业链生态体系可以促进供应链优化和品牌建设，培训产业工人，拓展销售渠道。而线上线下市场触达体系则通过及时提供高品质、标准化的生鲜农产品，增强消费者对特色农产品的信任度和忠诚度，从而形成产业升级的持续动力。

（二）进一步讨论

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经常面临政府、市场、社会多重失灵的情况，特色农业产业发展“选优扶强”机制是多元主体在长期目标趋同的情形下不断试错的结果（刘小峰等，2023）。然而，能够长期保持并形成特色农业产业优势的地区，多为“老少边区”。这些地区自然资源禀赋较差，可供发展的农业产业种类有限，因此，多元主体在自然资源禀赋约束下的长期目标趋同，进而形成了农业产业发展合力。相比之下，在自然资源禀赋较好的地区[①]，特色农业产业中的多元主体未必能保持长期目标高度一致，这使得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变动性较强。这种变动性导致“选优扶强”的农业产业发展机制并不一定能够成功。推动特色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平台型新零售企业，为应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变动性提供了新的思路。平台型新零售企业的外源式发展模式不仅适用于“老少边区”的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也为大部分自然资源禀赋较好的特色农业产业地区提供了一种不同于“选优扶强”产业发展机制的解决方案：通过引入强有力的市场力量，牵引实现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升级，降低产业发展类型变动的负面影响，减少政府投入，降低产业发展风险。

与传统经营模式相比，平台型新零售企业的经营模式使农业生产更加智能化、精准化，有效提高了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了市场风险，并提升了农民收入。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助推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过程，呈现外源式发展模式的特征：紧扣传统农业县的特色农业产业升级需求，在满足自身寻求高标准农产品供应地的同时，也为地方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补链强链。正是因为市场主体主导的外源式发展模式“帮忙不添乱”“利己也利他”，传统农业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自主性才被有效激发。通过平台型新零售企业的渠道、技术、品牌等资源，本地农户和企业生产出了更高质量标准、更稳定供应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从而在同质化的农业产业竞争中取得优势。最终，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内生力量逐渐变得强大。

然而，这种模式也存在明显的潜在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平台型新零售企业与小农户的权力关系不对等，导致小农户在议价、合作模式选择等方面的自主性较低；二是产业增收收益大部分被平台型新零售企业获得；三是农业生产风险依然由小农户和本地企业承担，尤其是在面临地区性系统性灾害时，小农户和本地企业难以有效应对，可能导致生产损失。因此，建议地方政府加强政策制度设计，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完善农村电商物流配送体系等，并加强政策监管和完善兜底保障，以更好地发挥平台型新零售企业在促进特色农业产业升级中的作用，维护小农户的利益。同时，不同地区在借鉴汪清县经验时，也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自身的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路径和模式，以实现特色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国军、王国恩，2020：《“新零售”环境下“盒马村”经济模式初探》，《农业经济问题》第7期，第14-24页。

[①]包括“老少边区”中自然资源禀赋较好的地区。

2.陈国军、王国恩，2023：《“盒马村”的“流空间”透视：数字农业经济驱动下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重构》，《农业经济问题》第 1 期，第 88-107 页。

3.陈航英，2021：《土客结合：资本下乡的用工机制研究》，《社会》第 4 期，第 69-95 页。

4.陈锡文，2024：《当前推进乡村振兴应注意的几个关键问题》，《农业经济问题》第 1 期，第 4-8 页。

5.褚庆宜、赵祥云，2023：《县域统合：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政府行为逻辑——基于陕西省柞水县木耳产业发展经验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 4 期，第 30-48 页。

6.风笑天，2005：《社会学研究方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57 页。

7.符平，2018：《市场体制与产业优势——农业产业化地区差异形成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1 期，第 169-193 页。

8.付伟，2020：《农业转型的社会基础 一项对茶叶经营细节的社会学研究》，《社会》第 4 期，第 26-51 页。

9.付伟、焦长权，2015：《“协调型”政权：项目制运作下的乡镇政府》，《社会学研究》第 2 期，第 98-123 页。

10.龚丽兰、郑永君，2019：《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中国农村观察》第 6 期，第 59-76 页。

11.郭占锋，2024：《对鹤见和子“内发型发展论”的再反思——基于〈农村振兴和小城镇问题〉》，《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第 114-129 页。

12.郭占锋、田晨曦，2023：《从“村落终结”到“社区再造”：乡村空间转型的实践表达——对陕西省袁家村的个案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 5 期，第 44-65 页。

13.贺雪峰，2007：《个案调查与区域比较：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进路》，《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第 112-119 页。

14.鹤见和子，1991：《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费孝通与柳田国男的比较》，载朱通华、宇野重昭（编）《农村振兴和小城镇问题：中日学者共同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 37-51 页。

15.胡国栋、王晓杰，2019：《平台型企业的演化逻辑及自组织机制——基于海尔集团的案例研究》，《中国软科学》第 3 期，第 143-152 页。

16.黄锋、郭超然、曹彦能，2023：《区域公用品牌如何创新发展？——来自“潜江龙虾”农业技术创新的启示》，《宏观质量研究》第 1 期，第 67-86 页。

17.黄建红，2023：《“红三角”内源式发展：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衡山案例研究》，《中国农村观察》第 3 期，第 125-141 页。

18.江艳军、黄英，2018：《农村基础设施对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资源开发与市场》第 10 期，第 1400-1405 页。

19.姜百臣、米运生、朱桥艳，2017：《优质农产品质量特征的消费者选择偏好与价格支付意愿——基于 Hedonic 模型的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第 128-137 页。

20.姜庆志，2019：《走出怪圈：产业扶贫中基层政府治理转型的多重逻辑——基于建始县的纵向案例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 11 期，第 100-115 页。

21.李祖佩，2015：《项目制基层实践困境及其解释——国家自主性的视角》，《政治学研究》第 5 期，第 111-122 页。

22.林毅夫，2018：《产业政策与国家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载林毅夫等（编）《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17-31 页。

23.刘军强、鲁宇、李振，2017：《积极的惰性——基层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的运作机制分析》，《社会学研究》第 5 期，第 140-165 页。

24.刘蓝予、周黎安，2020：《县域特色产业崛起中的“官场+市场”互动——以洛川苹果产业为例》，《公共管理学报》第 2 期，第 116-127 页。

25.刘小峰、彭扬帆、徐晓军，2023：《选优扶强：老少边区特色农业“一县一业”格局何以形成——盐池滩羊的纵向案例研究》，《管理世界》第 7 期，第 46-63 页。

26.罗必良、洪炜杰、耿鹏鹏、郑沃林，2021：《赋权、强能、包容：在相对贫困治理中增进农民幸福感》，《管理世界》第 10 期，第 166-181 页。

27.马荟、庞欣、奚云霄、周立，2020：《熟人社会、村庄动员与内源式发展——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中国农村观察》第 3 期，第 28-41 页。

28.马玉婷、高强、杨旭丹，2023：《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第 69-79 页。

29.慕良泽、任路，2010：《惠农政策的嵌入与乡村治理资源重组——基于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调查分析》，《理论与改革》第 6 期，第 71-74 页。

30.齐文娥、欧阳曦、周建军，2021：《区域品牌成长路径及其机理——基于赣南脐橙的案例分析》，《中国流通经济》第 12 期，第 90-101 页。

31.曲甜、黄蔓雯，2022：《数字时代乡村产业振兴的多主体协同机制研究——以 B 市 P 区“互联网+大桃”项目为例》，《电子政务》第 1 期，第 114-124 页。

32.茹玉、肖庆文、都静，2019：《全球价值链助推农业产业升级的创新路径研究——基于湄潭县茶产业扶贫项目的案例分析》，《农业经济问题》第 4 期，第 51-59 页。

33.阮俊虎、刘天军、冯晓春、乔志伟、霍学喜、朱玉春、胡祥培，2020：《数字农业运营管理：关键问题、理论方法与示范工程》，《管理世界》第 8 期，第 222-233 页。

34.折晓叶、陈婴婴，2011：《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 4 期，第 126-148 页。

35.唐世平、张雨亭，2021：《经济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一个根本性的批判》，《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 6 期，第 173-185 页。

36.田先红，2022：《从强干预到弱干预：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型政府行为转型研究——基于 L 镇产业发展过程的案例分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6 期，第 41-52 页。

37.韦德，1996：《东亚的产业政策：引导市场还是跟随市场？》，载杰里菲、怀曼（编）《制造奇迹——拉美与东亚工业化的道路》，俞新天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第 113-121 页。

38.吴延兵，2017：《中国式分权下的偏向性投资》，《经济研究》第 6 期，第 137-152 页。

39.徐宗阳，2016：《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基于华北地区一个公司型农场的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5 期，第 63-87 页。

40.徐宗阳，2022：《农民行动的观念基础——以一个公司型农场的作物失窃事件为例》，《社会学研究》第 3 期，第 182-205 页。

41.颜燕华，2020：《正宗与时变：基于安溪铁观音的产业治理与生产实践研究》，《社会》第 5 期，第 112-136 页。

42.杨润峰、王一鸣、仝志辉、刘闯，2023：《基层党组织何以推进乡村建设——基于组织领导力视角的川底村党支部案例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 3 期，第 142-161 页。

43.尹瑶、叶敬忠，2024：《新零售驱动消费革命的实现逻辑——基于盒马鲜生公司平台的数字化实践》，《农业经济问题》第 6 期，第 45-57 页。

44.岳晓文旭、王晓飞、韩旭东、周立，2022：《赋权实践如何促进乡村新内源发展——基于赋权理论的多案例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 5 期，第 36-54 页。

45.曾智洪、毛霞维，2020：《精准扶贫驻村工作队嵌入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拆解与立体化重构》，《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5 期，第 107-113 页。

46.张环宙、黄超超、周永广，2007：《内生式发展模式研究综述》，《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2 期，第 61-68 页。

47.张森、叶敬忠，2023：《“项目跑步机”上的村庄发展：自主性与可持续性探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第 86-100 页。

48.章熙春、陈泽、李胜会，2024：《引领式嵌入治理：科技特派员何以助推乡村产业新内源式发展——基于对广东省平远县梅片树产业的考察》，《中国农村观察》第 1 期，第 65-84 页。

49.郑观蕾、蓝煜昕，2021：《渐进式嵌入：不确定性视角下社会组织介入乡村振兴的策略选择——以 S 基金会为例》，《公共管理学报》第 1 期，第 126-136 页。

50.郑永君、张茜，2023：《资本嵌入、村庄响应与农地规模化经营成效》，《探索》第 1 期，第 129-146 页。

51.周黎安，2017：《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3-17 页。

52.周黎安，2018：《“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社会》第 2 期，第 1-45 页。

53.朱启臻，2018：《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产业——产业兴旺的一种社会学解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第 89-95 页。

54.Chang, H. J., 2007, *Bad Samaritans: The Myth of Free Trade and Secret History of Capitalism*,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34-47.

55.Eisenhardt, K. M., 1989,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4): 532-550.

56.Norton, R. D., 1986, “Industrial Policy and American Renewal”,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4(1): 1-40.

57.Ray, C., 1999,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Reflexive Modernity”,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3): 257-267.

58.Ray, C., 2010, “Cultu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erritorial Rural Development”, *Sociologia Ruralis*, 38(1): 3-20.

59.Slee, B., J. D. Ploeg, and A. Long, 1994, “Theoretical Aspects of the Study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J. D. van der Ploeg, and A. Long (eds.) *Born from Within: Practice and Perspectives of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Assen*, Netherlands:Van Corcum., 44-56.

Paths and Models of Platform-Based Omni-Channel Retail Enterprises Facilita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Specialized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LIANG Zhe[1] CHEN Shanen[2] CUI Caixian[1] CAI Songfeng[3]
(1.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Rural Economy,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3.General Office, Economic Forecasting Department, State Information Center)

Summary: Vigorously and effectively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hing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However, certain regions have encountered challenges characterized by low-level repetitive development and frequent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during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underscoring the urgent need fo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radigms.While existing academic research has extensively explore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led exogenous development models in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market-driven exogenous development models. Platform-based Omni-channel Retail Enterprises, as typical market-driven exogenous development entities, demonstrate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massive data mining, comprehensive industrial chain ecosystem support, and online-offline market access assurance, which can effectively facilitate the upgrading of specialized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This paper employs an embedded case study approach to thoroughly examine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process of black fungus cultivation in Wangqing County. The aim is to explore the functional mechanisms of Platform-based Omni-channel Retail Enterprises in the upgrading of specialized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function–organization–structure", and traces the evolutionary path of "massive data mining (function)–robust industrial ecosystem support (organization)–online and offline market access guarantees (structure)". It summarizes and reflects on the process by which Platform-based Omni-channel Retail Enterprises facilitate the upgrading of specialized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through the model of "data empowerment–industrial chain restructuring–reverse market traction".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massive data mining enables effective identification of consumer demands, prediction of market trends, guidance for specialty agricultural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mitigation of market risks; robust industrial chain ecosystems facilitate supply chain optimization, distinctive brand cultivation, professional talent development, and retail terminal penetration; integrated online-offline market access mechanisms ensure consumer outreach, supply chain restructuring,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improvement, and industrial chain information synergy.

Local governments are advised to strengthen 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s with Platform-based Omni-channel Retail Enterprises to accelerate the upgrading of specialty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Simultaneously,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nhance infrastructure, improve rural financial services, and optimize e-commerce logistics systems to foster a conducive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policy oversight and safeguard mechanisms should be fortified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smallholder farmers. When referencing the experience of Wangqing County, other regions should adopt context-specific development pathways and models tailored to their unique circumstances.Existing studies have seldom compared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market-driven exogenous development models with endogenous, neo-endogenous, and government-led exogenous models in promoting specialized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upgrading. Moreover, there remains a paucity of meso-level case studies focusing on county-level industrial entities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addressing these research gaps to a certain extent.

Keywords: External Development; Industrial Upgrading; Platform Based New Retail Enterprises; Distinctive Agricultural

JEL Classification: D22; L22; Q13

（责任编辑：尚友芳）

乡贤、村治与传统中国村落共同体的建构

李华胤

摘要：村落共同体是学术界长期讨论的经典议题。村落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建立在家户制基础之上的村落社会既具有整体性与稳定性，也具有分散性、分化性和矛盾冲突性，但村落社会在历史上长期保持着共同体形态。本文在“认识和理解村落共同体就要进入共同体内部”的研究主张下，运用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深入村落共同体内部研究发现，乡贤群体作为村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内生性权威，成为村落社会的权力主体和治理主体。乡贤在整合村落社会资源和调和社会关系基础上，通过共同行动满足村落社会成员的共同性需求，解决村落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抑制分化和对立，最终形成了共同的利益联结，维系了整体性秩序，并塑造了村落社会的共同体状态。村落共同体既是生活实体，也是共同性和整体性的关系状态。乡贤是村落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主体，乡贤治村是村落共同体建构的核心机制。没有乡贤的有效治理，村落社会可能很难形成具有共同性和稳定性的共同体。认识和理解“乡贤治村”作为村落共同体建构的内在核心机制，特别是在当代乡村社会面临原子化与个体化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发挥乡贤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对于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村落社会　乡贤　村治　传统中国村落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共同体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存在形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村落是农业社会的基本单位。当然，农业社会也孕育出了不同形态、不同层次的共同体，村落共同体便是其中之一。村落共同体也一度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讨论议题，“传统中国是否存在村落共同体”以及“村落共同体的形态是什么”便是学者争论和讨论的核心话题。村落共同体指的是生活在同一个地域空间的人群，基于共同的生活、生产、习俗、利益、社会交往和文化认同而形成的一种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的社会生活形态。村落共同体是基于乡村人群在关系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若干

［资助项目］　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课题（A 类）重大项目（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课题基金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究”（编号：23JDTCZ006）。

［作者信息］　李华胤，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电子邮箱：lihuayin123@163.com。

“共同性”而得以形成和维系的，这一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依赖于人为的社会建构。那么，传统中国村落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内在的建构机制又是什么呢？

2015 年，华中师范大学的徐勇教授发起了“深度中国农村调查”，对全国七大区域的 120 个村落的社会历史形态进行深入调查。该调查深入村落社会运行的微观场域，涵盖自然、经济、社会、文化和治理等各方面内容，完整且全面地再现了传统时期的村落社会与治理形态。根据已经出版的《中国农村调查》（村庄类）（包括华南区域第 1～9 卷、长江区域第 1～10 卷、黄河区域第 1～12 卷）[①]中有关“村落社会、村落治理”等方面的调查资料（以下简称“深度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乡贤群体作为中国传统村落社会中的权威主体、权力主体和资源主体，在村落共同体的塑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内部视角”，主张“要认识和理解村落共同体，必须进入其内部”，以乡贤为切入点，从乡贤的治理行为出发对村落共同体的内在建构机制进行深入探讨，进一步从微观层面厘清传统中国村落共同体的建构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②]。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是其中的重要议题。无论是新时代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还是传统中国村落共同体，都具有人为建构性。共同体作为一种稳定的整体性形态，其内部的建构性力量是核心要素。通过研究乡贤、村治与传统村落共同体的内在关联机制，本文能够为当前以新乡贤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提供理论借鉴。

二、村落共同体建构的内部视角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乡里乡亲”“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说法。村落是乡村人群的生活空间，既是社会自我治理的场域，也构成国家治理的基础。“村落”这一概念可以从两个维度去理解。首先，“村落”是一个地域社会性概念。王沪宁（1991）认为，中国的乡村分为不同的、形态各异的村落，乡民的生活主要在自己的村落中展开，家族生活也以村落为基地。在这个意义上，村落是指具有共同居住空间或居住生活关系的人群的集合。其次，“村落”也是一个国家行政性概念。《周礼》中提到，“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阨”[③]。其中，“乡”指的是由若干村落组成的“里”以上、“县”以下的地域性行政管理单位，而“里”则指的是处于国家政治权力末梢的乡村地域单位。“里以村落和居住地域为基础，是基本的基层行政管理和赋役征发单元”（鲁西奇，2021）。在传统中国，国家权力对村落社会而言，更多地只有资源汲取功能和政治控制功能，而无治理和服务功能，村落社会更多的是一个依靠内生性秩序得以运行的社会性单位。因而，无论从政治层面还是社会层面来理解，“村落”都是由有着共同的居住、生活、情感和习俗的若干社会人群组成的“村落社会”。

社会是人群的集合，村落社会则是共同生活在村落地域空间下的人群的结合，家庭是村落社会的

[①]该书系于 2017—2024 年陆续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54 页。

[③]钱玄、钱兴奇、王华宝、谢秉洪注译，2001：《周礼》，长沙：岳麓书社，第 123 页。

基本单元。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对共同体和社会进行了区分研究，他将“共同体”理解为按照亲属、邻里和友谊等关系力量形成的人群结合状态，认为“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滕尼斯，1999）。滕尼斯对于共同体的理解是从结合关系的意志属性来界定的，按照本质意志建立的结合关系是共同体，按照选择意志确立的结合关系则是社会。也就是说，共同体是一个关系性概念，反映着特定人群之间的关系结合状态和生活状态。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是共同体的基本类型。血缘共同体基于共同的血缘关系，地缘共同体直接表现为居住在一起（滕尼斯，1999）。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村落，在地理形态上呈现为“湾、坪、场、垸、庄、沟、屯、堡、寨”等。人们在这些地理形态各异的空间上冠上姓氏，就形成了具有独特地域社会标识的村落社会，将村落社会彼此区分开来。费正清（1999）对中国村落进行了细致刻画，指出“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单位（各个世系）组成，他们世代相传，永久居住在那里，靠耕种某些祖传土地为生”。费孝通（2008）则认为“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当然，受制于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的影响，农户在长久的共同生产和生活中会形成共同的社会关系网络、共同的利益以及共同的文化和惯习。当然，在国家建构的“乡里制度”之下，村落农户彼此之间还因共同的地缘关系而负有共同的政治责任关系，形成了支撑国家政权的基础性政治责任共同体。“凡是在人以有机的方式由他们的意志相互结合和相互肯定的地方，总是有这种方式的或那种方式的共同体”（滕尼斯，1999）。胡彬彬（2021）从历史的角度指出，村落的宗族化发展、村民互助体系的形成、村民信仰的同质化、村落治理的乡约化四个内在的历史文化结构特点决定了传统中国村落的共同体性质。张思（2005）基于农民生产中的结合行为，认为“一个时代的村民结合的基本形态反映着该时代村落共同体乃至农村社会的性质”，华北农村的农民为了某种共同的目的而结成的协同、互助、合作关系，反映在生产劳动、自治防卫、精神需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通过共同的行动和行为表现出来，充分说明了近代华北农村具有共同体的性质。总之，村落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共同血缘关系、共同地缘关系、共同利益关系、共同文化关系和共同政治关系基础之上的共同体。只是在中国不同地域的乡村社会，这些共同性关系会在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利益关系等的联结程度和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异，但这并不否认传统中国村落社会的共同体性质。

村落共同体是一个有机体，但这个有机体并不是完全封闭的、私密的和内向性的。村落共同体内部的成员是一个个家户。家户是独立的生活单元、产权单元、生产单元、消费单元、社会交往单元和政治责任单元，是村落社会的细胞，既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这就决定了村落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流动性和包容性。费正清（1999）谈道：“在正常情况下，农民生活并不限制在一个村子里，而是展开在形成一个集市地区的一大批村子里。”滕尼斯（1999）也并不否认共同体内部的矛盾关系，“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在村落社会内部，家户单元在土地财产数量、本姓氏家族成员数量、文化或功名、家庭男丁人口数量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村落社会结构并不是水平结构，而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化、分离甚至是矛盾和冲突。但是，在延续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历史长河中，村落社会一直保持着稳定性和整体性，村落社会成员之间一直存在着有机的结合关系。那么问题是，这

样一个内部存在着分离、对立和矛盾的村落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呢？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对村庄社会进行了界定，认为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费孝通，2012）。村庄具有人群共同生活的特质。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基层社会：一种是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是建立在“有机的团结”基础上的礼俗社会；另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是建立在“机械的团结”基础上的法理社会（费孝通，2008）。中国的村落社会便属于前者，村落社会成员彼此熟知、相互信任，并默认一致遵守在共同的、长久的农耕社会基础上形成的礼俗。村落共同体建立在共同的礼俗文化基础之上。在传统村落，“中央所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费孝通，2021），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轨道并不对村落社会秩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维系村落社会秩序并满足共同需求的是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其中最为关键的群体便是绅士。“一个绅士，他领导推行地方的自治公务，只要他不利用特权，侵夺公产，而真能用之于公，做些有益地方的工作，他就可以获得公正绅士的美名，得到农民的赞仰与拥护”（胡庆钧，2014）。换句话说，拥有地方权威的村落绅士在村落共同体的延续与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

韦伯从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维度来理解共同体。他认为，村庄由彼此相邻的家族群体组成，是一种典型的邻里形式。“邻里是地方共同体（Gemeinde）的天然基础”（韦伯，2009）。村庄之所以是共同体，是因为村庄内部比邻而居的邻里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睦邻关系。这种关系不受社会地位的限制。邻里之间的相互依靠、相互帮助体现为一种普遍性的博爱关系，进而在村庄内部形成一种紧密的社会关系联结。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对中国的村落进行了深入解读，指出中国的村落建立在氏族组织的基础之上，受到皇权和官方行政的影响很小，通过自身的组织来运转（韦伯，2010）。他指出，“村落无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都具有地方自治团体（Kommunalkorper）的行动能力”。因此，村落社会是一个内在性整体，具有共同体的属性，但这种内部整体性是基于自治，而非天然因素。

在日本的村落共同体学派中，一部分学者在探讨“中国华北是否存在村落共同体”这一议题时持肯定的态度。例如，清水盛光（1951）基于中国华北地区农村的村民在农耕生产和农耕生活中的通力合作、相互援助、互助合作等行为现象，指出这些行为所形成的共同关系促使了村民的结合。平野义太郎（1945）则基于中国华北地区农村的村民共同举行的“集会、治安、防卫、祭祀、祈雨、婚葬”等集团性活动的存在性，认定了华北村落存在共同体。也就是说，村民之间的互助性和合作性行为是村落共同体形成的主要因素。村落共同体建立在特定的生产性合作和生活性互助的基础之上。

以中国东南宗族性村落研究见长的华南学派探究了宗族性村落社会的血缘共同体性质。例如，弗里德曼（2000）认为，氏族通常只是村落的一个部分，但是，在福建和广东两省，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叠在一起，形成了地域性的血缘宗族组织。血缘寓于地缘之中，二者合而为一，成为村落人群结合的共同纽带。葛学溥（2011）通过对广东凤凰村的研究指出，虽然村落成员存在流动和迁移，“但仍有两条纽带把个人同凤凰村社区的成员资格联系在一起”，“甚至当由于当地范围内的不足增加，向

外扩展成为个人成就和表现机会时，社区通过其家族主义的组织机体，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来维持村落的统一”。共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共同地缘关系是宗族性村落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村落社会既是一个紧密的血缘社会，也是一个内聚的地缘社会，由此型构了一个血缘共同体与地缘共同体复合叠加的村落共同体。

可以看到，关于村落共同体的经典理论，要么着重于论述村落共同体成员的社会结合载体或条件，要么着重于从现实中寻找村落共同体的共同纽带或共同要素，都未能深入村落共同体内部去探讨村落共同体形成的要素，以及维系其存续的机制。建立在一家一户基础之上的乡里社会，形成了具有强烈分散性的小农经济社会形态。毛泽东对中国村落社会性质的认识极为深刻，他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①]。家户单元的个体性形塑了村落社会内部的分散性。村落社会的分散性不仅会生成村落社会成员之间的相对分离性，而且会降低和抑制村落社会成员之间的团结性。但是，从整体来看，这样的村落社会自秦汉到近代，一直延续了千年，并且没有发生太大的结构性变革，甚至成为上层皇权统治的基础。有学者指出，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中国村落共同体的性质，在先秦就初步形成，唐宋以来直至明清，不断完善、越发紧密（胡彬彬，2021）。可见，中国村落的共同体性质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徐勇（2024a）对“传统中国是否存在村落共同体”这一经典命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指出：“中国的村落社会形态及其共同体的形式具有丰富性、进化性和非均衡性的特点。社会分化程度愈低，共同体的自然属性愈高；社会分化程度愈高，共同体的人为构建属性愈强。”这一论断不仅承认了中国村落共同体的客观存在性和区域差异性，也强调了村落共同体具有人为建构性。那么，建立在分散的家户单元基础之上的村落社会是如何维系的？村落社会共同体的建构机制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深入村落共同体内部去探究村落共同体建构的内在机制。这是因为，无论是作为实体概念的共同体，还是作为关系概念的共同体，都是一个有机体，而有机体能够保持共同性、整体性和稳定性，主要依赖于其内部要素的作用，而非外部因素。

鉴于此，本文提出从村落共同体建构的内部视角进行分析。内部视角指的是进入村落共同体的内部，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在把握个体与个体之间共同性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个体与整体之间的依存依赖关系和共生共存关系，从而系统地把握村落共同体建构的核心要素。具体而言，本文旨在分析分散化、个体化和多样化的村落社会成员如何在满足共同需求、解决共同矛盾和冲突的基础上，将分散分化的村落社会群体联结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即具有若干共同性的共同体关系状态。

三、村落共同体的特质与乡贤类型

村落共同体的形成基础是以村落、聚落为基本地域单位的生活性社区。村落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家户，家户是行动主体，是村落社会的行动单位。从外部来看，村落社会具有地域属性、社会属性和生活属性。村落社会既是家户群的经济生产空间，也是家户群的生活空间和社会交往空间。从内部来看，

[①]毛泽东，1991：《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931页。

村落社会具有社会结构上的分化性和社会生活上的共同性，二者并存，共同形塑了一个个体与整体兼具、分化与共融并存的村落共同体形态。

从传统中国的村落社会结构来看，村落社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分化性。家户是村落社会的基本单元，但家户不是均质的，也不是同质的，而是具有异质性的。一方面，由于家户土地占有量的不同，村落社会成员既包括拥有土地的地主、富农或自耕农，也包括不拥有土地、以土地租佃为生的佃户。土地占有量的不同导致家户财富和地位的差异，进一步催生村落社会内部成员之间的经济分化。另一方面，家户人口数量的多少、在同姓宗族中的血缘等级差异、家户男丁人口数量的多少，以及能否通过读书获得文化名望、国家功名或政治权力等因素，导致村落社会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社会地位的分化。经济分化与社会地位分化在村落社会中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

虽然传统农业社会的分化不像建立在个体化、市场化基础上的现代社会所塑造的分化那么严重、那么复杂，但是如果作一个简单划分，村落社会的分化性使得村落社会内部存在两大阶层：一个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资源较为丰富的村落精英阶层；另一个是与之相对的缺乏这些资源的普通民众阶层，即乡民。萧公权在《中国乡村：19 世纪的帝国控制》中指出，“从社会上来说，一个乡村的居民通常分为两大群体，即‘绅’和‘民’；从经济上来说，可以划分为富有的地主和贫穷的佃农，这条线虽然变动，但很清楚”（萧公权，2020）。杨懋春在《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指出，村庄领导可分成官方和非官方两种（杨懋春，2012）。村庄领导通常与年龄、财富、学识等因素相关。因此，村落精英与普通农户是村落社会的两大主要阶层，尽管他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村落场域，但相对于普通农户而言，村落精英不仅具有本村村民身份，还具有权威身份，是乡里社会的公共权威，受到普通农户的普遍认可和尊重。部分村落精英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公共意识和道德责任感，在村落社会公共事务和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领导作用，成为村落社会的“乡贤”。明代学者蒋冕把“乡贤”理解为乡里社会的贤者，即“生于其乡而众共称贤，是之谓‘乡贤’”[①]；明朝嘉靖十三年（1534），官方将“乡贤”定义为“生于其地而有德业学行传于世者”[②]。乡贤是指以乡缘关系认同为纽带的“本土本乡贤达人士”（姜方炳，2021）。德才兼备且惠及乡里是人们对乡贤最朴素的理解（徐祖澜，2024）。乡贤既是在地性的主体，也更重在“贤”，是内生于村落社会或更广阔意义上（乡村社会）的权威，在乡村社会拥有较多的社会权力或较高的社会威望，是村落或乡村社会秩序的领导者和主导者。这里的“在地性”是指一定乡村地域范围内的“在地性”。中国传统村落是一个完整的地域社会单位，但彼此之间不是完全隔离的，而是存在血缘、地缘和文化上的若干联系。即使个别村落由于人口规模、地域条件和土地等因素的限制，缺少“在村落性”的乡贤，邻近村落中的乡贤也可能对本村产生影响，成为村落社会中的权威人物，发挥重要作用。

具体而言，根据“深度中国农村调查资料”，村落社会的乡贤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经济型乡贤，主要是指村落社会中那些具有较多土地资源并具有较高社会威望的地主，或者在村里从事农业产业经

[①]〔明〕蒋冕著，2001：《湘皋集》，唐振真、蒋钦挥、唐志敬点校，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第 206 页。

[②]〔明〕俞汝楫编，1935：《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卷 85（下）《礼部志稿》（二），上海：商务印书馆，第 28 页。

营的“老板”。例如，在湖北余村，村中开纸厂的“老板”彭则夫因威望高而被村民称为“则夫先生”。二是权力型乡贤，主要是指村落社会中具有正式国家权力并具有较高权威的人，如村长[①]、保长、甲长等。三是文化型乡贤，主要是指村落社会中具有较高文化权威的读书人或有功名的人，如乡绅、教师、私塾先生、中人、写约人、保人、代笔人等。四是道德型乡贤，主要是指村落社会中具有较高血缘权威或道德权威的人，如“知客先生”、族长、族贤、房长、长者或长老（“老辈子”）、绅粮、袍哥大爷、“在讲的”、“问事人”、“会首”、“大乡贤”、“大头首”等。乡贤的具体分类如表1所示。权威总是与权力相伴相生。拥有权威的人，往往也会产生相应的权力，因此，乡贤也是村落社会中的权力主体。

表1　　乡贤的基本类型

基本类型	基本特征	具体内容
经济型乡贤	具有较多土地或财富且威望高	地主（东家）、“庄头”、“老板”等
权力型乡贤	具有正式国家权力且威望高	村长、保长、甲长等
文化型乡贤	具有较高文化权威	乡绅、教师、私塾先生、中人、写约人、保人、代笔人等
道德型乡贤	具有较高的血缘权威或道德权威	“知客先生”、族长、族贤、房长、长者或长老（“老辈子”）、绅粮、袍哥大爷、“在讲的”、“问事人”、“会首”、“大乡贤”、“大头首”等

资料来源：徐勇、邓大才主编的《中国农村调查》（村庄类）书系。

从传统中国村落社会的生活角度来看，村落社会具有内在的共同性。“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许多公共事务需要有人去组织实施”（王晓毅，1993）。在同一个村落地域空间内，包括乡贤群体和普通农户在内的所有农户共同生活，既有共同遵守和默认一致的习俗和惯习，也在日常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产生共同的利益需求。韦伯（2010）认为，中国村落里的所有种种农民生活，绝不可将之想象成一和谐的、家父长式的田园牧歌。费孝通（2012）则认为，人们住在一起，或相互为邻这个事实，产生了对政治、经济、宗教及娱乐等各种组织的需要。根据“深度中国农村调查资料”，在传统中国的村落社会中，一家一户虽然独立自主，但并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彼此之间存在着若干共同性的需求，如堰塘、水坝、水塘、灌溉沟渠等水利设施的修建与维护，桥、路、渡船、庙宇等公共基础设施的修建与管理，村落安全防卫设施及组织的建设与运行，教育供给、孤寡贫困群体的救助、灾害救济、婚丧互助、节庆文化活动组织、祭祀活动等社会文化需求。这些需求与家户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无关，是村落社会成员的共同性需求，也是共同利益的体现。即使是拥有较多经济、社会、权力和文化资源的乡贤群体，也同样面临这些需求，他们单靠自身力量也无法完全满足，必须依赖于更大范围的家户联合行动。“家户制具有二元性、混合性，更强调个体性（非西方意义的自然人个体，而是家户个体）和个体之于整体的相对独立性、差异性”（徐勇，2013）。进一步，家户单位在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意味着家户之间既存在利益的一致性，也存在利益的对立性。这种对立性意味着村落社会成员之间可能会产生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或冲突，具体表现为土地租佃或买卖中的纠

[①]本文中的“村长”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对“一村之长”的称谓。

纷、用水与分水中的水利纠纷、市场纠纷、互助合作中的纠纷、邻里纠纷、地邻纠纷、分家或财产继承的纠纷、借贷纠纷以及社会交往中的矛盾等。这些矛盾或冲突涉及村落社会中的多个家庭单位，甚至会延伸至更大的家族单位。矛盾或冲突的存在对于村落社会具有一定的分解性，也会影响村落社会成员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只有有效化解矛盾或冲突，村落社会成员才能正常生活和生产。矛盾或冲突越多、越得不到解决，村落社会秩序就越混乱，进而削弱其稳定性和整体性。因此，秩序不仅是一种理想追求，更是一种现实需求。从这个意义上看，村落社会矛盾或冲突的化解也是一种共同性需求。每个村落社会成员都希望所生活的村落社会是一个有序的美好空间，而无序的村落社会定然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需要。

无论是超越一家一户的解决力量的物质性需求，还是协调家户间关系的社会性需求，在村落社会场域，它们都构成了村落社会成员的共同性需求。当更多家户需要满足这些需求时，这种共同性需求便转化为一种规模性的共同性需求。在传统社会中，“皇权的官方行政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韦伯，2010），国家只将收税和兵役的职能延伸至村落社会，而不直接对村落社会的共同性需求和公共秩序进行介入和干预。村落社会共同性需求的满足和公共秩序的维系并没有进入国家治理的议程，只有当这些需求或秩序问题对国家政权产生不利影响时，国家才会主动介入进行治理。

因此，村落社会的共同性需求都需要依赖于村落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进而形成目标一致的共同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共同性的需求、解决共同性的矛盾或冲突，使乡里社会处于大家都能正常生活和生产的有序状态。韦伯（2009）认为，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像自然灾害、社会突变这种特殊情况下产生的大量特殊需求，都要依靠超出单个家族的社会行动去满足：邻里间的援助。村落社会的共同性需求和矛盾冲突化解属于内生性需求，仅凭一家一户的力量是很难得到满足和解决的。只有通过有效的社会行动将乡里社会成员联结为一个整体，并依靠整体的力量或共同的力量，才能解决矛盾或冲突、满足共同性需求，从而生成村落社会稳定的内生性秩序，将村落社会维系在一个适合生活或生产的美好空间。因此，拥有权威和权力的乡贤便成为满足村落社会成员共同性需求、解决矛盾或冲突的内生性力量，构成村落社会的治理主体。作为村落社会人群的组成部分，乡贤不仅享有权威身份，更具备社会职能。张仲礼（2008）认为，绅士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若干社会职责。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乡贤，在解决共同性需求、化解矛盾或冲突中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同时，乡贤的“在地性”也客观上决定了他们在满足共同性需求、化解矛盾或冲突方面的作用，是对有序乡里社会现实需求的回应。

四、乡贤治村与村落共同体的建构

治理是权力主体通过有效的手段和行为解决问题、满足需求、调解矛盾或冲突、调和乡里社会关系的一种政治行为。乡贤是乡里社会的内生性权威主体，也是内生性权力主体。他们是满足乡里社会成员的共同性需求、解决村落社会的矛盾或冲突的治理者。整合资源、共同行动、调和关系等是主要的治理方式，而乡贤之“贤”也正是在这一治理过程中得以体现和强化。温铁军（2000）指出，传统的“乡村自治”本质上是“乡绅自治”；秦晖（2014）提出了“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

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这说明，在传统乡村社会，具备儒家所说的“贤能道德”的乡绅构成了乡村自治的主体。换句话说，在国家不直接为村落社会提供公共品、国家法律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而未能产生秩序的传统时期，乡贤治村是村落社会公共品供给和秩序维系的基础。那么，乡贤治理了什么？他们是怎么治的？这种治理又是如何形塑村落社会的完整性的？这是需要进一步回答和解释的问题，即需要进入村落共同体内部，探究其内在治理机制。根据“深度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乡贤的村治功能主要体现为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组织小型的基础性公共设施建设。费正清（1999）在用乡绅的社会职责来解释不到 2 万名的正式皇帝任命官员如何治理一个超过 4 亿人口的国家时，认为“士绅在每个乡里履行许多重要的社会职责。他们为诸如运河、堤堰、水坝、道路、桥梁、渡船之类的灌溉和交通设施进行筹款和主持修建”。帝制皇权政府是一个悬浮于村落社会之上的权力组织，只负责大型基础公共设施建设，如大型水利工程、桥梁建设等。村落社会作为人群具体生活的场域，与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小型基础设施建设通常无法依赖国家供给，而是以自治方式进行。通常由乡贤提出议题，动员村落社会的富裕农户捐款捐物，并组织普通乡民投工投劳，共同建设灌溉水渠、堰坝、桥梁、道路、渡口或渡船等，以满足村民的共同需求。

第二，兴办乡村教育，组织村落文化活动。乡贤群体具有共同的文化身份，是村落社会中为数不多的读书人，是文化礼仪或伦理道德的象征。一方面，乡贤群体积极支持和维护儒家教育，通过捐资、筹资或自筹等方式在村中兴建教育机构，如私塾学校，并由村中的读书人或有功名的人担任教书先生；另一方面，春节、端午等重要节日的节庆、祭祖、庙会活动，以及干旱年份的祭神、祈雨等文化仪式，属于村落社会的公共文化活动，是村落社会成员的共同性精神生活需求，通常由村中的乡贤负责主持，并组织临时性执行团队负责具体事务。此外，乡贤也会动员村中的互助合作性文化组织，让他们自发组织并负责相关事务。在这些文化活动中，乡贤始终是主要组织者，活动经费通常由包括乡贤在内的乡民共同出资，或通过有偿服务方式筹集。

第三，组织防卫力量，满足乡村安全需求。拥有暴力机器的国家安全力量并未延伸到村落社会，悬浮于其之上的郡县政权组织很难顾及村落社会的安全防卫。因此，村落社会的安全防卫只能依赖自身力量。村落社会的安全需求主要体现在村落防卫和庄稼保护两个方面。对于前者，通常由乡贤群体负责动员村中农户，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制定相应规则，并按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相对公平的方式筹集资金，组织劳力修建寨墙、寨海子等防卫设施。同时，乡贤还负责组建“红枪会”“保安会”等自卫组织，开展夜间巡逻，以满足村落社会成员共同的安全需求。对于后者，村民通常依据地邻关系自发成立“看青会”“青苗会”等合作组织，但当组织规模扩大，涉及全村人的经济利益时，庄稼保护的组织和领导通常由具有高度利益关联的乡贤承担，他们不仅负责统筹协调，也要调解与生产相关的矛盾纠纷。这些乡贤往往拥有大量土地，因此保护庄稼不仅是他们的直接利益所在，也关乎整个村落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

第四，救助孤寡贫弱，救济村落社会成员。村落共同体存在的基础之一是“村落作为社区对于社区内成员有保护、保障功能，对社区外成员则具有排斥功能”（毛丹，2000）。村落对社区成员的救

济保障功能主要落在乡贤的身上。一方面，在族长、村长等乡贤的推动下，村落社会通常会设立各种名目的公田，如养老田、祠堂田、书田、义田等，并利用公田的租金对村里的孤寡老人、贫困读书人、贫弱寡妇等进行生活救济，使他们能够正常生活，确保孤寡老人去世后得到妥善安葬。另一方面，对于村中的孤寡贫弱成员，乡贤通常会带头捐资捐物，并说服村里的富裕农户一起参与进来，以自愿的方式捐粮捐物，帮助有困难的村落社会成员。在旱灾、虫灾、水灾等灾害年份，乡贤往往会积极带头组织富裕农户捐粮捐物，施粥、施种，以保障乡邻生存和正常耕种；同时，他们也会积极与县政府沟通，争取更多的救助物资和政府捐款，以缓解村落社会的生存压力。

第五，化解乡邻矛盾冲突，调和村落社会关系。费正清（1999）认为，在传统中国，“民间纠纷常常通过各种非正式的渠道来解决”，“邻居间的争吵，可由村长、乡邻友好或士绅来调解”。包括族长、村长、士绅等在内的乡贤群体是村落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的重要主体。他们或以主动、或以被动的方式介入矛盾纠纷的场域，凭借乡民普遍认可和遵守的族规、村规以及惯习，通过协商、说服、讲道理等方式，促成彼此接受的解决方案，将社会关系维系在正常值。“儒教型”乡村精英主要采取教化乡民、处理公共事务、主持公道、募集善款等方式维持乡村社会的传统自治秩序（刘开君，2023）。乡贤在化解乡邻之间的矛盾或冲突时，无法依赖暴力手段，而是基于村落社会默认的公理来调和村落社会关系，由此也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矛盾冲突化解机制，如“断道理”“说公”“话公”等。

第六，担任各类经纪，供给权威资源。乡贤群体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因读书或取得功名而成为村落社会的文化精英。相较于普通乡民，文化精英在村落社会中天然地对文字语言具有权威感和话语权。“口说无凭，字据为证”是乡民普遍尊奉的行为取向，尤其在经济生活中体现得更为深刻。人们根据人际关系的亲近程度邀请乡贤在土地买卖、土地租佃、分家继承、市场交易、婚丧嫁娶等活动中充当主持人、中间人、介绍人、担保人、写约人、代笔人等，以乡贤的权威赋予经济社会行为合理性与正当性。在村落社会，没有乡贤见证的经济社会行为，没有乡贤执笔的契约，似乎很难被信任和认可。各类乡贤的权威资源既确保了村落经济社会生活的活力与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行为当事人能够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第七，制定和执行村规民约，维系共同认同的规则。传统社会中，与“皇权不下县”相对应的是“国法不下乡”，国家法律只是作为一种制度外壳将乡村社会包裹起来，却未能深入延伸到乡村社会内部（徐勇，2008）。在村落社会，无论是公共活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矛盾冲突的调解，乡贤的个人权威只是其能够成为治理主体的基础要素，更关键的是，他们在整个过程中都是凭借村落社会成员共同认同的村规民约，而非个人偏好。乡贤是村规民约的维护者和实践者，将村规民约的价值性权威转换为实践性权威，从而实现约束人们行为规范的目的。同时，乡贤也主导着新的规则的生产。在特定的公共活动中，乡贤根据治理的需要和乡民参与需要，制定乡民同意和认同的新规则。例如，在河南蔡村，乡贤在组建村庄防卫巡逻队时，为了保证参与的公平性，就制定了这样的规则：“出粮10担之户，不出丁巡寨。出粮10担以内之户，户均一丁。不出粮者，户均两丁。”[①]相较于正式的法

[①]来自笔者2016年在河南蔡村开展村庄历史形态调研时村中一位老人的讲述。

律制度，村落社会的规则带有很强的功能性和适应性，能够根据治理需要随时调整，满足了特定治理情境的秩序需求，也逐渐丰富了村落社会的治理规则体系。

综上所述，在传统社会，乡贤是村落社会中的权威主体，构成村落社会治理的主体。乡贤的村治行为不仅为村落社会成员带来了公共生活福祉，而且在维系和稳定村落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村落社会并非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因此，在七大类型的治理内容中，经济型、权力型、文化型和道德型乡贤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治理功能。由于权威基础不同，不同类型的乡贤在村治中的作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经济型乡贤侧重于资源整合，权力型乡贤强调与国家政权的互动，文化型乡贤更注重文化认同与教育，道德型乡贤则致力于维护乡土社会的伦理秩序。多元化的乡贤群体有效满足了乡村社会在公共事务自我治理方面的多样化需求。唯有“贤”，方能治。从“治”的意义上看，村落秩序的维护与发展是多元乡贤群体的共同目标。“共同体”是一种社会存在形式，体现了一种社会的质的规定性，即“共同性”，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共同发展，与分散性、孤立性和差异性相对应（徐勇和李华胤，2024）。乡贤治村不仅维系了村落社会的整体性，削弱了村落社会内部的分散与对立，还通过基于共同需要的治理行动，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内部共同性，构成村落共同体建构的核心机制。村庄社会关联与村庄秩序之间显然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贺雪峰，2013）。乡贤治理村落社会的关键就在于不断地建构和强化村庄社会关联，以“治”来稳定和发展“秩”。同时，乡贤的权威也在治理实践中得到具体体现和强化，并进一步增强了村落社会成员对乡贤治村的依赖感。乡贤治村实现了村落共同体的建构，其具体机制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基于治理的共同利益联结机制。乡贤治村的核心在于实现并强化村落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联结。利益是共同体成员建构共同性的基础要素。费孝通（2012）认为，若干“家”联合在一起，形成了较大的地域群体，而大群体的形成取决于居住在一个较广区域里的人的共同利益。在村落社会中，凡是超出家户单元自给自足能力的需求，通常涉及所有村民的共同利益，而这些需求的满足必须依赖于超越家户单元的村落社会单元或家族单元。为了实现共同利益，村落社会设置了大量的“公共土地”，这不仅构成了村落社会的共同经济基础，也实现了“以经营土地帮扶困难乡民”和“以土地租金进行社会救助”的双重功能。乡贤拥有“公共土地”的管理权与支配权，其权力行使的目标是增进村落社会的公共福祉。对于那些没有“公共土地”支撑的共同利益需求，乡贤则通过个人捐助、筹资筹劳等治理机制予以解决。乡贤具有很强的共同体责任感，其治村行为不是为满足个人利益需求的个体行为，而是指向村落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基于共同利益的治理机制构成乡贤治村并建构村落共同体的基础。

二是基于乡贤动员的共同行动机制。乡贤的治村行为具有公共行动性，是一种基于共同参与的协作性治理。乡村精英在“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社会结构孕育下，对村落共同体图存发展产生了道义责任（曹阳和赵旭东，2024）。在人类的天性中，生来就具有合群以及互相帮助和支援的需要（克鲁泡特金，1963）。在日常生产或生活中，村落社会的邻里或地邻之间可能会形成简单的互助合作，但当面对复杂性、规模性的共同利益需求时，仅靠自发合作难以形成有组织的公共治理行动。乡贤治村行为虽由乡贤主导和推进，但并非单一的“个体治理”，往往需要组织动员村落社会的共同利益关联者参与其中，形成乡贤主导的集体行动。具有公共性的集体行动是共同的利益关系、共同的意识塑

造、共同的规则认同、共同的目标达成的载体。乡贤在治村的过程中将村落社会成员组织动员起来，围绕共同的利益需求形成共同的治理行动，在村落社会成员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共同行动关系，强化了村落社会成员个体对于村落社会整体的依赖感和认同感。个体对于共同体整体的依赖，是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机制。乡贤治村通过有效的治理行动不断强化这一内在依赖感，并且这种依赖并非强制，而是基于村落成员的自愿选择与共同参与。

三是乡贤治村的分工协作机制。乡贤的治村行为具有一定的分工性。在“乡绅治村”的既定理论框架下，乡贤作为治理主体是一个抽象概念，其具象则是一个个具体的乡贤。村落权威基础要素的多样性决定了乡贤的具体性和多元化。关系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基础变量，也是社会运行的重要机制。关系也决定着行为。人际关系的亲疏性和权威匹配性为乡贤治理村落社会提供了参照变量。哪一位乡贤治理哪一类事务，似乎在村落社会存在着默认一致的分工。经济型乡贤、权力型乡贤、文化型乡贤和道德型乡贤作为治理主体，对村落社会事务治理实现了主体全覆盖。任何需要自治的乡村事务，几乎都能在村落社会中找到一位与之相匹配的乡贤。马克思曾深入分析社会有机体的内部分工规则体系，认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其分工遵循一定的规则，而这些规则的形成来源于物质生产条件[①]。同样，在传统中国村落社会内部，乡贤治村的分工也并非随意确立，而是源于村落社会内部的默会认同与惯习。这种治理模式的形成，根源于国家不直接治理村落的历史条件，同时也反映了乡民对秩序和稳定生活的内在需求。这种治理分工，不仅有效维系了村落社会的生存和生活，而且塑造一种无形但有序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行使秩序，进而确保村落社会的内部秩序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四是整体性社会关系的维系机制。共同体既包括“原始共同态”及其历史背景，也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囊括“共同组织”之整体（大塚久雄，2024）。从广义上讲，共同体是一种被某种机制组织起来的整体性状态，既要组织事物，也要组织关系。整合和调和是组织关系的主要方式。作为一个整体，共同体并不排斥内部的分化和分层，但共同体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是削弱和消解共同体成员之间共同关系联结的主要因素。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形成并维系，在于其内部能够生长出抑制分化、缓解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治理机制。在治理资源有限的村落社会，社会关系资源是乡贤治村的重要资源。在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中，乡贤通过调动社会关系资源，将有限的治理资源相对集中，以公共建设为载体整合分散的社会关系，使村落社会中个体性、分散性的社会关系网络转变为公共性、整体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矛盾冲突的化解中，乡贤充当村落社会关系的调和者，通过柔性治理方式维系和谐良性的村落社会关系网络，有效抑制内部的分裂、对立甚至斗争，从而塑造村落社会的稳定性关系结构。乡贤的治理行为具有社会关系的调和性，实现了“事治”与“关系治”的有机统一。

五是基于共同价值认同的规则机制。乡贤的治村行为基于共同认同的规则体系。村落社会成员在长久的共同生活和生产中所形成的大家共同认同和遵守的惯习、村规族约与伦理道德等，是村落社会的公约，也是乡贤治村的基本依循。乡贤治村基于内生性的规则体系，人们也基于对规则和权威的双重认同而认可乡贤治村的行为结果。“良善”的乡贤治村不仅使内生性规则获得了生命力，而且会进

[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43页。

一步强化规则的共同认同度和作用力。反之，违背村落社会公约的治理，不仅得不到村落社会成员的认可和接受，还会削弱村落社会对内生性规则和乡贤权威的认同度。秩序始于规则。作为村落社会内生性规则的维护者和实践者，乡贤通过对规则的公平性使用增强村落社会成员对共同规则的认同度，实现依规治村、以规服人、以规化人，从而维系村落社会内部的整体性秩序。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传统中国村落共同体长期以来是学术界讨论的议题，众说纷纭。与此同时，在当下“共同体”日益成为政治话语的时代背景下，“社会治理共同体”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议题。理解共同体的理论本质，是探讨这些议题的前提。进一步说，深入认识和理解传统中国村落共同体，并建构中国本土化的村落共同体理论话语，是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历史上，中国作为农业社会，其基本地域单元是村落。然而，中国的村落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也不仅是国家基层行政单元，更是一个有机的社会，体现为共同体形态。那么，这样的村落共同体是如何建构的，便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思考。与原始的共同体不同，村落共同体的形成是社会人群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互动的结果。要理解这样的共同体建构机制，就要深入共同体的内部，剖析村落社会的内在运作逻辑。本文基于“深度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从内部视角切入，通过分析村落社会的内部特征、内部结构和内部秩序，揭示乡贤治村是传统中国村落共同体建构的内在核心机制。

村落共同体是建立在村落地域社会基础之上的共同体。村落社会作为一个社会实体，是一个具体的社会。这个社会集合了特定村落地理空间内的生活、生产、社会交往及其社会关系。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关系性概念，体现为一种紧密而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状态。在结构上，村落社会以家户制为基本组织单位，家户是村落社会的基本生活单元、生产单元、消费单元、社会交往单元和政治单元。然而，家户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带来了家户间关系的家户主义倾向，使其呈现较强的个体主义和理性主义色彩，导致村落社会的分散、分化，甚至对立和冲突。在这样一个村落社会基础上，村落共同体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形成，而是需要人为建构。相较于自然形成的原始共同体，建构性共同体的核心在于通过治理，将分散的个体整合为一个具有共同性的整体。共同体的建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治理过程。只有通过治理，才能形成稳定的共同体（徐勇，2024b）。

村落共同体的建构基于有效的治理。乡贤作为村落社会的成员，因其拥有土地、知识或社会威望，成为村落社会的权威主体，并由此获得治理权力。同时，乡贤的内生性权威赋予其治理村落社会的正当性。因此，乡贤是村落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主体，乡贤治村构成村落共同体建构的核心机制。乡贤治村的核心在于整合村落社会资源，满足村民的共同需求，化解成员间的矛盾冲突，从而维系村落社会的整体性，使其既能维持生存与生活，又能保持秩序稳定。乡贤治村越是趋向于良善和有效，村落共同体就越坚固和稳定。当乡贤治村失效，甚至完全无效时，村落共同体便容易趋于解体和解散。杜赞奇（2003）用保护型经纪和营利性经纪的概念来分析乡村社会秩序，认为近代华北地区的村庄存在保护型经纪。在这一种类型中，村社自愿组织起来负责征收赋税并完成国家指派的其他任务，其目的不

是为了营利，而是保护社区利益。这也说明，村落社会中乡绅一类的主体在保护村落社会利益、治理村落社会中，只有形成保护型经纪，才能维持村落社会的完整性和有序性。当然，治理需要组织支撑。以乡贤为权力主体的村落社会治理组织越完善，乡贤治村越体系化、规则化和制度化，越能形成以整个村落社会单位为治理单元的治理，进而也就越能形成更紧密的村落共同体。宗族组织是一个以自然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血缘共同体。即便如此，血缘关系的稳固并不足以自然形成秩序，仍需通过治理来实现整体性秩序。中国华南区域在血缘宗族基础上建构的村落共同体，之所以比长江区域、黄河区域的村落共同体更为团结和紧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以族长治村为核心的治理组织和治理架构。

回到理论上看，“共同体”是一个源自西方的概念，日本学者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村落共同体”概念和理论，并基于对日本村落共同体的考察，建构了日本村落共同体的理论认识体系。然而，简单地将这一理论套用于中国村落社会，必然会导致认知偏差和事实错位。中国村落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制度和文化，因此，要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国的村落共同体，就必须立足于中国村落社会，深入其内部。只有这样，才能建构出中国本土的村落共同体理论体系。本文提出村落共同体的内部视角以及乡贤治村的核心建构机制，目的就在于回归中国村落社会的历史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村落共同体理论的认识论和话语体系。当然，中国本土的村落共同体理论体系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拓展。

（二）乡贤治村与村落共同体建构的当代意义

如果说传统中国的村落共同体建构主要依赖于村落社会自身的力量，而这一力量主要来自村落社会内部的乡贤群体及其主导的农民行动，那么 1949 年之后，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与延伸使得国家成为村落共同体建构的主要力量。由于不同时期国家建设目标的差异，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村落共同体形态也呈现不同的样态。在人民公社时期，乡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社合一体制，通过集体化改造，使村落社会国家化，并将其整合进更大的政治共同体体系；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权力的收缩，村落的自主性逐步增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村民自治的推行，使村落社会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逐步转变为自治共同体。当然，受到改革开放后快速的市场化进程冲击，村落社会自身也在发生着急剧变化。原子化、个体化、流动化和利益化是村落社会内部变化的一般性特征，而且这一变化仍在持续，尚未完成中国城乡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过程。随着这一转型的推进，村落共同体的内部建构力量和社会联结关系日渐弱化，共同体形态趋于松散甚至解体。

然而，回到实践上看，在中国绝大多数地方，村落社会不仅仍然是农民的社会生活单位，而且构成国家治理的基础末梢。从国家和社会的双重意义来看，村落共同体仍具有多重价值。在社会层面，具有共同体属性的村落社会建构，不仅能够在个体化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重建具有公共性和共同性的社会关系，还可以使村落社会成为农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的基本单元。而在国家治理层面，村落共同体可以作为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基点，为国家整体性秩序提供基础秩序支撑。有学者指出，作为共同体意义上的村落社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应当被重构，而非终结（李飞和杜云素，2015）。从近些年国家建设乡村社会的政策演变来看，构建现代化的乡村社会始终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精准扶贫，再到乡村振兴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这些政策演变都说明，国家正在通过治理力量重构乡村社会，增强乡村社会的共同体属性。

需要注意的是，与传统时期依靠乡贤治村并形成较为封闭的村落共同体不同，当前要建设的村落共同体是一个现代共同体。具体而言，这样的共同体不仅为农民群体提供美好生活的社会空间，形成一个社会生活共同体，还能够有效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形成良性互动，并提供基础秩序，成为治理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将村落社会重构为具有共同体属性的现代共同体，不仅需要国家力量的支持，也依赖于村落社会内部力量的推动，更需要这两者的共同建构。因此，乡贤作为村落社会内部具有一定资源、权威、道德、文化等优势要素的主体力量，在当前的现代村落共同体建设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邓小平曾对历史上党的工作的开展与乡贤的关系作出精辟论述，指出：“在农村工作中，拒绝与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合作。这些倾向都大大妨碍了党的任务的贯彻执行。”[①]这表明，具有才德、贤能、思想积极、公共性等要素的乡贤，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建设事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是可以利用起来的社会力量。

乡贤治村是传统农业时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文化是历史的积淀。乡贤治村的历史实践不断地汇聚成了以“见贤思齐、崇德向善、扶弱济困、诚信友爱、回报桑梓”等为核心的乡贤文化，这些内容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发展，乡贤在新时代乡村社会建设中仍然有着强烈的内在需求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并具有了“新乡贤”这一新的时代界定和称谓。从传统到现代，乡贤的具体主体虽有所变化，但其背后的乡贤精神、乡贤文化、乡贤品质始终未变。这些品质具有历史穿透力和生长力，并在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和独特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②]乡贤是乡贤文化的主体，而乡贤治村则是乡贤文化的实践形式。传承乡贤文化就是要把乡贤文化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社会主义文化相契合的文化精髓、治理思想、治理资源挖掘出来，并积极培育新乡贤群体，以新乡贤群体为主体，促进乡贤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早在 2003 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要善用乡贤，充分发挥在外地的浙江籍科技人员的作用”[③]。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④]这说明，新乡贤在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中具有积极作用。浙江、湖北等地的农村在培育和发挥新乡贤作用、引导其参与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方面，已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这些地方不仅建立了“乡贤理事会”“乡贤议事会”等乡贤组织，还逐步形成了包括组织章程和议事制度在内的制度化规则体系。

新乡贤之所以能够在乡村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不仅因为激活了乡贤内在的公共精神和公共意识，更在于充分发挥了乡贤的治理功能。传统的乡贤治村更多地依赖于乡贤自身的公共意识和道德素养，呈现自发性和内生性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内在局限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体性也不足；而新时

[①]邓小平，1994：《邓小平文选》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55 页。

[②]习近平，20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第 313 页。

[③]习近平，2006：《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 356 页。

[④]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153 页。

代的新乡贤治村要在党的领导下，结合治理现代化的国家意志和美好生活共同体的社会需求，进行规划性的建构，呈现国家和社会的双重公共性。新乡贤是基层政府和党组织治理乡村、建设乡村的重要帮手，既是激活群众公共意识、引导群众积极参与治理的主体，也是与群众具有平等地位的共治主体。具体而言：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可以结合乡村社会实际情况，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培育具有不同治理功能的新乡贤，并创新其参与乡村治理的机制，充分发挥新乡贤群体在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基础教育建设、乡村文化活动组织、平安乡村建设、乡村低收入人群救助与帮扶、乡村矛盾纠纷化解、乡村发展资源输入、村规民约建设等方面的治理作用，让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的积极作用，通过新乡贤的有效治村行动及其对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维系，在乡村人群之间建立共同的利益联结、共同的规则、共同的认同、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行动。这种治理方式能够将被市场分化的“你、我、他”整合为具有共同性和整体性的“我们”，从而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新型乡村共同体的建构。

当然，在实践中，也需要关注新乡贤治村可能带来的不利因素，如资源垄断、谋取私利等。在利用新乡贤治村推进乡村社会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过程中，要加强对新乡贤的引导和监督，注重在治理中实现新乡贤的贤能、贤德以及公共意识和公益精神等要素的创造性转化。同时，需要创新具有时代性和地方特色的新乡贤治村机制，使新乡贤成为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积极力量。通过将新乡贤治村与社会主义文化相结合，可以生成新时代的新乡贤文化，在“尚德、尚贤”的社会风气中，引导基层群众树立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提升公共道德素养。最终，新乡贤凭借贤德治村、公益治村，将成为乡村德治和自治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曹阳、赵旭东，2024：《村落共同体的传承及其文化转型——基于冀中平原－医神庙宇形态变迁的田野考察》，《河北学刊》第3期，第177-185页。

2.大塚久雄，2024：《共同体的基础理论》，周雨霖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4-5页。

3.杜赞奇，2003：《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25页、第33页。

4.费孝通，2008：《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页、第88页。

5.费孝通，2012：《江村经济》，戴可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0页、第89页。

6.费孝通，2021：《乡土重建》，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46页。

7.费正清，1999：《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第25页、第26页、第36页、第113页。

8.弗里德曼，2000：《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页。

9.葛学溥，2011：《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周大鸣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第187页。

10.贺雪峰，2013：《新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4页。

11.胡彬彬，2021：《中国村落史》，北京：中信出版社，第16-17页。

12.胡庆钧，2014：《论绅权》，载吴晗等（著）《皇权与绅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96 页。

13.姜方炳，2021：《从革命到改革：政治话语流变中的“乡贤之治”及其行动伦理——基于“有效性－合法性”分析框架的阐释》，《浙江社会科学》第 6 期，第 88-94 页。

14.克鲁泡特金，1963：《互助论》，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148 页。

15.李飞、杜云素，2015：《中国村落的历史变迁及其当下命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第 41-50 页。

16.刘开君，2023：《从士绅到新乡贤：乡村精英治理的传承与流变——基于晚清以来浙江上虞乡村治理的案例分析》，《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第 4 期，第 20-31 页。

17.鲁西奇，2021：《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9 页。

18.毛丹，2000：《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上海：学林出版社，第 39 页。

19.秦晖，2014：《传统十论》，北京：东方出版社，第 8 页。

20.滕尼斯，1999：《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54 页、第 65 页、第 95 页。

21.王沪宁，1991：《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7 页。

22.王晓毅，1993：《血缘与地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第 52 页。

23.韦伯，2009：《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481 页、第 484 页。

24.韦伯，2010：《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140 页、第 143 页、第 144 页。

25.温铁军，2000：《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第 411 页。

26.萧公权，2020：《中国乡村：19 世纪的帝国控制》，张皓、张升译，北京：九州出版社，第 382 页。

27.徐勇，2008：《“法律下乡”：乡土社会的双重法律制度整合》，《东南学术》第 3 期，第 19-27 页。

28.徐勇，2013：《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第 8 期，第 102-123 页。

29.徐勇，2024a：《传统中国是否存在村落共同体——对长达半世纪的一段学术争论的再讨论》，《探索与争鸣》第 5 期，第 68-76 页。

30.徐勇，2024b：《无治理不成共同体：政治学的视角》，《理论学刊》第 4 期，第 84-92 页。

31.徐勇、李华胤，2024：《现代社会、社会治理的“共同性”构建与实践探索——兼论微观场域中的“共同缔造”》，《政治学研究》第 5 期，第 44-54 页。

32.徐祖澜，2024：《论乡贤的信义义务》，《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 期，第 174-186 页。

33.杨懋春，2012：《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张雄、沈炜、秦美珠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 152 页。

34.张思，2005：《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6-7 页。

35.张仲礼，2008：《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40 页。

36.清水盛光，1951：『中国郷村社会論』，東京：岩波書店，第 560-598 頁。

37.平野義太郎，1945：『大アジァ主義の歴史的基礎』，東京：河出書房，第 144-169 頁。

Local Elites and Village Governance: Mechanis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llag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LI Huayin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Studies, Institute for China Rural Studi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ummary: The village community has long been a classic topic of scholarly discussion. As the fundamental un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the village also forms the cornerstone of state governance. Rooted in the household-based system, village society possesses both integrity and stability, while also demonstrating decentraliz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rnal tensions. Despite these contradictions, such societies have historically sustained a communal form over time. How, then, is the village community constructed?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understanding village communities requires entering their internal structures". Drawing on the *In-Depth China Rural Survey Data* from the Institute for China Rural Studies a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employing a historicist research approach,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ternal dynamics of village communities and identifies four major types of local elites within village society: economic elites, political elites, cultural elites, and moral elites. Relying on their endogenous authority, these local elites become central actors in both power structures and governance. By integrating local resources and mediating social relations, local elites engage in collective actions to meet the shared needs of community members, resolve internal conflicts, suppress social fragmentation and antagonism, and ultimately establish a network of common interests. This network sustains the overall social order and shapes the communal structure of village society. The village community is thus both a lived social entity and a relational state characterized by commonality and cohesion. The governance of villages by local elites constitutes the core mechanism for constructing village communities. Without effective governance by local elites, it would be difficult for village society to develop into a stable and unified community.

Given the uniqu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villages, a genuin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village communities cannot be achieved by simply applying Western community theories or Japanese village community models. Instead, it requires deep, context-specific analysis grounded in the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lities of rural China. Only through such an approach can a localiz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Chinese village communities be constructed.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recogniz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governance of villages by local elites as the central mechanism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especially under the current context of rural atomization and individualization—is of significant value for building a governance-oriented rural community rooted in public consciousness and civic spirit.

Keywords: Village Society; Local Elites; Village Governance; Traditional Chinese Village Community

JEL Classification: A14; D01; Z13

（责任编辑：张丽娟）

“经济－政治”互动中的社会重塑：乡村产业振兴如何推动社会共治

冉鹏程　魏　姝

摘要：乡村社会共治是中国治理实践的创新模式，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对于乡村社会共治如何形成的问题，现有研究在“政治建构社会”的基本框架下忽视了乡村经济体系的作用。随着乡村产业振兴的推进，乡村经济体系逐渐发展为独立体系，成为推动乡村治理模式变革的核心变量。本文基于典型个案的过程追踪发现，乡村产业振兴通过包含“情境营造－结构嵌入－体系建构”三个时序性部件的因果机制，推动社会共治。其中，情境营造是乡村产业振兴营造出的多元主体之间资源依赖与供需适配的社会共治情境；结构嵌入是党委和政府根据情境认知，将乡村治理中组织、身份、制度三个方面的结构要素融入产业经济体系的结构要素；体系建构是乡村治理相关主体，在利益聚合、权力分享和观念共识的作用下建构社会共治体系。这一机制蕴含的核心逻辑是“经济－政治”互动中的社会重塑，即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将乡村社会“离散性秩序”重塑为“共同体秩序”。本文识别的因果机制与核心逻辑，为乡村治理场域中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元体系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关键词：产业振兴　社会共治　结构嵌入　政治建构社会　社会重塑　政治经济互动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提出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难点、重点与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治理理念得以确立和发展。乡村是连接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群众的最基层的“接点”，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治理问题。《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指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①]。202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资助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科学影响公共政策的历史、机制与中国路径研究”（编号：21&ZD174）。

［作者信息］ 冉鹏程，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电子邮箱：dg21060020@smail.nju.edu.cn；魏姝（通讯作者），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电子邮箱：weishu@nju.edu.cn。

[①]《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

提出，要“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①]。可见，如何实现乡村社会共治已成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中的关键问题，也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与创新的主要方向之一。

目前，学术界已经对乡村社会共治的影响因素与达成机制进行了广泛讨论。在外生性因素方面，已有研究认为，乡村社会共治是地方政府发挥自身优势进行资源支持、主体培育和社会发展等行政建构的结果（康晓光和韩恒，2005），是基层党组织发挥自身资源整合、统筹协调和权威动员等政治统合功能的结果（冉鹏程等，2024），或者是数字化技术在信息收集、网络联结和公共价值营造等方面赋能的结果（胡卫卫和卢玥宁，2023）。在内生性因素方面，现有研究指出，乡村社会共治是党委和政府引导新乡贤参与、激活乡村传统文化与情感要素等所带来的效果（贺雪峰和谭林丽，2015）。可见，现有研究基本是在“强政府、弱社会”的关系格局下，将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党组织和政府作为分析起点，形成“政治建构社会”的基本框架。然而，随着产业振兴，乡村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发展并成为独立体系，推动了乡村社会样态和治理模式的变革。但现有研究未能充分关注乡村市场经济对社会共治的影响及其复杂的互动过程。

在现实中，乡村产业振兴是增强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源泉，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能通过改变乡村社会的主体基础、组织基础、秩序状况以及关系网络，推动乡村治理变革和乡村社会共治。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乡村产业振兴如何推动乡村社会共治？这两个因果变量之间的过程机制是什么？基于田野调查，本文以江苏省句容市丁庄村的“丁庄葡萄”产业发展为例，通过理论建构型过程追踪方法对乡村社会共治的过程机制进行细致识别，以深入理解乡村产业振兴与乡村治理的现实关系，从而为乡村全面振兴与乡村治理提供启示。

本文的研究贡献有以下三点：第一，运用典型案例的理论建构型过程追踪方法，本文识别乡村产业振兴推动社会共治的因果机制。这一因果机制由情境营造、结构嵌入和体系建构三个具有时序性关系的部件组成，为理解乡村社会共治与产业振兴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历时性的理论解释。第二，本文将乡村经济体系作为独立体系，对乡村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元体系的互动过程进行了梳理，阐释了“经济－政治”互动中的社会重塑这一核心逻辑。这不仅拓展现有理论的研究脉络，而且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样态提供适切性的理论性解释。第三，本文识别乡村社会体系中“离散性秩序”与“共同体秩序”两种主体关系类型，为理解中国农政变迁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思路

社会共治概念的提出是对治理理论的反思，是总结地方实践经验与凝聚国家治理智慧的理论表达，凸显了中国情境下的理论自觉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迅速成为新的理论增长点。

（一）文献回顾：乡村社会共治的动因与机制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大量涌现并逐步走向成熟，传统全能型政府管理

[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2/content_6929934.htm。

模式被打破，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逐渐形成。目前，既有研究主要从外生性因素和内生性因素两方面，对乡村社会共治问题进行讨论。

一方面是外生性因素。乡村社会共治体系的形成，离不开外在的支持、激励与引导。一是行政建构。政府会遵循控制、支持和功能替代等逻辑，通过分类控制（康晓光和韩恒，2005）、行政吸纳社会（Kang and Han，2007）、行政吸纳服务（唐文玉，2010）、嵌入型监管（刘鹏，2011）、嵌入吸纳（林兵和陈伟，2014）等多样化策略机制，主动培育社会主体，满足社会主体的生存发展需求，进而达成社会资源动员、乡村治理绩效与合法性强化等目标（蔡长昆和沈琪瑶，2020）。同时，政府也会利用项目化运作、契约管理、特许经营和购买服务等制度化方式，实现权利资源共享、社会主体发展等治理结果（唐煜金和唐重振，2022）。二是政治统合。在新形势下，党建引领已经成为乡村社会共治的关键，并催生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创新（徐选国等，2021）、组织吸纳社会（周明和许珂，2022）、第一书记制度（郭小聪和吴高辉，2018）和“以红领专”（郑广怀等，2021）等诸多实践。同时，基层党组织能够恰适性地运用公平制造、价值联结和利益耦合等“利益－价值”整合机制，消解政社之间的结构性、过程性张力，并通过政治势能、权威塑造和耦合调适等机制，发挥资源整合、组织嵌入和统筹协调等功能，撬动社会力量、增强多元主体凝聚力（何艳玲和王铮，2022）。三是数字赋能。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现代数字技术以信息系统、数字平台为中介，通过信息收集、问题呈现和征召动员等方式，不断建构社会共治网络（陈桂生和徐铭辰，2023）。数字元素推动乡村社会共治，是社会网络融入、多方利益协调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结果（胡卫卫和卢玥宁，2023），体现高效率与低成本的技术理性、超越时空与功能结构的自组织性和人机交互创造公共价值等特征（文宇和姜春，2023）；数字赋能蕴含的重要价值包括治理网络的扁平化与开放性，乡村治理资源的吸纳、链接与整合，以及以智治主义与简约主义促进治理空间、机制的迭代升级（李春茹和黄君录，2024）。

另一方面是内生性因素。乡村社会共治的实现不仅需要“由外而内”的资源输入和“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更要激活内生性的结构性、文化性动力要素。在政府引导下，新乡贤不断嵌入乡村治理的结构体系，并在秩序生产与价值实践的过程中实现乡土社会人财物的创造性整合（陈斌，2022）。新乡贤参与能通过共识建构获得合作响应，也能基于资源支配、宗族认同与体制合法性所形成的“复合型权威”，实现治理场域中不同主体间的信任、资源共享与协同共治（原超，2019）。同时，乡村传统文化与情感要素也为乡村社会共治提供了重要价值。包含经济纽带、文化符号和社会关系的情感场域，能通过信任、共识、互惠、声誉和场合等机制，生成乡村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结果（蓝煜昕和林顺浩，2020）。此外，在以宗族为代表的传统古村落，乡村所形成的内部经济活力、参与渠道等治理要素，能以组织韧性与功能适应性为社会共治提供制度内核（石文杰和马华，2024）。

（二）文献评述

针对乡村社会共治，学术界从多个角度展开研究。总体来看，在外生性因素方面，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党和政府的政策制度设计、项目资源支持、主体资源对接等行为机制；在内生性因素方面，已有文献主要关注党委和政府对熟人社会中新乡贤、传统文化和宗族等社会性要素的激活。但是，从知识演进的角度看，现有研究仍然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首先，在“强政府、弱社会”的非对称性关系格局下，已有研究强调乡村社会共治是党和政府发挥主动性进行外生性资源投入和内生性要素激活的结果，蕴含“政治建构社会”的单向作用逻辑，但忽视了乡村治理场域中经济体系的重要作用，导致政治、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未能被有效揭示。实际上，随着乡村产业振兴的推进，乡村市场经济逐步发展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并对乡村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产生深刻影响。这就需要将乡村经济体系作为独立体系，并厘清乡村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元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次，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已经成为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变革的基础性因素。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在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中居于首位。厘清乡村产业振兴对乡村社会共治的作用过程与动力机制，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和拓展乡村治理研究的理论视野具有重要价值。已有研究分析乡村社会共治与产业振兴的关系，主要是将企业作为社会体系的一部分，讨论“政府－社会关系”问题，或者是在协同治理的理论指导下，回答多元主体协同如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问题。这导致乡村产业振兴对乡村社会共治的作用的研究被严重忽视。最后，现有文献多是通过单案例或多案例比较研究，对乡村社会共治的动因与作用机制进行探究，缺少对典型性案例的长时段过程追踪与动态因果机制的完整识别。

因此，本文基于典型性案例的长时段过程追踪，对乡村产业振兴推动社会共治的因果机制进行细致识别，并对机制中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阐释，以深化对乡村治理的理解。

（三）分析思路：基于社会共治概念意涵的阐释

社会共治以其多元主体、参与合作、集体行动和共生共存等意涵，成为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与创新的重要元素。社会共治的理论话语与要义深受西方治理理论影响。在治理理论体系下，西方产生了大量与社会共治相关或相似的理论模式与概念，包括合作治理、网络治理、多中心治理和协同治理等，为中国学者建构社会共治理论提供了借鉴。但是，西方治理理论源于西方强势民主的特定社会背景，回应的是西方政治文化背景下的治理问题与需求，体现与中国现实情境和制度环境完全不同的实践关怀与价值取向（蓝煜昕，2017）。

正是基于中西方的这种差异性，社会共治作为挖掘中国传统思想、解释中国治理实践的本土性、规范性理论话语被提出。王名和李健（2014）指出，社会共治作为治理理念的新发展与治理改革的新境界，是多元社会主体在社会权力的基础上共同治理公共事务，通过协商民主等方式发起集体行动以实现共同利益。朱仁显和邬文英（2014）认为，社会共治是政府与社会各自发挥组织优势、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而形成的复合型治理模式。郁建兴和关爽（2014）将社会共治定义为由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主体通过互动协商，共同回应社会治理需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可以看到，社会共治蕴含诸多共识性内涵：一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二是具有公共性、开放性和协商性等特征的决策系统；三是现代性治理过程中构建主体间关系的多样化机制，如合作、对话、竞争、妥协、集体行动和协商民主等；四是社会共享的目标，即个体层面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及在社会层面建立共享型制度（王名等，2014）。

从中国的治理实践来看，社会共治具有必然性。随着改革开放与制度的逐步完善，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市场经济体系的独立性与功能性在发展过程中变得愈加显著，社会体系也随之挤

出发展空间（王名等，2014）。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需求与动力日益增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共治模式随之产生。实际上，市场经济发展在推动社会共治的过程中，依赖于多元主体的持续互动。首先，市场经济发展在提升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自身能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联与资源联系。为了消解市场运行中的负外部效应并实现更好的发展，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具有参与社会治理的需求和动力（朱仁显和邬文英，2014）。市场主体、社会主体与政治行政主体基于治理现实需求，会逐步突破传统利益、权力边界，并开启互相赋权、认同和融合的过程，以建立共同治理的组织与制度结构（郁建兴，2019）。其次，在主体多频互动与利益紧密耦合的过程中，多元主体会基于社会共治理念与共识建构协商对话、包容开放的网络关系（王春婷，2017）。最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共治体系，会改变参与者的行为动机与模式，为实现特定治理功能提供支持与条件，并产生社会性共有权力形成、社会资本与资源增加的治理结果（吴晓林，2017）。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社会共治包含复杂的建构过程。具体而言，市场经济发展让社会共治具备了强烈的情境性动力因素，推动多元主体互动，进而在多元主体之间建立具有参与性、协商性、耦合性等特征的关系体系，最终产生多方面的乡村社会治理成效。本文构建乡村产业振兴推动乡村社会共治的总体分析思路：乡村产业振兴与乡村市场经济发展会形成乡村社会共治的情境性动力，触发结构性互动过程，进而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社会共治。沿着这个分析思路，本文将根据中国乡村治理具体实践，对乡村产业振兴推动社会共治的具体要素和过程机制进行有效识别与归纳。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为了研究乡村产业振兴与社会共治之间的因果机制，本文采用理论建构型过程追踪法，开展历时性的纵向研究。方法选择原因包括：首先，过程追踪法是在个案研究中进行因果推断、考察因果机制的研究工具（汪卫华，2022），其具体思路是通过历时性分析系统阐明“怎样发生”与“为什么”的问题，与本文研究目标相契合。其次，遵循“机制论+决定论”的因果观，过程追踪法通过时间序列研究与溯因推理，识别纵向案例内部因果机制这一“黑匣子”的构成部件，厘清变量之间的层次关系和先后关系（任勇和周芮，2023）。笔者收集乡村社会共治过程中的大量经验事实与证据，使历时性分析与因果机制识别具有可行性。最后，作为过程追踪法的一种变体，理论建构型过程追踪法寻求从特殊个案事实的经验证据中建构一般性的因果机制与理论解释，适用于知道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却并不知晓连接因果的潜在机制的研究情形（比奇和佩德森，2020）。本文研究情境与之契合，即已知乡村产业振兴与社会共治之间存在相互关系，需要进行时序研究并揭示完整的因果链条。

（二）案例选择

个案选择的一大挑战在于，理论性研究结果能否超越“就事论事”并得到推广适用和“一般化”。为了通过案例研究获得一般性因果机制，笔者需要选择有因有果的“典型个案”。因此，本文选择江苏省句容市茅山镇丁庄村社会共治的实践案例。第一，丁庄村社会共治的实践案例涉及的问题具有典型性。20 世纪 90 年代，丁庄村属于贫困村，面临普遍性的“空心村”问题。丁庄村面临主体缺失、

社会参与性弱等典型困境，其社会共治实践经验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第二，丁庄村的产业振兴实践具有较强的典型性。经过 35 年的发展，丁庄村葡萄种植面积从 1989 年的 2 亩发展到 2023 年的 2 万亩，村民人均收入在 2022 年超过 5 万元，成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丁庄村探索出“党建+合作联社+合作社+示范园+农户”的葡萄产业发展模式，带动周边 6 万余户农户种植葡萄 50 多万亩，成为江苏省丘陵山区产业开发的典型范例。第三，丁庄村的社会共治产生了显著成效。基于乡村产业振兴所形成的组织结构、主体网络，丁庄村持续推动乡村社会共治体系建设，前后获得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江苏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示范村和江苏省省级生态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三）资料收集

笔者所在研究团队于 2024 年 4－6 月在丁庄村开展了深入的实地调研，具体资料收集方式包括一对一半结构性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内部文件收集和网络资料收集等，访谈对象包括茅山镇党政领导、丁庄村村支书、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专业合作联社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农业指导专家和村民。研究团队收集了访谈记录、调研日志、政策文件和新闻报道等多类型的研究资料，整理的具有分析价值的一手与二手资料超过 20 万字，为本研究提供了扎实的证据基础。

四、从政府主导到社会共治：丁庄村产业振兴与乡村治理的历程

经过多年持续发展，丁庄村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葡萄产业特色村。随着葡萄产业的快速发展，丁庄村的村民实现了增收致富，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乡村治理样态也发生了转变（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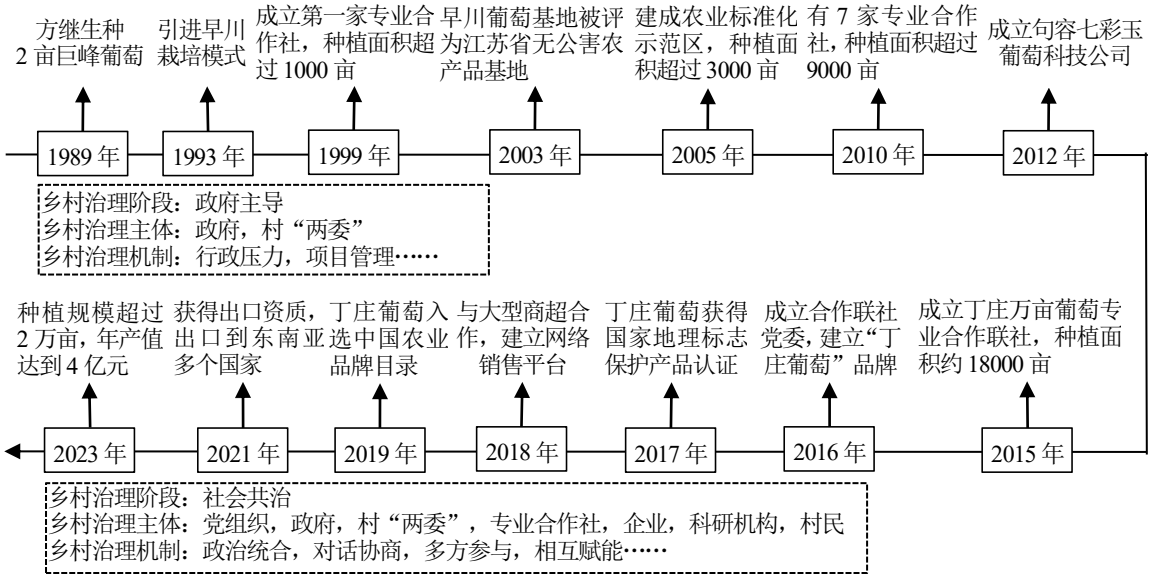


图 1　丁庄村产业发展历程与乡村治理阶段

（一）政府主导阶段：1989－2014 年丁庄村的产业发展和乡村治理

丁庄村属于江南丘陵地貌，土地贫瘠，小麦、玉米等旱谷作物种植更多是“看天吃饭”。20 世纪

末，该村是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的贫困村。1989年，丁庄村村民方继生偶然在《致富信息报》上看到关于巨峰葡萄的种植信息，为了增收致富，他在自家自留地种了2亩巨峰葡萄。为了快速掌握科学的种植技术，方继生成为镇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农科所”）的“常客”。最终，在时任镇江市农科所所长赵亚夫、技术员芮东明的技术指导下，方继生采用平网棚架栽培技术，在种植第一年就尝到了“甜头”。随着方继生的收入提高和宣传扩散，丁庄村其他村民开始种植巨峰葡萄，丁庄村葡萄产业开始得到发展。1993年，赵亚夫特别邀请日本葡萄专家早川进三前来指导，并引入科技含量较高的早川栽培模式。1996年9月，方继生带领农户成立葡萄协会，以提供技术指导和统一分销。1999年8月，丁庄村成立了第一家专业合作社，即老方葡萄专业合作社，建立了技术指导、育苗和销售于一体的一条龙服务体系。2010年，丁庄村葡萄种植面积超过9000亩，种植农户超过1000户，先后组建了丁庄、二丫和老毕等7家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2014年，丁庄村葡萄种植面积超过1万亩，村民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2万元。

在这一阶段，丁庄村的乡村治理总体上是政府主导模式。20世纪90年代，丁庄村与全国大部分村庄的基本状况一样，处于一种“强政府、弱社会”的非对称关系格局中，乡村治理以政府为主体。由于政府治理能力极其有限，丁庄村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根据资料记载，当时全村仅有一条1.5千米的硬化路面。进入21世纪后，随着葡萄产业的快速发展，丁庄村的经济状况得到显著改善，社会主体的类型和数量都显著增加，乡村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社会基础。然而，这一阶段丁庄村的主要经济发展模式是合作社团体经营和村民自主经营，不同主体的关注重点在于产业扩张和市场竞争。2010－2014年，由于产量激增、市场渠道有限，各合作社之间的恶性竞争、相互压价现象愈演愈烈，对产业持续发展及农户切身利益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不同主体之间很难形成紧密的合作网络，更没法参与乡村治理。因此，基层政府只能自上而下地对公共事务实行一元化治理。

（二）社会共治阶段：2015年至今丁庄村的产业发展和乡村治理

2015年，面对葡萄滞销、村内压价的现状，时任丁庄村村支书、村主任的方静进行了多次调研，并邀请农业专家赵亚夫“巡诊把脉”，合作联社成为“解题方法”。在茅山镇党委和镇政府的支持下，丁庄村万亩葡萄专业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合作联社”）顺利成立，方静当选为合作联社理事长。经过3个多月、80余场座谈会，合作联社吸纳了老方、丁庄、二丫和老毕等7家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和5家家庭农场，共计1927户葡萄种植户，实现了在品种育苗、生产资料使用、技术培训、品质标准和品牌销售等五个方面的统一管理。自此之后，丁庄村葡萄产业发展开启了标准化、规模化的新阶段。合作联社逐步将原来几十个葡萄品牌统一为“丁庄葡萄”，并成功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从“卖葡萄”跨入“卖品牌”“卖标准”时代。依托规模、品牌和品质的支撑，丁庄村合作联社成功与盒马鲜生、百果园、华润苏果、南京金鹰、武汉中百、上海Costco等大型商超及连锁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并于2021年开始出口至东南亚多个国家。到2023年，丁庄村葡萄产业产值达到4亿元，村民年均收入超过5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在这一阶段，丁庄村的产业发展得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党建+合作联社+合作社+示范园+农户”的产业经营模式下，丁庄村形成了多元主体协同网络，呈现崭新的乡村治理面貌。

丁庄村通过党委领导、政府项目支持、企业捐助和群众参与，完成了全村 150 多千米道路的硬化，以及电力与排水系统的整村建设；依托乡贤能人的示范引领，开展了对不良风俗的专项整治；通过强化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和禁毒禁赌会等自治组织的宣传引导，积极推动村民移风易俗；通过组建志愿服务队，建立文明实践激励与积分制度，形成了村民人人参与卫生环境保护的常态治理机制。此外，丁庄村开展了村庄美化亮化、社会和谐促进等一系列人居环境整治工程，打造了葡萄文化广场、紫樱湖等村庄景点，成为美丽乡村、和谐农村。正是基于产业振兴形成的社会基础和治理契机，丁庄村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共治体系，产生了多方面的乡村治理成效。

五、乡村产业振兴与社会共治之间的因果机制

过程追踪法的核心在于识别由相关部件构成的因果机制。其中，因果机制的各个部件是“实体参与活动”的概念化。基于理论建构型过程追踪法的研究程序，本文在界定原因（乡村产业振兴）与结果（社会共治）的基础上，从经验证据中识别产业振兴与社会共治之间因果机制的 3 个部件，即情境营造、结构嵌入与体系建构。

（一）情境营造

乡村社会共治是乡村社会中个体与组织在特定情境下的特定选择。根据定义，情境属于组织环境的子系统，是影响组织行为的机会与约束，包含直接影响行为选择与情景设定的背景因素和焦点变量（O’Toole and Meier，2015）。情境是组织的一种动力因素，隐含结构与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情境作为一种自成一体的客观事物，具有决定性、结构性特征，即存在于互动之前且塑造了互动过程；另一方面，情境作为互动过程的产物，具有生成性、自发性特征，即随着正式或非正式互动过程的展开，情境会发生变迁、新情境被营造出来（Flaherty，1990）。在丁庄村治理场域中，产业振兴营造资源互赖与供需适配的社会共治新情境（具体如图 2 所示）。这种“情境营造”的内在机理是：由于乡村产业振兴，社会主体与党政部门在产业发展与乡村治理中形成供需适配关系结构，让社会主体具备了参与乡村治理的动力和能力，并推动社会共治体系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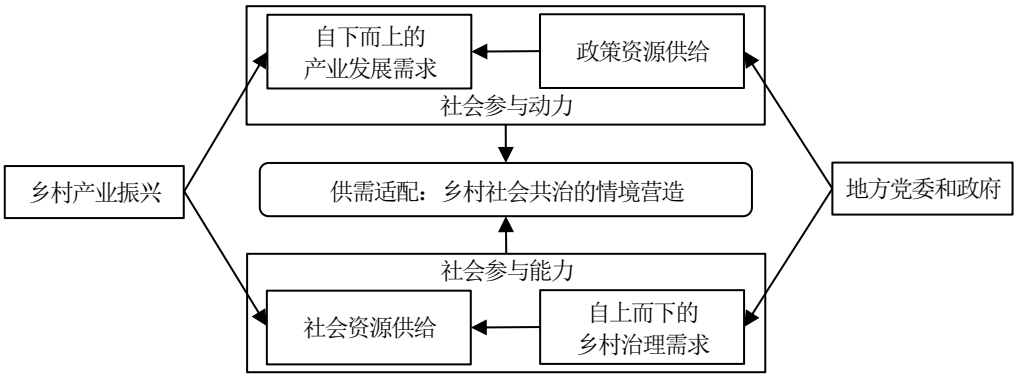


图 2　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社会共治的情境营造（部件 1）

1.产业发展中的供需关系。乡村产业振兴并非单一的农业发展，而是乡村的整体进步。仅仅依靠

乡村社会主体，往往无法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在政府主导阶段，丁庄村葡萄产业发展的自主经营模式面临诸多困境。一是分散经营的负面效应。2015 年之前，丁庄村葡萄产业以“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为主。专业合作社有独立的品牌和销售渠道，种植“散户”则自主销售，这就造成品牌杂乱、市场效益有限。同时，丁庄村葡萄的主要市场在镇江市及其周边地区，有限的销售市场与种植规模的持续扩大形成了矛盾。2014 年，丁庄村的葡萄种植户超过 2000 户，种植面积超过 15000 亩。葡萄是应季鲜食水果，为了不让葡萄“烂在手里”，合作社、农户等开始恶性竞争，严重损害了种植户的利益。二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建设瓶颈。到 2015 年，丁庄村的葡萄种植技术已经较为成熟，葡萄产业已经有可观的种植规模。但是，这一时期葡萄产业的品牌影响力不大，尚未形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农户增收效果并不突出。

“当时都是种的传统品种，也没什么品牌，就是自己家种了推到路边卖或者让别人收购，价格也不高，平均一个人一年也就一两万块钱。”（20240425-丁庄村-村民 A）[①]

正是由于丁庄村葡萄产业存在这些问题，丁庄村的合作社与种植户对资源整合、品牌统一、标准化生产、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和三产融合发展具有较强的内生需求。对此，地方党委和政府作为权力部门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之一，利用自身的组织资源和政策优势，为丁庄村产业发展提供多方面支持。一是整合内部的品牌、土地、技术和信息等资源要素，在缓解内部竞争的基础上，推动形成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格局；二是争取省级政府项目支持，并强化本级财政资金投入，为丁庄村葡萄产业的升级与转型提供资金保障；三是联系镇江市农科院、江苏省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等农业科研机构，为丁庄村葡萄产业的品种换代、技术升级提供助力；四是帮忙联系大型商超，推动丁庄村合作联社与企业进行合作；五是通过产业规划和招商引资，为丁庄村葡萄深加工、旅游等产业的发展提供政策和资本支持。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丁庄村的市场主体得以更新品种、打开市场、提升品质，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

2.乡村治理中的供需关系。地方党委和政府作为乡村治理主体，面临多方面的乡村治理压力。在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需要落实乡村振兴相关任务；在“晋升锦标赛”机制下，地方政府面临横向竞争压力。同时，随着丁庄村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致富，乡村社会需求逐渐变得多样、复杂，加剧了政府面临的治理压力。特别是在乡镇层面，党委和政府的治理资源和能力难以应对上级部署的众多条块任务。对此，地方党委和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对乡土权威资源、关系网络、非政府组织力量具有强依赖性，形成了公共部门对社会主体参与、社会资源激活的强烈治理需求。

“茅山镇下辖 1 个社区、10 个行政村，乡村治理是一件非常系统、非常复杂的事情，光靠我们政府几个人，做工作很难；而且内部的人最了解村里的情况，只有把村里的资源调动起来，乡村治理才能真正实现。”（20240517-茅山镇政府-刘副镇长）

丁庄村的产业振兴为乡村治理奠定了资源基础。一是主体营造。如前文所述，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丁庄村形成了 7 个专业合作社和 1 个农业公司，以及诸多家庭农场与专业大户；在乡镇党委、乡镇政

[①]编码规则：访谈时间-访谈地点-访谈对象。

府及村“两委”的支持与引导下，丁庄村成立了村民议事会、亚夫科技服务团、亚夫新农人学院等社会组织，完善了村庄治理的组织结构。二是能力提升。丁庄村葡萄产业的发展为村民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逐步实现了“藏富于民”，并显著改善了乡村道路、水渠、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募集状况，强化了群众的乡村治理参与意愿。同时，丁庄村葡萄产业的发展吸引了具有一定威望和能力的“领头雁”“土专家”“田秀才”回乡创业，为乡村治理提供了人才基础。三是制度条件。丁庄村在葡萄产业良性发展过程中，探索技术培训制度、葡萄产业发展议事会制度等制度，形成了具有村民共同参与、信任关系建构、信息共享等特征的制度体系，为乡村治理中的社会动员提供了制度基础。

（二）结构嵌入

理论上，组织会根据决策情境决定行动准则与偏好选择（斯科特和戴维斯，2011）。由于现实情境包含问题、资源、信息和战略等要素，组织为了实现能力更新与持续发展，会在情境扫描、探索、学习和认知过程中采取匹配性的行动策略（Sirmon and Hitt，2009）。组织会基于情境解读，通过动员、协调和部署等方式对跨边界资源进行剥离、捆绑与结构化组合，以实现资源利用、能力建构与价值创造（Herrmann and Nadkarni，2014）。在实践中，乡村治理中的公共组织会基于对现实情境中的治理资源与机会的理性认知，决定其治理目标与行动策略。

在丁庄村，面对乡村产业振兴营造的供需适配的治理情境，地方党委和政府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推动产业振兴的同时激活社会资源，实现社会共治。为此，地方党委和政府需要对产业经济体系与乡村治理体系的组织、身份与制度等结构性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在丁庄村具备产业发展基础的情况下，有效的社会共治体系建构方式是利用产业振兴所孕育的组织网络、制度规则、政策体系和动员方式，将乡村治理的结构要素嵌入产业经济体系。地方党委和政府采取结构嵌入的适应性策略，以回应现实情境并推动社会共治体系建构（具体如图 3 所示）。在新经济社会学中，嵌入性理论强调将经济行为融入社会网络结构（Granovetter，1985）。因此，本文中的“结构嵌入”，是指将乡村治理中的结构要素融入产业经济体系的结构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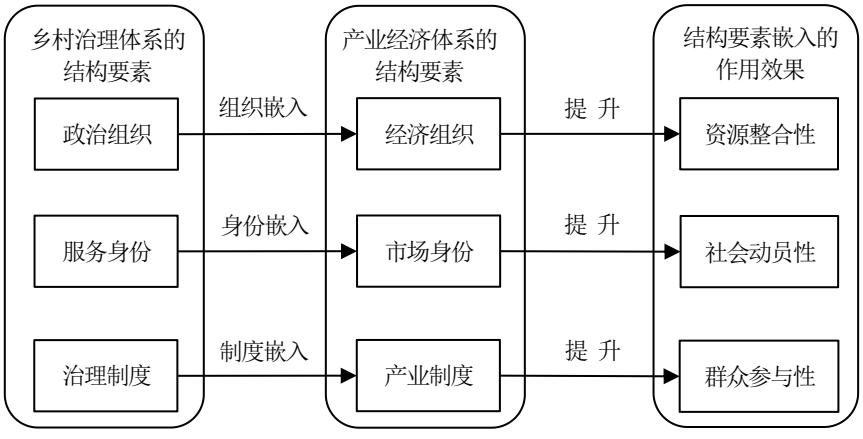


图 3　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社会共治的结构嵌入（部件 2）

1.组织嵌入。在乡村治理场域中，基层党组织作为全面领导力量，能够发挥政治动员、资源整合、吸纳参与和统筹协调等功能，推动乡村社会共治体系建构。丁庄村以党建引领为重点，将政治组织嵌入经济组织体系。

针对前期葡萄产业分散经营的问题，丁庄村在乡镇党委和政府的牵头下，对产业组织结构体系进行了改革。2015 年，丁庄村成立了合作联社，内设管理、生产、技术和销售四个职能部门。以专业合作联社为纽带，丁庄村形成了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产业振兴组织网络。2016 年，为了发挥合作联社的治理功能，合作联社成立联社党委，内设管理、生产、技术和销售四个党支部。其中，合作联社的党委书记由茅山镇党委书记担任，党委副书记由合作联社理事长担任，理事长则由村支书担任；各党支部的主要职务由机关干部、合作社理事长、种植大户和大学生村干部担任。这种组织嵌入，使产业经济组织体系内生出一套乡村治理的政治组织体系。

合作联社党委在引领产业振兴的同时，将乡村治理的目标、任务与职责融入其中。一方面，合作联社党委通过分配乡村治理任务，以领导重视和政治权威强化治理任务的合法性与认可度，进而提升资源动员能力和社会参与积极性。另一方面，这种政治组织建设将合作社与企业负责人、产业发展能人等进行整合，并通过学习培训与组织管理，引导社会主体承担社会责任、创造公共价值。

“联社党委成立后，通过党委会议，（大家）能就村里面的道路建设、移风易俗、志愿服务等事情进行讨论协商，大家就会积极参与。”（20240619-丁庄村合作联社-陈理事长）

2.身份嵌入。身份与类别、角色相联系，揭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能够被用来建构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陈映芳，2005）。个体身份代表自身融入社会的方式与程度，体现个体所能调动的潜在资源和社会资本，决定了集体行动方式与行为成效（李东泉和王瑛，2021）。在乡村治理中，参与个体的身份是影响社会动员与治理参与的重要因素。丁庄村通过“身份嵌入”，将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服务性身份”嵌入市场主体的身份体系，进而使市场主体具备“服务性身份”与“市场性身份”的双重身份。这样，市场主体不仅具有更强的参与乡村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更能借助自身“市场性身份”所具有的社会资源、网络关系和动员能力，克服乡村治理障碍，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丁庄村组织村内种植大户、技术带头人，组建了一支规模超过 50 人的、具有“营农指导员”身份的人才队伍，以推动先进葡萄种植与采摘技术的广泛传播与知识共享。“营农指导员”不仅具有一定的专业权威，而且在长期的义务性技术指导过程中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为了挖掘这部分农业人才的治理价值，丁庄村引导“营农指导员”组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并激励部分种植大户或合作社理事长牵头成立乡贤理事会、红白理事会、禁毒禁赌会和道德评议会等社会组织。通过将服务性、治理性身份嵌入技术性、市场性身份，这些村民个体同时具备多重身份。这种身份嵌入具有很好的社会动员效果：一方面，能强化具有多重身份的村民的乡村治理责任感、主动性与示范性，进而引导其开展宣传政策、普及法律、倡导文明风尚等活动；另一方面，能让这部分村民利用专业权威、非正式关系网络，动员其他村民参与村庄治理。

“这些村民能通过这些身份获得技术和市场等信息。这些身份具有一定的荣誉性。而且这些人能

力很强，在村里有一定威望和影响力，日常做事都有号召力。”（20240418-丁庄村村委会-吴支书）

3.制度嵌入。制度是被制定出来的系列正式与非正式规范、规则与程序，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创造合作条件和提供激励机制等作用（布罗姆利，2012）。在乡村治理中，创新制度供给是塑造主体行为与解决治理问题的必然举措。面对产业振兴所营造的治理情境，丁庄村将乡村治理制度嵌入产业发展制度，以激励乡村治理主体的协同参与。

丁庄村针对产业发展，制定了《丁庄合作联社社员积分管理制度》，建立了积分管理制度。合作联社社员能通过参加技术培训、提升葡萄品质（接受品质检测，包括葡萄颜色、大小和口感等）、购买葡萄保险、参与葡萄评比和进行标准化生产等方式获得动态积分。为了保证激励效果，社员所获得的积分直接与葡萄销售价格挂钩。在每年 7 月 1 日到次年 6 月 30 日的积分周期里，合作联社根据社员积分排名评选出五星会员（排名前 50）、四星会员（排名 51～100）和三星会员（排名 101～300）。在收购葡萄时，在葡萄统一收购价的基础上，五星会员的巨峰、夏黑葡萄享受额外 0.6 元/千克的加价，阳光玫瑰享受额外 2 元/千克的加价，其他品种的葡萄享受额外 1 元/千克的加价；四星会员与三星会员享受的加价则依次递减。

基于积分管理制度良好的激励作用，丁庄村于 2019 年重新制订了《丁庄合作联社社员积分管理制度》，增加了乡村治理考核指标。在原有产业振兴指标的基础上，新增结对帮扶、文明志愿服务和其他文明实践活动（争创文明家庭、遵守村规民约等）等几项乡村治理考核内容。这种制度嵌入实现了乡村治理与产业振兴的深度融合，增强了乡村社会的凝聚力。

（三）体系建构

在乡村治理体系与产业经济体系的互动中，在利益驱动、权力分享、观念重塑等关键要素的作用下，丁庄村逐渐拓展治理主体的关系网络，构建党委、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与村民之间互动共享的社会共治体系，推动了社会共治，提高了治理效能（具体如图 4 所示）。

1.利益聚合。乡村治理参与者作为理性主体，其参与行为以利益为逻辑起点。经济利益是社会群众与市场主体的主要行动目标和最本质的激励因素。丁庄村的村民、专业合作社及企业在日常经营中最关注的是扩大葡萄产量、卖出高价、品种换代、产业升级等与经济收入直接相关的问题。这些主体之所以参与村庄治理事务，是为了获取农业专家指导、实现品种与技术的更新换代、获得销售渠道和购买农业保险等。例如，2017 年，丁庄村引入高端葡萄品种“阳光玫瑰”，其每千克售价在 100 元以上，最高等级的葡萄甚至创造过 498 元一串的“销售奇迹”。相对于销售价格仅为每千克 12 元的巨峰葡萄，种植阳光玫瑰葡萄显然能获得更大的收益。

政治利益是党政主体的主要行动目标。基层党委和政府通过机制创新激活乡村社会力量，这既是基于自身资源状况与治理情境的现实考虑，也是为了纾解国家政策执行压力与履行乡村治理责任，更是为了争取上级财政资金、项目资源以及拓展政治发展空间。

“政府要完成上级任务，但是也要形成地方特色、打造地方亮点，（这样）才能获得上级的重视和支持。领导重视这种亮点村的建设。”（20240418-丁庄村委会-驻村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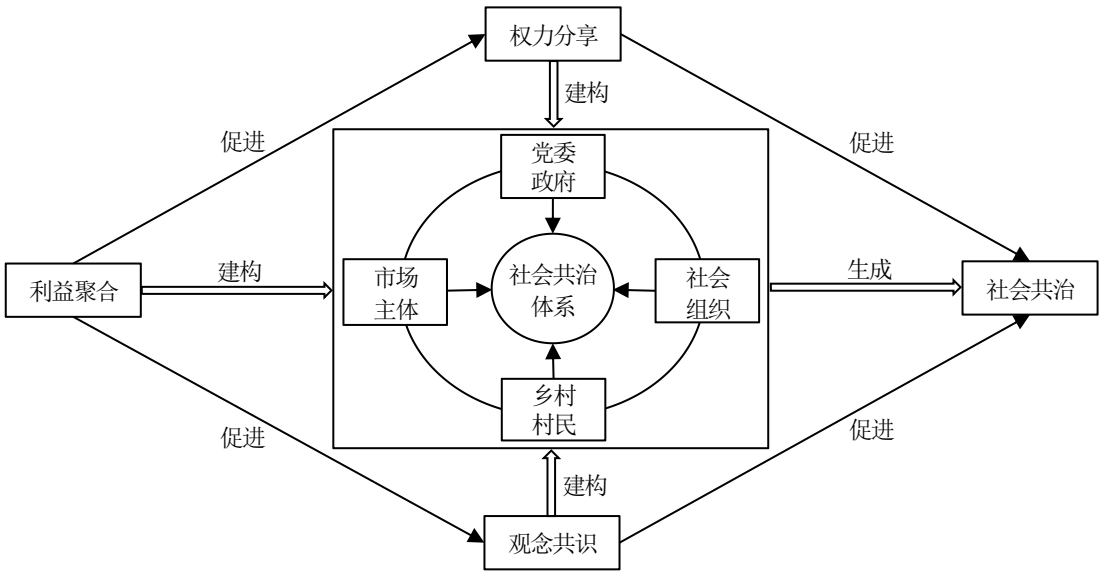


图4　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社会共治的体系建构（部件3）

2.权力分享。社会共治体系得以建构的关键是权力分享，即利益相关者共同享有和行使资源分配、公共决策等方面的权力（祁玲玲，2020）。在社会共治体系中，政府为了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通常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与社会分享权力，以实现民主参与及意见表达。

在葡萄产业规模化发展之前，丁庄村的治理模式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乡镇政府根据上级政策自主决定乡村治理的主要项目，并通过行政方式直接实施。“在以前，主要就是政府决定道路建设、活动举办等内容，并组织建设或者发通知实施。”（20240606-丁庄村村委会-杨副主任）在葡萄产业规模化发展之后，丁庄村的乡村治理事务变得繁杂，需要更多的信息与资源支撑。对此，政府通过共享决策裁量权激活社会参与。丁庄村成立了乡贤议事会、村民听证会等5个协商自治组织，并坚持和完善村民议事会、“一事一议”等共同商议和决策制度，变“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在丁庄村卫生保洁试点工作的讨论中，50多位村民参与并提出了意见。

3.观念共识。观念作为行动者的客观认识与价值取向，能通过合法化机制影响目标设定和规范行为方式（周雪光，2003）。面对乡村治理的复杂问题及新情境，共治思想会在行动主体的互动过程中逐渐成为观念共识。这种社会共治的观念共识，成为乡村社会共治体系建构的重要内容。

在党政干部与乡村精英的阐释传播以及群众的响应过程中，丁庄村形成了社会共治的观念共识。随着产业的规模化、现代化发展，上级党委和政府更加关注丁庄村的发展，并在项目资源上向丁庄村倾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和文化活动开展。这些项目的实施又极大地促进了丁庄村葡萄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和转型升级。村干部等积极宣传参与乡村治理事务的重要性，让村民认识到社会共治的价值逻辑。此外，丁庄村定期开展田间课堂、百姓名嘴理论宣讲、“葡萄架下”的红色阅读等活动，积极组织“文明实践家庭”“十佳好邻居”“十佳好婆媳”等系列文明创建评选活动，使村民在参与过程中逐渐形成乡村共同体的观念共识。

“现在村里一些家庭结婚，女方会看一看男方是不是文明实践家庭，如果不是，那女方就会怀疑你的家庭是不是有些什么问题。”（20240606-丁庄村村委会-杨副主任）

（四）社会共治的成效

乡村产业振兴通过情境营造、结构嵌入和体系建构的过程机制，推动形成社会共治的运行体系，产生了良好的成效。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丁庄村实现了 83 条支干道的硬化、黑化，实现了污水管网、水渠灌溉系统、路灯的全覆盖，完成了公共图书馆、文娱广场、健身设施和标牌凉亭的建设使用。在人居环境方面，丁庄村通过村庄整体设计改造，重点打造了明心塘、宣传文化墙、葡萄小镇文化广场、丁庄葡乡记忆馆和葡萄文化长廊等村庄环境景观；通过党员干部带头、网格化管理和志愿服务等方式，实现了卫生保洁队伍专职管理区域覆盖全村、全村保洁设施设置到位、环境整治情况全村督查巡查，改善了村庄人居环境。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丁庄村通过道德讲堂、荣誉评比等方式，评选出一批文明典型、文明家庭等先进模范，提升了村民的道德认知和文化素养，培养了淳朴民风，有效化解了乡村矛盾纠纷。因此，丁庄村获得了江苏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示范村、江苏省生态示范村、江苏省民主法治示范村、句容市文明村等多项荣誉，其乡村社会共治成效得到了普遍认可。

（五）案例总结与机制检验

1.案例总结：因果机制的理论建构。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建立识别乡村产业振兴与社会共治之间因果关系的分析框架，即由情境营造、结构嵌入和体系建构三个部件所构成的因果过程机制（具体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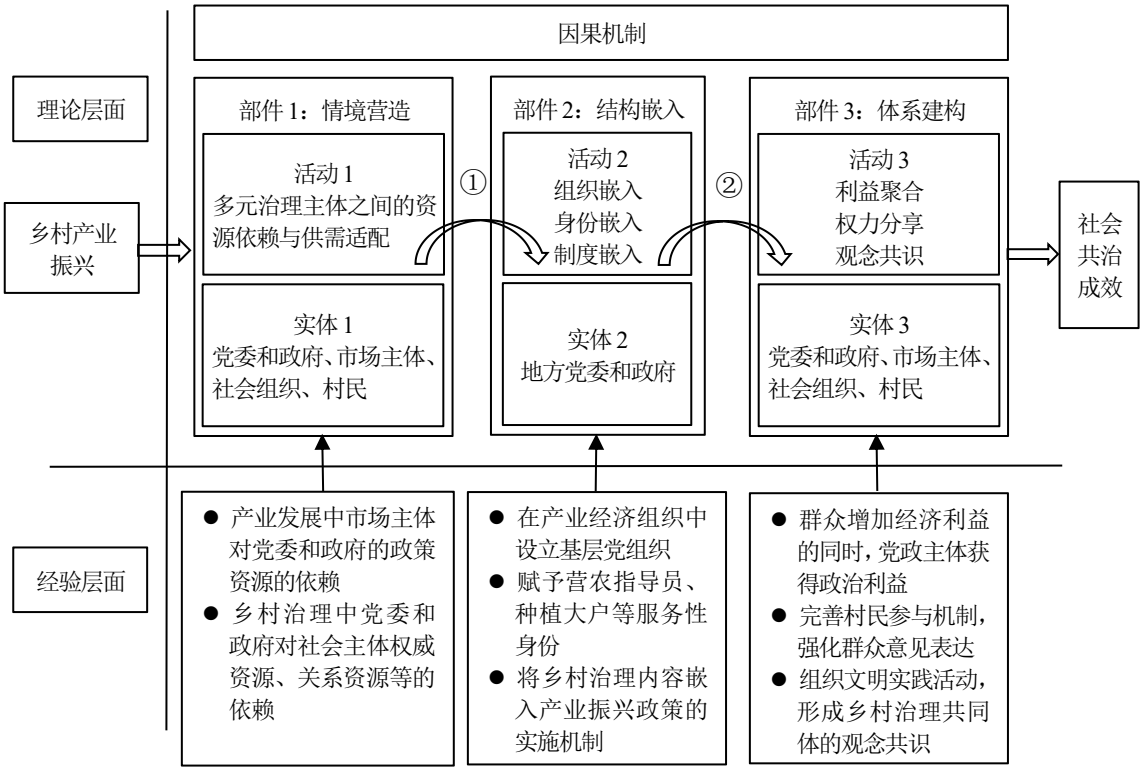


图 5　乡村产业振兴推动社会共治的因果机制

其中，情境营造（部件 1）是资源依赖情况下多元行动主体之间的供需适配过程；结构嵌入（部件 2）是组织、身份和制度三方面的嵌入；体系建构（部件 3）是通过利益聚合、权力分享与观念共识等运行机制，建构起社会共治体系。社会共治成效依赖于这三个部件的共同作用。在这个具有序贯性的因果机制中，上一个部件成为下一个部件的驱动因素，即多元主体供需适配的情境营造为党委和政府实施结构嵌入提供了情境基础（见图 5 中的①），党委和政府实施的结构嵌入为乡村社会共治体系建构提供了结构基础（见图 5 中的②）。

总体上，从乡村产业振兴到社会共治的过程性因果机制体现出清晰的内在部件关系，即情境营造是社会共治的驱动力，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结构嵌入是社会共治体系建构的行动力，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体系建构所形成的是社会共治的运行结构，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

2.机制检验：经验证据的具体分析。过程追踪法需要对理论化的因果机制进行经验检验。一方面，这种经验检验关注能否在经验记录中找到与预测相符的现实，即找到各部件预测所对应的“相关证据”。其中，证据共有四种类型：模式证据是与统计模式的预测相关的证据；次序证据涉及因果机制所预测事件的时空顺序；痕迹证据是仅凭其存在就能为机制假设提供支持的证据；记述证据则是对经验内容的详细记录与说明，如会议纪要等。

另一方面，过程追踪法的经验检验应该能够捕捉理论化因果机制中因果力量传递的痕迹，即具有一定的检验力度。根据确定性（否定效力）和独特性（确证效力）两个维度，经验检验可划分为四种检验力度不同的理想类型，分别为环箍检验（高确定性、低独特性）、双重决定性检验（高确定性、高独特性）、稻草随风倒检验（低确定性、低独特性）和枪口冒烟检验（低确定性、高独特性）（陈超和游宇，2022）。其中，否定效力表示，如果没找到该证据，理论预设就为虚假预设；确证效力表示，在理论预设成立的情况下，证据出现的概率远高于预设不成立的情况。在现实中，几乎没有一个证据具有足够的证明价值。因此，在现实评估中，不太可能找到通过双重决定性检验的证据。为了增加检验价值，更为可行的方法是在因果机制的每个部分找到多种证据来平衡环箍检验与枪口冒烟检验（Raimondo，2020）。因果机制经验检验的证据与检验类型如表 1 所示。

表 1　　因果机制经验检验的证据与检验类型

要件	概念化	证据	证据类型	证据来源	检验类型
原因	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产业走向规模化与现代化	痕迹证据 记述证据	深度结构访谈资料 内部政策文件	
部件 1 情境营造	多元主体在产业振兴与乡村治理中的供需适配	①乡村产业发展需求与党委和政府的政策资源供给匹配；②党委和政府的乡村治理需求与社会主体的资源供给相匹配	次序证据 痕迹证据 记述证据	深度结构访谈资料 内部政策文件 公开发布资料 参与观察材料	环箍检验 枪口冒烟检验
部件 2 结构嵌入	党委和政府实现组织、身份、制度三方面的结构嵌入	①政治组织嵌入产业经济组织体系；②服务性身份嵌入市场性身份；③乡村治理制度嵌入产业发展制度	次序证据 痕迹证据 记述证据	深度结构访谈资料 内部政策文件 公开发布资料 参与观察材料	环箍检验 枪口冒烟检验

表 1（续）

部件 3 体系建构	多元主体在利益聚合、权力分享、观念共识的作用下实现社会共治体系建构	①社会主体的经济利益与党政主体的政治利益聚合；②党政主体与社会主体共享决策裁量权；③让社会共治理念成为观念共识	次序证据 痕迹证据 记述证据	深度结构访谈资料 内部政策文件 公开发布资料 参与观察材料	环箍检验 枪口冒烟检验
结果	社会共治成效	多种乡村治理荣誉	痕迹证据 记述证据	深度结构访谈资料 内部政策文件	

六、“经济－政治”互动中的社会重塑：乡村产业振兴推动社会共治的核心逻辑

丁庄村产业发展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本质上是乡村场域中政治、经济与社会三元体系之间关系的变迁。政治、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反映了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水平以及国家治理水平。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过程追踪，本文识别乡村产业振兴推动社会共治的过程机制，即“情境营造－结构嵌入－体系建构”。这一机制所体现的核心逻辑，是包含“政治建构经济”与“经济作用政治”的“经济－政治”互动中的社会重塑。具体而言，随着乡村产业振兴的推进，乡村治理场域中经济体系与政治体系的双向互动推动乡村社会从“离散性秩序”走向“共同体秩序”，进而推动乡村社会共治体系的建构（具体如图 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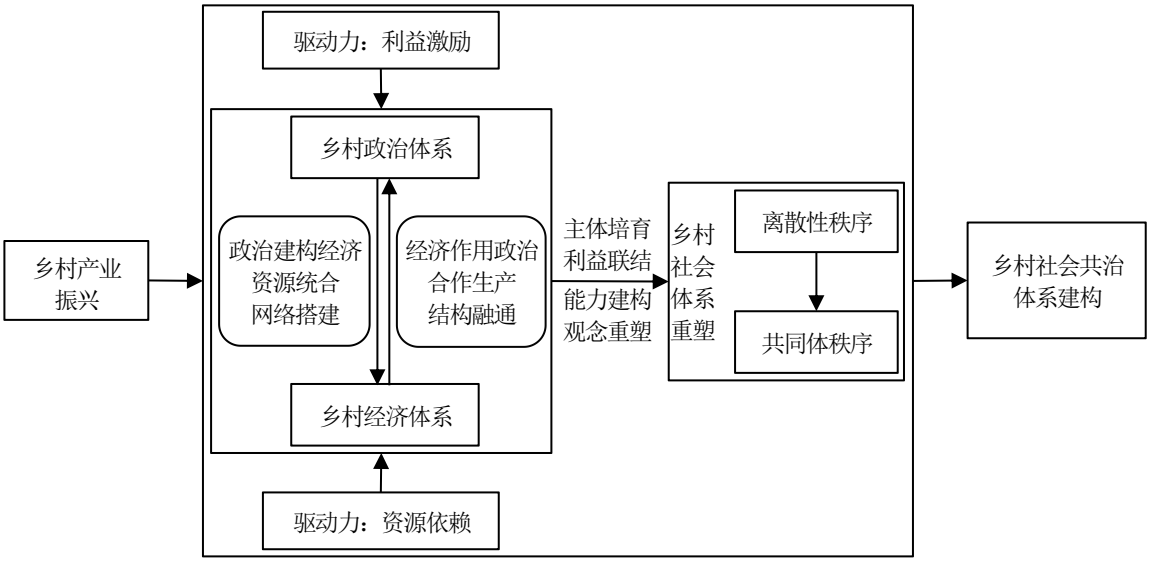


图 6　乡村产业振兴推动社会共治的核心逻辑

（一）“经济－政治”互动

产业振兴涉及乡村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的深刻互动。其中，乡村政治体系以地方党委和政府以及村“两委”为关键主体，追求的目标是政治利益最大化，其核心功能是实现乡村治理与提供公共服务；乡村经济体系则以企业、专业合作社和农户等为主体，追求的目标是经济利益最大化，其核心功能是推动产业发展与促进收入增加。在乡村产业振兴实践过程中，党委和政府作为乡村政治体系的关键主体，不仅动员社会资源履行治理性、服务性职能，也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推动产业振兴。

乡村政治体系主体与经济体系主体之间的双向互动是两方面驱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资源依赖。乡村经济体系若要克服结构性困境并实现可持续发展，需依托乡村政治体系所提供的组织资源支持、制度保障与干预协调；同时，乡村政治体系为了有效履行职责与产生治理绩效，也依赖于乡村经济体系提供的非正式权威资源、社会关系网络与非正式动员能力的支持。二是利益激励。基于这种互动，乡村政治体系中的党委和政府能够完成乡村产业振兴任务，并进一步实现乡村治理目标。这既会纾解党政主体的上级政府政策落实压力，也有利于党政主体获得上级项目资源。对于乡村经济体系中的市场主体而言，这种互动有助于其与党政主体建立信任关系与紧密联系，并获取信息、资金、产业技术和销售渠道等要素资源，进而实现更大的经济利益。

首先，受资源依赖与利益激励的驱动，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的“经济－政治”互动体现为“政治建构经济”。通过发挥自身的优势，乡村政治体系主要通过两种机制作用于乡村经济体系。一是资源统合。地方党委和政府会充分发挥自身的全面领导、政治动员、行政控制和统筹协调等功能，实现政府内部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整合。在本文案例中，为了推动葡萄产业的发展，句容市与茅山镇两级党委和政府通过部门统筹，强化对丁庄村葡萄产业的政策倾斜与资金投入力度：茅山镇党委和政府帮助丁庄村成立了合作联社，集中项目资金打造了 5000 平方米的合作联社综合服务中心；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丁庄村打造了“丁庄葡萄”的统一品牌，并成功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二是网络搭建。乡村政治体系中的党政主体基于自身的组织优势，通过搭建沟通平台、引领主体协商等方式为乡村经济体系主体搭建合作性、支持性关系网络，进而有效解决市场销售、技术更新和扩大投资等现实问题，保障产业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在“镇党委+合作联社党委”的组织架构下，丁庄村与百果园、盒马鲜生、南京金鹰、武汉中百等大型商超建立销售合作关系；在句容市党委和市政府的支持下，江苏省农科院、镇江市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与丁庄村合作构建支持性的科技服务网络，促进葡萄品种与技术的不断更新；农村商业银行、建设银行、南京银行等 8 家银行与丁庄村开展对接，提供“惠农贷”等金融服务，解决农业资金投入大、周转难的问题。

其次，“经济－政治”互动还体现为“经济作用政治”。随着产业发展，乡村经济体系也会作用于乡村政治体系。具体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合作生产。乡村政治体系中的党委和政府与乡村经济体系中的市场主体建立合作关系，共同保障公共服务的提供。这一机制的关键在于，市场主体通过主动参与并投入时间与资源，推动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在葡萄产业规模化发展之后，丁庄村拥有经济实力较强的 1 家农业企业与 7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村民也获得了较为可观的经济收入。这些市场主体积极募集资金，支持乡村道路、文体设施、和美乡村等方面的建设，并主动参与移风易俗、环境整治和村务评议等活动。二是结构融通。乡村产业振兴中形成的服务于乡村经济体系建设的结构性要素，会逐渐融入乡村治理体系。丁庄村在葡萄产业发展中创建的社会参与规则、群众动员方式、组织网络、制度规则和政策体系等，为党委和政府实现乡村治理目标提供了条件与基础。其中，“镇党委+合作联社党委”的组织架构，成为乡村治理事务讨论的重要框架；产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以及在专业合作社积分管理办法中纳入乡村治理的考核指标，使公共服务提供与乡村治理拥有了具体的制度载体与落地机制；乡贤能人与种植大户成为村委会成员，也将其在产业发展中积累的非正式关系网

络、专业技术权威融入乡村治理体系，进而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二）社会重塑

“经济－政治”的双向互动，使乡村社会逐渐发生了四方面的变化。一是主体培育。乡村社会逐渐形成多元主体。在产业振兴过程中，丁庄村除了形成多个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等经济主体外，还在党委和政府的引导下建立了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亚夫科技服务团、亚夫新农人学院等社会组织。二是利益联结。随着丁庄村葡萄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包含品种、技术、销售和价格等关键要素的经济利益成为紧密联结村委会、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和村民等主体的“纽带”。利益联结是社会主体保持互动沟通、增强非经济性任务参与意愿的关键动力。三是能力建构。在本文案例中，乡村产业发展的直接结果是村民实现增收致富，从而提升了其乡村治理参与能力。同时，通过参与产业发展活动与村庄治理事务，村民的治理参与素养逐步提升，具体体现为更加熟悉参与制度与方式、需求表达能力以及协商能力显著增强。四是观念重塑。丁庄村的实践表明，村民在参与经济活动和乡村治理过程中，既能获得实际经济收益，又能切实感受到治理成效，进而强化自身的主体性，逐渐形成对乡村事务共同治理、共同参与的观念共识。

基于上述多重变化，乡村社会体系得以重塑。重塑前的乡村社会体系的秩序为“离散性秩序”，具体表现为家户关系松散并走向原子化、村民缺乏乡村治理参与意识与能力、乡村社会组织发展不健全、主体间互动联系渠道较少等多个方面。当然，这一秩序的形成具有其特定的背景。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具有较强的乡土性，但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经历了深刻变迁：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分田到户”以及农村土地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让农民具有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自主权，同时也带来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格局；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推进，中国乡村“农二代”逐渐“离土”并脱离乡村经济社会，进而逐渐唤起农民的个体权利意识，加剧农户“原子化”趋势。在本文案例中，在葡萄产业发展之前，丁庄村基本是以户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村庄劳动力在城镇化浪潮下持续流出。在这一时期，丁庄村内部呈现典型的“离散性秩序”。

重塑后的乡村社会体系秩序为“共同体秩序”，具体表现为乡村治理参与意识与能力提高、社会组织有效发展、经济精英成为重要的动员协调角色、多元主体联系互动的渠道增多等多方面。随着葡萄产业的发展，丁庄村的村民融入这一产业体系。受葡萄种植技术、品种、价格和市场等因素的影响，村民之间逐渐建立起紧密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在合作联社成立之后，丁庄村的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植农户等主体被统筹纳入一个体系，并建立统一的生产标准、葡萄品牌和国内外市场体系，使得村内不同主体或群体之间的关系网络进一步得到强化和聚合。葡萄产业发展使丁庄村涌现一批具有影响力、号召力的经济精英。这些新乡贤逐步成为乡村事务处理中具有重要动员与协调功能的群体。最终，以经济利益为牵引，乡村社会多元主体逐步形成具有共同目标、观念共识和紧密关联等特征的共同体，从而进一步推动乡村社会共治体系的建构与社会共治成效的生成。

七、总结与讨论

现有研究多基于“政治建构社会”的理论框架，探究外生性和内生性的乡村社会共治实现因素。

但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市场经济得到长足发展，逐步成为独立的体系，并对社会共治体系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遗憾的是，现有研究未能对乡村产业振兴与社会共治的互动过程进行深入揭示。鉴于此，本文聚焦乡村产业振兴如何推动社会共治这一核心问题，运用长时段过程追踪法，打开过程“黑箱”，以深化对乡村社会共治的理论解释，并为乡村治理实践提供经验启示。

本文采用理论建构型过程追踪法发现，乡村产业振兴通过“情境营造－结构嵌入－体系建构”的理论性因果机制推动社会共治。具体而言，首先，乡村产业振兴在乡村治理场域中营造多元主体资源相互依赖与供需适配的社会共治情境；随后，党委和政府根据情境认知，从组织、身份、制度三方面实施结构嵌入；最终，乡村治理相关主体在利益聚合、权力分享和观念共识的作用下推动社会共治体系建构。这一过程机制蕴含的核心逻辑是“经济－政治”互动中的社会重塑：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市场经济体系的成长，并在“经济－政治”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将乡村社会体系的秩序由“离散性秩序”重塑为“共同体秩序”。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启示。一是在产业发展中健全市场经济体系，并基于供需适配关系建构多元主体共治情境。乡村需要在挖掘本地特色资源和发展特色产业时，不断培育市场主体，完善资源协调系统。在这一过程中，可以通过成立专业合作社、专业合作联社等方式，让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基于资源依赖与共同利益建立紧密型互动网络。二是着力提高结构嵌入程度，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在经济组织中建立基层党组织并强化党建引领，将产业发展“能人”吸纳进村“两委”、社会组织之中，并赋予其服务性、治理性身份，在产业发展制度安排中加入乡村治理内容，发挥产业振兴对乡村治理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比奇、佩德森，2020：《过程追踪法：基本原理与指导方针》，汪卫华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11-18 页。

2.布罗姆利，2012：《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陈郁、郭宇峰、汪春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23 页。

3.蔡长昆、沈琪瑶，2020：《从“行政吸纳社会”到“行政吸纳服务”：中国国家－社会组织关系的变迁——以 D 市 S 镇志愿者协会为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第 120-129 页。

4.陈斌，2022：《组织嵌入视角下新乡贤有效参与村庄治理的机理探究——基于 S 村的个案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第 4 期，第 72-79 页。

5.陈超、游宇，2022：《迈向理论导向的个案研究：过程追踪与一致性分析的混合设计》，《公共管理评论》第 4 期，第 132-148 页。

6.陈桂生、徐铭辰，2023：《从“转译”到“网络”：基于行动者网络的数字乡村韧性治理》，《中国行政管理》第 4 期，第 137-145 页。

7.陈映芳，2005：《“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第 3 期，第 119-132 页。

8.郭小聪、吴高辉，2018：《第一书记驻村扶贫的互动策略与影响因素——基于互动治理视角的考察》，《公共行政评论》第 4 期，第 78-96 页。

9.何艳玲、王铮，2022：《统合治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及其对网络治理的再定义》，《管理世界》第 5 期，第 115-131 页。

10.贺雪峰、谭林丽，2015：《内生性利益密集型农村地区的治理——以东南 H 镇调查为例》，《政治学研究》第 3 期，第 67-79 页。

11.胡卫卫、卢玥宁，2023：《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与运作逻辑研究——基于“中国大棚第一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公共管理学报》第 1 期，第 133-143 页。

12.康晓光、韩恒，2005：《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6 期，第 73-89 页。

13.蓝煜昕，2017：《社会共治的话语与理论脉络》，《中国行政管理》第 7 期，第 105-110 页。

14.蓝煜昕、林顺浩，2020：《乡情治理：县域社会治理的情感要素及其作用逻辑——基于顺德案例的考察》，《中国行政管理》第 2 期，第 54-59 页。

15.李春茹、黄君录，2024：《数字治理赋能乡村共同体建设的实践经验及价值指向——基于苏南 L 村的考察》，《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第 23-34 页。

16.李东泉、王瑛，2021：《单位“隐形在场”对社区集体行动的影响研究——以广州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为例》，《公共管理学报》第 4 期，第 93-104 页。

17.林兵、陈伟，2014：《“吸纳嵌入”管理：社会组织管理模式的新路径——以浙江省 N 市 H 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为例》，《江海学刊》第 1 期，第 107-113 页。

18.刘鹏，2011：《从分类控制走向嵌入型监管：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 5 期，第 91-99 页。

19.祁玲玲，2020：《权力分享的治理困境：基于贝宁与肯尼亚的对比分析》，《学海》第 6 期，第 99-108 页。

20.冉鹏程、魏姝、蔡长昆，2024：《基层治理中的“党领合作”：实践类型及其比较分析——基于 M 市乡村振兴的案例研究》，《公共管理学报》第 1 期，第 69-81 页。

21.任勇、周芮，2023：《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因果过程追踪法应用及其拓展空间》，《中国行政管理》第 2 期，第 96-107 页。

22.石文杰、马华，2024：《重估传统：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生性逻辑——基于对华南村治的田野考察》，《行政论坛》第 1 期，第 125-133 页。

23.斯科特、戴维斯，2011：《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高俊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223 页。

24.唐文玉，2010：《行政吸纳服务——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诠释》，《公共管理学报》第 1 期，第 13-19 页。

25.唐煜金、唐重振，2022：《“权力－利益”视阈下的乡村产业治理逻辑——基于 L 村罗汉果产业开发的个案考察》，《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第 6 期，第 96-110 页。

26.王春婷，2017：《社会共治：一个突破多元主体治理合法性窘境的新模式》，《中国行政管理》第 6 期，第 30-35 页。

27.王名、蔡志鸿、王春婷，2014：《社会共治：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中国行政管理》第 12 期，第 16-19 页。

28.王名、李健，2014：《社会共治制度初探》，《行政论坛》第 5 期，第 68-72 页。

29.汪卫华，2022：《拆解过程追踪》，《国际政治科学》第 2 期，第 156-178 页。

30.文宇、姜春，2023：《注意力再分配、外部资源依赖与数字乡村治理绩效——基于 TOE 框架的组态分析》，《中国行政管理》第 7 期，第 58-67 页。

31.吴晓林，2017：《结构依然有效：迈向政治社会研究的“结构－过程”分析范式》，《政治学研究》第 2 期，第 96-108 页。

32.徐选国、吴佳峻、杨威威，2021：《有组织的合作行动何以可能？——上海梅村党建激活社区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公共行政评论》第 1 期，第 23-45 页。

33.郁建兴，2019：《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建设路径》，《公共管理评论》第 3 期，第 59-65 页。

34.郁建兴、关爽，2014：《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进展》，《探索与争鸣》第 12 期，第 7-16 页。

35.原超，2019：《新“经纪机制”：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新变化——基于泉州市 A 村乡贤理事会的运作实践》，《公共管理学报》第 2 期，第 57-66 页。

36.郑广怀、王晔安、马铭子，2021：《“以红领专”：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自主性与国家的领导权建构》，《社会学研究》第 6 期，第 136-155 页。

37.周明、许珂，2022：《组织吸纳社会：对社会治理共同体作用形态的一种解释》，《求实》第 2 期，第 37-50 页。

38.周雪光，2003：《组织社会学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 75 页。

39.朱仁显、邬文英，2014：《从网格管理到合作共治——转型期我国社区治理模式路径演进分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1 期，第 102-109 页。

40.Flaherty, M. G., 1990, “Two Conceptions of the Social Situation: Some Implications of Humor”,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1(1): 93-106.

41.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481-510.

42.O’Toole, L. J., and K. J. Meier, 2015, “Public Management, Context, and Performance: In Quest of a More General Theory”,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5(1): 237-256.

43.Herrmann, P., and S. Nadkarni, 2014, “Managing Strategic Change: The Duality of CEO Personalit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5(9): 1318-1342.

44.Kang, X., and H. Han, 2007,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Society: A Further Probe into 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in Chinese Mainl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8(2): 116-128.

45.Raimondo, E., 2020, “Getting Practical With Causal Mechanisms: The application of Process-Tracing under Real-World Evaluation Constraints”, in J. Schmitt (Ed.) Causal Mechanisms in Program Evaluation, *New Directions for Evaluation*, 2020(167): 45-58.

46.Sirmon, D. G., and M. A. Hitt, 2009, “Contingencies Within Dynamic Managerial Capabilities: Interdependent Effects of Resource Investment and Deployment on Firm Performa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0(13): 1375-1394.

Social Reshaping in “Economy-Politics” Interaction: How Does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Promote Social Co-Governance

RAN Pengcheng　WEI Shu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Summary: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he rural economic system has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n independent entity, emerging as a core variable driv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model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study focuses on how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promote rural social co-governance.Based on the conceptual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governance,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overarching analytical framework: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rural market economy generate contextual drivers for social co-governance, triggering structural interaction processes that ultimately lead to multi-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in rural social co-governance. To investigate the causal mechanisms linking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nd social co-governance, this paper adopts a theory-building process-tracing method and conducts a longitudinal study over time. To derive generalizable causal mechanisms, Dingzhuang Village is selected as a representative case characterized by clear causal relationships. Through in-depth fieldwork, robust empirical evidence was obtained via structured interview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collection of internal document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promotes social co-governance through a causal mechanism comprising three sequential components: contextual structuring, structural embedding,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Contextual structuring refers to a social co-governance environment shaped by resource interdependence and supply-demand alignment among diverse stakeholders. Specifically,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fosters a relationship structure between societal actors and Party committee and government, aligning developmental needs with governance priorities, thereby equipping societal actors with both the motivation and capacity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governance. Structural embedment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the government integrate the structural elements of organization, identity and system in rural governance into the industrial economic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al cogni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entails the relevant subjects of rural governance construct an interactive and shared relationship network and social co-governance system under the role of interest-driven, power-sharing and conceptual consensus.

The core logic underpinning this mechanism is society reshaping through “economy-politics” interaction. On the one hand, driven by interest incentives and resource dependence, the rural political system will realiz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economy” through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the rural economic system will also realize “economic function politics” through cooperative production and structural integ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y and politics reshapes the “discrete order” of rural society into “community order” through subject cultivation, interest connection, capacity construction, and concept reshaping. The case experience and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vide empirical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rural market economic system, creating a pluralistic co-governance situation with supply-demand relationship, and strengthening the degree of structural elements embeddedness of economic system and political system.The causal mechanism and core logic identified in this paper expand the research boundary of social co-governance, provide a new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the interaction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tripartite system in the field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olitics.

Keywords: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Social Co-Governance; Structure Embeddedness; Society Being Constructed by Politics; Reshaping Society; Economy and Politics Interaction

JEL Classification: D02; D7

（责任编辑：光　明）

制度激励视角下的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生成机制

石欣欣

摘要：为了解答乡村建设内生动力如何生成的问题，本文从制度激励视角出发，融合新内生式发展和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构建“资源力—主体力—认同力—三力循环互促”的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生成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阐释制度通过改变利益结构从而发挥激励作用的内在逻辑，进而运用单案例研究法对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柏木村的实践经验进行剖析，提炼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生成机制及行动指引。研究发现，制度因素在乡村建设资源力、主体力、认同力的生成以及三力循环互促环节均起到重要的激励作用：宏观制度变革能够重塑激励结构，整合资源力；微观制度创新能够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并提高合作的相对收益，汇聚主体力；有效制度干预下的村庄公共品合作博弈使得集体利益超越个人利益，凝聚认同力；长期重复博弈使得合作的远期利益超越眼前利益，并且资源力、主体力、认同力得以循环互促集成乡村建设持续动力。本文的研究在丰富和完善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理论内涵的基础上，为激发乡村建设内生动力提供政策参考，为推动乡村建设实践发展提供行动指引，对于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实现可持续乡村建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乡村建设　内生动力　制度激励　公共品供给

中图分类号：D422.6；F323.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乡村建设[①]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议题，从 2006 年“十一五”规划纲要正式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中国通过连续推进多种形式的乡村建设运动，调动国家资源、社会资源持续输入乡村以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努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并取得显

［资助项目］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乡村人居建设中激发内生动力的制度机制与创新路径——基于成渝地区的案例研究”（编号：23SKGH318）；重庆文理学院塔基计划引进人才项目“乡村人居建设内生动力的制度逻辑与靶向策略研究”（编号：R2023MS16）。

［作者信息］ 石欣欣，重庆大学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传播与设计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电子邮箱：419431094@qq.com。

[①]梁漱溟（2018a）首次提出“乡村建设”这一概念时，主要涵盖了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经济建设三项内容。本文所讨论的乡村建设，包含了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建设等内容，属于相对广义的研究范畴。

著成效。在此过程中，外部力量对乡村建设的推动作用不断增强，而乡村建设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和乡村建设中的作用（李海金和陈文华，2022）。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进入新阶段（李培林，2023），迫切需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在乡村建设方面，需要从农民需求出发并完善农民参与和长效管护机制[①]，调动乡村内部力量对接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通过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为乡村建设开源节流、赋能增效。在此背景下，如何激发内生动力已成为推进可持续乡村建设的关键问题。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②]。改革开放初期的“包产到户”通过制度变革激发乡村建设内生动力，乡镇企业则是激发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的又一个伟大创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总结“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的重要改革原则，并部署了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具体任务和要求[③]。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建设，迫切需要深化以人民为创新主体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激发动力与活力。从制度激励[④]视角探索乡村建设内生动力问题，既具有合理性，也具有必要性。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内生动力”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表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的理论内涵研究方面，学术界在研究思路上存在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内生动力研究聚焦其主体性，认为农民作为行动主体是乡村建设的主要内驱力（韩喜平和王晓兵，2020）；广义的内生动力研究注重其系统性，认为内生动力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内因或内部条件（刘晓雯和李琪，2020）。可见，相关研究拓展了对“内生动力”这一政策表述的理论认知深度，但对其理论内涵和构成要素尚未形成清晰界定和共性认知，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在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的实现路径研究方面，学者从文化复兴（Ray，2001）、精英动员（马荟等，2020）、产业振兴（黄效茂和张登国，2022）、技术革新（吴海琳和曾坤宁，2023）等视角，为激发乡村建设内生动力提供了相对宏大的发展理念与较为多元的实现路径。但宏大的发展理念在实践中面临难以落地的困境，而碎片化的实现路径则难以提炼出一般化的行动指引。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近百年中国乡村发展动力的阶段性变化进行了充分讨论，发现制度变革释放的巨大能量和农民的伟大创造是最根本、最深刻的动力（张晓山，2018），而农民作为行动主体的驱动力则有赖于某些外部条件的变化得以实现，例如，通过改革和发展战略的调整来促使这种驱动力的作用成为现实（李培林，2023）。已有研究表明，制度变革能够通过改变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产权的具体规定，进而影响人们在社会、经济等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诺思，2014），而激励结

[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人民日报》2024年2月4日01版。

[②]《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金句》，《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8日02版。

[③]《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01版。

[④]柯荣柱（2005）认为，对于制度激励的研究要关注人们的利益所在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激励就会导致人们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即利益激励会引导人们的行为选择。

构会引导人的行为选择。因此，制度激励视角从乡村建设主体的共同利益基础切入，既能够在宏观层面讨论利益结构调整的问题，又能够在微观层面探讨行为偏好引导的问题，有助于结构化[①]地克服乡村建设内生动力落地性、操作性困境。然而，当前从制度激励视角展开的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研究还较为缺乏，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刘欣（2020）、高万芹（2023）等学者从“文化－制度”视角分析了文化与制度因素如何互促互补并影响农民的行为选择；毕凌岚等（2017）、马荟等（2020）等学者从“社会－制度”视角考察了村规民约、人情机制等非正式制度对于村民参与和多元主体互动的影响；苏毅清等（2023）、谢治菊（2019）等学者基于自主治理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探讨了乡村内外部力量动员的实现路径。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制度因素对于乡村建设主体行为偏好的影响机制，但仍然缺乏对于制度激励内在逻辑的深入探讨，且对宏观层面的利益结构问题关注不足，尚未形成系统性的行动指引。

鉴于此，本文将围绕制度通过何种激励机制促进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生成问题展开讨论，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首先，融合新内生式发展和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构建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生成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阐释制度通过改变利益结构从而发挥激励作用的内在逻辑；其次，对案例实践进行深度剖析并提炼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生成机制及行动指引，其中，包括对资源动员、主体参与、社会认同三大要素互动机制的剖析，为完善新内生式发展理论提供来自中国基层的智慧经验；最后，分析和总结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的理论内涵与构成要素，并结合现实问题，为推进可持续乡村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益启示。

二、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生成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一）新内生式发展理论为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生成问题提供分析基础

1.*新内生式发展理论是阐释乡村建设内生动力内涵的本源理论。*乡村发展和建设动力问题的理论研究大体上经历了“外生式发展－内生式发展－新内生式发展”的演变脉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外生式发展模式成为全球乡村发展和建设的主流思想（李培林，2023）。尽管外部力量主导的乡村建设效率较高，但外生式发展模式的演变也可能导致对乡村资源的掠夺并加剧乡村衰落（张文明和章志敏，2018）。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主张农民作为发展主体并重视培育本地发展能力的内生式发展模式（张环宙等，2007）逐渐成为替代性解决方案，被广泛运用于欧洲中部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建设实践。但是，内生式发展过多强调地方权力而忽视了与外部的关联，面临本地力量对资源调动能力有限以及难以应对复杂外部环境挑战等困境（Bosworth et al.，2016）。1999 年，Ray（1999）提出了新内生式发展理论，该理论强调地方力量与超地方力量互动的逻辑，与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导向和现实需求高度契合，可作为阐释乡村建设内生动力内涵的本源理论。

2.*新内生式发展三大要素构成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生成机制分析的基本架构。*新内生式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资源动员、主体参与和社会认同（张文明和章志敏，2018），为判断乡村建设内生动力

[①]吉登斯（2016）提出的结构化理论核心在于结构与行动的二重性原理，强调社会结构与个人社会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

是否被激活提供了明确的衡量标准（苏毅清等，2023）。对这三大要素的研究构成了本文理论分析的基本架构。资源的开发利用是触发乡村建设启动的重要契机（Bosworth et al.，2016）。乡村外部的各种超地方因素，如人力资源、技术资源、财政资源、社会资本等，对资源开发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Gkartzios and Scott，2013）。然而，农民的主体性不足会造成内部资源动员的障碍（黄家亮，2023），内外部资源整合的着力点则在于重建村庄共同体（杨锦秀等，2023）。因此，资源动员需要资源所有者积极参与才能实现。针对如何调动本地主体的积极性以及多元主体如何形成有效互动问题，学术界提出了文化激励（梁漱溟，2018b）、需求激励（张琦和李顺强，2021）、发展激励（王杰森，2021）、精神激励（韩喜平和王晓兵，2020）等路径，并强调社会认同对于激发多元主体参与具有重要作用。

3.新内生式发展理论解释力的局限。新内生式发展理论以社会学理论为根基（Ray，2001），侧重于运用文化认同、社区、权力等概念构建对乡村发展的认知逻辑（张文明和章志敏，2018）。在现有的新内生式发展理论分析基础上，三大要素的相互关系遵循“社会认同促进主体参与，主体参与促进资源动员”的基本逻辑链条，易将激发内生动力问题根源锁定在本土社会认同唤醒方面。然而，从文化、精神等方面唤醒社会认同从而激发内生动力的路径过于理想化，“软性”激励始终难以改变“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梁漱溟，2018a）的困境。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利益结构变化对主体参与和社会认同的影响：一方面，为村民和村集体赋利、赋权、赋能可以有效激发本地主体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黄家亮，2023；岳晓文旭等，2022），构建利益联结机制有助于实现超地方主体之间的有效互动（石欣欣等，2021）；另一方面，共同利益基础有助于实现多元主体的社会认同（苏毅清等，2023）。虽然新内生式发展理论素来重视行动者利益协同的研究，但对于利益结构如何优化、共同利益基础从何而来等经济领域问题以及关于内源发展的“非合作条件”分析等方面缺乏充沛的解释力（方劲，2018），需要利用其他理论工具加以补充。

（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生成问题具有解释力

新制度经济学是运用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制度、制度体系及其变迁的学科领域，其本质是关于制度如何影响人的行为的研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开展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生成问题研究，既能够在宏观层面讨论利益结构调整的问题，又能够在微观层面探讨行为偏好引导的问题，从而系统性探究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生成机制，弥补新内生式发展理论解释力的不足。

1.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能够解释宏观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利益结构变化。在宏观层面，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的激发首先要讨论利益结构调整的问题，利益结构的调整需要通过产权变革来实现。产权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工具，能够帮助人们在进行资源交易时形成合理的收益预期（德姆塞茨，2014）。产权的界定即对资源权利束[①]的界定，权利束的变化会对资源价值和价值实现途径产生影响，并对产权人利用资源的动机产生影响。而产权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相结合，则能够分析产权制度所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及其对产权制度运行效率的影响，进而解释产权制度变革的内在规律。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于中国

[①]权利束既是一个“总量”概念，也是一个“结构”概念，即不同权利束的排列与组合决定了产权的性质和结构。资源权利束是指资源的权利集合，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

的经济制度变革也具有解释力。例如，周其仁（2017）借助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剖析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包产到户制度创新激发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的成功经验，揭示了包产到户及随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通过调整利益结构调动资源要素、激发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积极性的内在逻辑[①]。

2.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能够解释多元主体行为决策的微观机制。在微观层面，乡村建设内生动力议题本质上是关于乡村内外部多元主体合作或博弈行为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以及公共事务治理理论，提供了一套分析主体行为决策逻辑以及了解真实世界经济社会运行规律的微观案例经验研究方法。借助合作的交易成本和收益分析，可以准确把握多元主体之间差异化的行为决策逻辑，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制度干预，引导多元主体选择合作。此外，运用合作博弈的逻辑对乡村建设实践中多元主体的行为决策过程进行分析解读，有助于客观呈现多元主体长期重复博弈的实现过程，并进一步归纳微观制度创新能够为长期重复博弈的实现创造哪些必要条件。

3.理论融合链接三大要素循环互促的逻辑闭环。在新内生式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引入新制度经济学分析逻辑，有望链接三大要素——资源动员、主体参与和社会认同，循环互促形成逻辑闭环，从而增进新内生式发展理论的解释力。其一，制度变革通过改变乡村内外部资源产权和主体资格，调整利益结构，为资源所有者参与乡村建设提供初始激励；而资源所有者在参与乡村建设的过程中若能充分分享资源增值收益，则有望进一步激发社会认同，呈现“资源动员促进主体参与，主体参与促进社会认同”的逻辑链条。其二，社会认同的形成又将进一步促进主体的广泛参与，广泛的主体参与将引发更广泛的资源动员，从而链接“社会认同促进主体参与，主体参与促进资源动员”的新内生式发展基本逻辑链条。由此，资源动员、主体参与、社会认同三大要素循环互促形成完整的逻辑闭环。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乡村社会的特殊情境决定了不能完全从经济学视角去解释中国农民的行为选择问题，应结合中国乡村社会情境与实践经验对相关理论进行必要修正。一方面，中国乡村社会存在着乡土习俗、传统文化和观念等内部化制度（温铁军等，2011），农民的行为选择会受到扎根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乡土社会内部化制度以及宏观制度规则的共同影响。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②]。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是圈层化的关系网络社会（费孝通，2013），最紧密的社会关系构成了人们最可靠的社会资源。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为了积累社会资本而具有互惠、利他倾向，通过互惠行为扩展熟人关系圈子。因此，在乡村建设活动中人们的利他倾向有时会超越利己逻辑，从而作出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决策。

[①]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土地的产出由村集体统一支配；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村土地所有权依然归村集体，而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户。由此，农村土地资源产权结构发生了变化，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对农村土地资源的支配权，其身份资格也发生了变化。周其仁（2017）指出，包产到户这一“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在集体化大生产末期彻底改变了农村土地资源的支配方式，调动了村集体的资源整合能力以及农民扩大农业生产和发展乡村工业的积极性。

[②]正式制度是人们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法律、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等；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包括乡土习俗、传统文化和观念等。详见石欣欣（2024）。

（三）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生成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以新内生式发展所强调的地方和超地方互动的逻辑作为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理论内涵的认知基础，构建“资源力－主体力－认同力－三力循环互促”的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生成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从制度重塑、偏好引导、合作博弈、长期博弈四个方面，阐释制度通过改变利益结构从而发挥激励作用的内在逻辑，剖析乡村建设资源力、主体力、认同力的生成机制，以及三力循环互促集成乡村建设持续动力的作用机制。

1.制度重塑。资源是乡村建设的基础和主体参与的前提。乡村内外部资源的有效协同和充分利用，能够为乡村建设带来资源增值收益并推动乡村建设持续运转。资源力是乡村建设启动和持续运行的基础力。既有相关研究已经关注到政府资金、社会资本、技术等要素对乡村资源调动的作用，然而极少有学者关注宏观制度变革对乡村资源调动的影响。本文认为，宏观制度变革[①]通过重塑乡村资源产权结构和主体关系秩序，能够改变乡村资源的价值以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提供资源动员的新激励，增强村庄内部主体对资源的整合能力。

首先，宏观制度变革能够通过调整乡村资源产权结构，拓展乡村资源价值化途径，从而影响资源价值，提供资源利用的新激励。例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拓展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市场化、价值化合法途径，提高了农村闲置土地和空间资源的潜在价值，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利用提供了新激励。其次，宏观制度变革能够改变村庄内外部主体的身份和资格，并通过保障内部主体的财产收益权，来增强内部主体对资源的控制力，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例如，“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将集体资源产权明晰到组（组织）、股份明晰到人（孔祥智，2020），并保障了村集体和村民的资产增值收益权。集体资源产权明晰到组（组织）调动了村集体整合资源的积极性；村民变股东之后，村民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由原来的福利分配转变为按股分红，村民由原来对集体经济组织漠不关心转变为踊跃参与监督（孔祥智，2020），村集体对村民的动员能力和对资源的整合能力得到增强。最后，制度变革可以为外部资源下乡提供新激励。例如，城乡融合体制机制的建立、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为村庄外部人力资源、金融资源注入乡村建设提供新激励。

2.偏好引导。参与是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的核心议题。多元主体的参与行为所汇聚成的主体力，是实施乡村建设的核心行动力。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来看，村民参与、多元主体互动的阻力源于具有异质性利益诉求的多元主体之间合作的交易成本，而通过微观制度创新[②]降低交易成本，能够提高集体行动的相对收益，引导村民由独立行动转变为集体行动，促进内外部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最终汇聚成乡村建设的主体力。

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阻力源于交易成本。乡村建设会涉及大量的人与人之间资源、权利的交易。科斯（2014）认为，交易过程中的意愿沟通、多轮谈判、契约签订、履约监督等为了确保交易顺利进行而开展的活动，是需要花费时间、人力、物质等成本的。交易成本就如同相互作用的物体之间粗糙

[①]本文中的宏观制度变革是指以国家或地方政府正式发布的政策文件为依据的、国家或地方社会层面的全局性制度变革。

[②]本文中的微观制度创新是指由村民、村干部及其他相关主体针对乡村社会具体情况进行的乡村社会组织运行规则设计。

的表面一般，是多元主体互动过程中摩擦力的源头（石欣欣，2024）。行为偏好是个体对具有不确定性的制度收益和成本的评估结果（奥斯特罗姆，2012）。一般情况下，只有合作带来的收益大于交易成本时人们才会选择合作。据此，在乡村建设中多元主体之间之所以无法合作，其原因在于参与主体认为制度安排不易于实施，或者制度运行难以实现日常化。他们采用模糊评价的方法判断出合作的交易成本太高，以至于预期合作收益无法对其产生足够的激励。因此，要促成乡村建设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并形成主体力，关键在于通过微观制度创新，降低多元主体之间合作的事前交易成本和事后交易成本[①]，并增加符合多元主体共同诉求的合作收益，实现对主体行为偏好的有效引导。

在乡村建设活动中，多元主体合作的事前交易成本主要来自明确合作意向以及签订正式或非正式合作契约需要花费的成本。因此，通过微观制度创新控制事前交易成本的关键在于：第一，明确多元主体共同诉求，引导多元主体确定合作意向；第二，创造便捷的信息交流渠道，确保多元主体之间能够进行高效率协商。在乡村建设活动的启动阶段，首要任务是找到促成多元主体合作的聚点。乡村建设多元主体的诉求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如何在异质性中找到共同点是实际操作的难题。谢林（2019）认为，多元主体的效率曲线上存在利益诉求的交叉点，即聚点。围绕聚点开展乡村建设活动，能够吸引多元主体的注意力，聚焦多元主体的共同利益，进而化解潜在的矛盾冲突。此外，创造便捷的信息交流渠道也是关键。在乡村建设活动的启动阶段，便捷的信息交流渠道能够确保每一位参与主体及时反馈诉求，并了解合作收益的存在，从而增强各方的合作意愿。根据 Williamson（2000）关于交易成本来源的论述[②]进行推断，乡村建设活动中多元主体合作的事后交易成本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个体因素，多元主体难以避免的有限理性和投机主义特征会引发“搭便车”问题；二是环境因素，多元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互不信任的关系氛围。因此，在乡村建设活动中，通过微观制度创新控制合作的事后交易成本，关键在于：一是建立有效的监督惩罚机制，尽量避免个体有限理性和投机主义引发的“搭便车”问题；二是增强合作的可信度，营造互相信任的氛围。

3.合作博弈。认同是乡村建设参与主体对合作行为以及合作结果的认可和肯定，是乡村建设内生动力被充分激活的重要标志，也是促成多元主体深度合作的心理纽带。认同力是一种维持多元主体持续合作和推动乡村建设持续运转的精神力。然而，认同并非天然存在于合作团体之中。因此，需要以村庄公共品自主供给为契机[③]，在有效制度干预的前提下，通过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创造村庄公共品，

[①]威廉姆森（2020）在科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事前交易成本和事后交易成本的概念。事前交易成本是契约签订之前，人们在谈判、拟订合同等过程中耗费的成本。事前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了合作是否能够顺利启动，以及乡村建设的参与者能否形成对合作收益的预判。事后交易成本是契约签订之后，人们在履约过程中发现契约不完善而需要改变契约条款的成本，以及督促人们严格履行契约的成本。事后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了合作是否能长期续存。

[②]Williamson（2000）认为，交易成本的来源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体的有限理性；第二，个体的投机主义；第三，交易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第四，信息不对称；第五，互不信任的氛围。

[③]本文探讨的村庄公共品供给主要指乡村建设活动，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村容村貌整治、公共空间打造等方面，不涉及公共服务领域的讨论。

并在此过程中积累社会资本，最终实现集体利益超越个人利益，凝聚乡村建设的认同力。

奥尔森（2014）认为，在大集团的情况下，有限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为了集体利益而采取合作行动。然而，Cason and Khan（1999）研究发现，人群由极少数的“天生合作者”“天生搭便车者”以及占大多数的可能“左右摇摆”的“对等者”组成。乡村社会中也天然存在一定数量的“天生合作者”，他们具备超越追求物质利益的利他主义行为决策逻辑，但由于缺乏将其外显化的契机，这种决策逻辑常常隐匿于现代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隐性行为决策逻辑。而村庄公共品供给活动恰好提供了将这种隐性逻辑外显化的契机。“天生合作者”是完全利他者，在人群中是宝贵的“极少数”。需求激励和精神激励等“软性”激励对于“天生合作者”是有效的。一旦村庄公共品供给能够充分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这些“天生合作者”会展现出极强的合作意愿。“搭便车者”的出现是无法避免的，需要通过日常化、低成本的监督准确识别“搭便车者”，并通过劝解机制、惩罚机制进行行为引导，降低“搭便车”的发生率。占绝大多数的“对等者”的权变决策[①]是决定合作博弈成败的关键。“对等者”的权变决策一方面受到合作者数量和能力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天生合作者”利他主义行为决策能够感召观望中的“对等者”；另一方面受到“搭便车者”行为决策的消极影响，需要通过有效的监督惩罚机制确保“搭便车者”受到应有的惩罚，帮助“对等者”确认自己不会成为“受骗者”，这一重要的制度干预能够为“对等者”提供博弈对局以外的相关信号（Aumann，1974）[②]。此外，需要通过日常化的信息交流渠道保障相关信号能够在村民之间便捷传播，从而确保“对等者”能够清晰判断合作以及“搭便车”行为决策的成本和收益。通过监督惩罚机制和信息交流机制的干预，可尽量扩大合作行为结果的积极影响，降低“搭便车”行为的消极影响，进而引导“对等者”放弃计较个人得失，作出参与集体行动的决策，实现合作博弈。而合作博弈的实现是认同形成的基础。

在乡村建设中实施村庄公共品自主供给，一方面，能够为参与主体创造符合切身需求的有形产品，从而增加合作收益；另一方面，合作者互惠、利他的行为决策逻辑能够被充分展现出来，通过熟人社会圈子不断向外扩展并获得他人赞誉，从而积累社会资本。合作者通过参与集体行动而获得的公共品收益、社会资本收益与成就感，最终凝聚成为认同力。

4.长期博弈。乡村建设的资源力、主体力、认同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资源力是乡村建设启动的基础和主体参与的前提；主体力是乡村建设的核心力，起到链接资源力和认同力的核心作用；认同力是主体参与乡村建设的结果以及内生动力被激活的重要标志。而且，乡村建设的资源力、主体力、认同力之间并非单向线性关系，长期重复博弈使得三力循环互促得以实现并集成乡村建设持续动力。

[①]利瓦伊（2010）提出，人们对遵守规则的承诺具有“权变”的性质，“对等者”是否遵守承诺是权变的，当他们在确定其他人也能作出类似的承诺并依此行事时，“对等者”才能保证遵守承诺。

[②]Aumann（1974）提出“相关均衡”的理论，认为相关均衡是参与博弈对局的人们根据博弈对局之外的有关信号进行决策，并最终实现的均衡。例如，交通信号灯就是一种有利于实现交通参与者之间博弈均衡的相关信号。

然而，第一阶段合作博弈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村民必然会参与长期合作，村民是否参与长期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贴现率[①]，只有贴现率低的村民才有可能为了远期利益而放弃眼前利益。在村庄公共品供给活动中，村民贴现率的高低受到以下因素影响：第一，村民是否考虑长期在村庄生活或长期坚持城乡双栖生活，这决定了村民对于环境改善是否具有迫切需求；第二，村民是否拥有稳固的经济来源，生计困难的村民是否能够得到其他村民或村集体的帮助；第三，村庄是否具有内部规范使得“搭便车”行为会受到社会非议甚至惩罚，并确保相关信息能够在村民中及时传播。在相对封闭的传统熟人社会中，村民难以退出村庄生活，村民信息完全公开，并且具有共同认可的道德伦理等内在规范的约束，村民的贴现率低，村民之间的博弈均为长期重复博弈（贺振华，2006）。现代乡村社会的村庄边界日益开放，熟人社会演变为“半熟人”社会，村民拥有多样化的外部机会，甚至可以选择退出村庄生活，村民之间信息不完全，乡村道德伦理约束力被削弱。这些情况都会引发村民贴现率升高，单次合作博弈难以自动演变为长期重复博弈。而长期重复博弈的实现需要针对性的制度干预。首先，制度设计需要持续聚焦热点问题，围绕村民最迫切的共同利益需求展开村庄公共品供给，并为合作者提供可观可感的持续回报，引导合作行为演变为一种行为习惯。其次，制度设计要给予生计困难的村民一定的关照，从而避免生计困难的“对等者”因经济条件限制而放弃合作。再次，制度设计应重视重建道德伦理等内部规范的约束力，并提供有力的监督惩罚机制作为补充，确保“搭便车者”会受到社会非议甚至惩罚，使得被边缘化的“搭便车者”只能获得更低的收益，从而不得不加入合作。最后，通过信息交流机制确保相关信息能在村民中及时传播。总之，只有降低“对等者”的贴现率，才能确保“天生合作者”愿意持续合作，并引导“对等者”参与长期合作。

长期重复博弈确保了三力循环互促得以实现。一方面，只有在长期重复博弈的条件下，认同力才能够在熟人社会网络中不断扩大影响，“天生合作者”的利他主义行为决策逻辑才能够得到持续显化并获得更多主体认可，从而感召更多村民和其他主体参与乡村建设。更重要的是，长期重复博弈使得“对等者”可以从他人行为中获取更多准确信息和更稳定的合作预期，降低信息不完全对合作可信度的不良影响，从而降低多元主体合作的交易成本，提高主体集结的效率，增强主体力。另一方面，随着多元主体互动的增加，合作团体能够调动、整合的乡村内外部资源数量、类型不断增加，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乡村建设的资源力也得以增强。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一）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本文采用单案例经验研究方法，从典型案例的真实情境中观察和剖析制度因素对乡村建设资源力、主体力、认同力的影响。改革始于乡野，智慧源于乡民。对于典型案例的详细剖析，能够实现对宝贵的地方性知识以及农民首创精神的记录和传播，并结合中国乡村社会情境与实践经验对相关理论进行

[①]奥斯特罗姆（2012）指出，贴现率等同于折现率，是指将未来有限期预期收益折算成现值的比率。具有高贴现率的村民更在意眼前利益，具有低贴现率的村民更注重长远利益。

必要修正，呈现具有本土特色的乡村新内生式发展智慧经验。

本文以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柏木村为研究案例，该案例在激发乡村建设内生动力方面具有典型性、普遍性和代表性。第一，案例具有典型性。柏木村位于成都市西北郊区，距离成都市中心约 45 千米，下辖 16 个村民小组，共有农户 1010 户 3075 人。柏木村的村庄规模较大，空间布局分散，呈现典型川西林盘“大分散、小聚集”的复合型乡村居住环境形态。柏木村在启动乡村建设活动之初，村庄干群关系不佳，村民合作难度较大，其激发内生动力的经验具有典型性。第二，案例具有普遍性。柏木村主导产业是农业和以外来企业经营为主的农副产品加工业，部分村民能够就地就业。柏木村的乡村建设活动没有大规模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注入，这样的普通村庄案例更能反映大多数村庄在激发内生动力过程中的普遍状况和问题。第三，案例具有代表性。起初，柏木村村级道路、入户道路狭窄且未硬化，夜间照明设施缺乏，村庄环境卫生也未得到日常维护。难能可贵的是，柏木村借助宏观制度变革与微观制度创新，并以村庄公共品自主供给为契机，逐步激活乡村建设的资源力、主体力、认同力，实现三力循环互促，最终集成乡村建设持续动力。近十年来，柏木村坚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实施乡村人居环境自主更新，取得了显著成效。

（二）资料来源

本文的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课题组在田野调查中收集的各类信息，包括调查记录、半结构化访谈资料、线上回访记录以及整理的内部文件和公开报道等。课题组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2021 年 1 月和 2023 年 1 月赴柏木村进行田野调查，持续跟进该村的乡村人居环境自主更新活动并对相关情况进行日常记录。在此期间，课题组共组织了 3 次集体座谈会，课题组成员对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政府工作人员、柏木村第一书记以及村委会干部、村民小组长、本地企业家、柏木村村民和邻村村民等开展了 42 人次的半结构化访谈，获得了超过 30 小时的访谈录音，整理出近 10 万字的访谈资料。除了实地调查，课题组成员还与村干部、村民等受访者建立了长期联系，利用电话、微信等通信方式进行多次线上回访，掌握最新进展。除田野记录和座谈访谈资料外，课题组成员还收集了相关二手资料，包括从成都市郫都区统计局、唐昌镇政府获得的与柏木村及其所在地区乡村改革和发展有关的政策文件、统计报表，从柏木村村委会获得的村民自筹自建相关档案文件和部分过程记录，以及从网络上收集的相关学术文献和资料等，为深入的制度分析提供了丰富的细节支撑。

（三）案例背景

1.*允许改革与探索的制度环境调动求变精神*。自 2007 年 6 月 7 日设立国家级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经过 10 余年的改革探索，成都市试验区难能可贵地探索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经由非国家征地模式合法流转的多种实现途径，农民的自主性在成都市的改革实践中逐渐发育起来（周其仁，2017）。同时，在相对宽松的允许变革、允许创新的制度环境下，成都市基层干部和村民的实干精神与主动求变精神被调动起来。

2.*跨村选拔任用第一书记为村庄增添领导力*。柏木村是由两个行政村合并而成的大型村庄，村内不同姓氏和家族之间形成不同派系并常有利益争端，村庄组织结构松散，人心涣散。为改变合并后的柏木村治理失序的局面，2013 年，唐昌镇为柏木村跨村选拔任用了第一书记，这成为村庄进行微观制

度创新、激发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的重要力量。但是，部分村民对第一书记的跨村选拔任用心存不满。柏木村第一书记李某，原是一位兼具乡土情怀和实干精神的企业家。上任第一年，李书记投入大量时间挨家挨户走访村民并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通过持之以恒地记录并解决问题，李书记逐渐建立起与村民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并清晰掌握村民的基本情况。在收集村民意见和问题的过程中，李书记发现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已成为大多数村民的共同诉求，这为后续有针对性的微观制度创新奠定了基础。

四、柏木村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生成机制分析

（一）宏观制度变革重塑主体资格与合约关系——整合资源力

1.“‘一事一议’与财政奖补”和“村级公共服务与管理资金”制度为村庄发展注入新动能。在成都市，普通村庄在人居环境建设中想要获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需通过“一事一议”村级民主议事制度（以下简称“一事一议”）争取财政奖补资金。中央财政对村民筹资筹劳行为给予适当补助，具体奖补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一事一议”作为一种村级民主决策制度安排，可调动村民主体筹资筹劳开展村庄公共品合作供给。此外，成都市实行“村级公共服务与管理资金”制度，为村庄提供每年20万元的资金支持，但需要由村民议事会协商确定资金的使用方式（杜姣，2017）。“‘一事一议’与财政奖补”和“村级公共服务与管理资金”两种制度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构成柏木村资源整合的制度背景。

2.宏观制度变革改变参与主体的身份、资格和利益关系。与单纯的项目制不同，村庄想要通过“一事一议”获得财政支持，就需要村委会干部、村民和地方政府达成合作，并按照筹资筹劳、财政奖补的实施机制开展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村委会干部必须承担起动员者和组织者的角色；而村民无法再“袖手旁观”，需要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实施，承担起乡村人居环境设计者和实施者的角色；地方政府无须直接介入乡村人居环境的具体建设事务，避免了“政府干、群众看”的尴尬处境，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由执行者与监督者的关系转变为项目审批者与项目申报者的关系。

3.主体身份、资格的转变带来潜在合作契约的变化。在项目制下，地方政府与村民、村干部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外部合约关系；而在“一事一议”制度下，合约关系发生了内部化转向，只有向内构建以村民和村干部为主体的合作秩序才有可能向外对接财政资源。同时，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也发生了内部化转向。在项目制下，地方政府无法规避与分散村民之间的高额交易成本。而在“一事一议”制度下，乡村建设变成村庄内部事务，内部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可以借助乡土社会内部化制度来进行控制，从而提高制度运行效率。

4.筹资筹劳、财政奖补的实施机制调动村集体对资源的整合力。筹资筹劳、财政奖补的实施机制要求村集体必须具备对村庄内部资源，特别是村民自有资金的整合能力。凡是自筹资金都会涉及道德风险和监督问题，柏木村通过“理财小组”制度实现自筹资金有效管理的经验将在下文进行详细分析。而一旦村庄具备了自筹资金的整合能力，将重新获得“财权”。这是比获得财政资金、社会资金支持更可靠、更持久的一种宝贵能力。在此基础上，村干部和村民可以针对亟须解决的人居环境问题开展自主建设并向地方政府申请财政奖补资金，从而实现村集体与外部资源的有效对接。柏木村的道路改

造项目体现了村集体对内外部资源的整合力：在入户道路改造项目中，村民自筹资金61.2万元，申请财政奖补资金227万元，完成了9.17千米院落入户道路改造；柏木河绿道建设项目获得了多元主体的资金支持，村民筹资59.6万元，本土企业筹资20万元，地方政府奖补资金130万元，村民全程主动投入劳动力，自主修建完成了5千米柏木河绿道。

（二）微观制度创新降低主体合作的事前、事后交易成本——汇聚主体力

从项目制到“一事一议”制度，宏观制度变革为乡村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激励结构和运行机制，村庄内部主体对资源的整合力增强。可是，在“一事一议”制度下进行乡村建设的村庄有很多，并非所有村庄都能够充分调动主体行动力并有序运行。柏木村成功激发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的核心环节在于调动村民集体智慧、运用本土知识经验，通过微观制度创新，降低主体合作的事前、事后交易成本，提高合作的相对收益，进而实现对参与主体行为偏好的正向引导。

1.聚点机制、交流机制降低事前交易成本。其一，围绕共同诉求建立聚点机制。对于柏木村而言，想要在“一事一议”制度下改善人居环境，就必须改变村庄组织结构松散且人心涣散的不利状况，让村民愿意关心公共事务并切实参与“一事一议”。为了找准关切问题、明确共同诉求，柏木村创建“问题账单”制度，村委会干部根据挨家挨户走访调查时村民反映的诉求，建立柏木村人居环境“问题账单”，并按照“村民关注度高、受益广、解决可行度高”三个标准筛选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大重点问题：入户道路改造、夜间照明改善、环境卫生整治。这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事关大多数村民的共同利益，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为村民创造大量合作收益，是能够将大多数村民聚集、发动起来的聚点。

其二，创造体系化与常态化的交流机制。除了找到聚点之外，事前交易成本控制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创造便捷的信息交流渠道，体系化、常态化的信息交流渠道为多元主体提供协商平台，让合作的参与者能够事先知晓合作收益的存在，并在协商过程中确定合作方式。然而，柏木村“大分散、小聚集”的空间特征导致面对面信息交流非常困难，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沟通成本极高。为此，柏木村建立了“议事会成员直接联系群众”制度，全村选举出包括党员、村民小组长、致富能手、村庄权威在内的51位议事会成员，确保每个村民小组有3～5位议事会成员，每个议事会成员联系10～20户村民。如此一来，原本由村委会干部承担的与分散村民沟通、联络的成本被分解成51份。在总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每位议事会成员所承担的沟通、联络成本显著降低，村民与村干部之间传递信息的效率显著提高。同时，柏木村还创建了“村长茶馆”制度，“村长茶馆”是村民与村干部进行日常化沟通交流的空间，也是收集村民问题的途径之一。起初，柏木村利用村民日常聚集的场地安排了13个“流动茶馆”，在这些空间定期安排村干部与村民座谈。近年来，柏木村通过自筹自建的方式在党群服务中心、4社和8社分别建成了三个固定的“村长茶馆”，为随时接收村民意见和反馈信息提供了场所。此外，柏木村还通过林盘环境整治将村民日常聚集的场地打造成“院落微广场”。村民既可以在“院落微广场”观看露天电影、拉家常，通过生活化场合完成信息互换；又可以参与知识讲座或村民议事会，在轻松的氛围中实现村民与村干部的常态化交流和问题反馈。

柏木村创造的聚点机制、交流机制降低了村民合作的事前交易成本，引导了村级民主议事的顺利开展以及内部主体合作的顺利启动。

2.监督机制、互信机制降低事后交易成本。其一，建立内部化与日常化的监督机制。多元主体难以避免的有限理性和投机主义特征引发的“搭便车”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互不信任氛围是导致高额事后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为了尽量避免潜在的“搭便车”和道德风险问题对合作长期存续的负面影响，必须建立能够有效遏制违规情形出现的监督和惩罚机制。然而，监督和惩罚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多元主体之间内部化、日常化的监督惩罚机制交易成本最低（奥斯特罗姆，2012），对于控制合作的事后交易成本而言尤为重要。柏木村通过以下两个方面的制度创新实现了内部化、日常化的监督。一方面，柏木村创建“理财小组”制度，实现自筹资金的自主监管。村干部不介入资金监管，而是让参与自筹资金的村民推选“理财小组”成员负责资金的核算、收支统计和财务公示等，确保项目实施和监管的公开透明。“理财小组”中至少包含由不同村民推选出的3位成员，每位成员代表了不同的姓氏和家族，从而实现“理财小组”内部的日常相互监督。此外，“理财小组”成员一定是具有利他精神的“天生合作者”，他们能够精打细算地为村民自筹自建项目节约实施成本。总之，“理财小组”制度设计能够实现村民自筹资金的内部化自主监管，能够提高自筹自建项目的可信度，有助于增强村民参与自筹自建的心理意愿。另一方面，柏木村重树村庄权威，织补熟人社会网络，增强内部化监督的约束力。中国乡村熟人社会天然具有内部化监督机制。其中，面子和声誉机制能够降低违规行为的发生概率（马荟等，2020）。但柏木村面临的是大都市近郊村庄经济分化、人口外流所带来的熟人社会网络瓦解的困境。为此，柏木村发挥议事会成员、党员在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活动中的行动表率作用，重树村庄权威，重建差序格局。此外，柏木村利用村民返乡的时机，为村民创造相互了解的机会，织补乡村熟人社会网络。例如，柏木村在春节、清明节等村民返乡的重要节假日举办村庄运动会、游园会，每年定期举办最美林盘、最美院落、最美村民、道路命名评比等活动。

其二，构建多元主体之间的互信机制。互信是降低事后交易成本、实现合作长期存续的关键因素，而互信氛围的形成是聚点机制、交流机制和监督机制对多元主体进行行为偏好引导的良性结果。柏木村从以下三个方面构建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互信机制。首先，柏木村通过建立人居环境“问题账单”，明确参与主体的共同利益诉求，为互信的形成提供共同利益基础。其次，体系化、常态化的信息交流渠道为多元主体提供固定、可靠的协商平台，这有助于多元主体在频繁的沟通中相互了解，增进互信的氛围。例如，“外来”的第一书记通过“村长茶馆”等信息交流渠道，了解村民诉求并为村民解决实际问题，逐渐与村民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村民之间通过“院落微广场”等生活化场合完成信息互换，增进相互信任。最后，柏木村通过创建“理财小组”制度并加强内部化监督的约束力，最大限度地减少违规情形对互信氛围的不利影响。

得益于微观制度创新对村民行为偏好的引导，柏木村每个林盘院落的村民组成了最小合作单元，每个合作单元又由“议事会成员直接联系群众”制度联结成网络，进而汇聚成乡村建设的主体力。

（三）制度干预促成村庄公共品合作供给——凝聚认同力

1.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小团体合作博弈试验。微观制度创新引导主体力的形成，而主体力需要在村庄公共品供给中发挥作用，多元主体在制度干预下的村庄公共品合作供给中完成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博弈。柏木村的村庄公共品供给活动是从6社黄家院子入户道路自筹自建的小团体合作试验开始的，

黄家院子通过以下实践创新和制度干预实现对多元主体参与合作博弈的行为引导。

第一，小团体博弈试验引导“天生合作者”启动合作。在柏木村众多林盘院落中，6社黄家院子的村民议事会成员、党员等“天生合作者”占比较大，村民之间依然拥有血缘和地缘认同且相互知根知底，是一个信息相对完全的熟人社会，存续的道德伦理和声誉机制有助于促进合作的启动。而入户道路硬化已成为黄家院子村民积压已久的需求，“‘一事一议’与财政奖补”等宏观制度的干预，意味着参与合作的村民只需付出少量的资金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就可以换来出行条件改善的直接收益，这能够给“天生合作者”带来强大的需求激励。

第二，“理财小组”制度降低入户道路改造的实施成本并保证成本的公平分摊。入户道路改造启动后，“理财小组”成员先核算出实施成本并根据自筹资金标准对成本进行分摊，再协调和安排农户的出工时间，尽可能平衡各家各户投入的资金、时间成本并降低合作的总成本。黄家院子村民通过反复协商确定了一个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的自筹资金标准：农户按照每人200元的基本标准出资；家中有三轮车、小轿车的农户需分别额外增加150元、300元；困难户每户出资100元，也可自愿增加劳动投入抵扣出资款。为了解决自筹资金监管问题，村民集思广益，创造了“理财小组”制度。黄家院子村民事前总共筹措入户道路改造资金13900元，修建了3米宽、490米长的入户道路，其中，路基和边沟由村民自筹自建完成。得益于“理财小组”成员的精打细算，最终建设成本仅11735元，结余的2165元按出资比例返还给了村民，进一步增强了集体行动的可信度。对于此事，黄家院子村民老刘是如此描述的：

“我家当时是按照标准出了550元，包括两个人共400元，一辆三轮车150元，其实算下来也没多少钱，开始的时候都担心这么少的钱这个路修得好吗……后来我们院子的劳动力轮流出工，前后差不多干了一个多月吧，我们把路基和边沟修完，没想到凑的钱还没有用完，老黄他们（‘理财小组’成员）还退了我家85.6元，我们也很意外。”（受访者：村民老刘，访谈时间：2021年1月9日）

第三，分级调解和制裁机制引导院落内“搭便车者”参与合作。黄家院子的试验经验表明，村民是可以接受少数“搭便车者”的，如那些长期不在村内居住的“搭便车者”。对于真正的冷眼旁观者，院落会先启用亲属劝解、长辈劝解等内部调解机制，只有在劝解失败的情况下，才会对“搭便车者”进行惩罚。例如，柏木村规定无故不参加筹资筹劳者不允许参与村内各类投资分红型经营项目。如此一来，“搭便车者”会面临个人收益下降的情况：一是“搭便车者”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对集体合作造成消极影响、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会受到社会非议，导致其声誉受损；二是“搭便车者”将失去参与旅游开发等投资分红型项目的机会，这对于大都市近郊的柏木村村民而言，意味着将会损失一笔非常可观的持续收益。在黄家院子的合作博弈中，在上述微观制度的干预下，除了长期不在村内居住的村民不参与合作外，并未发生典型的“搭便车”事件。

第四，交流机制引导“对等者”进行权变决策。在项目建设期间，黄家院子的“理财小组”成员每周举行一次院落会，公开资金筹集、资金使用以及各户出工情况等，并安排下一阶段的实施进度。参加会议的既有黄家院子村民也有其他院落的旁观者。院落会的定期召开确保所有人都能够了解合作的资金成本、劳动力成本和时间成本分摊情况，并了解“搭便车者”的调解情况，从而给予“对等者”关于合作的稳定预期和信心，有效引导观望中的“对等者”选择合作而非“搭便车”。

在有效的制度干预下，黄家院子的合作博弈试验取得成功。柏木村其他院落也陆续启动自筹自建试验，不断扩大村民的合作范围[①]。此过程中，集体利益超越了个人利益，体现了村庄公共品供给合作博弈的制度激励，并为认同的形成打下基础。

2.合作产生的有形与无形收益凝聚认同力。继开展入户道路改造之后，柏木村又通过自筹自建的方式开展了“我为柏木点盏灯”的村庄光明工程以及院落环境卫生整治，实现了道路硬化、夜间亮化、环境美化。这些可观可感的有形公共品切实回应了村民的急迫需求，收获了村民的广泛认同[②]。而且，认同的力量还召唤了一批村民返乡创业。4 社返乡青年小李曾跟笔者分享过他返乡的动机，可见其对村庄人居环境改善的认同：

“2015年之前，（柏木村的）道路都是泥土路，夜晚没有路灯，环境卫生跟城市里面的小区没法比。那时候我只想出去做生意，不想待在村里。这两年我们搞了自筹自建之后，院子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入户道路硬化了，（柏木河绿道）入口的水塘还改造成了小花园，环境明显比以前好了很多。而且，我们院子的人心都很齐，你看这些（入户）道路边的花卉，都是我们从自家院子搬出来种的，隔三岔五地种几棵，现在相连成带……成都的乡村旅游市场一直比较好，我看村里面环境好了，人与人的关系也改善了，我又有经营餐馆的经验，后来就下定决心举家返乡开农家乐了，现在游客的车子可以开到院子里停放，实在是非常方便。”（受访者：返乡青年小李，访谈时间：2019年12月24日）

村庄公共品自主供给除了产生有形收益外，还积累了无形的社会资本。例如，4社村民金阿姨是在“我为柏木点盏灯”活动中最早自愿安装院灯的村民之一，在日常生活中她自觉维护院落周边环境卫生。院落周边的空旷场地逐渐成为村民日常聚集的场所，最终被改造成“院落微广场”。在这个过程中，金阿姨作为“天生合作者”，赢得了四邻的认同和赞誉，积累了社会资本，也鼓励了更多“对等者”转变为合作者。得益于“我为柏木点盏灯”活动的全面实施，柏木村与邻村的夜间照明状况形成鲜明对比，邻村村民看到柏木村的夜间亮化效果后，晚饭后相约到柏木村散步、跳坝坝舞，激发了柏木村村民的成就感、自豪感。笔者曾就“我为柏木点盏灯”活动采访过村民金阿姨，她是这样描述的：

“我家一次性在院墙外安装了2盏灯，后来其他村民发现夜晚有路灯是真的好，也陆续安装了院灯。你看现在我们村晚上是亮的，对面村是黑的，差别真大。到了晚上，隔壁村的人都喜欢来我们这里跳舞，这件事让大家都很有成就感……装了灯之后，电费也没增加多少，现在我们又筹资安装了太阳能

[①]在柏木村 6 社黄家院子入户道路自筹自建试验成功之后的 3 年内，该村 1 社戚家院子、3 社方家院子、7 社彭家院子等 16 个林盘院落陆续开展入户道路自筹自建，4 社完成全社入户道路改造，5 社、6 社完成村道改造，7 社完成 2 条耕作道路改造。涉及改造的道路总长度为 9.17 千米，自筹资金 61.2 万元。

[②]柏木村公共品自主供给创造的有形收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村庄道路硬化，提升出行品质。2016—2018 年，村民筹资 61.2 万元，申请财政奖补资金 227 万元，自主完成 9.17 千米入户道路硬化；2019 年，村民筹资 59.6 万元，获得企业资助和财政奖补资金 150 万元，自主完成 5 千米柏木河绿道建设。第二，村庄夜间亮化，改善夜间照明。2016 年柏木村开展“我为柏木点盏灯”活动，村民自发在院墙外安装路灯；2020 年，村民筹资 6.9 万元安装太阳能路灯。第三，院落卫生整治，美化村庄环境。村民筹资 22.8 万元，申请财政奖补资金 10 万元，自主完成 7 个林盘院落环境卫生整治。

路灯，更节能了。”（受访者：村民金阿姨，访谈时间：2021年1月8日）

通过参与集体行动，柏木村的村民不仅获得了有形的公共品收益，还收获了无形的社会资本以及成就感、自豪感，最终凝聚成认同力。

（四）长期重复博弈推动三力循环互促——集成持续动力

1.降低贴现率引导长期重复博弈。正如前文所述，第一阶段合作博弈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村民必然会参与长期合作。柏木村持续通过一系列的实践创新和制度干预克服“半熟人”社会对村民贴现率的不利影响，引导村民开展长期合作。第一，聚焦村民迫切需求。得益于“问题账单”制度，柏木村持续开展入户道路改造、夜间照明改善、环境卫生整治等事关村民共同利益的公共品供给活动，为合作者提供可观可感的持续回报，引导合作演变为一种行为习惯。第二，关照生计困难群众。例如，在入户道路筹资过程中，困难户按照每户 100 元的最低标准执行，还规定困难户可以通过增加劳动投入抵扣出资款，引导生计困难的“对等者”愿意持续参与合作。第三，实施分级调解和制裁。通过选举村民议事会成员和“理财小组”成员，柏木村重树村庄权威，重建差序格局，充分发挥声誉机制的约束力，设置分级调解和制裁机制。特别是关于“搭便车者”不允许参与旅游开发等投资分红型项目的规定，将村民的远期利益与近期责任挂钩，并且对于柏木村而言，这类远期利益能够兑现的可能性极大，对村民具有极强的利益激励，从而引导村民为了获得远期利益而愿意承担近期合作成本，降低贴现率。第四，加强信息交流。柏木村充分利用林盘院落空间打造“院落微广场”，定期召开院落会，使得村民能够在轻松的生活化场合完成信息交流，逐步改善村民之间信息不完全状况，确保“对等者”能够及时了解各方情况，增强“对等者”持续开展合作的信心。柏木村在自筹自建过程中总共出现过 4 次利益争端，都借助分级调解机制得到解决。最典型的一次是柏木村绿道建设需要挪动 4 社一户党姓村民的几棵珍贵苗木，笔者就此事采访过村民小党，他是这么描述的：

“当初我确实很不能理解这个绿道为什么要经过我的苗圃，我种这些树也不容易，所以我就想让他们改线。后来小组长跟我解释了这个选线的事情，我哥哥（村民议事会成员）也来劝我，周围邻居也很想尽快把绿道修好，他们要搞农家乐。我犹豫了很久，后来觉得因为几棵树影响了大家也不好，就把树挪了。但我还是担心树会死掉，村里面就请了园艺专家来帮我看了，没出什么问题。你看现在，我这几棵苗木在这绿道边还成风景了。”（受访人：苗木种植户小党，访谈时间：2021年1月8日）

除了上述做法以外，柏木村客观存在的一些特殊情况也使得村民的贴现率较低，从而使得长期合作更容易实现。一方面，柏木村属于城郊融合类村庄，距离成都市中心仅45千米，所处的成都市郫都区特色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实力雄厚，柏木村本地的豆瓣、醪糟等农副产品加工企业解决了400余名村民的就业问题。村民跨省务工的少、就近就地就业的多，因此，他们能够长期在村庄生活或者长期坚持城乡双栖生活，对村庄环境改善具有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柏木村村民的经济实力普遍较强，早在2018年，村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就已达到20822元。

2.形成持续动力稳步推进乡村建设。近十年来，从改造入户道路到修建景观道路，从添置简易路灯到安装太阳能路灯，从整治人居环境到开发空间资源，柏木村从易到难、由点及面、循序渐进地推进村庄公共品供给。在长期重复博弈过程中，矛盾纠纷能解决、环境建设有成效，“对等者”进一步

确认合作的可靠性，凝聚了强大的认同力。村民对村庄公共品自主供给的认同力能够进一步增强主体力，而主体力的增强又进一步调动了资源力。柏木村4社通过实施“三变”改革进行空间资源开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20年初，柏木村4社疫情服务队成员协商组建了乡村旅游合作社，整合了4社的林盘、院落、建设用地、水系、农田等空间资源，编制了简单实用的乡村休闲旅游规划设计方案。2020年3月，合作社成员自筹资金100万元，成员以资金或资源折价入股进行空间资源开发。村庄空间资源的统筹开发能够整体改善村民的居住环境，并且后续项目的持续运营将会为村民带来股份分红收益和自主经营收益，成为动员村民参与空间资源自主开发的有效激励。

李书记曾在线上访谈中向笔者详细介绍柏木村4社空间资源开发的经验：

“今年我们采用村、社、村民三级联动模式打造柏木河公园小环线旅游项目。村集体利用成都市水务局‘水美乡村’项目的60万元资金做好环境治理与基础建设，本地企业赞助硬件设备30万元；4社集体按照每亩1500元/年的价格租赁43亩农田整体营造柏木大田景观；在4社项目实施区域，采用村民入股的方式众筹100万元原始股金。村民对于股份的认领非常积极，众筹进展顺利。未来我们还会根据项目实施需要持续开展资金众筹。”（受访者：李书记，访谈时间：2020年3月13日）

对于此事，村民是如此描述的：

“这次是我们村第一次筹资开发旅游项目，投资有风险我们也是晓得的。这次我家只投了2万元，不多也不少，但我不担心经营问题，因为即使旅游没有搞成，环境肯定会改善，我家要是自己花2万元可能院子都搞不好，大家不一起搞哪里会有这样的（规划设计图）效果。”（受访者：返乡青年小张，访谈时间：2021年1月8日）

在循序渐进的村庄公共品自主供给活动中，柏木村村民确认了合作的可靠性，逐渐形成牢固的互信和坚定的认同。而且，合作过程中利他主义行为决策逻辑得到了持续显化并在熟人社会网络中不断扩大影响，能够感召更大范围的村民参与合作。更重要的是，在“三变”改革这一正式制度的有力保障和有效激励下，村民有勇气、有底气尝试更大范围的合作，“三变”改革构建的利益联结机制，使得柏木村单个合作团体的规模从院落扩大到村民小组，主体力显著增强。得益于主体的广泛联结，合作团体单次筹集的资金从万元扩大到百万元，资源调动的类型从自筹资金扩展到空间资源，资源利用的方式和目的也从筹资改善人居环境扩展到通过空间资源开发获取经营收益，资源力极大增强。坚定的认同力、积极的主体力、活跃的资源力，三力循环互促推动着柏木村乡村建设有序进行，持续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和发展环境。

五、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生成机制及行动指引

前文将新内生式发展和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相融合，构建了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生成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激发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的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剖析。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进一步总结制度激励视角下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生成机制及行动指引。

（一）宏观制度变革重塑激励结构整合资源力

资源是乡村建设的基础和主体参与的前提。宏观制度变革通过重塑乡村资源产权结构和主体关系

秩序，能够改变乡村资源的价值以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提供资源动员的新激励，增强村庄内部主体对资源的整合能力。“‘一事一议’与财政奖补”和“村级公共服务与管理资金”制度重塑了柏木村资源整合的激励结构，改变了村委会干部、村民、地方政府的身份、资格及相互关系，并促使潜在合作契约和交易成本发生内部化转向。在新的激励结构下，柏木村只有实现向内构建“一事一议”村级民主议事秩序，才能对接财政奖补资金等外部资源。在筹资筹劳、以奖代补的实施机制调动下，在“理财小组”制度保障下，柏木村重新具备了自筹资金整合能力，并与“村级公共服务与管理资金”等地方财政奖补资金有效对接，初步实现对村庄内外部资源的整合。

在行动指引层面，在乡村建设的启动期应重视并巧妙发挥宏观制度变革对资源和主体动员的促进作用，强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有力举措并集成增效，拓展农村集体资源价值化合法途径，提高农村集体资源的价值，充分保障村集体和村民的财产权益，调动村集体对村庄内外部资源的整合力。

（二）微观制度创新降低交易成本汇聚主体力

参与是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的核心议题。村民参与、多元主体互动的阻力源于具有异质性利益诉求的多元主体之间合作的交易成本。通过微观制度创新，可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合作的相对收益，引导村民从独立行动转变为集体行动，并促进内外部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最终汇聚成乡村建设的主体力。柏木村通过建立“问题账单”制度，明确村民的共同利益，将村庄人居环境整治重点问题作为将村民发动起来的聚点；通过发展“议事会成员直接联系群众”制度，提高信息自上而下传递的效率；通过创建“村长茶馆”制度和打造“院落微广场”，实现多元主体之间低成本信息交流，引导合作顺利启动。为了降低事后交易成本，柏木村创立了“理财小组”制度并加强了内部化监督的约束力，营造了多元主体之间的互信氛围。乡村建设的多元主体合作“始于聚点、成于互信”，而互信是降低事后交易成本、实现合作长期存续的关键因素。聚点机制为互信提供共同利益基础，交流机制为互信提供协商平台，监督机制则为互信提供正向信号。互信氛围的形成是聚点机制、交流机制、监督机制对多元主体进行行为偏好引导的良性结果（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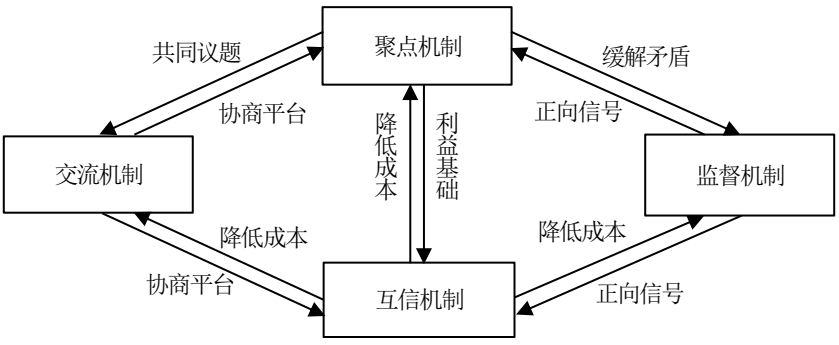


图1　聚点机制、交流机制、监督机制与互信机制相互作用关系示意

在行动指引层面，乡村建设过程中应准确把握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进行村庄微观制度创新。首先，村干部以及参与乡村建设的有识之士应发挥制度组织者的作用，调动集体智慧，善于发现多元主

体的共同诉求，并找到合作聚点。其次，应注重多元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在传统面对面交流的基础上，利用现代通信技术构建体系化、常态化的交流机制。最后，需善于利用村规民约等内部化规范，形成低成本日常化的监督机制，提高合作的可信度。

（三）村庄公共品合作供给凝聚认同力

认同是乡村建设内生动力被充分激活的重要标志。认同的形成需以村庄公共品自主供给为契机，在有效的制度干预下引导多元主体开展合作博弈，有形的公共品收益和无形的社会资本收益能够激发乡村建设的认同力。柏木村的村庄公共品合作博弈始于入户道路自筹自建的小团体合作试验，在试验过程中确定了自筹资金标准，创造了“理财小组”制度。在此过程中，通过实践创新和制度干预给予观望中的“对等者”正向引导，最终集体利益超越了个人利益，合作者通过参与集体行动获得公共品收益、社会资本收益和成就感，进而凝聚成认同力。

在行动指引层面，普通村庄可以动员村民议事会成员、党员等“天生合作者”占比较大的小团体进行村庄公共品自主供给的合作博弈试验，将利他主义行为决策逻辑外显化，加强对“天生合作者”的赞誉和奖励，落实对“搭便车者”的监督和惩罚，并对村庄公共品自主供给成效进行宣传。在创造有形村庄公共品的同时，不断积累无形社会资本，凝聚社会认同。

（四）三力互促集成乡村建设持续动力

乡村建设的资源力、主体力、认同力并非相互割裂，长期重复博弈使得三力循环互促得以实现，进而集成乡村建设持续动力。具体而言，宏观制度变革所激发的资源力为多元主体参与乡村建设提供了共同利益基础；微观制度创新所引导形成的主体力确保了多元主体能够有序开展村庄公共品供给活动；有效制度干预下的村庄公共品供给所带来的有形与无形收益凝聚了认同力；在村庄公共品供给的长期重复博弈中，认同力进一步发挥感召作用扩大主体参与范围，并增强主体力；主体参与范围的扩大又进一步增强了合作团体对内外部资源的调动能力。

在行动指引层面，普通村庄可以充分关注村民贴现率的情况和影响因素，动态调整并改进微观制度设计，将村民的远期利益兑现与近期责任分担挂钩，降低村民的贴现率，确保长期重复博弈从易到难、由点及面有序开展，实施“三变”改革构建利益联结机制，逐步扩大参与主体的类型和数量，实现超地方主体和资源的良性互动，推动乡村建设持续运行。

六、结论和启示

（一）结论

1.*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的理论内涵与构成要素*。理论和案例研究表明，乡村建设内生动力并非一个狭义的内部力量概念，而是以乡村内部因素为主导，由资源力、主体力、认同力循环互促集成，具有地方和超地方互动特征的乡村建设持续动力。其中，资源力是村庄内部主体对村庄内外部资源的整合能力，是乡村建设启动的基础，为主体力的激发提供新的利益激励；主体力是以村民合作为基础、内外部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集体行动力，主体力是乡村建设的核心力，资源力和认同力的运作目标都是增强主体力；认同力是源于多元主体对制度结构和合作行为的充分认可而形成的精神动力，认同力是

乡村建设内生动力被激活的重要标志，是维持多元主体持续合作的动力源泉。资源力、主体力、认同力以村庄公共品供给的长期合作为契机循环互促集成乡村建设持续动力。

2.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生成的制度激励内在逻辑。基于制度激励视角，本文构建了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生成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制度因素在乡村建设资源力、主体力、认同力的生成以及三力循环互促环节均起到重要的激励作用：宏观制度变革能够重塑激励结构，改变乡村资源的价值以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提供资源动员的新激励，整合资源力；微观制度创新能够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提高合作的相对收益，汇聚主体力；有效制度干预下的村庄公共品合作博弈使得集体利益超越个人利益，并带来有形与无形收益，凝聚认同力；长期重复博弈使得远期利益超越眼前利益，引导村民持续合作，并且三力实现循环互促集成乡村建设持续动力（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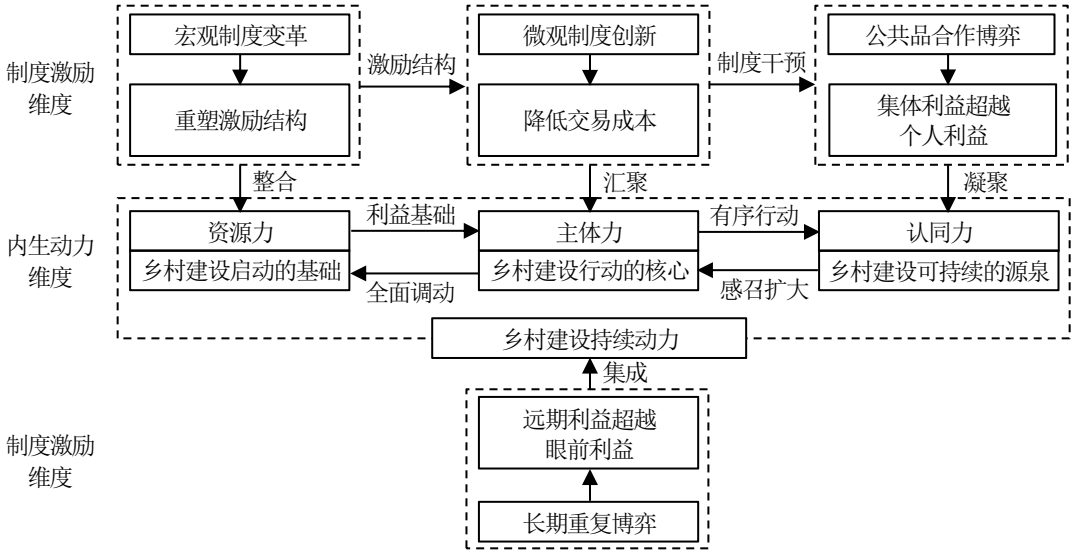


图2　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生成的制度激励机制示意

制度激励视角下，乡村建设内生动力的生成本质上是一个从改变制度结构到改变主体行为的过程。改变制度结构体现在宏观制度变革和微观制度创新两个方面。一方面，宏观制度变革重塑激励结构并为激发主体行动提供初始激励；另一方面，微观制度创新致力于降低主体合作的交易成本，并在村庄公共品供给中对多元主体行为决策进行有效干预和引导，实现单次合作博弈向长期重复博弈的转变。

（二）启示

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决定了中国乡村地区未来仍将面临乡村人口外流以及随之而来的乡土文化消弭、内部规范消解的现实困境。然而，乡村地区虽然普遍存在主体性有待加强和认同感相对薄弱的现象，却拥有丰富的生态空间、文化遗存等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述提出以来，这些资源所蕴藏的巨大价值潜力已日益显现。改革之所以能够对乡村建设动力产生最根本、最深刻的影响，正是因为其彻底改变了资源价值及其实现途径，产生了新的利益激励。而当下恰恰有机遇、有条件从乡村资源动员的利益激励切入，循序渐进、久久为功，逐步提升乡村建设的资源力、主体力、认同力。第一，应对乡村资源动员问题，地方政府应建立促进农村产权制度改

革和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政策体系，鼓励多元主体构建利益联结机制，推动乡村资源合作开发。在此过程中，应充分保障村民的合法财产权利，避免乡村建设目标与村民真实需求错位偏离。基层干部应提高对宏观制度变革的敏感性，在充分落实耕地保护、生态和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政策的前提下，通过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举措，盘活村庄的生态空间、文化遗存等资源，重塑资源利益结构，重获村庄空间发展的主动权。与此同时，要为村民创造更多的兼业机会，提高村民的财产性收入，从而激发他们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第二，应对乡村主体缺乏问题，应鼓励多元人才下乡驻村，重视第一书记的选拔任用，鼓励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驻村人才发挥乡村经营者和制度组织者的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的集体智慧，积极开展微观制度创新。第三，应对乡村认同缺失问题，应鼓励从“天生合作者”占比较大的自然村开始，在微观制度的干预下引导多元主体由点及面地开展村庄公共品合作供给，为村民持续创造有形村庄公共品和无形社会资本，持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和认同感。与此同时，要加强村庄文化建设，促进村民日常交流，重树村庄权威，重建乡土社会内部规范的约束力。最终，通过宏观制度变革和微观制度创新重启内生于村社体制的低成本、高效率的制度优越性（徐嘉鸿和贾林州，2014），从而继承和创新以“勤劳革命”[①]为基础的乡村建设中国模式。当乡村建设的多元主体广泛联结成具有超地方行动力的共同体，就能够在充分调动乡村内部资源的同时对接注入乡村的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共同推进可持续的乡村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

参考文献

1.奥尔森，2014：《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2 页。

2.奥斯特罗姆，2012：《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第 40-45 页。

3.毕凌岚、刘毅、钟毅，2017：《多方互动的乡村营建中乡规民约作用机制研究》，《城市规划》第 12 期，第 82-89 页。

4.德姆塞茨，2014：《关于产权的理论》，载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70-82 页。

5.杜姣，2017：《资源激活自治：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民主实践——基于成都“村级公共服务”的分析》，《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第 4 期，第 100-106 页。

6.方劲，2018：《内源性农村发展模式：实践探索、核心特征与反思拓展》，《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第 24-34 页。

7.费孝通，2013：《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 28-31 页。

8.高万芹，2023：《文化抑或制度：农民主体乡村建设模式的实践形态——基于湘、川两地乡村建设实践的案例比较》，《天津行政学院学报》第 1 期，第 67-76 页。

[①]以劳动和管理协调投入替代资本投入的内在机制是中国村社体制的核心，该机制是在中国农耕文明变迁进程中自发演进的结果，被学者称为“勤劳革命”。详见韩毓海（2009）。

9.韩喜平、王晓兵，2020：《从“投放－遵守”到“参与－反馈”：贫困治理模式转换的内生动力逻辑》，《理论与改革》第 5 期，第 61-71 页。

10.韩毓海，2009：《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 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九州出版社，第 164-189 页。

11.贺振华，2006：《转型时期的农村治理及宗族：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中国农村观察》第 1 期，第 24-29 页。

12.黄家亮，2023：《赋利赋权赋能：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动力再造》，《江苏社会科学》第 2 期，第 97-104 页。

13.黄效茂、张登国，2022：《乡村现代化内生动力的激发与维系——以曹县淘宝村为例》，《山东社会科学》第 7 期，第 21-29 页。

14.吉登斯，2016：《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1-4 页。

15.柯荣柱，2005：《制度分析的基本技术》，载张曙光（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 4 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 555 页。

16.科斯，2014：《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162 页。

17.孔祥智，2020：《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于“产权清晰+制度激励”理论框架的研究》，《经济纵横》第 7 期，第 32-41 页。

18.李海金、陈文华，2022：《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重要论述》，《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 6 期，第 32-39 页。

19.李培林，2023：《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动力和路径选择》，《社会学研究》第 6 期，第 1-17 页。

20.利瓦伊，2010：《统治与岁入》，周军华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54-56 页。

21.梁漱溟，2018a：《乡村建设理论》，北京：中华书局，第 7-25 页、第 467 页。

22.梁漱溟，2018b：《乡村建设大意：答乡村建设批判》，北京：中华书局，第 16-21 页。

23.刘晓雯、李琪，2020：《乡村振兴主体性内生动力及其激发路径的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 8 期，第 27-34 页。

24.刘欣，2020：《内生偏好与社会规范：脱贫内生动力的双重理论内涵》，《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第 33-40 页。

25.马荟、庞欣、奚云霄、周立，2020：《熟人社会、村庄动员与内源式发展——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中国农村观察》第 3 期，第 28-41 页。

26.诺思，2014：《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4-8 页。

27.石欣欣，2024：《乡村人居建设内生动力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 23 页、第 44 页。

28.石欣欣、胡纹、孙远赫，2021：《可持续的乡村建设与村庄公共品供给——困境、原因与制度优化》，《城市规划》第 10 期，第 45-58 页。

29.苏毅清、邱亚彪、方平，2023：《“外部激活+内部重塑”下的公共事物供给：关于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机制解释》，《中国农村观察》第 2 期，第 72-89 页。

30.王杰森，2021：《后扶贫时代脱贫内生动力培育的长效机制研究——基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第 1-5 页。

31.威廉姆森，2020：《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段毅才、王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37-40页。

32.温铁军等，2011：《解读苏南》，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第19-43页。

33.吴海琳、曾坤宁，2023：《激活“附近”视域下的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改革》第6期，第115-128页。

34.谢林，2019：《冲突的战略》，王水雄译，北京：华夏出版社，第59-83页。

35.谢治菊，2019：《诱致性制度变迁视角下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基于塘约经验的分析》，《探索》第6期，第173-182页。

36.徐嘉鸿、贾林州，2014：《从“村社理性”到“村社制度”：理解村庄治理逻辑变迁的一个分析框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92-100页。

37.杨锦秀、刘敏、尚凭、吴晓婷，2023：《如何破解乡村振兴的内外联动而内不动——基于成都市蒲江县箭塔村的实践考察》，《农业经济问题》第3期，第51-61页。

38.岳晓文旭、王晓飞、韩旭东、周立，2022：《赋权实践如何促进乡村新内源发展——基于赋权理论的多案例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第36-54页。

39.张环宙、黄超超、周永广，2007：《内生式发展模式研究综述》，《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61-68页。

40.张琦、李顺强，2021：《内生动力、需求变迁与需求异质性：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衔接中的差异化激励机制》，《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65-72页。

41.张文明、章志敏，2018：《资源·参与·认同：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社会科学》第11期，第75-85页。

42.张晓山，2018：《改革开放四十年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从“大包干”到城乡融合发展》，《学习与探索》第12期，第1-7页。

43.周其仁，2017：《改革的逻辑》，北京：中信出版社，第153-175页、第236-245页。

44.Aumann, R., 1974, “Subjectivity and Correlation in Randomized Strategies”,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1(1): 67-96.

45.Bosworth, G., I. Annibal, T. Carroll, L. Price, J. Sellick, and J. Shepherd, 2016, “Empowering Local Action Through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LEADER in England”, *Sociologia Ruralis*, 56(3): 427-449.

46.Cason, T., and F. Khan, 1999, “A Laboratory Study of Voluntary Public Goods Provision with Imperfect Monitoring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8(2): 533-552.

47.Gkartzios, M., and M. Scott, 2013, “Placing Housing in Rural Development: Exogenous, Endogenous and Neo-Endogenous Approaches”, *Sociologia Ruralis*, 54(3): 241-265.

48.Ray, C., 1999,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Reflexive Modernity”,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5(3): 257-267.

49.Ray, C., 2001, “Culture Economies: A Perspective on Local Rur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https://www.ncl.ac.uk/mediav8/centre-for-rural-economy/files/culture-economy.pdf.

50.Williamson, O., 2000,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ing Stock, Looking Ahea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8(3): 595-613.

The Mechanism for Generating Endogenous Dynamics in Rural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SHI Xinxin[1,2]

(1.Postdoctoral Mobile Research Station in Law, Chongqing University;
2.School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Summary: Stimulating endogenous dynamics is crucial for sustainable rural construction and revit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highlighted the ongoing advance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rough reform and opening-up. Urgently needed are deepened reforms i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mechanisms that foster innovation, driven by the people, and continuously stimulate dynamism. Exploring endogenous dynamics in rural construction from an institutional incentive perspective is thus both rational and necessary.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how of generating these dynamics. Drawing on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t propos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resource capacity–agency capacity–identity capacity–and their cyclical, mutually reinforcing interaction". This framework elucidates how institutions incentivize by altering interest structures. A single-case study of Baimu Village, Pidu District, Chengdu, provides empirical grounding, allowing for the extraction of generative mechanisms and actionable guidanc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endogenous dynamics in rural construction are primarily driven by internal factors, characterized by the cyclical interaction of resource, agency, and identity capacities, within a context of local and translocal interplay. Institutional factors exert incentivizing effects at multiple levels: Macro-institutional reforms restructure property rights and eligibility, altering the value of rural resources and inter-agent interest relations, thereby consolidating resource capacity. Micro-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lower transaction costs and increase the relative benefits of cooperation, thus mobilizing agency capacity. Effective institutional intervention in the cooperative provision of village public goods elevates collective interests above individual interests, fostering identity capacity. Long-term, repeated interactions prioritize long-term cooperative benefits over short-term gains, allowing the three capacities to cyclically and mutually reinforce, sustaining rural construction.

These findings offer insights for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While rural areas may face challenges of limited agency and weak identity, they possess abundant and valuable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Leveraging current reforms i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 entry point is to mobilize resource capacity through incentivizing interest alignment via resource activation. Subsequently, through micro-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sustained, long-term cooperativ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agency capacity can be gradually enhanced and identity capacity fostered. When diverse rural stakeholders form broad, translocal coalitions, they can effectively leverage both internal resources and external inputs, jointly driving sustainable rural construction and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ural Construction; Endogenous Dynamics;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Public Goods Provision

JEL Classification: O18

（责任编辑：王　藻）

农村高额彩礼形成机制的新探索

——基于“互助－竞争”的分析框架

刘武根　陈栋良

摘要：本文基于“互助－竞争”分析框架，对农村高额彩礼形成过程中三个主体的行动逻辑进行深入分析。从农村高额彩礼形成过程中主体行动逻辑的维度来看，农村高额彩礼是接受主体、支付主体和社会力量三方共同推动形成的。作为接受主体的女方家庭，依据彩礼的归属机制和象征机制产生索要高额彩礼的需求；作为支付主体的男方家庭，依据责任机制和挤压机制产生支付高额彩礼的意愿；部分职业媒人作为社会力量，运用配对机制和定价机制诱导男女双方提高彩礼价格。有效治理农村高额彩礼，需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思维，多管齐下，综合施策，调整优化治理农村高额彩礼的相关政策法律，引导男方家庭抵制高额彩礼，约束女方家庭追逐高额彩礼，规范乡村职业媒人行为。

关键词：高额彩礼　互助－竞争　婚姻市场　代际责任　婚姻挤压　职业媒人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彩礼是在娶亲时，男方经过协商议定赠予或主动赠予女方的实物或货币，是一个固定的社会群体达成姻亲关系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学意义上，彩礼是“纳征”，是“男方送给女方家的财物”（李霞，2008）。彩礼在婚姻关系的达成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彩礼有助于保证婚姻关系达成、维持婚姻关系稳定（胡敬阳，2023），促成村庄社会合作和实现家庭互助合作（阎云翔，2016a）。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彩礼价格也“水涨船高”，“彩礼高面子高”“万紫千红”“穿金戴银”等俚语逐渐流传开来。不少新闻媒体对高额彩礼现象进行了专题报道，引发广泛关注。笔者调查发现，很多农村地区的彩礼已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100 元左右上涨到目前的 20 多万元甚至更高。高

［资助项目］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研究”（编号：24LLZZA098）。

［作者信息］　刘武根，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电子邮箱：liu481016@sina.com；陈栋良，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电子邮箱：17793400176@163.com。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罗兴佐教授对本文亦有贡献，但文责自负。

额彩礼造成家庭代际关系破裂、夫妻关系终结、姻亲双方纠纷和恶性事件等现象频频出现。农村高额彩礼既给农民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又给淳朴民风、文明乡风乃至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带来负面影响。各地对农村高额彩礼的治理不断“加码”，但效果并不理想。调查显示，不少农村地区的彩礼价格仍在上涨。如何有效治理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从合法性层面来看，政府对彩礼的态度经历了“否定－默认－辩证对待”的演变过程。1950 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将彩礼视为买卖婚姻，明确规定“禁止任何人藉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从法理角度明确否定了彩礼制度的合法性[①]。但因彩礼风俗在民间的悠久历史和文化意义，彩礼在法律约束下仍隐晦存在。改革开放后，彩礼风俗在民间再度兴起。1980 年通过、2001 年修正的《婚姻法》对彩礼的表述调整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②]。与 1950 年的《婚姻法》相比，法律在主体和要件上对彩礼的界定发生了明显变化。2012 年以来，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彩礼价格不断提高，甚至出现了天价彩礼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村青年婚配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202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重申了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基本原则，对彩礼纠纷的诉讼主体、返还规则和认定范围等作出明确规定，从合法性层面加强对彩礼的约束。然而，彩礼作为中国社会长期普遍运行的一项互助制度，不只是经济上的往来，还包括了丰富的文化意蕴。单纯以法律法规赋予彩礼合法性或非法性，容易导致国家权力与民间秩序的冲突（董磊明等，2008）。从中国关于彩礼的法律实践来看，仅仅利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彩礼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从政策性层面来看，相关的政策文件对“合理范围内”的彩礼持认可的态度，对明显超出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彩礼持否定的态度。2019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③]；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推进对高额彩礼现象的治理；202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持续推进高额彩礼、大操大办、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④]；2025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发挥妇联、共青团等组织作用”[⑤]。除近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外，《乡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https://www.chinacourt.org/law/detail/1950/04/id/78945.shtml#:~:text=%E6%9C%AC%E6%B3%95%E8%A7%84%E5%AE%9A%E4%BA%861。

[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0891.htm。

[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2/19/content_5366917.htm。

[④]《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2/content_6929934.htm。

[⑤]《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2/content_7005158.htm。

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及 2022 年 8 月农业农村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开展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等文件都对治理农村高额彩礼问题提出明确要求，并作出具体部署。从成效来看，规范性政策的逐步落地使部分地区农村高额彩礼现象得到缓解。但总的来看，高额彩礼现象在农村地区并没有得到全面遏制。这表明，政策性文件实施在治理高额彩礼方面只发挥了部分作用，没有完全达成预期效果。

从学理性层面来看，学术界对彩礼问题的研究颇丰，形成了多种分析视角。有学者认为，女方的要价、男方的支付动力和阶层匹配的婚姻市场助推北方高额彩礼问题的形成（李永萍，2018a）。有学者提出，通行的相亲介绍婚恋模式会促使彩礼价格不断提高，加剧农民负担（王向阳，2021）。还有学者指出，婚姻挤压、彩礼属性和彩礼归属等机制，通过契约和支付的双重属性推动高额彩礼问题的形成（杨华，2024）。概言之，当前国内关于高额彩礼的研究主要有代际剥削论（王德福，2014）、婚姻市场挤压论（李永萍，2018a）、婚姻契约规范论（牟敏娜，2023）、婚姻要价论（桂华和余练，2010）和婚姻偿付论（阎云翔，2016b）等理论认识。代际剥削论认为，农村高额彩礼问题源于父代对子代成婚的强烈代际责任，男方忽略了彩礼价格高低，可能导致“因婚致贫”（刘成良，2018）。婚姻市场挤压论认为，地方社会男女性别比例结构性失衡，使女性有了要价能力和要价资本，导致男方“婚姻难觅”（王向阳，2020）。婚姻契约规范论认为，彩礼亘古有之，高额彩礼是源于对婚姻制度的强烈经济性规范（牟敏娜，2024）。婚姻要价论认为，女方在婚姻缔结过程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将自身作为要价资本，难以生成“倒贴彩礼”（徐晓军和孙晓红，2021）。婚姻偿付论认为，高额彩礼是对女方家庭失去劳动力的经济补偿，难以生成“低额彩礼”（张艳霞和刘远东，2024）。笔者认为，既有对高额彩礼问题的研究大都在弗里德曼（2000）提出的婚姻偿付、婚姻资助的理论框架和阎云翔（2016b）提出的时间维度内展开，对农村高额彩礼形成中相关主体行动逻辑的研究还比较少，尤其是缺乏对彩礼制度本身既有姻亲结对互助和共同抵御风险的性质，也有市场经济条件下村社内部家庭竞争与社会竞争属性的分析。

总的来说，既有研究从代际、婚姻市场（婚姻要价理论）、婚姻偿付理论（婚姻资助理论）、婚姻契约理论等维度对农村高额彩礼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但从相关主体行动逻辑的维度对农村高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展开深入分析的研究不多。从笔者在全国各地调研的情况来看，婚姻偿付和婚姻资助理论在传统农村社会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随着农村社会的老龄化、空心化，农村家庭的少子化、核心化，农民的个体化，彩礼的互助、偿付和资助逻辑逐渐被市场逻辑所宰制。家庭、个人之间基于经济能力的竞争物化到彩礼价格的比较上，这既弱化了彩礼的互助性质，也极大地增强了彩礼的竞争性质。这种竞争不是单一的男性竞争，而是“夸富宴”般的总体性社会竞争。因此，本文从社会竞争的维度，基于“互助－竞争”的分析框架，深入剖析农村高额彩礼的形成机制，系统阐释当前农村高额彩礼形成机制中相关行为主体的行动逻辑，以期为治理高额彩礼问题提供理论依据，为深入推动移风易俗政策落地提供学理支撑。

二、农村高额彩礼的形成机制：“互助－竞争”的分析框架

（一）彩礼的双重属性：互助性质与竞争性质

从历史演变看，彩礼既有因婚配产生姻亲关系而具有的互助性质，也有村庄社会内部的竞争性质。

1.互助性质。家庭制度在母系原始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后逐渐稳定下来，缔结姻亲关系的目的变为家庭延续。为避免近亲通婚导致的身份混乱和子女畸形，乱伦禁忌的社会规则和外婚制度逐步形成。为了弥补另一个家庭或另一个部落失去一个劳动力所导致的损失和女方父母的养育成本，男性家庭或部落需要给予女方家庭或部落一定的实物作为补偿，因缔结婚姻而形成的彩礼制度逐渐传承下来。

彩礼最基本的属性是偿付属性，但这种偿付同时内含互助属性。补偿是婚姻偿付理论的核心，男方对女方的财物转移被看作是必需的（熊凤水和慕良泽，2009）。将彩礼视作补偿，还隐含通过补偿帮助姻亲家庭生存的意思。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家庭经营处于高风险之中，需要靠天吃饭，基本生产生活缺乏可靠的保障。费孝通（2007）指出：“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农民家庭在依靠宗族式关系的同时，会积极寻求姻亲这一更加强有力的关系来应对家庭生存风险。由此，中国传统社会演化出两条村社内部的互助路径：一是依靠宗族血缘关系，在农业耕作等基本生存事件中寻求支持；二是依靠姻亲关系，在农业经营、家庭维系等基本安全事件中寻求支持。一方面，彩礼是实物支持，能使女方家庭的生产得以维系，家庭基本生存得以保障；另一方面，彩礼推动姻亲关系缔结，女方家庭的关系网络得以扩展，形成的扩展性社会关系能够缓解女方家庭面临的生存和安全问题，还可能成为女方家庭阶层跃升的通道。

2.竞争性质。传统农村以家庭为“生产单元”，家庭是核心，生产多寡决定家庭的社会地位。传统农村社会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无论是宗族型村庄，还是原子化村庄，抑或小亲族村庄，村庄内部均呈现竞争态势。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农村逐步确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很多农民选择进城务工，农村社会的竞争内容由生产能力的强弱转变为经济能力的高低。这种竞争不因村庄社会结构不同而有所差别，宗族型村庄的竞争主要是家族与家族之间的竞争，原子化村庄的竞争主要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竞争，小亲族村庄的竞争则既有家族之间的竞争，也有家庭之间的竞争，更有兄弟之间的竞争。北方小亲族村庄的社会竞争最为激烈，既有家庭之间围绕生育率、成婚率、高龄老人数量和子女性别等展开的竞争，也有家庭内部围绕父母资产、姻亲双方的社会地位和子女的成才程度等展开的竞争。

农村社会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个人或家庭以某种物质形式的展演作为其在村庄社会竞争中的位阶。农民要想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就要拿出足够的现金参与生存消费之外的人情礼仪、面子消费等社会性消费竞争（夏柱智和贺雪峰，2017）。北方小亲族村庄的社会竞争渗透到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没有儿子”“子女是否适龄成婚”“女儿彩礼高低”等是农村社会竞争的重要体现。作为农村社会性消费重要组成部分的彩礼，天然具有财货性质，彩礼多寡成为家族与家族、家庭与家庭、兄弟与兄弟之间竞争的标志。

（二）本文的分析框架：“互助－竞争”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彩礼的互助属性日趋式微，而竞争属性不断增强。彩礼价格的高低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朱战辉，2017）。笔者调查发现，在彩礼价格不高的地方，彩礼的互助性质和礼俗性质较为明显，地方社会竞争不激烈；在彩礼价格远超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地方，彩礼的互助和礼俗性质逐渐消亡，竞争性质凸显。本文的基础性理论是华中村治研究团队提出的村庄社会结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江西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广东省的村庄大多属于宗族型村庄，宗族色彩明显，属于团结型村庄；重庆市、湖北省、四川省、贵州省、安徽省、湖北省以及东北地区的村庄大多属于原子化村庄，村庄个体化明显，属于分散型村庄；河南省、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以及关中平原的陕西省、甘肃省的村庄大多属于小亲族村庄，户族特征明显，属于分裂型村庄（贺雪峰，2012）。本文主要分析甘肃省庆阳市平泉镇小亲族村庄的高额彩礼问题，兼有分析其他小亲族村庄的彩礼形成机制。

根据彩礼的互助属性和竞争属性，笔者构建“互助－竞争”的分析框架。根据这个分析框架，本文将村庄划分为“强互助－强竞争”“强互助－弱竞争”“弱互助－强竞争”“弱互助－弱竞争”四种理想类型。各种类型村庄的彩礼价格不同，低价彩礼或高额彩礼的形成机制不同，治理机制也应当有所不同。“强互助－强竞争”类型村庄的彩礼价格非常高，但存在救济机制，这在江西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广东省等省份的宗族型村庄中较为普遍。在这些地区，因为强烈的竞争属性，彩礼价格逐渐提高，成为男方家庭的主要负担。但宗族型村庄保留了一定的村庄社会规则，存在互助救济机制，主要体现为彩礼返还、彩礼陪嫁和赠送给新人小家庭等。在这种类型的村庄中，高额彩礼成为农民家庭的负担，但不是结构性负担，而是能被救济机制所消解的负担。“强互助－弱竞争”类型村庄的彩礼价格比较低，彩礼的礼俗色彩重，这在贵州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等省份的民族地区、山区、边疆地区的村庄中较为普遍。在这些地区，家庭维持和生存对人们的互助能力要求高，再加上较为保守的地方文化特色，高额彩礼风潮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不明显。“弱互助－弱竞争”类型村庄的彩礼价格比较适中，这在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和北京市等省份的城中村、城郊村以及四川省、重庆市、湖北省等省份的原子化村庄中较为普遍。在这些地区，村庄内部关系较为松散，家庭、子女之间的互助比较少，彩礼的礼俗色彩不重，竞争色彩也不明显。彩礼价格高低不会引起区域挤压和社会竞争，彩礼以父母帮助子女成家的“道义经济”为主要维持动力。“弱互助－强竞争”类型村庄的彩礼价格非常高，鲜有救济机制，这在河南省、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安徽省、陕西省和甘肃省等省份的小亲族村庄中较为普遍。

在划分上述四种理想类型村庄的基础上，笔者主要分析“弱互助－强竞争”这一类型的村庄。在“弱互助－强竞争”类型村庄，社会竞争激烈，村庄互助体系逐渐消解，彩礼的礼俗功能和互助性质逐渐被竞争性质所取代。从农村高额彩礼形成的相关主体及其行动逻辑来看，彩礼的支付主体是男方父母，帮助子女成婚是其必须完成的人生任务；彩礼的接受主体是女方父母，彩礼不会返还给新人小家庭或男方父母，陪嫁品往往只有被褥、电器等基本生活用品，女方父母给女儿的“压箱底钱”往往附带只能女儿使用等要求。媒人在婚配和彩礼竞争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农村高额彩礼议定的重要参与者。村庄、家庭、子女之间的竞争往往会导致彩礼价格不断提高，甚至远远超过家庭的承受能力和地

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给农民家庭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和婚配困难问题。同时，这一类型村庄没有“强互助－强竞争”类型村庄的救济机制，难以消解高额彩礼的负面影响。本文进一步将社会竞争的主体聚焦于给付主体、接受主体以及助推彩礼价格不断提高的社会主体，通过分析不同主体对彩礼的认知和行动逻辑，从社会竞争的视角分析北方小亲族村庄，尤其是甘肃省庆阳市等地区农村高额彩礼的形成机制，阐述“弱互助－强竞争”类型村庄高额彩礼的生成逻辑。

本文的问题意识来源于笔者 2021 年 12 月在甘肃省庆阳市平泉镇“剧院相亲市场”的参与式观察，以及随后的 3 年里对多个农村家庭婚配过程的追踪调查。笔者在追踪调查中发现，“弱互助－强竞争”类型村庄高额彩礼现象的形成除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农民社会保障水平偏低、农村婚恋市场发展不充分、农村婚配男女比例结构性失衡等因素有关外，还与农村高额彩礼支付主体的男方父母、接受主体的女方父母以及作为推动力量的职业媒人息息相关[①]。

本文的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笔者在甘肃省庆阳市平泉镇的八山行政村和南徐行政村长期进行的农村调研，田野调查时间为 2021 年至 2024 年。此外，笔者所在团队在全国多个省（区、市）的农村开展村治模式调查，笔者在贵州省、湖北省、山东省和江西省等地对彩礼相关问题的调查，积累了大量质性资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经验借鉴。本文所引用相关表述均为职业媒人或婚配过程中男女双方父母的表述。本文所称女儿为女方视角，儿子为男方视角，新人小家庭为年轻男女组建的新家庭。

三、女方竞争：高额彩礼的归属机制与象征机制

当前，北方大部分农村的彩礼价格上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笔者调查发现，“弱互助－强竞争”类型村庄出现高额彩礼的内在逻辑是女方在彩礼归属和象征问题上陷入激烈的个人、家庭与社会的竞争。同时，男女双方家庭因彩礼和婚姻关系的确立成为替代血缘关系的互助体。

（一）高额彩礼的归属机制

1.*彩礼的三重归属*。彩礼问题的核心是彩礼的归属（李永萍，2022）。彩礼是男方家庭单向度给予女方家庭的“流动的礼物”。彩礼有三种去向：第一种去向是给女方父母，成为男方家庭付给女方家庭的“养育成本费”和“劳动力损失费”，或是充当女方父母其他子女的“成家立业准备金”；第二种去向是给新人小家庭，成为小家庭开始新生活的“准备金”或“启动资金”；第三种去向是回到男方父母手中，通过“陪嫁”等方式归属男方父母所有，成为男方资助新人小家庭的“储备资金”。在第一种去向中，彩礼给付是单向且没有相应补偿的。在第二种去向中，彩礼给付具有了流动的可能性，尽管彩礼最终只回流到新人小家庭手中，但能减轻男方家庭的经济负担。在第三种去向中，彩礼给付更多变成流动的“伦理责任”，是父母为了履行自己的伦理义务而尽的责任。在彩礼的三种去向中，只有第一种去向缺乏陪嫁、返还等救济机制，会严重拉高彩礼价格。在第二种去向中，彩礼成为男方父母的负担，但救济机制减弱了这种负担的影响。第三种去向因有强力的救济机制而不会产生彩

[①]限于篇幅和聚焦对相关行为主体行动逻辑的分析，本文从接受主体、支付主体和社会力量三个方面，对农村高额彩礼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但这并不是说农村高额彩礼的形成仅仅是接受主体、支付主体和社会力量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礼负担。平泉镇普遍盛行的是彩礼最终归属女方父母，且女方父母更多将彩礼看作其他子女的“成家立业准备金”。这导致彩礼的偿付与互助属性消解，彩礼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单向度的“扶贫”。因此，女方父母为了标榜自己的要价能力、积累更多的经济资源，将高额彩礼视为家庭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同时，应当指出的是，彩礼归属暗含了姻亲关系中互助的可能与机会，但高额彩礼严重侵蚀了彩礼本身的互助功能，大大降低了姻亲之间互助的现实可能性。

2.彩礼的分配逻辑。彩礼价格的核心是彩礼的分配。有学者认为，女方的要价能力决定了彩礼的高低（李永萍，2022），但分配逻辑对彩礼价格的影响往往具有决定性。一般来说，彩礼是由女方父母根据自身家庭情况来支配。女方家庭分配彩礼，有三个基本分配主体和三重分配逻辑。第一个主体是女方父母，即彩礼向上分配。在“弱互助－强竞争”类型村庄，女儿不是养老责任和养老成本的主要承担者。由于年轻男性普遍外出打工，“儿子出钱、女儿出力”的养老模式（许琪，2015）不再可靠。女方父母发现养老需要自己负责，要攒够“养老钱”。在子女养老不再可靠的现实困境下，女方父母需要通过扣留、提高女儿的彩礼要价来积累自己养老的资金。第二个主体是女方父母的其他子女，即彩礼同代分配。在北方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占少数，大多数北方农村家庭是一儿一女或一儿二女的家庭。女方父母在留足家庭储备资金后，通常会将剩余的彩礼用于其他子女的婚嫁、教育和生活等支出，甚至是购房、购车。彩礼同代分配的原因是女方父母需要解决家庭生存及其他子女的发展问题。第三个主体是新人小家庭，即外向分配。甘肃省庆阳市平泉镇流行的 20 多万元彩礼一般会掏空一个农村家庭的全部积累，部分家庭甚至需要向他人借钱。郝海波（2021）指出，河南等北方农村地区 60%以上的农村家庭会因为高额彩礼选择向亲朋好友借钱或向银行贷款。对女方父母来说，“彩礼是必需的，但可以通过借贷的方式让女儿女婿的生活不那么困难”。在这种伦理关怀下，男方家庭可以借钱支付彩礼钱，这种借贷会导致女方父母索要更高额的彩礼。此外，在彩礼给予女方家庭之后，部分女方父母还会选择将彩礼存入银行、借钱给亲朋好友。应对女方父母的养老需要、女方家庭经营需要、女方父母其他子女发展需要以及新人小家庭的可能性借贷，共同导致彩礼价格不断提高。在彩礼分配上，新人小家庭、女方父母及女方父母其他子女是竞争关系。但是，这种竞争关系因伦理纽带又保留了微弱的互助色彩。女方父母在经过家庭协商之后，仍可能会选择将得到的彩礼部分借给新人小家庭，帮助他们减轻经济压力和负担。

3.彩礼的用途导向。彩礼的用途对高额彩礼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彩礼分配涉及谁来分配、向哪里分配的问题，彩礼的用途则是彩礼由谁来使用、怎样使用。二者主体有差异，机制有不同。一项关于彩礼用途的调查显示，约有 9%的人的彩礼主要作为“间接嫁妆”，32%的人的彩礼被女方父母占有，59%的人的彩礼转化为兄弟的结婚费用（田丰和陈振汴，2016）。彩礼的用途往往由女方父母决定，彩礼的主要用途能体现高额彩礼形成的根本逻辑。笔者的调查显示，彩礼的用途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和最主要的用途是转化为女方父母其他子女的结婚费用。这一用途是高额彩礼“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女方父母其他子女的结婚费用主要来源于彩礼，高额婚姻成本倒逼女方父母提高女儿的彩礼要价，如此往复，彩礼价格陷入不断提高的“恶性循环”。平泉镇南徐村的一位母亲说：“我可以给我的女儿少要一些彩礼，但我的儿子结婚肯定会被要很高的彩礼。”这一回答凸显高额彩礼问题的核

心是：在一个社会信任程度较低的群体中，人们的互助观念淡薄，不会以自己难以预期的结果在事前做出更加符合道义的“理性选择”。但是，彩礼在用途上同样遵循互助的逻辑。“娘亲舅大”和“一个女婿半个儿”的伦理规则决定了女方父母的其他子女和男方之间微弱的互助关系会延续。彩礼的第二个用途是女方家庭发展支出。女方父母不仅面临“给自己儿子娶媳妇”的重大人生任务，还有“建好一院房子”的人生任务。根据笔者在平泉镇八山村的观察，大多数女方父母修建房屋的费用和支付儿子彩礼的资金都来源于女儿结婚的彩礼。当建房成为必须完成的人生任务时，女方父母就必须积累足够的建房资金。在人生任务的约束下，女方父母会通过提高彩礼价格来积累“修房基金”和“儿子结婚钱”，导致高额彩礼的产生。第三个用途是女方家庭成员的发展支出。无论是老人养老，还是其他子女的教育、婚恋，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女方父母在自己努力积累的同时也寄希望于一笔较高的彩礼能够增加部分资金积累。提高彩礼价格成为促进资金积累的重要方式。彩礼接受主体的这种行动逻辑必然导致姻亲关系中的互助成分大打折扣，进一步扩大当前农村婚配中彩礼的互助属性与竞争属性的张力，使“弱互助”属性更加弱化、“强竞争”属性更加突出。

（二）高额彩礼的象征机制

1.“值钱”的女儿。“值钱”是女方个体竞争的标签，彩礼的多寡是女方身价的象征（杨华，2019a）。平泉镇八山村有一对堂姐妹王云和王雪，自小便相互比较。其中，王云在2017年结婚的彩礼价格是18.8万元，王雪在2019年结婚的彩礼价格是22.8万元。彩礼价格首先是个人“面子”的竞争。王云认为，“自己是因为结婚早所以礼金低，并不是不如王雪”；王雪认为，“自己学历较高，相貌出众，所以在彩礼谈判中要求必须加到22.8万元，以比王云高4万元”，“男方愿意给自己更多的彩礼，自己当然比王云强”。这种个人的竞争与攀比源自家庭内部的竞争与攀比，个人面子竞争成为推动彩礼价格提高的一个普遍因素。彩礼价格其次是家庭之间的培养能力的竞争。王云与王雪同属一个大家族，但不同家庭之间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王云的父母和王雪的父母在彩礼一事上进行过多次争论，分别从嫁娶早晚、学历层次、颜值高低、高矮胖瘦等方面据理力争，认为“自己的女儿更值钱”，应该索要更高的彩礼。彩礼价格最后是女方父母的“自我理性化”。这对堂姐妹的父母均认为，彩礼多要一点女儿才会受到男方家庭的重视，“要的少就不会心疼钱，也不会心疼我的女儿”。这种自我理性化反映了女方父母提高彩礼价格的心态。女方父母将彩礼看作是自己或女儿“值钱与否”的象征，将彩礼作为保障女儿家庭地位的象征，导致彩礼价格不断提高。

2.“不赔钱”的家庭。“不赔钱嫁女儿才是有能力的家庭”。有研究提出，高额彩礼是女儿优秀的标志，并转化为女方家庭在村庄中的面子，高额彩礼通过依附社区价值而获得维系动力（李永萍，2018b）。笔者在考察陇东、鲁北、鄂西和黔东的“强互助－弱竞争”“弱互助－弱竞争”类型村庄的彩礼要价动机时发现，鄂西、黔东等地区彩礼价格不高的原因是家庭之间没有激烈的竞争。甘肃省庆阳市的村庄普遍为小亲族村庄，家庭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而地方经济欠发达决定了女方父母需要从女儿身上得到超出或“扯平”抚养成本的“收入”。王云家庭与王雪家庭的彩礼价格不同，但他们都实现了自我判定的收支平衡。王云家庭在教育上投入少，因而彩礼少于王雪是能够接受的；王雪学历比王云高，晚嫁了两年，彩礼自然要高一些。因此，对于王云与王雪两个家庭来说，他们都做到了“不

赔钱”，做到了抚养成本与收入的均衡。但是，抚养成本往往是难以计算的，也是难以被准确衡量的，家庭只能根据外化特征，即学历、颜值、工资、家庭条件等“明码抬价”，促使彩礼价格被不断抬升。提高彩礼价格不仅能保证抚养成本和收入的平衡，还能在家庭之间的竞争中取得“优势”，获得更高的面子价值和舆论支持。

3.“养得好”的村庄。村庄之间的舆论竞争促使彩礼价格向上看齐。2021 年，笔者调查发现，平泉镇八山村彩礼价格提高到 23 万元左右，相邻的南徐村的彩礼价格大多维持在 18 万元左右。八山村的人认为，“南徐村在抚养女儿方面抠抠搜搜，既没有投入足够的教育资金，也没有培养足够的个人能力，在彩礼谈判中自然要不了高价”。面对村庄竞争，南徐村在彩礼谈判中逐步提高要价。2023 年南徐村的彩礼价格也普遍涨到 21 万元～23 万元，与八山村的彩礼要价一致。在村庄竞争中，彩礼价格会影响村庄整体形象的评判。南徐村的人认为，“八山村的女儿养得就是好，能给爸妈把钱挣回来”。激烈的村庄竞争成为推动彩礼价格不断提高的重要因素。

（三）女方竞争的逻辑审视

在归属方面，“弱互助－强竞争”类型村庄的彩礼归属女方父母，使得彩礼由双向的情义互换（李升和方卓，2021）变成单向的“经济扶贫”，由低度的礼俗秩序变为高度的经济往来。彩礼优先分配给女方父母及其他子女，其次才是新人小家庭。女方父母及其他子女在彩礼分配上有话语权，养老焦虑和发展需要排斥了女儿的分配权利，促使彩礼高度异化。在用途方面，彩礼主要用于兄弟结婚、修建新房、家庭成员发展等三个主要方面，满足女方家庭的家庭繁衍、血脉传承、修建新房和经营家庭等需要，却忽视了女儿组建新家庭需要经济支持的需要，使得彩礼由支持新人小家庭发展转为支持女方父母儿子家庭的发展。彩礼流动路径的异化导致彩礼价格提高。尽管存在姻亲关系的互助体系和“彩礼借贷”的微弱互助形式，但彩礼的归属、分配和使用使彩礼更具竞争性，互助性减弱。

从象征视角看，彩礼高低成为女儿“值钱与否”和“是否重视女儿”的象征，被视为家庭话语权的体现，进一步导致彩礼的异化与人的物化。家庭之间的彩礼攀比与村庄之间的比较，促使每个家庭、每个村庄淡化彩礼的礼俗意义和看重彩礼的具体数额，将原本象征美好爱情的“纳征”变成“卖女儿”。“高价卖女儿”是不正确的，也是受八山村和南徐村的村民所谴责的，但他们所代表的女方家庭被个人、家庭和村庄之间的竞争影响。高额彩礼所代表的“值钱”“不赔钱”“养得好”推动彩礼价格提高，并呈现疯涨态势。

四、男方竞争：高额彩礼的责任机制与挤压机制

彩礼的经济属性能展示男方家庭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大家都知道高额彩礼会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但为什么男方家庭依然要支付 20 多万元的彩礼？笔者调查发现，在“弱互助－强竞争”类型村庄，男方家庭是高额彩礼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主体。作为给付一方，代际责任使男方在家庭内部需要互相“给一个交代”，这种结构性挤压致使男方家庭失去彩礼议价的主动权。农村男性只能被动接受高额彩礼的现实，部分农村男性更是被迫晚婚或不婚。

（一）高额彩礼的责任机制

从代际责任视角分析不同农村地区的代际关系及彩礼制度，能有效阐释高额彩礼的形成动力。代际责任是指代与代之间的伦理性义务，包含父代对子代和子代对父代的双向伦理责任（杜姣，2017）。

1.父代责任：“给自己一个交代”。有研究认为，南方农村彩礼价格普遍较低是因为父代责任较弱，而北方农村高额彩礼源于父代的强责任（杨华，2019b）。这种强责任主要体现在高质量养育、建新房、帮子代娶妻、帮子代帮忙带孩子以及其他无条件的各类支持上。帮助子代娶妻是“弱互助－强竞争”类型村庄的父母必须完成的最大的人生任务，父代会参与子代的婚配对象选择、彩礼支付和婚姻仪式等婚配全过程。父代为了早日完成人生任务，往往会主动同意女方的高额彩礼要求。人生任务具有强烈的代际责任符号，而代际责任则是彩礼支付的内在基础（何倩倩，2021）。在父代观念中，“必须给儿子娶媳妇”“儿子没娶媳妇就是自己人生的失败”。不给自己一个交代，父代会觉得在社会竞争中落了下风。在这种强代际责任驱使下，父代会采取多种方式为子代娶媳妇，以完成人生任务，甚至选择高利贷或逼迫女儿早婚获得彩礼钱（陶自祥，2011）。当代际责任与彩礼关联起来，父代就有了支付高额彩礼的内驱力。女方家庭将这种代际责任运用到彩礼要价谈判中，促使男方父母在高额彩礼的社会环境中心甘情愿被“代际剥削”（王德福，2014）。

2.子代责任：“给父母一个交代”。子代对父代的伦理责任主要包括养老、成婚和育儿三件大事。在“弱互助－强竞争”类型村庄，子代不仅要高质量完成父代的养老任务，还必须以成婚、生子作为对父代养育之恩、彩礼支付的回报。当女方父母提高彩礼价格时，受过高等教育或经商务工成功的年轻人往往会拒绝婚约。然而，更多的农村男性不得不履行家庭血脉延续的责任，早日完成父母期望的“结婚生子”。一方面，父代会主动灌输“晚婚娶不到好媳妇”“再不结婚就只能找别人剩下的”等观念；另一方面，子代的“个体化”观念觉醒和成婚责任履行之间产生极大的张力。在子代观念中，“不结婚就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之恩，哪怕彩礼再高也必须结婚，给父母一个交代”。不给父母一个交代，就是不孝子，子代就会在社会竞争中落入下风。在这种主观责任机制下，子代被动地在高额彩礼的社会环境中接受高额彩礼，以“给父母一个交代”。

（二）高额彩礼的挤压机制

1.结构失衡挤压男方议价自主权。结构失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胞结构。男方家庭人口结构是影响彩礼价格的重要因素，男方家庭子女数量会影响彩礼价格的高低。当男方家庭有两个及以上的待婚男性时，女方家庭往往会提高彩礼价格，超过当地平均水平。对女方家庭来说，这既能验证男方家庭的经济能力，又能保障新人小家庭的发展。当男方家庭为独生子家庭时，彩礼价格一般为当地平均水平。当男方家庭有一儿一女或一儿二女时，彩礼价格会略高于独生子家庭的要价，但低于多子家庭的要价。二是性别结构。农村生育率下降是推高彩礼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许琪和朱袁庆，2024）。在北方村庄，原有男女性别结构基本平衡。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农村总体生育率下降；另一方面，“生儿偏好”使村庄性别结构失衡。适婚男性数量明显超过适婚女性数量，使得女方家庭在彩礼议价中占据主动，男方则面临性别结构失衡所带来的婚配竞争压力，和其他男性一起“被

挑选”。在这种性别结构失衡的婚配竞争中，个人能力无疑是重要的，但彩礼支付能力更具有吸引力。性别结构失衡迫使男方支付更高的彩礼，以在婚配竞争中占据优势。

2.婚姻市场扩展挤压男方议价自主权。改革开放前，农村婚姻圈基本维持在同乡镇范围内，鲜有跨县（市、区）和跨省的婚姻。改革开放后，农民开始进城务工，婚姻市场从本地扩展到全国，为女性向外寻求婚姻提供了可能性，再加上男方父母“担心外地媳妇会跑掉”，从而压缩了农村男性的婚配选择。有研究指出，男性村民出生年代越晚，结婚年龄越晚，通婚范围越大，同时择偶时间、择偶方式、家庭背景和村庄非农化水平是影响通婚范围的主要因素（张翼和尹木子，2017）。打工青年的跨省婚姻，甚至跨国婚姻不断出现，使得婚姻在村庄文化中的象征意义逐渐淡化（宋丽娜，2010）。农村女性外嫁越来越多，加剧了农村的性别结构失衡。婚姻圈越开放，婚姻资源流动越快，农村适婚男性的选择余地越小。农村适婚男女在婚姻市场上选择权的差异使男性逐渐失去彩礼议价中的主动权。男方家庭在婚配过程中被迫不断提高彩礼价格，以此获得女方家庭的“优先关注”。

（三）男方竞争的逻辑审视

在责任视角下，为了完成人生任务，男方家庭陷入责任伦理困境。男方父代和子代都被代际责任和人生任务的逻辑所牵引：一方面，父代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实现家庭血脉延续，完成给儿子娶媳妇的任务，从而愿意支付高额彩礼；另一方面，子代为了“给父母一个交代”，回馈父母养育恩情，完成父母早日成婚的愿望，从而被迫接受高额彩礼。家庭帮衬是农村高额彩礼形成的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陈秋盼等，2018），没有男方父母的全力支持，大多数年轻男性无法独立支付高昂的彩礼。当男方家庭将婚姻看作人生任务和必须完成的伦理要求时，他们便具有支付高额彩礼的内驱力。这降低了彩礼的互助属性，强化了彩礼的竞争属性，推动高额彩礼的形成。

在挤压视角下，农村性别结构失衡是高额彩礼形成的重要土壤。男方家庭子女数量影响彩礼高低，男方家庭儿子较多会稀释男方家庭财富，催生女方家庭索要高额彩礼的动机。性别结构失衡使男方具有为了在婚配过程中占据主动而支付高额彩礼的动力。婚姻市场从本地扩展到全国，加剧了农村性别结构失衡。男女婚配选择权存在显著不同，男方家庭只有主动提高彩礼价格，才能在本地婚姻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在性别结构失衡和婚姻市场扩展的双重挤压下，农村男性的婚恋空间缩小，失去了彩礼议价的自主权，为了结婚只能支付高额彩礼。

在高额彩礼的形成过程中，男方家庭天然具有代际责任，愿意支付高额彩礼以在村庄与家庭竞争中占据优势。结构失衡和婚姻市场挤压使男方家庭主动支付高额彩礼，以在村庄和家庭竞争中获得社会声望。男方家庭在代际责任的内驱、结构失衡与婚姻市场挤压的外驱推动下，支付高额彩礼，使彩礼的互助属性和礼俗性质被不断消解，使彩礼的竞争属性和经济性质被不断强化。需要指出的是，有部分男方家庭在支付高额彩礼过程中带有“夸富宴”色彩，意图通过高额彩礼实现“斗阔”“炫富”的目的（蔡华和何长英，2022）。但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江浙沿海等地区的“弱互助－弱竞争”类型村庄中，“弱互助－强竞争”类型村庄的村民一般都比较排斥与谴责这种现象。

五、社会竞争：高额彩礼的配对机制与定价机制

一般认为，在农村只有通过“媒妁之言”，婚姻才是合乎礼数的；男女青年经由本地长者介绍，才能永结同心；哪怕自由恋爱，男女结婚也要安排媒人承担中间角色（郝建平，2010）。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媒人开始由德高望重之人转变为职业媒人，具有职业化趋向（王敬和海莉娟，2018）。高额彩礼的形成不仅与接受主体与给付主体有关，还与以职业媒人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推动有关。从成本的角度看，男方家庭要支付的婚姻成本包括媒人费用、彩礼、婚礼费用及婚房费用（靳小怡和段朱清，2019）。笔者调查发现，甘肃省庆阳市平泉镇的媒人费用从 10 年前的 1000 元增长到 2024 年的 5000 元至 2 万多元，增长迅速。当地一位男性媒人说：“一年只要介绍成两对，就能挣 4 万多。”部分社会力量进一步推动婚配竞争强化，是农村高额彩礼的重要推手。

（一）高额彩礼的配对机制

1.条件错配异化婚配竞争。在农村婚配过程中，媒人往往掌握一定数量的适婚男性和女性资源。现实的婚配逻辑是：男方家庭条件好，配对家庭条件一般的女方；男方家庭条件一般，配对个人条件较差的女方；男方家庭条件差，配对单亲家庭或有生理缺陷的女方。媒人根据学历、身高、相貌、家庭位置和工作收入等，按照男方略高于女方一个层级的方式进行男女配对。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一般都能满意，彩礼价格也会比较正常。但部分职业媒人为了提高婚配竞争程度，会进行“错配”。错配的逻辑是：男方条件不好，配对条件好或经济实力差不多的女方，利用女方的高要求制造适婚男性的焦虑；经济条件好的男方，配对单亲家庭或有生理缺陷的女方，利用女方较差的状况降低经济条件好的男方的婚配预期；夸大性别结构失衡，刻意降低适婚男性的婚配次数，制造男性婚恋焦虑。通过条件错配，部分职业媒人等社会力量异化婚配竞争，促使适婚男性支付高额彩礼来匹配一个满意的女性。

2.市场错配异化彩礼竞争。一方面，职业媒人利用信息资源、网络直播等方式扩大婚恋圈，使部分适婚男性得以向外寻求配偶，在男女婚配过程中帮助很多家庭解决了婚配难题，帮助本地择偶困难男女实现了婚配，被很多家庭视为座上宾。另一方面，在婚配过程中，部分职业媒人利用信息不对称和信息资源优势提高女方家庭心理预期，抬高彩礼价格。职业媒人的信息网络不断扩展，从线下交流扩展到线上直播介绍，“农民在更广阔的区域中争夺女性资源，打破了原来小区域的通婚规则”（王振和刘成良，2018）。通婚圈变化使适婚女性的选择增多，婚配竞争更加激烈，造成婚姻成本不断上涨。在部分职业媒人的婚配介绍中，女方家庭彩礼要价向更高水平看齐，致使彩礼价格不断提高，彩礼的互助属性和礼俗性质被削弱。

（二）高额彩礼的定价机制

1.职业媒人引导女方家庭多要彩礼。部分地区的职业媒人以盈利为目的，依靠彩礼抽成获得收入。在婚配过程中，这类职业媒人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引导女方家庭索要高额彩礼。一是抬高女方的自我认知，提高要价预期。职业媒人与女方会面时，往往会夸赞女方的条件，拔高女方自我认识，为提高彩礼要价做心理上的铺垫。二是抬高女性的家庭地位，增强要价的合理性。职业媒人介入男女双方彩礼议价时，通常会强调女方的家庭地位和经济能力，为提高彩礼要价埋下伏笔。三是提高女方的社会地

位，增加彩礼要价的可能性。职业媒人在彩礼定价时，会着重强调婚姻市场中女性资源的稀缺程度，强调现代女性的独立地位和自我意识，引导和培养女方的要价意识。总之，部分职业媒人依靠掌握的女方信息引导女方提高彩礼要价。

2.职业媒人引导男方家庭多出彩礼。部分地区的职业媒人获得收入的主要途径是男方的彩礼抽成。笔者的调查显示，平泉镇职业媒人收入包括彩礼的10%、女方支付的误工费和辛苦费。在婚配过程中，这类职业媒人会在三个阶段引导男方家庭多出彩礼。一是在婚配过程前，夸大婚配难度，为男方家庭支付高额彩礼埋下伏笔。职业媒人会强调婚配难度，降低男方家庭婚配预期，诱导男方家庭支付高额彩礼。二是在婚配过程中，减少男方的婚配次数，营造婚配困难的氛围，为男方家庭支付高额彩礼奠定基础。职业媒人将男方信息纳入信息资源网络，不进行循环配对，而是采取一天一个、一周一个等低频率配对方式，营造婚配困难的氛围。三是在彩礼议价和定价阶段，强调男方责任，提高男方家庭的支付意愿和动力。职业媒人在议价和定价环节，会放大女方优点，提高男方家庭支付高额彩礼的意愿；放大成婚的必要性和完成人生任务的重要性，增强男方家庭支付高额彩礼的动力。总之，部分职业媒人通过夸大婚配难度、减少婚配次数、强调男方责任和人生任务等方式，引导男方家庭支付高额彩礼。

（三）社会竞争的问题审视

在婚配过程中，职业媒人承担“议价人”和“中间人”角色。部分职业媒人会因彩礼抽成而隐瞒某些信息（李琼，2003）。“议价人”角色促使职业媒人利用手中资源，通过条件错配异化婚配竞争，通过市场错配异化彩礼竞争。这部分职业媒人具有抬高彩礼的动机，“中间人”角色使职业媒人对彩礼具有基础定价权，促使男女双方共同接受高额彩礼。农村婚姻市场的信息不透明和礼俗区隔，导致男方家庭往往只能通过熟人社会网络了解适婚女性。为精准匹配和提高婚配成功率，男方愿意带礼物、托关系寻求职业媒人的帮助。职业媒人的兴起似乎提高了婚配的选择余地，但实际上却可能放大婚配竞争，致使彩礼价格不断提高。部分职业媒人参与婚配、彩礼议价和定价过程，推动彩礼价格不断提高。虽然彩礼议价过程比较焦灼，但男方因接受不了女方家庭高额彩礼而放弃这门亲事的情形比较少见（王思凝等，2020）。高额彩礼给男方家庭带来巨大经济负担，但他们想要结婚就只能接受高额彩礼的现实。

六、结语

农村高额彩礼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根据其复杂的形成机制推进综合治理。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农村高额彩礼形成过程中，为什么女方家庭愿意抬高价格，女方家庭是如何抬高价格的；为什么男方家庭要支付高额彩礼，男方家庭是如何被“规训”的；职业媒人在高额彩礼形成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在“弱互助－强竞争”类型村庄，彩礼的互助属性比较弱，竞争属性偏强，致使农村高额彩礼现象频现。

本文构建“互助－竞争”分析框架，聚焦“弱互助－强竞争”类型村庄，从女方、男方和职业媒人等社会力量三个视角，分析高额彩礼如何形成。研究发现：农村高额彩礼是农村婚姻市场中男方、

女方和部分职业媒人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彩礼较高的农村地区，彩礼的归属机制决定彩礼的最终流向，决定高额彩礼问题的区域差异；彩礼的象征机制提高女方家庭的彩礼要价能力，推动彩礼与面子等挂钩而不断提高。彩礼的责任机制决定彩礼的支付动机，决定高额彩礼被男方“自我合理化”；彩礼的挤压机制导致男性婚配困难，抬高彩礼价格。彩礼的配对机制异化婚配和彩礼竞争，导致高额彩礼问题的治理阻滞；彩礼的定价机制推动彩礼价格提高，放大了婚配竞争与彩礼竞争。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通过举办集体婚礼、倡导零彩礼、出台强制性法规和政策条文等方式治理农村高额彩礼问题具有一定效果，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高额彩礼问题。本文认为，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综合治理。这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综合施策，夯实农村高额彩礼治理的社会基础，强化法治保障。要多措并举，将抵制高额彩礼纳入村规民约，充分发挥宣传标语、宣传栏、农村广播等传统媒体和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新兴媒体的矩阵效应，改变农村彩礼接受主体、支付主体和社会力量既有的高额彩礼观念，帮助男女双方家庭形成正确的婚恋观和彩礼观，树立抵制高额彩礼的集体意识和村庄共识。要强化法治保障，进一步修订治理高额彩礼的相关法律条文，依法严厉打击通过高额彩礼骗财敛财的各种行为。二是多管齐下，推动接受主体归属机制和象征机制的调整，约束女方家庭追逐高额彩礼的行为。要进一步完善治理高额彩礼的相关政策，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确女方接受彩礼的上限及其返还原则，构建彩礼归新人小家庭的政策。要构建约束女方家庭索要高额彩礼的非正式制度，树立以婚姻幸福代替彩礼高低、以家庭和睦和经营能力代替计算抚养女儿成本的文明乡风。三是多措并举，推动给付主体责任机制和挤压机制的调整，引导男方家庭抵制高额彩礼。要弱化男方父母对儿子成婚的代际责任，改变男方家庭竞争性支付高额彩礼的土壤。推动父代改变“帮助儿子娶媳妇是人生的最大任务”等观念和对“外地媳妇”的偏见，推动子代转变“完成父母期待的成婚和生育是人生的第一位任务”等观念。完善乡村养老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女方父母对稳定养老保障的预期。民政部门要主动担责，建立线上线下婚配平台，减轻农村适婚男性的婚姻焦虑。四是多策并用，推动社会主体配对机制和定价机制的调整，建立健全乡村职业媒人行为准则。要建立乡村职业媒人信息库，明确提出乡村职业媒人准入标准，倡导由德高望重的乡贤能人担任乡村职业媒人。要科学制定并适时出台《乡村职业媒人行为准则》，为乡村职业媒人提供基本行为遵循。强化乡村职业媒人的公益性，推动乡村职业媒人收入由彩礼提成向婚配成功次数转变。严厉打击乡村职业媒人诱导女方提高彩礼价格、哄抬彩礼价格等行为。

参考文献

1.蔡华、何长英，2022：《凉山彝族婚嫁“高额彩礼”问题研究》，《民族学刊》第 3 期，第 67-74 页。

2.陈秋盼、王海平、康丽颖，2018：《家庭帮衬：农村青年婚姻中高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分析》，《当代青年研究》第 5 期，第 48-53 页。

3.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2008：《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第 5 期，第 87-100 页。

4.杜姣，2017：《城市化背景下农村老人利他型自杀的形成机制分析——基于鄂中地区 S 村的个案研究》，《南方人口》第 2 期，第 50-61 页。

5.费孝通，2007：《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247 页。

6.弗里德曼，2000：《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38-40 页。

7.桂华、余练，2010：《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青年研究》第 3 期，第 24-36 页。

8.郝海波，2021：《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移风易俗和乡村社会秩序重塑——以河南省 N 县农村高额彩礼治理为中心的考察》，《治理研究》第 2 期，第 92-101 页。

9.郝建平，2010：《中国古代的媒人浅议》，《天府新论》第 4 期，第 123-127 页。

10.何倩倩，2021：《农村彩礼变动的两重分析：婚配性别比结构与代际责任》，《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第 120-127 页。

11.贺雪峰，2012：《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开放时代》第 10 期，第 108-129 页。

12.胡敬阳，2023：《彩礼的制度机理与国家规制》，《青海民族研究》第 2 期，第 118-125 页。

13.靳小怡、段朱清，2019：《天价彩礼源何来：城镇化下的中国农村男性婚姻成本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第 6 期，第 18-31 页。

14.李琼，2003：《婚姻合约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浙江经济》第 2 期，第 62-63 页。

15.李升、方卓，2021：《乡村婚姻支付的社会交换逻辑——基于豫东 F 乡高额彩礼的个案研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6 期，第 17-24 页。

16.李霞，2008：《民间习俗中的彩礼及其流变》，《民俗研究》第 3 期，第 253-262 页。

17.李永萍，2018a：《北方农村高额彩礼的动力机制——基于“婚姻市场”的实践分析》，《青年研究》第 2 期，第 24-34 页。

18.李永萍，2018b：《联合家庭再生产模式：理解低额彩礼的一种视角——基于粤北宗族性村庄的考察》，《当代青年研究》第 3 期，第 96-102 页。

19.李永萍，2022：《归属视角下农村低额彩礼形成的动力机制——基于赣南 G 村的田野调查》，《北京社会科学》第 1 期，第 120-128 页。

20.刘成良，2018：《因婚致贫：理解农村贫困的一个视角》，《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第 37-44 页。

21.牟敏娜，2023：《作为“保证金”的彩礼：婚姻契约视角下的江西农村彩礼研究》，《当代青年研究》第 4 期，第 78-89 页。

22.牟敏娜，2024：《支付还是契约？农村彩礼支付实践的类型化研究》，《中国农村观察》第 2 期，第 168-184 页。

23.宋丽娜，2010：《打工青年跨省婚姻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 1 期，第 64-68 页。

24.陶自祥，2011：《高额彩礼：理解农村代内剥削现象的一种视角——性别视角下农村女性早婚的思考》，《民俗研究》第 3 期，第 259-269 页。

25.田丰、陈振汴，2016：《农村青年结婚高额彩礼问题探析——以福建省大田县为例》，《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第 2 期，第 62-67 页。

26.王德福，2014：《变色的嫁衣：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农村彩礼习俗的性质嬗变研究》，《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2 期，第 26-30 页。

27.王敬、海莉娟，2018：《婚姻市场分层化与公共仪式市场化——陕西关中地区农村青年婚嫁的运作机制》，《中国青年研究》第 6 期，第 53-58 页。

28.王思凝、贾宇婧、田耕，2020：《“议彩礼”：论农村彩礼形成机制中的道德嵌入性基于甘肃 L 县的案例分析》，《社会》第 1 期，第 1-24 页。

29.王向阳，2020：《姻缘难觅：转型期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婚配危机及其解释——基于关中扶风 X 村的田野调研》，《兰州学刊》第 11 期，第 162-171 页。

30.王向阳，2021：《当前我国农村“天价彩礼”的产生机制及其治理》，《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5 期，第 37-46 页。

31.王振、刘成良，2018：《媒妁之言：宗族村落的媒人、彩礼与婚姻市场——基于赣南农村的调查》，《北京社会科学》第 12 期，第 105-113 页。

32.夏柱智、贺雪峰，2017：《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第 12 期，第 117-137 页。

33.熊凤水、慕良泽，2009：《婚姻偿付·婚姻资助·姻亲互惠——对农村婚姻支付实践的尝试性解读》，《新疆社会科学》第 1 期，第 101-105 页。

34.徐晓军、孙晓红，2021：《农村“倒贴彩礼”的发展逻辑——基于江汉平原北村的调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 3 期，第 117-123 页。

35.许琪，2015：《儿子养老还是女儿养老？基于家庭内部的比较分析》，《社会》第 4 期，第 199-219 页。

36.许琪、朱袁庆，2024：《同胞数量和结构对农村家庭彩礼支出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第 146-162 页。

37.阎云翔，2016a：《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172 页。

38.阎云翔，2016b：《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192 页。

39.杨华，2019a：《代际责任、通婚圈与农村“天价彩礼”——对农村彩礼机制的理解》，《北京社会科学》第 3 期，第 91-100 页。

40.杨华，2019b：《农村婚姻挤压的类型及其生成机制》，《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第 25-34 页。

41.杨华，2024：《农村高额彩礼形成的社会机制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第 2 期，第 1-15 页。

42.张艳霞、刘远冬，2024：《农村新生代青年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及其现实挑战》，《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第 163-180 页。

43.张翼、尹木子，2017：《村庄婚姻圈变迁及影响机制分析——以华北 F 村为例》，《北京社会科学》第 1 期，第 81-89 页。

44.朱战辉，2017：《农村彩礼性质的区域比较研究》，《当代青年研究》第 4 期，第 61-66 页。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High Betrothal Gifts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Mutual Assistance–Competition"

LIU Wugen　CHEN Dongliang
(College of Marxism,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ummary: Bridal price has historically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Chinese marriages. However, due to various reasons, in recent years, the amount of bridal price has been continuously rising in some rural areas of China, which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Currently,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high bridal prices in rural areas,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analyze the causes of high bridal prices in rural areas.Bridal price has the dual attributes of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mpetition. Based on the "mutual assistance–competitio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action logics of the three main bodies in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high bridal prices in rural areas.

The study find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ction logics of the main bodies in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high bridal prices in rural areas, high bridal prices in rural areas are jointly promoted and formed by the receiving main body, the paying main body, and social forces. As the receiving main body, the bride's family generates the demand for high bridal prices according to the ownership mechanism and symbolic mechanism of the bridal price. As the paying main body, the groom's family has the willingness to pay high bridal prices based on the responsibility mechanism and the pressure mechanism. Professional matchmakers, as social forces, use the matching mechanism and pricing mechanism to induce both the bride and the groom to increase the bridal price.To deeply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of high bridal prices in rural area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governance level of high bridal prices in rural areas, on the basis of further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high bridal prices in rural areas,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systematic thinking, adopt multiple measures simultaneously, promote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and implement comprehensive policies.

On the basis of steadily improving the overall level of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ly enhancing the social security level of farmers, improving the gender ratio structure in rural areas, and perfecting the rural marriage market system,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work especially need to be done well. First, adopt comprehensive policies to strengthen the social foundation and legal guarantee for the governance of high bridal prices in rural areas. Second, take multiple measures simultaneously to promote the adjustment of the ownership mechanism and symbolic mechanism of the receiving main body, and restrict the behavior of the bride's family in chasing high bridal prices. Third, take a variety of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adjustment of the responsibility mechanism and pressure mechanism of the paying main body, and guide the groom's family to resist high bridal prices. Fourth, make precise efforts to promote the adjustment of the matching mechanism and pricing mechanism of social main bodies, an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rural professional matchmakers.

Keywords: High Bride Price;Mutual Assistance–Competition;Marriage Market;Intergenerational Responsibility; Marriage Squeeze; Professional Matchmaker

JEL Classification: R20; Z13

（责任编辑：光　明）

联结、激活与整合：传播网络促进易地搬迁村庄公共空间重建的作用机制

李杜若　何志武

摘要：公共空间重建是易地搬迁村庄实现治理有效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传播网络是促进易地搬迁村庄公共空间重建的重要内生力量。本文以一个南水北调外迁移民新村为案例，探究传播网络促进易地搬迁村庄公共空间重建的作用机制。研究显示：“在地”传播网络方面，媒介化空间重现家乡的地方性精神和文化，唤起移民的身份认同；比邻而居的集中安置促进村庄内交流互动频率增长，通过仪式传播重建被搬迁重组打乱的各种关系勾连；“可沟通性”村庄中公共舆论传播既维护集体利益，又激发团结意识。“跨域”传播网络方面，移民新村与邻近的当地村庄之间的具身性传播是破除误解、祛除污名的重要渠道，推动安置地社会融合；一起搬迁至当地的“本处”村庄之间的组织传播，促进合作互助的形成；新村与老家之间的线上线下传播，建立起流动性的情感空间。“在地”和“跨域”的传播网络通过联结、激活和整合三种机制发挥作用，在村庄内外促进了新的邻里关系、人地关系、个人与集体关系以及跨村合作等关系的形成与深化，激发了易地搬迁村庄地方性知识、乡土文化、村规民约等活力再生，整合了当地政府、企业、村庄组织、传统权威、新意见领袖等各方力量，再造了易地搬迁村庄社会网络，从而推动了乡村公共空间重建。

关键词：乡村公共空间　传播网络　易地搬迁村庄　南水北调　移民

中图分类号：G206；C912.8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乡村公共空间与社区认同、社会秩序、社会融合关系密切，具有消除分歧、缓解紧张、达成共识、互惠合作、文化整合的社会功能（张良，2013），是乡村共同体得以形成与发展的纽带和载体（张诚，2024）。随着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乡村社会普遍面临过疏化、空心化等问题，乡村

［资助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村庄传播网络与乡村公共性重建研究”（编号：2023M731210）；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双一流创新团队建设项目“社会治理与公共传播创新团队”。

［作者信息］　李杜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电子邮箱：hkdldr@163.com；何志武，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电子邮箱：hezhiwu2001@hust.edu.cn。

公共空间呈现衰败、萎缩趋势，导致村庄集体记忆和社会关联日益淡化，易引发价值危机、文化危机、伦理危机和治理危机（张诚和刘祖云，2018），从而加剧乡村共同体的消解。因此，重建乡村公共空间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因脱贫攻坚、生态保护、灾害防范、大型工程建设等现实需要，中国产生了大量易地搬迁重建的村庄，易地搬迁改变了村庄所在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新村重建改变了村庄的外在形态和内部格局，空间的整体变迁对乡村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新村往往区位环境更佳、布局规划合理、村容村貌良好，为乡村公共空间重建带来新的契机。但新村的建成并不意味着乡村公共空间必然充满活力，一些地方在实践中过于重视物理空间的建设，过度追求整齐划一的外观和现代化的功能，忽视了村庄的社会空间、乡村文化及社会组织的重构与培育，公共空间反而更加衰落（冯健和赵楠，2016），不利于乡村治理与发展。易地搬迁村庄为观察、探索乡村公共空间重建问题提供了一种典型样本。当前，关于易地搬迁村庄后续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计发展、社会融入等传统移民研究主题，而以重建乡村公共空间、重塑乡村公共性为核心的易地搬迁村庄社会治理研究仍具有较大拓展空间。

乡村公共空间包含“空间性”和“公共性”双重内涵，其中，空间性体现物理属性，表现为公共场所及其物质形态；公共性体现社会属性，表现为空间与社会和人之间的关系（张诚和刘祖云，2018）。公共性是乡村公共空间的核心属性，也是乡村公共空间未来发展的重要原则和方向（张诚和刘祖云，2019）。重建易地搬迁村庄公共空间，不仅需要在物理属性上做好田地、房屋、广场、街道、会议室等场所实体的规划建设，更需要从社会属性上重建空间与乡村社会和人之间的勾连，要从空间中所包含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出发，厘清其独特的空间生产机制与表达方式（吴宗友和管其平，2024），从而再造村庄的公共生活、公共交往、公共文化和公共精神，重塑乡村空间的公共性。

要重建乡村公共空间，空间中各主体的公共交往与关系联结是关键，而这些交往与联结离不开各种媒介使用与传播实践。传播社会学认为，媒介与传播是构建社会现实、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力量（张杰，2024）。传播网络内嵌于乡村社会网络，具有沟通互动、关系联结和社会整合的功能，是易地搬迁村庄公共空间重建的重要内生力量。易地搬迁村庄中的传播主体（村民个人、农村家庭、村庄组织）与迁出地（原住地）、迁入地（安置地）、外流地（外出打工地）之间的传播实践复杂交织，通过重塑易地搬迁村庄“在地”和“跨域”的社会传播网络，可以实现安置地内外的关系整合，促进实体性公共空间和意义性公共空间的重建。

本文聚焦易地搬迁村庄的公共空间问题，以一个南水北调移民新村为案例，探索村庄传播网络如何作用于村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从而推进其公共空间重建。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三点：其一，本文将乡村公共空间重建问题置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易地搬迁和新型乡村社区建设的情境之中，探讨地理迁移、环境变化和乡村格局新建之下的村庄公共空间治理问题。当前研究多集中于快速城镇化、市场化背景下普遍存在的乡村公共空间衰落问题，对于易地搬迁重建导致的空间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型乡村公共空间的研究尚较为匮乏。易地搬迁村庄的公共空间问题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对探索中国乡村空间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其二，本文引入传播网络视角，搭建“传播－关系－空间－治理”框架，将乡村公共空间研究与社会治理研究相结合。学者对乡村公共空间的研究

从早期过度关注物理属性转向重视社会维度，但缺乏传播视角的研究。乡村社会中各传播主体在公共空间中通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进行公共交往、讨论公共议题、传播公共文化、建立关系联结，使得公共空间参与到乡村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建构和乡村公共性的生产中，这是强化村庄共同体凝聚力和归属感、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关键，值得进一步关注。其三，本文结合易地搬迁村庄传播实践和空间生产的特点，将其传播网络划分为“在地”传播网络和“跨域”传播网络两个子网络，并将其公共空间划分为核心层和补偿层两个层次开展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有利于揭示传播网络促进易地搬迁村庄公共空间重建的作用机制。

二、传播网络促进易地搬迁村庄公共空间重建的理论分析

（一）易地搬迁村庄公共空间重建

1.乡村公共空间重建。乡村公共空间的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学术界出现，涉及建筑、地理、管理、社会、旅游等多个学科，各学科的研究侧重有所不同。从乡村治理视角来看，对话、协商等公共交往活动及普遍认同的公共规则是整合乡村社会的重要途径，承载这些的公共场所就形成了公共空间（张良，2013）。因此，乡村公共空间是乡村社会中公众可以自由出入、进行日常交往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公共场所（曹海林，2005；李小云和孙丽，2007），是介于私人空间与国家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相对概念（王玲，2010），以相对固定和特定的空间形式展现（徐勇等，2002），既包括有形的物质空间，也包括无形的社会空间，还包括因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而兴起的虚拟公共空间（张诚，2024）。

明确乡村公共空间类别和功能特征，有利于重构乡村空间治理体系，进而构建有序的乡村空间系统（魏璐瑶等，2021）。西方学者对乡村空间的认识经历了从物质层面到社会表征，从客体性空间到主体性空间的发展过程（李红波等，2018），对国内学术界理解乡村空间有所启发。王春光等（2004）认为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由民间组织、社会舆论和民间精英等构成，并将乡村社会公共空间作为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曹海林（2005）依据国家权力渗透程度，把乡村公共空间划分为“正式的公共空间－嵌入型公共空间”和“非正式的公共空间－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两个层次，从而将公共空间演变与村庄社会秩序重构的内在逻辑相关联。

多数研究依据功能划分乡村公共空间。例如，李小云和孙丽（2007）将乡村公共空间划分为生活型公共空间、休闲型公共空间、事件型公共空间、项目型公共空间和组织型公共空间；张良（2013）根据公共交往类型及其相应的承载空间场所，将乡村公共空间划分为信仰性公共空间、生活性公共空间、娱乐性公共空间、生产性公共空间和政治性公共空间；张诚和刘祖云（2019）将乡村公共空间二分为传统乡村公共空间和现代乡村公共空间；魏璐瑶等（2021）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理论和“生产－生活－生态”可持续发展三支柱理念，将乡村公共空间划分为生产性公共空间、生活性公共空间和生态性公共空间。这种功能性的划分不仅有助于理解乡村公共空间的不同定位与作用，也为乡村规划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

中国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阶段与乡村社会的整体变迁相关联，分为传统乡村社会时期、行政干预乡村时期、乡村改革复兴时期、城乡快速流动时期和乡村振兴重构时期（魏璐瑶等，2021），经历了

“异化－复兴－衰落－迷失”的过程（王春程等，2014），其演变的核心在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乡村公共空间逐渐衰落，成因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促使大量乡村人口外流，亲密社群、村庄共同体不断解体（董磊明，2010）。其二，市场化的经济标准不断强化，削弱了互助合作的传统公共意识（宣朝庆和葛珊，2021）。其三，村落过疏化以及城镇化生活方式传播，导致了乡村公共空间萎缩（冯健和赵楠，2016）。这种空间衰落表现在双重维度：一方面，物理属性上表现为公共交往和公共活动减少，公共场所和公共资源凋敝（张良，2013；董磊明，2010）。另一方面，社会属性上表现为空间功能与形式脱节，公共空间的公共服务、情感寄托、文化教育等功能退化或消亡（张诚和刘祖云，2019）。这种空间衰落引发的多重影响体现在：公共空间的衰落会导致集体记忆减退、公共文化衰落（赵语慧，2015），还会引发公共舆论失语和乡村价值再生产能力式微（韩鹏云，2015），从而削弱村民对村庄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如何充分发挥乡村公共空间的功能，建设充满活力、具有公共性的“强社会”（贺雪峰，2023），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

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落已是学术界共识，要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促进乡村治理有效，重建乡村公共空间势在必行，且重建乡村公共空间、进行空间治理的核心在于其社会属性。这些结论为进一步开展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借鉴，但已有研究仍存在提升空间：一是对于因易地搬迁重建而空间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型乡村公共空间的研究尚显不足，二是缺乏传播视角的研究。

2.易地搬迁村庄的后续发展。中国的大国特征决定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应当是多元化的（苏红键，2022）。《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明确提出，“对位于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村庄，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搬迁的村庄，以及人口流失特别严重的村庄，可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生态宜居搬迁、农村集聚发展搬迁等方式，实施村庄搬迁撤并，统筹解决村民生计、生态保护等问题”[①]。易地搬迁村庄在政府主导下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是具有便利基础设施和现代化村庄格局的新型乡村社区。

尽管如此，易地搬迁在一般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叠加了“人为”的痕迹（施国庆和陈阿江，1999），且是一种“突变过程”（风笑天，2004）。在地理环境上，村庄大多从山区、水库、戈壁等地搬迁到距离城市较近的平原、盆地，不仅会对生产和就业产生影响，还引发了部分基于地缘的社会关系的断裂；在村庄形态上，较为分散的村落转变为集中连片的安置区，村庄之间的关系联结被打乱；在内部格局上，传统散落的房屋田地转变为整齐划一的社区化新村，村民居住形态的变革对生活习惯和邻里交往产生巨大影响。易地搬迁重建的过程冲击了村庄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从而为乡村公共空间重建带来新的挑战和契机。

当前，关于易地搬迁村庄后续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可持续生计研究，聚焦于移民的生计资本、生计转型过程及生计结果，探索易地搬迁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与路径。二是社会融合研究，侧重于易地搬迁移民在安置地的经济融合、社交融合、文化融合、心理适应等问题。这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人民日报》2018 年 9 月 27 日 01 版。

些研究为深入理解易地搬迁村庄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和理论支持。然而，当前研究整体呈现两个特点：其一，在分析单位上偏向于个体层面，即较多以移民个体的生存、适应、发展为研究视角，微观层面的成果相对丰富，但立足于村庄整体尤其是乡村公共空间层面的研究较为缺乏。其二，在分析视角上侧重于生计发展、社会融入等传统移民研究主题，对易地搬迁村庄社会治理的研究则相对不足，尤其是如何在新的社会结构和空间环境中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以实现更高效的社区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相关问题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易地搬迁固然对个体生产生活造成了直接影响，但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冲击了移民的社会系统，动摇了移民的根基和社会的结构（风笑天和王小璐，2004）。这种变化不仅涉及移民个体的适应问题，更影响了村庄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秩序与功能。因此，以村庄为单位，从移民社会系统整体视角出发，对乡村治理展开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与此同时，大规模的易地搬迁不仅是传统移民问题的扩大化，更是在乡村多元化发展原则下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重要举措，是中国乡村振兴长远规划中的一环。要实现移民的可持续生计发展、促进易地搬迁村庄的社会融合与和谐稳定，就必须将村庄重新组织起来，激活其内生性的团结力量。因此，以重建乡村公共空间、重塑乡村公共性为核心的易地搬迁村庄研究尚有较大空间和潜力，且对于改善移民个体的生活质量、恢复并提升村庄整体社会功能具有深远意义。

3.易地搬迁村庄公共空间特点和分类。随着地理位置迁移、村庄格局新建和社会融入推进，易地搬迁村庄公共空间表现出一些新特点：第一，标准化的物理空间。移民新村是按照一定标准统一规划建设的新型乡村社区，村庄内耕地、街道、广场、学校等布局规范合理，房屋形态整齐划一，展现出基础设施现代化、村容村貌整洁美丽的社区化风格。第二，高可达性的公共场所。搬迁前的村庄多位于山区、库区等地，村民居住较为分散，乡村公共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以村委会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分布状态（张诚和刘祖云，2019），且公共空间质量不高、使用率低。而移民新村居住较为集中，空间基础设施供给较为充足、功能使用便利，公共场所具有较高的可达性。第三，错位的空间认同感。尤其对于较远距离外迁的移民而言，移民新村是生活实体上的新家乡，但老家迁出地是心理上的家乡，村民对新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需要逐步建立。这种心理上的错位感在移民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会对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的实践产生一定影响。第四，现代型为主的公共空间。移民新村中，部分传统型公共空间被现代型公共空间所取代，例如，文化广场取代晒场，成为广场舞、秧歌舞等公共文化活动的组织场所，村民活动室取代水井边、大树下，成为村民聊天喝茶的交流场所等。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公共空间具备多种功能，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特点。第五，多元协同的共建主体。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为规划、搬迁、安置和新村建设提供保障，并引导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移民新村中的公共空间多由多元主体共同建设，一些公共场所的运营维护也由多方力量共同参与。

本文结合易地搬迁村庄的空间特点，将其公共空间划分为核心层和补偿层。核心公共空间是村庄内部建立的公共空间，包括公共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文化娱乐空间等。补偿公共空间是村庄外部形成的公共空间，包括在安置地内不同村庄之间以及新村与老家之间互动形成的兼具物理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空间，表现出情感性、流动性等特点，对移民新村内核心公共空间的功能形成补充。

（二）易地搬迁村庄的传播网络

1. 传播网络与乡村治理。传播不仅是信息传递、人际关系，还是结网成群、文化仪式、组织方式、社群归属等多种功能与意义的聚合（丁未，2018）。传播与治理具有天然的联系，传播是治理权力的来源，是治理过程的本质，也是有效治理的保障（费爱华，2011）。乡村场域中，国家政策的传达与落实、村庄组织的建构与运行、村民意见的表达与协商、乡村文化的传承与振兴、村民之间的交往与关系维系等都离不开各种乡村传播活动。例如，大众传播以其覆盖面广的优势使村民广泛接触政策信息，组织传播则依托体制性、权威性等特点确保政策信息的有效传播（郑亮等，2017），微信（群）能够搭建起散落在不同空间的村民之间的联系，发挥传承乡村传统文化习俗、营造乡村公共舆论以及唤醒乡村社会记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郭明，2019）。随着新媒介的快速发展和国家治理理念的转变，传播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越发凸显。

媒介和传播，不应仅被理解为技术和中介，还应将其视为情境和网络（孙信茹，2017）。传播网络是在特定的时空内个人、群体、组织等交流主体之间的一种信息流动模式，“内嵌”于家庭、邻里、社区等整个社会生活中（谭华，2018）。人类社会的传播网络金字塔自下而上分别是人内的、人际的、群体内的、跨群体的、组织性的与建制性的、全社会范围的公共网络（麦奎尔，2019）。传播网络具有一定的结构和稳定性（埃弗雷特，2002），借助于各种不同的传播网络，同一社区的人才能够形成共有的意义，这个社区才能够成为一个相对紧密的结构（吴飞，2007）。

村庄是乡村公共空间重建和村庄传播网络运行的基本单位。村庄传播网络是村庄社区内以共享意义的生产、流通和交换为核心的多层面的、动态的信息交流结构形态（姚君喜，2008），由多种关系、组织和规范密切交织而成，它不仅可以描述传播结构，而且可以用于揭示个人、群体、组织与乡村社区之间的动态建构关系，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动态的结构化意义（谭华，2018）。

当前的乡村传播学提倡以开放、动态的乡村传播系统和传播实践为研究核心，以传播学和行动研究为理论基础（李红艳，2008），批判以发展为导向、以媒介为中心、遮蔽农民主体性的范式（关琮严，2021），转向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视野、以社会人类学为路径、以乡村社会及其传播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取向（沙垚，2015；吴予敏，2018）。传播与乡村治理已成为乡村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传播实践与乡村的组织性、公共性、乡土团结等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已有的以传播（媒介）与乡村公共空间为主题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有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关注特定媒介或传播实践对乡村公共空间构建的作用，如微信群对乡村公共空间的重构（吴海琳和周重礼，2020）等。另一种是以乡村公共空间作为传播研究的主体，如探究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整体形象建构与传播路径（吴欣彦，2023）。

整体而言，虽然既有成果为进一步考察村庄传播网络与乡村公共空间重建提供了一定指引和参照，但关于传播如何作用于乡村公共空间重建的系统性研究还较为缺乏，且在研究视角上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关注大众媒介、社交媒体和人际传播的研究较多，但系统性考察村庄传播网络的研究较少。二是基于文化传播视角探讨乡村治理的研究较多，以传播与公共空间重建作为关注点的研究较为缺乏。三是以易地搬迁村庄的传播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较少。

2.易地搬迁村庄的传播网络特点和分类。相较于在一地扎根的传统村落，易地搬迁村庄的传播网络具有一些新特点：第一，在传播主体上，关系与空间脱钩，“在地”与“跨域”交织。易地搬迁使得乡村社会中传播网络疏密与空间距离远近之间的天然相关性被打破，一些原本具有“强关系”的传播主体在空间上呈现“跳跃性”。传播主体“在地”和“跨域”的传播行为复杂交织，伴随着易地搬迁村民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重建的整个过程，传播网络的结构和意见领袖也随之发生改变。第二，在传播媒介上，传统媒介被激活，具身性传播凸显。集中居住模式使得积分榜、告示牌等传统媒介获得了新的可见性（何志武和陈天明，2024）。文化广场、村民活动室、文化礼堂、农家书屋等提供了新的交往空间，且更多的就近务工机会使得乡村人口外流减少，促使乡村传播主体之间具身性传播活动更频繁、更充分。第三，在传播主题上，以社会融合、搬迁记忆讲述与认同追寻为重要主题。除了生产协作、生活互助、投票选举、人情往来、农技学习等常规性的乡村传播主题，易地搬迁村庄还呈现一些特有的传播主题。一是社会融合主题。例如，与陌生的邻村居民进行试探性的人际交往或事务合作。又如，参加安置地乡镇组织的文艺演出、节日庆典等文化交流活动。二是搬迁和老家主题。例如，邻里闲话时表达对老家的怀念、感叹搬迁的辛苦、畅想新村的发展前景。又如，在社交媒体上关注、转发和评论与老家或移民相关话题的媒介内容。三是身份认同和共同体认同主题。例如，通过开会和在线投票讨论决定新村的名字。又如，结合老家风俗、当地文化和新农村政策共同修改村规民约等组织传播活动的开展。易地搬迁村庄的传播主题与村庄整体的公共利益密不可分，公共性重建的逻辑蕴含其中。第四，在传播形式上，线上线下融合，多元传播交互。易地搬迁导致一些原本相邻、相近居住的亲戚朋友被分隔开，与亲戚朋友保持密切联系是移民的诉求。他们频繁通过打电话、发信息、视频聊天、微信群聊、抖音分享等形式强化线上的人际交往，还通过婚丧嫁娶的聚会、逢年过节的串门等传播实践进行信息分享与情感共享，推进线上线下的传播融合。

本文结合易地搬迁村庄传播网络的特点，将其传播网络划分为“在地”传播网络和“跨域”传播网络两个子网络。“在地”传播网络是易地搬迁村庄成员在村庄物理空间内互动所形成的传播网络，包括村庄内的邻里交往、日常闲话、文化活动、支部会议等。“跨域”传播网络包括安置地内移民与当地村民之间互动所形成的传播网络，一起搬迁至当地的“本处”村庄移民之间互动所形成的传播网络，以及以移民为传播主体、与迁出地老家之间多元传播实践和关系互动所形成的传播网络。

（三）传播网络促进易地搬迁村庄公共空间重建的分析维度

基于对易地搬迁村庄公共空间和传播网络的理论探讨及分类，本文搭建起传播网络促进易地搬迁村庄公共空间重建的分析维度。通过对这些分析维度的探讨，本文旨在揭示传播网络促进易地搬迁村庄公共空间重建的作用机制。

乡村公共空间是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承上启下的“接点”（颜德如和张玉强，2020），具有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社会整合、增进社会信任、培育公共精神、维护社会秩序等多重功能（张诚，2024）。此外，乡村公共空间承载着乡村的历史变迁，是村民集体记忆和乡土文化的载体，也是提升个体幸福感和归属感的重要场所（王勇和李广斌，2014）。有形的场所、权威与规范（包括内生与外生两个层面）、公共活动与事件、公共资源等四个方面构成了乡村公共空间的基本内涵，影响着村民的日常生

活与精神状态，形塑着村庄的价值体系，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村庄社会秩序（董磊明，2010）。然而，搬迁、重建的过程冲击了村庄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使得村庄社会秩序发生波动。因此，重建易地搬迁村庄公共空间，就要从物理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维度重新搭建起村庄内的关系勾连、构建起新的交往秩序、营造出充满活力的公共场域，从而有效推动移民新村治理体系的健全，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进而实现易地搬迁村庄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稳定。

如前所述，易地搬迁村庄公共空间表现出标准化的物理空间、高可达性的公共场所、错位的空间认同感、现代型为主的公共空间、多元协同的共建主体等特点。这些特点是由地理迁移、村庄新建、政策扶持、媒介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融入安置地社会结构、获取社会资本与情感支持，移民在安置地内村庄之间以及安置地与迁出地之间形成了独特的交往方式和关系勾连，从而促进了村庄外部公共空间的形成。因此，本文将易地搬迁村庄公共空间划分为核心层和补偿层。在乡村人口普遍外流、数字乡村建设全面推进、搬迁撤并实践多样化开展的当下，本文通过对补偿公共空间的研究，尝试拓展对乡村公共空间范围和功能的理解。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传播既能发挥政治认同和社区整合功能，也有利于乡村社会关联的建立、增进和调动，从而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和个人发展（费爱华，2011）。本文采用“去媒介中心化”的传播研究视角，关注乡村场域中村民个人、农村家庭、村庄组织等主体的各种传播实践，研究范围不仅限于看电视、读报纸、刷短视频、上网聊天等新旧媒介使用行为，还拓展到物质性媒介、具身性传播等视角，考察乡村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多元立体的互动传播实践。而且，本文以传播网络为视角研究乡村治理问题，探究易地搬迁村庄内外各主体传播行为背后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变化，将宏观的乡村社会问题与各主体微观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以内生性、地方化和参与性的视角进行考察，以系统化、整体性的思路加以思考。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相较于在一地扎根的传统村落，易地搬迁村庄的传播网络在传播主体上，具有关系与空间脱钩、“在地”与“跨域”交织的特点；在传播媒介上，展现出传统媒介激活、具身性传播凸显的特点；在传播主题上，社会融合、搬迁记忆讲述与认同追寻是其重要内容；在传播形式上，则表现出线上线下融合、多元传播交互的特点。

本文结合易地搬迁村庄传播网络特点，将其传播网络划分为“在地”传播网络和“跨域”传播网络两个子网络。易地搬迁村庄“在地”传播网络包括空间传播、仪式传播、舆论传播三个层面。村民个人、农村家庭、村庄组织等传播主体通过各种媒介载体，在村庄的社会、文化、政务等维度开展传播实践，在此过程中推进易地搬迁村庄内部社会认同构建、社会关系整合和社会结构再造，重塑乡村的公共生活、公共文化与公共舆论，从而在核心层推进易地搬迁村庄公共空间重建。易地搬迁村庄“跨域”传播网络包括安置地内具身性传播、一起搬迁至当地的“本处”村庄之间的组织传播、新村与老家之间的线上线下传播三个层面。移民迁入安置地后，在与邻近的当地村庄、一起搬迁至当地的“本处”村庄以及老家之间的交往和传播实践中，推进误解消除与社会融合，建立合作并积累社会资本，创造共同情感空间，重塑乡村公共交往、公共生产与公共情感，从而在补偿层推进易地搬迁村庄公共空间重建。

综上所述，传播网络促进易地搬迁村庄公共空间重建的分析维度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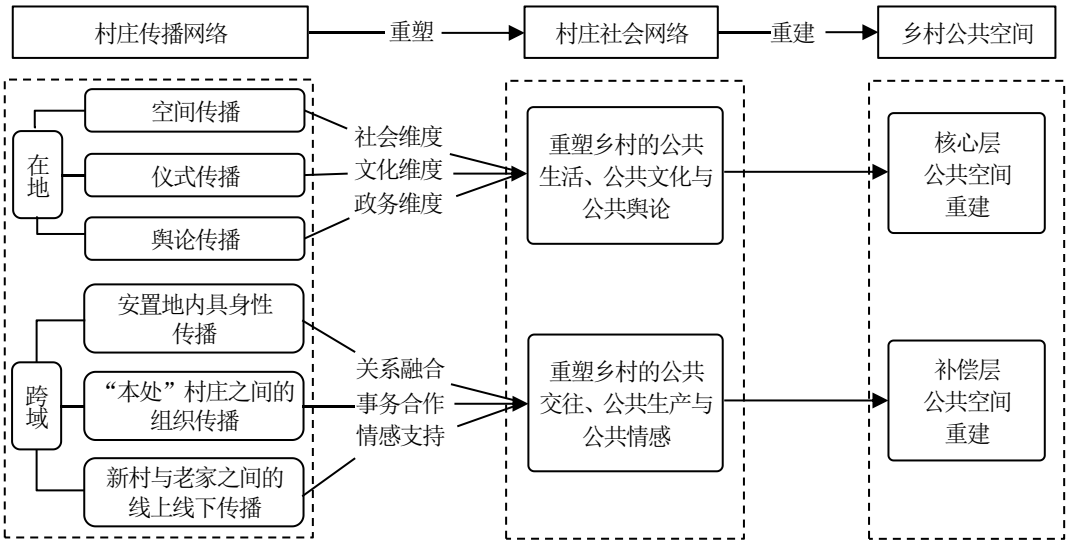


图 1　传播网络促进易地搬迁村庄公共空间重建的分析维度

三、研究设计

（一）案例选取

本文采用拓展个案法，以一个南水北调外迁移民新村——和顺园村作为研究案例。拓展个案法不强调个案的“统计显著性”，而是着眼于对“特殊个案”意义和独特逻辑的深入研究，进行理论抽象与重建，挖掘个案的深层次价值。与此同时，通过参与式观察，不仅可探寻研究对象的内部结构性张力，还能将其置于宏观的权力结构与历史性情境中加以考察，从而落实反思性科学的基本原则（布洛维，2007）。该方法规避了个案研究在特殊性与普适性、微观与宏观关系处理上的局限性，结合情景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和普遍性知识，实现从微观个案到宏观分析的跨越，被视作个案研究一般化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Small，2009）。

和顺园村位于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蒲山镇西南部，是该地区重要的移民新村。2011 年 8 月 17 日，村民从河南省淅川县大石桥乡杨营村搬迁至此，属于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第二批移民。和顺园村距南阳市区 6 千米，交通便利。全村共有 4 个村民小组 610 人；生产用地 840 亩，人均 1.4 亩；养殖用地 27.5 亩，人均 0.05 亩；建房 143 户；全村以传统农业种植为主，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在南阳市本地务工和“家门口”企业务工为主。

和顺园村属于因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产生的易地搬迁村庄，村民从丹江沿岸搬迁到距市区较近的平原，实行整村成建制搬迁，并采用就近外迁和有土安置的方式。作为统一建设的移民新村，和顺园村生活环境和空间格局较之原来的杨营村大不相同。该村的公共空间和传播网络呈现易地搬迁村庄的典型特征，乡村公共空间衰落与重建的各种因素在该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选择和顺园村作为本文的研究案例，能够深入探讨这些特征在移民新村中的具体表现。

（二）资料来源

本文遵循人类学乡村研究的“社区范式”，以“村落”为单位进行质性研究。笔者于2022年2月、2023年5月和6月、2024年1月先后赴和顺园村开展田野调查。首先，笔者通过参与式观察法和访谈法，深入了解移民新村公共空间中人际沟通、邻里交往和公共事务讨论等如何进行，节日民俗、演出庙会、婚丧嫁娶等文化仪式如何开展和传播，村民对移民搬迁的集体记忆如何讲述，村民如何使用手机、电视、广播等媒体，村庄里墙报、横幅、大喇叭等媒介如何发挥作用等，全面考察移民新村公共空间中的传播网络如何推进新的关系联结、组织运行与文化传播。其次，笔者通过网络民族志方法，加入该村不同主体创建的线上社交群组进行观察、记录和分析，并通过线上渠道对部分长期在外务工的本村村民开展访谈和观察，了解村民如何在线上线下进行交往、在新媒介环境下乡村文化如何传播，并思考这些传播实践对乡村公共空间的影响。最后，笔者通过文献法，收集并阅读《河南省移民志》《河南省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移民志》以及相关媒体报道资料，进行文本分析。此外，笔者访谈了当地移民局工作人员、邻村村民、附近工厂的工人等，补充相关信息。与此同时，笔者还对蒲山镇的刘家梗村、泉东村、杨营村等3个移民新村进行调研。

四、“在地”传播网络重塑与核心公共空间重建

移民搬迁后，村民面临生活方式、人际交往范围和文化活动形态等方面的改变。就乡村传播而言，集中居住使得沟通更加便利，既有助于村庄内人际互动，也使得传统媒介更具可见性；基于抽签抓阄的住宅安排打乱原有的邻里关系，既可能引发新的冲突，也可能带来新的交往和关系联结。基于这些新变化，村民通过多种传播实践适应并融入新生活，充分利用街道、广场等空间的媒介功能，积极调动并发挥空间传播、仪式传播、舆论传播的交往作用，深入挖掘村庄内线上社交群组讨论、开会协商等传播形式，重塑村庄内的社会传播网络。“在地”传播网络的重塑有利于调解空间冲突、整合村民关系，推动村庄内部沟通与互助的有序恢复，从而促进村庄内核心公共空间的秩序建立与活力再生。

（一）故乡再造：媒介化空间唤起认同

根据移民安置实施规划，移民新村应遵循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选择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质条件适宜、交通便利的地方建设安置点，并将每个移民新村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示范村[①]。和顺园村的村民的确享受到更便捷的交通出行、更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以及更多的务工机会。但是，将移民新村认同为“家乡”并完全适应新生活并非易事。就空间环境而言，大石桥乡与蒲山镇相距160千米；迁出地大石桥乡原杨营村位于丹江口水库边，青山绿水、物殷俗阜，村民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观念都与这片山水环境息息相关；而蒲山镇的主山“蒲山”则是碳酸钙含量超过90%的矿山[②]，当地支柱产业为水泥、石灰等建材生产加工业，工业气息较浓，自然环境一般。明显的空间差异阻碍了村民认

[①]《河南省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移民志》编纂委员会，2020：《河南省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移民志》，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第48页、第230页。

[②]资料来源：《蒲山镇》，https://www.hnzwfw.gov.cn/411303104000/detail.html。

同感的生成。村民在访谈中告诉笔者：

“自来水是方便，但我们以前在丹江里洗衣服，夏天冰冰凉的，冬天温乎乎的，现在自来水（冬天）凉得扎手。”（受访者：和顺园村的村民颜国春[①]，访谈时间：2022 年 2 月 7 日）

“（以前）漫山遍野都是宝，家里孩子闹肚子了、被猫抓了还是发烧了，或者老人头疼脑热了，我都知道挖什么草药。”（受访者：和顺园村的村民黎娇，访谈时间：2023 年 5 月 10 日）

“（新村）没什么不好，就是闷得很，我们是山里人，刚开始在这里很不习惯。”（受访者：和顺园村的村民于风超，访谈时间：2023 年 5 月 11 日）

为了让新家更具“家”的感觉，和顺园村的村民开展了一系列“重现故乡”行动。其中，门前街道景观的塑造展现了村民以物质性媒介作为文化符号和记忆载体，将公共生活空间媒介化，从而获得家乡认同感的过程。

和顺园村有五排住宅，住宅间有四条街道。在老家时，村民习惯在门前屋后种菜、养牲畜，既便利生活，又能增加收入。然而，这种旧习不仅会污染环境，还容易传播疾病。为了打造更洁净、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更美丽的村容村貌，新村在每家门前统一修建了花坛，要求村民统一种植与新村景观和谐一致的花草树木。

2011 年搬迁之初，镇政府统一为每户门前栽种两棵女贞树。据移民干部介绍，女贞树耐寒耐湿，四季常绿，十分适合作为当地绿化树。然而，库区群众有个口耳相传的忌讳：“前不栽桑，后不栽柳，两边不栽‘鬼招手’。”其中，“鬼招手”指的是白蜡树和白杨树，而女贞树和白蜡树较为类似，因而引发了村民的不满，这是镇政府始料未及的。经移民干部与镇上协调，2012 年，村民每户门前栽种的树木被换成了楝树。楝树生长速度快，但易空心、易折断，村民依然不喜欢。于是，村民借着修房子、换门等各种理由，渐渐将这些树砍伐了。

2012 年初，在附近经营果园的浩然集团为拉近与移民新村的村民的关系，不仅积极吸引村民前来打工，还向每户村民赠送两株葡萄藤。葡萄可以食用和酿酒，亦可贩卖获得收益，受到村民欢迎。村民纷纷自发种植葡萄。随着之前种植的楝树被砍伐殆尽，村委会于 2014 年开会决定，出资为 4 条生活街道统一安装葡萄架，这不仅为葡萄的种植和管理提供了便利，还有助于提升村庄的整体景观。

南阳市是全国最大的月季苗木繁育基地[②]，为打响南阳月季品牌，推动世界月季洲际大会申办，市政府号召周边乡镇栽种月季。月季作为一种颇受欢迎的观赏花卉，常被用于庭院装饰。葡萄种植主要占用上层空间，而门前花坛也非常适合种植月季。然而，之前女贞树、楝树的教训使得蒲山镇在移民新村推广月季种植计划时更加慎重，仅先向几户村民介绍种植计划并开展试种，不承想这次推广异常顺利。问及原因，村民表示：

“镇干部介绍说，月季脆弱、低矮，我们村的月季都嫁接了来自我们淅川大山里的香花刺藤，我听了觉得很亲切。”（受访者：和顺园村的村民刘又京，访谈时间：2023 年 5 月 13 日）

[①]本文案例涉及的所有人名均系化名。

[②]资料来源:《以花为媒 以节圈粉丨第二届世界月季博览会在南阳开幕》,https://www.henan.gov.cn/2024/04-29/2984974.html。

村民所说的香花刺藤也常被称为“山木香”，是比较粗壮的野生蔷薇，嫁接后的树状月季生命力强，存活率高，且更便于观赏。当地月季种植多采用此方法，一些村民对此感到骄傲：

“对我们来说漫山遍野的东西，城里人种月季算是个宝贝了。”（受访者：和顺园村的村民刘平新，访谈时间：2023 年 6 月 18 日）

“南阳的花嫁接上浙川的刺藤，就像来自库区最后扎根在蒲山的我们啊！”（受访者：和顺园村的村民蒋庆先，访谈时间：2023 年 6 月 19 日）

由于得到众多村民的认可，月季作为门前景观在和顺园村顺利推广开来。月季树下，村民又种上了从老家山上挖来的各种中草药——狗腥草、紫花地丁、蒲公英等。山里人对中草药有特别的情感，也具备一些中草药知识。与此同时，库区移民眷恋丹江水，许多人在移民搬迁时带上几块丹江石，在门前花坛里摆出各种造型，进出皆可赏玩。镇政府移民办看到草药、丹江石与月季花、葡萄架相映成趣，组成了独特的移民新村景观，也不再阻止村民自发种植、造景。

人的地方性社会认同与共同体情感需要特定的空间载体（吴宗友和管其平，2024）。通过访谈了解到，移民普遍怀念故乡的山水，他们常常讲起雷家泉、夜壶洞、大口井、石燕岭、石燕河、白坡庙、石膏窑及祖辈居住的丹江口，足见思乡之情。乡村公共空间物质变化的实质是社会制度、经济结构、价值观念等要素共同构成的“合力”的反映和投射（王春程等，2014）。从女贞树、楝树、葡萄到树状月季，再到草药和丹江石，政府、企业、村干部、村民等多元主体在乡村公共空间构建过程中从博弈到沟通，和顺园村的街道终于实现了统一和谐的公共景观与思乡情感表达之间的融合平衡。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和企业更加了解移民，移民也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

易地搬迁村庄中的空间媒介化传播实践，充分发挥了地方性知识的文化和情感功能，促进移民与新村之间产生新的人地联结，并有效调节与整合了当地政府、企业、村干部、村民等多方力量。村庄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中嵌入了能够维系地方性精神和集体记忆的物质性媒介元素，使得这些公共空间具备了传递身份信息、展示移民文化、表达思乡情感、进行社会互动的功能。乡村公共空间成为信息传播与文化展示的媒介，推动了村民地方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形成与强化。

（二）比邻而居：仪式传播重建勾连

培育和建构社区共同体意识是促进治理有效的基础，长期充分的互动交流会促进共同体意识增长（吴义东，2022）。移民新村集中居住的模式为互动交流提供了更多机会，有利于促进村庄内更紧密的关系联结和更广泛的合作互助，从而增强乡村公共性。

大石桥乡原杨营村有 9 个村民小组 2000 余人，而蒲山镇空间有限，单一安置点无法容纳所有移民。为此，移民局设计了相距不远的 4 个移民新村作为安置点。得知要拆分行政村后，原 1 组、2 组、6 组距离较近且杨姓家族的成员较多、关系密切，于是自发组成了移民新村杨营村；原 3 组、4 组、5 组共同居住在名为刘家梗的区域且以刘姓家族为主导，于是自发组成了移民新村刘家梗村；原 7 组、8 组、9 组分布在雷家泉以东的公路两旁，彼此较为熟悉，于是自发组成了移民新村泉东村。这些村民均根据自身情况选出了心仪的安置点。余下的一个安置点靠近集镇和市区，被认为与库区生活差别最大，村民普遍不愿意选择搬迁至此。而且，村民自发形成了 3 类安置意向，难以适配 4 个安置点。

为了协调这一问题，移民干部上门给村民分析利弊，动员村民自发报名。最终，来自 8 个小组的 500 余位村民报名组成了最后一个新村。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建议将新村命名为“和顺园”，希望大家和睦相处、顺利搬迁，得到了村民的欢迎。

为了确保公平公正，和顺园村的村民一致同意通过抓阄的方式来分配房屋，而非按照原先的家族、小组、近邻等关系来安排。由于安置地距离集镇和市区较近，和顺园的村民多在附近的工厂打工，在村人数比在老家时大幅增加。一同搬迁来的村民之间在房屋分配上的随机组合和在村人数的增多为村庄内部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契机。在此过程中，仪式传播在建立新的社会联系和日常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库区民风淳朴、乡土气息浓厚，村民较为注重婚丧嫁娶等仪式性活动，社交往来范围主要限于户族亲人和近邻。搬迁次月，和顺园村的村民程海喜得麟儿，定于农历八月二十送汤。程家本来只通知了家族内的亲戚和在老家时的朋友近邻，但集中居住的村庄中不仅信息传播速度快，而且搬迁重建的过程让村民内生出团结友爱的意识。送汤宴当日，村民几乎全体出动，自发上门帮忙。这场送汤宴成为和顺园村第一场“集体活动”。席间，年长者回忆集体化时期原杨营村 9 个小组在一起劳动的往事，谈论彼此家族之间的渊源，年轻人则交流生活经验、分享打工信息。多年后，村民依旧对当时的场景津津乐道：

“想着大家刚搬完家，都很忙，而且好多人都不熟，一开始没邀请多少人。后来不停加桌子，饭店派人买菜都来不及，还是村里人骑着三轮车出去买菜，帮着炒菜端菜，热闹得很！”（受访者：程海的母亲、和顺园村的村民郑一花，访谈时间：2023 年 6 月 22 日）

“我们以前不熟，搬来后和他家住在一排，看他们忙前忙后，想着以后是近邻了，就主动去帮忙了。”（受访者：和顺园村的村民董玉霞，访谈时间：2023 年 6 月 22 日）

“以前我们不是一个小组，没说过话，大老远搬迁不容易，以后在这儿我们这 500 人相依为命了，想着有娃子出生咋也得去看看。”（受访者：和顺园村的村民李小岭，访谈时间：2023 年 6 月 22 日）

“一开始犹豫去不去，后来看村里大家都去了，我也就跟着去了。”（受访者：和顺园村的村民杨爱国，访谈时间：2024 年 2 月 10 日）

搬迁后的“外来者”之感促使村民更加注重彼此之间的联结与认同。程家孩子的诞生为刚经历搬迁的村民提供了一个抒发情感的出口。集中居住的空间格局既加速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又拉近了村民的心理距离，促进了村民之间的互动与互助。这场送汤宴让稍显生疏的村民快速熟悉起来，也成为村民重建归属感的重要契机。

几个月后，村民鲁大河的儿子结婚。搬迁前他常年在县城做餐饮生意，与大部分村民并不相熟，甚少参与村庄事务。但他头脑灵活，待人热情，有了程家送汤宴的例子，他提前为全村人上门赴宴做好了准备。他还请教了村里的老“执客”[①]，结合库区传统民俗和国家对新婚俗的提倡，设计了一场

[①]“执客”在当地是指婚丧嫁娶仪式中帮助料理各项事务的总负责人。作为“执客”，不仅需要精通各类民俗仪式的流程，还要能够有效组织和安排相关人员、协调各项花销，有的“执客”还会兼任主持人或司仪。

将传统与创新融合起来的婚礼仪式。随着老“执客”退休，鲁大河成为村里最受信任的新“执客”，渐渐获得村民拥护，还曾当选为村支书。鲁大河就是借助仪式传播在乡村社会中的力量，从相对边缘的身份逐渐转变为移民新村传播网络中的意见领袖。

易地搬迁村庄中的仪式传播实践，激活了传统乡土文化中仪式性活动对村民关系的维系作用，加强了村民之间关系联结的强度，整合了传统权威、新意见领袖等多方力量。对于个人而言，重塑易地搬迁村庄的仪式传播网络，有助于消除搬迁带来的孤独感、迷茫感和被剥夺感，促进村民对新生活的适应并积累个人社会资本。对于村庄而言，重建仪式传播网络，有助于激活村民的文化民俗记忆和共同情感，促进被打乱的社会关系重新联结，推动乡村社会力量迅速成长，进而重建村庄内部情感紧密、关系融洽、团结互惠的公共生活空间。

（三）守卫田园：公共舆论促进团结

在乡村公共性普遍衰落的背景下，村庄公共舆论呈现去公共化趋势（吴理财，2012）。易地搬迁涉及移民个人、家庭及整个村庄的利益，如上文所述的村庄组织变更、安置地选址、房屋分配、新村命名等事务都需要在广泛征集意见、充分讨论后作出民主决策。在此过程中，村民的民主意识和公共意识被召唤、动员。搬迁完成后，村民还面临着重建生计资本、实现社会融合等挑战，迫切需要村庄共同体作为有力后盾来维护村庄社会秩序，并对违背村庄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强烈谴责，这在客观上增强了对公共舆论的需求。

易地搬迁村庄中，统一规划的公共空间（文化礼堂、会议室、广场等）和可见性强的公共媒介（电子屏幕、公示栏、大喇叭广播等）有利于公共信息的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集中居住使得负面信息的群体传播速度加快，从而对违背公共利益的行为产生更大的舆论压力。而随机组合的近邻既更加注重维护“面子”，又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减少了“害怕得罪熟人”的逃避心理。这都增强了村庄的“可沟通性”，促进村庄内传播由传统的静态式参与向新型的对话、沟通与交流的动态参与方式改变（严火其和刘畅，2019）。和顺园村在易地搬迁安置和新村生活适应过程中，公共舆论传播的道德约束作用得到充分激活，从而有力推动了乡村公共空间秩序的建立。

为节约土地资源并推动移风易俗，乡村地区一直在推进殡葬改革，提倡以火葬代替土葬。但是，火化后再土葬或者偷埋等变相土葬现象仍普遍存在，移民在库区生活时也不乏这种做法。搬迁后的第一年，和顺园村赵家一位老人去世，其家人按照传统方式请人相看风水，将老人葬在本村席姓村民的耕地上，并通过宴请和给红包等方式获得席家同意。第二年清明节，去世老人的子女以“养护坟地旁所种植的松树”为由，将坟地周围圈建起来，实质是想把这块“风水宝地”据为己有，并再次通过宴请和给红包等方式获得席家认可。

然而，赵家修坟占用耕地的做法渐渐引起村民的不满，相关讨论在公共空间中逐渐升级。和顺园村的中央区域为和顺园村党群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村部”）和文化广场，是村民日常活动的核心地带。清明节过后天气转暖，村民纷纷到广场上散步、下棋、跳舞、唱戏。到了“五一”节前后，村民开始收油菜，紧接着又忙碌于收麦子。农作物收割后，通常会被堆放在广场上晾晒，广场上因此聚集了大量村民。在此期间，随着赵家修坟占用耕地问题的持续发酵，此事逐渐成为广场讨论的焦点，吸

引了越来越多村民的关注。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村民普遍认为：在库区时，移民除了耕地外，还有河道落差地、山地[①]，且坟地多位于山上，并不占用耕地，而新村旁没有山地、河道，耕地总量是固定的，赵、席两家的做法实际上是侵占了全村的公共财产。这种不满情绪通过人际传播逐渐形成舆论压力。与此同时，在村部上班的村干部也可以听到广场上村民对此事的议论，村民也常常在村部门口甚至直接进入村部讨论此事。

麦子收获后要播种玉米，村委会雇请了农机手操作大型收割机和播种机统一作业，在微信群里与村民讨论作业价格、日期、面积等。搬迁前，耕地分散且多为山地，村民很少使用大型机械，而移民新村土地平整、集中连片，村民早已体会到机械作业的益处。有几位村民借着讨论雇请机械作业的契机，率先在微信群里表达了随意埋坟的坏处——随意埋坟会造成连片优质的耕地割裂，不利于机械化农业生产。村民在微信群里纷纷响应，并发起了关于埋坟问题的线上投票。玉米播种结束后，村干部多次召开会议组织村民进行协商，最终全村达成共识：以后本村人去世必须火葬，不得再侵占村庄集体耕地。搬迁 10 余年来，和顺园村再也没有发生过在耕地随意埋坟的事情，成为当地殡葬改革最成功的村庄之一。村民对此持有比较一致的看法：

“现在大家住得这么近，一家有人去世，全村都去帮忙，大家都眼睁睁看着你有没有抱骨灰盒回来。”（受访者：和顺园村的村民马长友，访谈时间：2023 年 5 月 20 日）

“虽然大家彼此之间有情谊，但涉及共同的土地可是大事，谁也不愿含糊。”（受访者：和顺园村的村支书李新军，访谈时间：2023 年 6 月 18 日）

从广场上的闲聊议论到微信群发言投票再到村民开会协商，易地搬迁村庄的公共舆论网络以维护村庄公共利益为最终旨归。这个公共舆论网络将传统乡村社会的村社理性、搬迁安置中被强化的主体意识与适应融入过程中的现实情况相结合，以村庄内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村规民约为评判标准，以村庄共同体内的全体成员为约束范围，通过人际传播、社交媒体和组织传播等形式进行表达与协商，能够在村庄内有关生产生活公共事务的公开讨论中发挥作用，并通过邻里、家庭、个人之间的传播反复施加影响。

易地搬迁村庄中的公共舆论传播实践，激活了传统乡村社会普遍衰落的“村议”功能，使公共舆论网络重新发挥道德评价和行为约束的作用。这种传播实践不仅加强了村民个人与村集体之间的紧密联系，还有效整合了乡村治理的内生性力量，促进了乡村社会的自我调节与管理。移民新村的集中居住模式和高可达性的公共场所，使得村民议事更加便利、高效（何志武和陈天明，2024），街道、广场、田间地头等都成为讨论公共事务、传播公共舆论的空间。公共舆论传播实践促进了村庄空间中公共性的增长和村民公共精神的培育，使得公共空间成为协商互动和监督对话的舞台，从而推动了村庄内部的团结观念和集体意识的再生。

[①]移民在丹江口的老家时，机耕地面积较少，但落差地、山地等土地在过去统计提留款和特产税时并未计算在内。这些土地可以拓展种植农作物，再加上村里房前屋后都可以种菜以及种桑树、橘子、柿子等，荷塘里可以种莲藕等，家里还散养着各种家畜家禽，这些种养殖活动都能够产生收入，故而移民普遍认为搬迁之后土地变少了。

五、“跨域”传播网络重塑与补偿公共空间重建

乡村公共空间并不仅限于村庄物质空间范围（李红波等，2018），也不只有本村成员出入和参与。对于易地搬迁村庄而言，乡村公共空间重建的实践在地域跨度上具有复杂性，不仅涉及移民新村与当地村庄之间的关系融合，还包含与一起搬迁至当地的“本处”村庄之间的互助，更涵盖与老家之间的往来。而这些“跨域”传播实践和关系构建不仅会促进乡村社会力量的增长，还能够创造新的公共交往空间、文化空间和情感空间。这些补偿公共空间的建立对于重塑村庄社会秩序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祛除污名：具身性传播促进安置地社会融合

易地搬迁后，移民群体常怀有“外来者”的防备心态，移民与当地村民之间难免存在文化误解。与此同时，集中安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移民与当地村民的交往意愿，阻碍安置地社会融合。这种情况对于移民个人提升人力资本、移民新村获得发展项目以及安置地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都是不利的。重塑易地搬迁村庄与安置地融合互动的传播网络，关键是要推进移民与周边村庄的“在场交往”，在具身性传播中破除双方的误解与排斥、促进信任关系的建立，充分发挥乡村公共空间的社会整合功能。

“污名”是使污名化客体被迫拥有破损身份，遭受社会排斥的过程（戈夫曼，2009）。作为特定地域文化的携带者和传播者，移民往往会遭受迁入地主流群体的歧视与排斥，其危害不仅在于阻碍移民的社会融入，还会造成移民心理上的焦虑感、隔离感和被剥夺感（刘有安，2009）。而移民群体出于自我保护的意识，以及为了提高自尊感，会对当地村民反向“污名化”。双向“污名化”会加深文化误解，阻碍社会融合，甚至引发矛盾冲突。

搬迁初期，与和顺园村相邻的周后王村的村民常用“山里来的”“爱闹事的移民”等代指和顺园村的村民，并对移民持有许多负面的刻板印象，而这些印象多来自捕风捉影的传闻和忧心忡忡的推测。周后王村的村民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表示：

“移民迁来前夕，附近的村庄都不敢种菜，很多种了菜的都赶在移民迁来之前收掉，因为听说山里来的移民喜欢偷菜。”（受访者：和顺园村新星小学教师、周后王村的村民李咏梅，访谈时间：2023年5月14日）

“据说他们爱打架、爱闹事，惹不起啊，（搬迁之初）不敢让孩子去他们村里玩。”（受访者：周后王村的村民王旗风，访谈时间：2023年5月15日）

和顺园村的村民对当地人也缺乏信任。搬迁初期，为了防止偷窃或袭击，和顺园村安排年轻人夜晚轮流巡更。和顺园村的村民根据发音，将周后王村的村民称为“猴王”或“猴子”。和顺园村的一位语文老师手书楹联——“猴山猴水猴入林，福天福地福扎根”，以表达对周后王村的村民“污名化”移民的回击。

“污名化”源于对“外来者”的防备心态，以及“外来者”与本地人之间的文化误解。其根本原因在于双方没有直接接触，没有真正互相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与当地村民之间具身性的传播实践渐渐展开，“污名化”也在此过程中渐渐消散。

搬迁后的第一个除夕，和顺园村的村民自发设计、排练了锣鼓曲[①]、“三句半”、扭秧歌、快板、豫剧、诗朗诵等十几个节目，在村庄的文化广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村晚”。蒲山镇许多居民前来观看，有些人甚至从十几千米外骑着三轮车带着老人和孩子赶来观看。“村晚”展示了库区的民俗文化和移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鼓舞了移民，也打动了当地村民。当晚的表演视频通过朋友圈、抖音、快手等平台广泛传播，并得到地方媒体报道，增进了当地人对移民的了解。

大年初一，和顺园村按照库区习俗开始“玩龙”，舞龙舞狮队在文化广场上敲锣打鼓、翻腾跳跃着进行表演。随后，和顺园村的村民争相“请龙”。“龙头”根据每位“主东家”（“请龙”的村民）的心愿说出不同的吉祥话，例如，对家中做生意的说“龙头抬一抬，恭喜发大财”，对家中有孩子要降生的说“今年生贵子，明年中状元”，对家中有司机的则说“请龙到门前，出入保平安”，龙的“玩法”也根据台词变换。周后王村的村民闻声前来，被热闹的氛围所感染。一位周后王村的村民也“请龙”到自家，并模仿移民的方式作为“主东家”招待围观邻居、打赏表演的村民。周后王村的其他村民看到后纷纷效仿。由此，两个村庄之间的陌生感被进一步打破。

易地搬迁村庄的新建广场相较于传统村落的广场具有功能齐备、空间宽阔、设施新颖等特点。“村晚”和“玩龙”活动举办之后，越来越多的附近村民到和顺园村文化广场散步、看锣鼓曲、跳广场舞。浙川人喜食酸菜，家家户户自己做酸菜。为表达友好，和顺园村的村民在广场上向周后王村等当地村庄的村民赠送酸菜，而周后王村的热心妇女也开始帮助年轻移民介绍本地对象。和顺园文化广场成为村民开展人际交往和文化互动并破除误解、增进了解、促进融合的公共空间。

村民之间的自发交往逐渐增多，镇上再次拨款组建和顺园村“文化宣传队”，为其采购服装、聘请指导、宣传报道。此后，镇上有商场开业、新人结婚也会邀请移民的锣鼓曲队和舞龙舞狮队表演。和顺园村“文化宣传队”渐渐小有名气。随着交往增多，和顺园村的村民与蒲山镇的当地居民之间合伙做生意或相互介绍打工资源、年轻人之间谈恋爱和结婚的情况都增多了，例如，上文提到的和顺园村的村民程海的父亲就经周后王村的朋友介绍，去了附近的养猪场打工。10 余年间，和顺园村先后有 3 位年轻人与周后王村的年轻人结婚。“污名化”在互动交往中完全消解。

通过各种传播实践，当地人加深了对移民群体的了解，浙川库区的民俗文化在此过程中得到展示，促进了区域文化碰撞和乡村文化繁荣。与此同时，移民社会网络的拓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积累了新的社会资本。对于绝大多数村民而言，具身性交往才是可感知的交往（何志武和陈天明，2024）。和顺园村和周后王村的村民之间具身在场的传播互动，真正打破了“据说”和想象中的刻板印象，避免了矛盾冲突，促进了移民的顺利融入和邻近村庄之间友好互助关系的建立。

易地搬迁村庄与当地村庄之间的多元传播实践，激活了村民开展公共交往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加强了移民与安置地的关系联结，有效促进了安置地的和谐安定与社会融合。村庄文化广场等场所为这些具身性传播提供了平台，发挥了社会整合的功能，进而成为充满活力的公共交往空间。

[①]浙川锣鼓曲是一种传统民间音乐，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民歌连缀说唱故事的形式表演，曲目内容多为劳动生活及爱情故事。

（二）分而不散：组织传播打通“本处”之间互助

除了村庄内部的住宅、街道、广场、村部等空间，村庄附近的集市、路口、茶馆、庙会等场所也可能成为村民交流思想、交易商品、协商事务的发生地，这些公共空间对乡村社会运作具有重要意义（罗亮等，2022）。而安置地（镇或乡）内的移民新村之间互动形成的公共空间便是这种类型。

对于乡村社会而言，关系疏密与空间远近通常呈正相关，即越邻近的村庄互动越多、关系越密切。然而，对于易地搬迁村庄而言，由同一老家搬迁至当地的村庄即使不相邻，也具有独特的亲近感。和顺园村的村民称这些村庄（刘家梗村、泉东村、杨营村）为“本处”，这一称谓便透露着“同出一脉”之意。“本处”村庄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血亲、姻亲、老邻居、老同学、同事、合作伙伴等。移民搬迁后必然面临一些困难，如适应当地饮食和气候、重新找工作、思念故乡等，这使得移民常常需要与“本处”村庄的亲人朋友互相帮助、互相倾诉。再加上淅川库区仪式性活动本就较多，民俗文化也与当地不同，更增加了“本处”村庄的村民之间联系往来的频率。在人际传播层面，和顺园村的村民与其他“本处”村庄的村民往来频繁，主要表现为平时串门聊天、参加红白喜事酒席、亲戚朋友聚会、一起做生意或合作打工、帮年轻人介绍对象、一起排练锣鼓曲等，在日常生活各方面保持密切交往。和顺园村的村民闲谈时经常提起“本处”村庄的亲人朋友：

“在老家的时候根本不会骑（电动）车，也不敢骑，速度太快了，让人害怕。到这边买个小电动车咬牙学了几天，因为平时要骑车去那3个村串门。”（受访者：和顺园村的村民颜歌春，访谈时间：2022年2月12日）

“我们村（锣鼓曲）论起能敲打的都有，但几个唱得都不太行，泉东村的张海涛和杨营村的杨丰川唱得好。我们闲了就凑一起唱唱，然后聊聊天。”（受访者：和顺园村的村民吴方宇，访谈时间：2023年5月14日）

“儿子是跑车的，想离市里近一些，拗不过他于是报名来了和顺园村，但我亲弟弟刘又章去了泉东村，有事我还得去泉东村找他商量，平时我也爱去他家吃饭。”（受访者：和顺园村的村民刘又华，访谈时间：2023年5月17日）

在组织传播方面，4个移民新村——和顺园村、刘家梗村、泉东村、杨营村作为独立的行政村，彼此合作、互相支持，通过各种形式构建起独特的互助网络。和顺园村的村支书告诉笔者：

“我们4个村的村干部经常在一起切磋，小半年总要聚一下。前几天还在和陈二哥（杨营村现任村支书陈明飞）取经，问问他们村办工厂的经验。”（受访者：和顺园村的村支书李新军，访谈时间：2023年5月16日）

4个移民新村中，杨营村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政府规划的建设用地统一分配在杨营村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归属权分属4个移民新村。2022年，杨营村通过上级移民扶持资金及自筹资金等方式建设了杨营移民产业园项目，产业园占地16.627亩，建设标准化厂房4座共计13000余平方米[①]。建成的

[①]资料来源：《南阳卧龙区：移民村“移”出村美民富新图景》，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307/18/WS64b64888a3109d7585e45691.html。

厂房按照“大招商、招大商”理念，引进了南阳德信行洲实业有限公司家用电器五金生产线建设项目、河南怀南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艾制品生产加工项目。杨营移民产业园项目是于2021年申报获批的，此后杨营村帮助其他3个移民新村申请资金。在其帮助下，刘家梗村于2022年获批产业园项目，和顺园村和泉东村于2023年获批产业园项目，这些产业园还在建设中。

移民新村建设初期，和顺园村、刘家梗村、泉东村、杨营村各有一所乡村小学，按照移民规划标准配备人员、建设校舍、提供设备。然而，随着出生率下降和一些村民的子女到市里上学，这几所乡村小学的生源都有所减少，出现生源分流、彼此竞争等问题。于是，4个移民新村商议合并学校。在镇政府指导下，因刘家梗小学人数最多、场地较大，将其作为中心小学，并开设了幼儿园，其他3所小学作为其分校，进行统筹安排。例如，2023年9月，随着和顺园村新星小学最后一名六年级学生毕业[①]，和顺园村新星小学的教师便合并到刘家梗中心学校工作。

杨营村和刘家梗村的广场较大，吸引了和顺园村和泉东村的村民前来跳舞。尤其是杨营村，在4个工厂组成的“蒲山镇移民产业园”前面的空地上修建了一个宽敞的活动场地，命名为“移民文化广场”。广场旁还开设了特色餐馆、活动室、KTV等，成为4个移民新村的村民都喜爱的公共娱乐空间。4个移民新村的村“两委”还商定每年春节一起联欢。在2024年2月8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晚上，4个移民新村联合在杨营村的移民文化广场举办了“2024年蒲山镇南水北调移民村春节乡贤团拜会”，由4个移民新村的村民小组推举乡贤参加。4个移民新村的村干部先进行总结讲话，表彰乡贤，感谢村民，随后请乡贤轮流上台发言，讲述村里的生活故事，发表自己对公共事务的看法，之后举行宴会，宴会后参会者一起唱歌、跳舞、放烟花。和顺园村的乡贤代表和村干部回村后，又向村民讲述了当晚见闻，引起了村民围观讨论，场面十分热闹。此后，很多村民在朋友圈和抖音平台发布了此次团拜会的相关内容，足见该活动对村民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人们在村庄社区里享受着“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滕尼斯，2020）。村庄是生活共同体、生产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等多位一体的有机组织。发生在村庄之间的组织传播既是有利于村庄内部正常运转的信息纽带，又使得村庄作为一个整体与外部世界保持良好互动、获得社会支持。

“本处”村庄之间的“跨域”传播实践，激活了传统乡村社会互助合作的意识和移民谋求发展的主动性，加强了安置地内村庄之间的关系联结，整合了人力、信息、文化等各种资源。4个移民新村协同开展的生产合作、办学合作以及一起组织的文娱活动、乡贤表彰活动等组织传播活动，与4个移民新村的人际传播实践共同构建起“本处”的传播网络，促进了村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使安置地内的易地搬迁村庄之间形成了合作互助的乡村公共空间。

（三）身离心至：线上线下传播再造情感空间

建立在血缘、姻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家人、亲戚和邻居，往往是乡村社会中人们最重要的初级社会关系。移民在搬迁前拥有相对完整的关系结构，能够从既有的社会关系中获取稳定的信息和资源，拥有较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王淼和严登才，2020）。然而，易地搬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关系

[①]该学生智力有缺陷，故单人成班进行授课直到其小学毕业。

网的成员失散。与此同时，搬迁带来的距离间隔和环境改变引起移民心理认同的错位，产生“我是谁”的“两栖”焦虑和“我与谁”的认同迷茫（吴宗友和管其平，2024）。一些移民经常性地返回老家走亲戚、看朋友、扫墓，甚至仅仅是回去看看故乡的山水，逛一逛曾经熟悉的街道。和顺园村的一位村民清明节回老家的事情就非常典型：

“父母都是在搬来之后去世的，葬在南阳了。但老家山上有爷爷们的坟，以前年年去看，搬来以后头两年还去过，中间几年因为父母生病、带孙子太忙了没回去。2020 年清明节的时候，我突然心里难过得厉害，就自己一个人坐个大巴回去，跟谁也没说，到老林家祖坟坐了一天，回来之后心里舒服多了。”（受访者：和顺园村的村民林采申，访谈时间：2023 年 6 月 21 日）

在传统乡村社会，村庄的地理边界、社会边界和文化边界高度统一（张诚和刘祖云，2018）。这种统一性使得村庄本身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整体。然而，随着外出务工常态化和数字乡村建设全面推进，乡村公共空间逐渐呈现开放、流动、多元的特点。而村民在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频繁往返以及在此过程中建立起的密切联系，推动了一系列流动性的情感空间的形成。例如，一些地方性节日成为移民回乡的重要节点，在这些节日期间，大量移民成群结队返回老家参加文化活动、走亲访友。这种公共空间虽然形成于移民新村之外，且具有临时性的特点，但公共活动常态化发生使得依托于物理性的某一具体场所开展的公共交往，成为村民之间联络情感、确认共同体关系的重要社会过程。正因如此，这种流动性和临时性的公共空间，尽管与传统的乡村公共空间有所不同，但依然是乡村公共空间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3 年 5 月 18 日，和顺园村的刘芳老太太迎来 90 岁大寿。鲐背之年，福寿双全，这对于村民来说是值得庆贺的大喜事。经过商议，由于刘老太太的 3 个儿子都在淅川县城上班，刘家最终选定回淅川县城办寿宴，请鲁大河做主持人和“执客”。刘家在大石桥乡原杨营村是大姓，被村民称为“一河刘家”[①]。刘老太太的主要亲朋好友分布在 4 个移民新村和淅川老家：刘老太太与丈夫居住在和顺园村，刘老太太丈夫的侄子侄女们居住在泉东村，刘老太太的娘家亲戚居住在刘家梗村，刘家以前的同组和近邻多居住在杨营村。寿宴当日，4 个移民新村的村民纷纷驱车前往淅川老家，有车的自驾，没车的则租用了几辆大巴，贺寿车队绵延不绝，场面十分壮观。宴会现场热闹隆重，儿孙们献花、唱歌、颂诗，村民也献上各有深意的礼物，在场者无不沉浸在欢声笑语之中。由于场地容量有限，或因在外打工未能到场的亲友晚辈则通过抖音直播观看贺寿仪式、进行互动。宴会是家庭与大家族成员及邻里朋友联络感情的场合，也是户族共同体再次得到确认并加固的场所（冯健和赵楠，2016）。尽管移民身处异地，但通过经常性地返回老家参加聚会，他们的家族共同体、邻里共同体和村庄共同体依然得到有效维系。而借助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媒介，线上的传播实践也起到增强移民与老家亲友之间情感沟通、弥补具身性传播不足的作用。

乡村的空间治理需要整合多空间的行动主体和治理资源，重点是重构以乡村社会为原点而延伸至异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吴宗友和管其平，2024）。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可促进村民产生一致的行动能力，

[①]大意是一条河两岸都是刘家人，形容刘家家族大、成员多。

使村民参与乡村公共空间建设成为可能（冯悦等，2021）。移民个体和移民家庭通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以及各种社交媒介使用，与老家之间进行线上线下的传播互动，构建起跨地域的以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为基础的新型传播联系形式与意义网络，并与安置地内的多元传播网络交互耦合，最终形成紧密协同、内外联动的社会传播网络。

易地搬迁村庄与老家之间的“跨域”传播实践，促使被物理空间区隔的关系继续保持甚至得到加强，整合了多空间的行动主体和治理资源。通过线上线下的传播实践，村庄实体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之间的一致性被消解，并产生新的实体性公共空间和意义性公共空间，进而建立起“跨域”的情感空间，起到凝聚共同体、整合社会关系、提供情感支持和丰富移民社会资本的作用。

六、结论与讨论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治理有效，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蕴含着重建乡村社会公共性的内在逻辑（王丽，2022）。乡村公共空间既是乡村公共性形成和存在的社会基础，也是乡村公共性实现的公共场域。根据社会空间统一体理论，社会变迁会塑造和建构空间形态，而空间形态转变也会对社会关系产生一定反馈作用（王春程等，2014），从而影响社会发展。因此，乡村公共空间治理不仅是重构乡村结构体系的必要举措，而且是乡村振兴和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魏璐瑶等，2021）。

易地搬迁村庄在较短时间内经历了空间的“破坏”和“新建”，其公共空间重建问题是普遍现象与特殊情境的叠加，面临新的契机、呈现新的特点。关注易地搬迁与移民新村建设对乡村公共空间的冲击与构建作用，可以为中国广大乡村地区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和实践启发。因此，以易地搬迁村庄为研究对象，探讨乡村公共空间的建设与治理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通过村庄调研和理论分析，本文研究发现：“在地”传播网络方面，媒介化空间重现家乡的地方性精神和文化，唤起移民的身份认同；比邻而居的集中安置促进村庄内交流互动频率增长，通过仪式传播重建被搬迁重组打乱的各种关系勾连；“可沟通性”村庄中公共舆论传播既维护集体利益，又激发团结意识。“跨域”传播网络方面，移民新村与邻近的当地村庄之间的具身性传播是破除误解、祛除污名的重要渠道，推动安置地社会融合；一起搬迁至当地的“本处”村庄之间的组织传播，促进合作互助的形成；新村与老家之间的线上线下传播，建立起流动性的情感空间。

无论“在地”还是“跨域”，易地搬迁村庄传播网络发挥作用的对象不外乎三者：空间中的人、空间中的规则和空间中的结构。

人是公共空间中的活动主体，要想重建村庄空间的公共性，就必须提升共同体内人与人之间互动交往的频率、强度和质量，这是村庄空间内进行对话协商、开展公共事务的主体性基础。在比邻而居的移民新村中，传播网络通过空间传播、仪式传播和舆论传播，作用于村民个人、家庭、邻里之间的交往互动，从而促进新的关系勾连；在移民新村之外，移民与当地村民、“本处”村庄的亲友和老家亲友之间的“跨域”传播实践，推动这些新老关系的建立或加强。

空间中的规则，即哪些要素能够在村庄空间公共性重建时发挥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易地搬迁村庄经历了地理环境、形态格局、组织结构等方面的改变，村庄内外的各种传播实践调动乡土社会的

传统文化、库区生活的地方性民俗以及搬迁所激发的民主意识等各种要素，并改变这些要素发挥作用的方式，推动空间中公共生活、公共交往、公共文化活动等的规则重塑。

空间中的结构，即在村庄空间公共性重建过程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强弱对比、互动方式与组成结构。搬迁重建的过程中，政府、企业、村干部、村民、媒体等主体协同合作。易地搬迁村庄内外的传播网络中，既有现代性力量的注入，也有传统权威的延续，还有新意见领袖的产生，促使各种力量之间的强弱对比和组合方式发生变化，从而形成重建乡村公共空间的内外合力。

因此，易地搬迁村庄传播网络在上述维度发挥作用的根本机制可归结为三种：联结、激活和整合。

第一，联结机制，即发挥易地搬迁村庄传播网络沟通交流、联系互动的功能，推动各种疏离、分散的关系建立联结。“在地”传播网络方面，媒介化空间传播使得移民与新村产生新的人地联结，仪式传播加强了被打乱重组的村民之间的关系联结，公共舆论传播促进了个人与村集体之间的紧密联结。“跨域”传播网络则增进了易地搬迁村庄与当地村庄、其他“本处”村庄和老家之间的关系联结。

第二，激活机制，即通过易地搬迁村庄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实践与媒介使用，使得部分沉淀、衰落的要素重新焕发生命力，从而激活乡村公共空间重建的内生性动力。“在地”传播网络通过空间传播、仪式传播、舆论传播等方式，推动了地方性知识、乡土文化和村规民约焕发活力并有效发挥作用；“跨域”传播网络通过在安置地内、“本处”村庄之间和新村与老家之间的传播实践，激发易地搬迁村庄村民的主体性、主动性和互助合作意识。

第三，整合机制，即整合易地搬迁村庄传播网络中各传播主体的力量和各种资源，形成重建乡村公共空间的积极合力。在易地搬迁村庄内外推动故乡再造、促进人际互动、讨论公共事务、祛除污名、开展“本处”互助和再造情感空间等传播实践的过程中，当地政府、企业、村庄组织、传统权威、新意见领袖等各方力量实现整合，推动多元主体的共建与共治。

总之，“在地”和“跨域”的传播网络通过联结机制、激活机制和整合机制，重塑了易地搬迁村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再造了易地搬迁村庄的社会网络，在物理属性和社会属性上重塑了乡村公共交往空间、文化空间和情感空间的新秩序，从而促进了易地搬迁村庄公共空间的重建。

参考文献

1.埃弗雷特，2002：《创新的扩散》，辛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 291 页。

2.布洛维，2007：《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 77-78 页。

3.曹海林，2005：《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村落公共空间——以苏北窑村为例考察村庄秩序重构的一项经验研究》，《中国农村观察》第 6 期，第 61-73 页。

4.丁未，2018：《“攸县的哥村”：一个城中村的媒介生活》，《开放时代》第 4 期，第 225 页。

5.董磊明，2010：《村庄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拓展》，《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 5 期，第 51-57 页。

6.费爱华，2011：《乡村传播的社会治理功能探析》，《学海》第 5 期，第 97-102 页。

7.风笑天，2004：《“落地生根”？——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社会学研究》第 5 期，第 19-27 页。

8.风笑天、王小璐，2004：《我国三峡移民研究的现状与趋势》，《社会科学研究》第 1 期，第 107-111 页。

9.冯健、赵楠，2016：《空心村背景下乡村公共空间发展特征与重构策略——以邓州市桑庄镇为例》，《人文地理》第 6 期，第 19-28 页。

10.冯悦、王凯平、张云路、李雄，2021：《乡村公共空间与场所依恋研究综述：概念、逻辑与关联》，《中国园林》第 2 期，第 31-36 页。

11.戈夫曼，2009：《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宋立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4 页。

12.关琮严，2021：《属性转移、边界消弭与关系重构：当代乡村媒介空间的转型》，《新闻与传播研究》第 4 期，第 57-72 页。

13.郭明，2019：《虚拟型公共空间与乡村共同体再造》，《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6 期，第 130-138 页。

14.韩鹏云，2015：《村庄价值世界嬗变与新农村文化建设方向》，《学术探索》第 2 期，第 100-105 页。

15.何志武、陈天明，2024：《因地制“仪”：新型农村社区的空间生产与乡村传播网络重构》，《编辑之友》第 1 期，第 75-83 页。

16.贺雪峰，2023：《乡村治理中的公共性与基层治理有效》，《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1 期，第 166-174 页。

17.李红波、胡晓亮、张小林、李智、袁源，2018：《乡村空间辨析》，《地理科学进展》第 5 期，第 591-600 页。

18.李红艳，2008：《乡村传播学概念解析——兼论乡村传播学与发展传播学之异同》，《新闻界》第 6 期，第 42-44 页。

19.李小云、孙丽，2007：《公共空间对农民社会资本的影响——以江西省黄溪村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第 82-97 页。

20.刘有安，2009：《移民文化适应过程中的“污名化”现象研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第 121-125 页。

21.罗苾、许泽港、陈翚，2022：《基于 CiteSpace 的国内乡村公共空间研究综述》，《南方建筑》第 2 期，第 11-21 页。

22.麦奎尔，2019：《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 6 版），徐佳、董璐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第 13-15 页。

23.沙垚，2015：《乡村传播研究的范式探索》，《新闻春秋》第 4 期，第 52-58 页。

24.施国庆、陈阿江，1999：《工程移民中的社会学问题探讨》，《河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第 23-28 页。

25.苏红键，2022：《村庄分类、农民收入与多元化乡村振兴》，载魏后凯（编）《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 202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273 页。

26.孙信茹，2017：《田野作业的拓展与反思——媒介人类学的视角》，《新闻记者》第 12 期，第 70-78 页。

27.谭华，2018：《乡村传播网络与共同体重建：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传播社会学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111 页、第 113 页。

28.滕尼斯，2020：《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71 页。

29.王春程、孔燕、李广斌，2014：《乡村公共空间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现代城市研究》第 4 期，第 5-9 页。

30.王春光、孙兆霞、罗布龙、罗霞、袁葵、张定贵，2004：《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对贵州省安顺市 J 村农村公共空间的社会学研究》，《浙江学刊》第 1 期，第 137-146 页。

31.王丽，2022：《善治视域下乡村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重构》，《行政论坛》第 3 期，第 99-104 页。

32.王玲，2010：《乡村社会的秩序建构与国家整合——以公共空间为视角》，《理论与改革》第 5 期，第 29-32 页。

33.王淼、严登才，2020：《丹江口水库农村移民社会关系重构及困境分析》，《人民长江》第 9 期，第 206-211 页。

34.王勇、李广斌，2014：《裂变与再生：苏南乡村公共空间转型研究》，《城市发展研究》第 7 期，第 112-118 页。

35.魏璐瑶、陆玉麒、靳诚，2021：《论中国乡村公共空间治理》，《地理研究》第 10 期，第 2707-2721 页。

36.吴飞，2007：《社会传播网络分析——传播学研究的新进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 4 期，第 106-113 页。

37.吴海琳、周重礼，2020：《微信群对乡村公共空间的重构——以 D 村“行政外生型”网络空间为例》，《河北学刊》第 4 期，第 178-184 页。

38.吴理财，2012：《乡村文化“公共性消解”加剧》，《人民论坛》第 10 期，第 64-65 页。

39.吴欣彦，2023：《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整体形象建构与传播路径》，《新闻爱好者》第 2 期，第 76-78 页。

40.吴义东，2022：《微治理：城市社区营造中的社交媒体实践——一项媒介人类学研究》，《新闻与传播评论》第 1 期，第 105-114 页。

41.吴予敏，2018：《“重构中国传播学”的时代场景和学术取向》，《国际新闻界》第 2 期，第 85-98 页。

42.吴宗友、管其平，2024：《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新乡村的空间分化及其治理转向》，《中州学刊》第 1 期，第 72-80 页。

43.徐勇、吴毅、孙龙、仝志辉、肖立辉，2002：《农村社会观察（五则）》，《浙江学刊》第 2 期，第 90-98 页。

44.宣朝庆、葛珊，2021：《村庄公共性再生产与祭祖活动公共化的蜕变——浙江省 G 村祠祭仪式考察》，《民俗研究》第 3 期，第 52-61 页。

45.严火其、刘畅，2019：《乡村文化振兴：基层软治理与公共性建构的契合逻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2 期，第 46-51 页。

46.颜德如、张玉强，2020：《“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 Y 村的空间治理实践》，《理论探讨》第 5 期，第 160-167 页。

47.姚君喜，2008：《社会转型传播学》，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第 148 页。

48.张诚，2024：《权力、资本与生活：乡村公共空间生产的三重逻辑》，《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第 153-163 页。

49.张诚、刘祖云，2018：《失落与再造：后乡土社会乡村公共空间的构建》，《学习与实践》第 4 期，第 108-115 页。

50.张诚、刘祖云，2019：《乡村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困境及其重塑》，《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第 1-7 页。

51.张杰，2024：《共识与共鸣：传播社会学的历史关切与未来进路》，《中国社会科学报》3 月 8 日 04 版。

52.张良，2013：《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败与重建——兼论乡村社会整合》，《学习与实践》第 10 期，第 91-100 页。

53.赵语慧，2015：《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困境与出路》，《中州学刊》第 9 期，第 83-87 页。

54.郑亮、尼罗拜尔·艾尔提、杜昱丹，2017：《新疆涉农政策信息乡村传播效果研究——一项基于两个维吾尔族聚居乡村的调查》，《新疆社会科学》第 1 期，第 141-146 页。

55.Small, M., 2009, “How Many Cases Do I Need? On Science and the Logic of Case Selection in Field-Based Research”, *Ethnography*, 10(1): 5-38.

Connection, Activation, and Integration: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s in Reconstructing Rural Public Spaces in Resettlement Villages

LI Duruo HE Zhiwu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mmary: Reconstructing rural public spaces is crucial for achieving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rural governance. Resettlement villages, particularly those established for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like the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offer a unique context for examining this proces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ommunication networks, with their inherent capacity for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building, and social integration, represent a vital endogenous force in reconstructing public spaces within these communities. Using a new village created for the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as a case study, we investigate how the village's communication network influences its social relations and structure, ultimately contributing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its public spaces. We analyze two distinct yet interconnected communication sub-networks: the "local" and the "cross-regional", and correspondingly, two levels of public space: core and compensatory.

Within the "local" communication network, mediated spaces foster a sense of shared identity by re-enacting local spirit and culture. The concentrated settlement pattern promotes the diffusion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ritual practices, re-establishing social connections. Furthermore, in "communicable" villages, the active dissemination of public opinion safeguards collective interests and cultivates a sense of unity. The "cross-regional" communication network operates on a broader scale. Embodie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resettlement village and neighboring local villages helps to dispel misunderstandings and dismantle "stigmas", fostering social integration within the wider resettlement area. Inter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among resettlement villages complements this process, encouraging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Finally,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between the resettlement villages and their original hometowns create a fluid emotional and cultural space that transcends the limitations of physical public space.

Consequently, the "local" and "cross-regional" village communication networks operate through three interconnected mechanisms: connection, activation, and integration. "Connection" facilitates the formation of new relationships (e.g., neighborhood ties, human-land relationships, individual-collective bonds, and inter-village cooperation). "Activation" stimulates the revitalization of local knowledge, traditional culture,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the residents' sense of agency. "Integration" brings together diverse actors, including local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village self-organizations, traditional authorities, and emerging opinion leaders. Through these mechanisms, the communication networks within resettlement villages reshape the social fabric,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robust and meaningful rural public spaces.

Keywords: Rural Public Space; Communication Network; Resettlement Villages;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Immigrant

JEL Classification: Z19

（责任编辑：王 藻）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研讨会暨第二十届全国社科农经协作网络大会”会议综述

刘鑫开　于元赫

2024 年 12 月 6 日至 8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城乡发展一体化智库、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丽水学院主办，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研究院、中国（丽水）两山学院承办的“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研讨会暨第二十届全国社科农经协作网络大会”在浙江省丽水市顺利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农村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省（区、市）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及丽水市委、市政府等单位的 100 多名专家学者、政府干部参加了会议。本次大会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及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系统探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工作经验及其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在本次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主任黄承伟，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黄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部长叶兴庆，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钱文荣等，分别就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深化农村改革等重大问题作了主旨发言；此后，全体参会人员围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现代化”等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现将与会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千万工程”的实践发展与工作经验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学习运用浙江省“千万工程”经验，有利于新时代新征程走好乡村全面振兴道路，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围绕“千万工程”的发展历程、工作经验和实践推广，与会专家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作者信息] 刘鑫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电子邮箱：liuxinkai@ucass.edu.cn；于元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电子邮箱：yuyuanhe@cass.org.cn。

（一）“千万工程”的发展历程

学者们认为，浙江省“千万工程”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演化阶段。

1.以“千万工程”引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阶段（2003－2010 年）。2003 年 6 月，浙江省印发《关于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通知》[①]，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重点，选取一万个左右的行政村开展全面整治工作，并筹划建成一千个左右的全面小康示范村。2003 年 7 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作出“八八战略”的决策部署，要求浙江坚持走城乡一体化和绿色发展道路。2008 年，新一轮“千万工程”开始实施。相较以往，本轮工作整治范围有所扩大、整治内容有所拓展，是浙江省推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农村民生全面改善、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②]。

2.以打造美丽乡村为重点的“千村精品、万村美丽”阶段（2011－2020 年）。十年间，浙江省连续印发《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2011－2015 年）》《浙江省深化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等文件，形成了以县域建设规划为龙头，村庄布局规划、中心村建设规划、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规划、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规划为基础的“1+4”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体系。在此阶段，浙江省有效促进了域内乡村的科学布局、生态宜居、增收宜业、治理有效和风气文明，最终使得九成以上村庄达到新时代美丽乡村标准，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了有益的地方经验。

3.以探索未来乡村建设为重点的“千村未来、万村共富”阶段（2021 年至今）。2022 年 2 月，浙江省正式印发《关于开展未来乡村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要“以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为建设方向”，集成“美丽乡村+数字乡村+共富乡村+人文乡村+善治乡村”建设[③]，并提出到 2025 年全省建设 1000 个以上未来乡村的目标。2023 年 6 月，浙江省印发《关于坚持和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全面打造乡村振兴浙江样板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7 年基本建成乡村振兴样板区，到 2035 年全面建成乡村振兴样板区的目标[④]。2024 年 11 月，浙江省通过了全国首部“千万工程”专项法规《浙江省“千万工程”条例》，将“千万工程”的工作经验成功转化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制度性成果[⑤]。

（二）“千万工程”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与推进机制

与会专家认为，把握好“千万工程”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与推进机制，是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核心要义，对于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而言，意义深远、价值重大。

1.“千万工程”的发展理念。“千万工程”的发展理念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黄承伟将其概括为：秉承人民至上根本立场，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党建

[①]《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通知》，《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2003 年第 24 期。

[②]《赵洪祝：扎实推进新一轮“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https://www.gov.cn/gzdt/2008-07/26/content_1056343.htm。

[③]《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未来乡村建设的指导意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2022 年第 9 期、第 10 期。

[④]《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坚持和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全面打造乡村振兴浙江样板的实施意见》，https://www.zjsjw.gov.cn/toutiao/202310/t20231013_20860287.shtml。

[⑤]《浙江省“千万工程”条例》，https://nynct.zj.gov.cn/art/2024/12/15/art_1229564739_2538908.html。

引领乡村治理能力持续提升，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走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千万工程”，坚持人民至上、农民主体，走共建共治共享道路，创新驱动未来乡村建设，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化“绿色浙江”为现实，成功彰显新发展理念的实践伟力。“千万工程”，从环境整治出发，不断深化拓展，达成农村人居环境深刻重塑、城乡融合发展深入推进、乡村产业蓬勃发展、乡村治理效能有效提升和农民精神风貌持续改善等成就，成功塑造乡村领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全面振兴格局。“千万工程”，始终在乡村工作各环节贯彻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不断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全面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为新征程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可循案例和地方智慧。与会专家强调，要深刻认识“千万工程”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动实践载体的特征，进一步领会蕴含其中的发展理念，并精准把握“千万工程”的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

2.“千万工程”的工作方法。工作方法是指为达到一定目的或完成一定任务而采取的途径或措施，理清“千万工程”工作方法，关键要总结好“千万工程”的工作体系和工作着力点。《浙江省“千万工程”条例》提出“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工作体系，明确“人居环境提升、乡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优享、文化保护传承、村庄治理优化”的工作条目。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这五大条目构成了“千万工程”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实施路径，而“千万工程”的工作方法，正是通过党建引领强化组织保障，政府主导发挥政策引导与资源调配作用，农民主体激发内生动力，社会参与拓宽资源与发展渠道，实现各项任务的有机整合、协同推进。在此过程中，依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的实施方案，确保各项任务精准落地，最终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崭新画卷。

3.“千万工程”的推进机制。机制是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者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洞察“千万工程”的推进机制，关键要把握好工作模块有效协同和工作方法高效执行的规律与原则。对此，黄承伟提炼出“千万工程”统筹推进、守正创新、分类施策、久久为功、层层抓落实的五大推进机制。以“1+4”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体系为例，促进工作任务和治理主体的联动与协同，既要全局统筹资源，系统推进各项措施，也要尊重乡村差异性，分区分类、精准施策，并进一步贯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等四部门关于“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政策落实”的要求[①]，健全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直接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保障机制。此外，强化“千万工程”工作体系执行效能，还要守正创新、勇于开拓，持续挖掘乡村发展新动能，同时久久为功，不断丰富建设内涵、拓展建设领域、放大建设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从局部示范向全域共富迈进。

（三）“千万工程”的有序推广

以发展理念统领全局，以工作方法落实理念，以推进机制保障执行。总结推广“千万工程”经验，各地要深入领会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打好乡村全面振兴漂亮仗。近年来，各地积极学习、有序推广“千万工程”经验，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取得了显著的建

[①]《中央财办等部门印发〈关于有力有序有效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的指导意见〉的通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307/content_6890255.htm。

设成效。

1.以“三个乡村”统筹推进作为总体框架和重点任务。总体来看，各地主要以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这“三个乡村”的统筹推进作为推广“千万工程”经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总体框架和重点任务。黄勇指出，贵州省围绕提升“三个乡村”水平等目标，以“四在农家·和美乡村”建设为载体，逐步解决衔接滞后、城乡藩篱、要素缺乏、投入不足等难点和堵点。黄承伟指出，四川省通过产业“集聚发展”“建圈强链”促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通过人居环境改善等措施有力推进乡村建设工作，依托“三位一体”乡村共治体系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储昭斌和宛睿指出，安徽省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以产业发展富民强村，以规划分类指引村庄建设，以“三治融合”体系形成乡村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做好 2024 年及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要“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提升多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多村建设水平、提升多村治理水平为重点”[①]。因此，要持续探索“三个乡村”的推进路径，将“千万工程”经验不断转化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思路办法和具体成效，奠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坚实基础。

2.积极运用城乡融合发展的有益经验。各地在积极推广“千万工程”的过程中，也较为注重运用“千万工程”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的有益经验。宁夏社会科学院宋春玲指出，宁夏回族自治区围绕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基础设施共建共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产业协同融合发展四个方面，推出二十四条举措，着力加快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郭跃文和邓智平指出，2022 年以来，广东省以“千万工程”为榜样，举全省之力推进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努力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短板。福建社会科学院马晓红指出，福建省坚持走“县域统筹、以城带乡、城乡融合、一体推进”道路，实施“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乡村发展势头良好、动能充足。

此外，与会学者还分享了青海、陕西与河北等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实践探索。整体而言，各地已经形成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热烈氛围，彰显了“千万工程”经验对于描绘乡村美丽图景、指引乡村全面振兴、塑造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价值。

二、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治理是乡村运行的基石，涉及乡村全面振兴工作的方方面面。与会学者围绕浙江省农村改革发展的实例和经验，探讨其对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构建党建引领多方协同乡村治理格局

“千万工程”实践过程中，浙江省逐步构建了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为基础、各类

[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人民日报》2024 年 2 月 4 日 01 版。

村级组织互动合作的乡村治理格局，完善了“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工作体系，涌现一大批以乡村善治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典型案例。

1.党建引领是乡村治理的前提和关键。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水平持续提升是“千万工程”的重要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基层工作的全面领导，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质量，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①]。浙江省安吉县余村作为“两山”理念的诞生地，其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党建引领的重要性。余村的生态环境曾因长期开采矿山遭到严重破坏，“千万工程”建设期间，余村党支部联合环保、农业等部门，果断关闭矿山与水泥厂，逐步修复当地生态环境；同时，余村党支部与旅游企业积极合作，大力发展生态旅游项目，成功将余村打造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这一实践表明，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承担引领各主体发挥自身优势与功能的责任，保障资源整合、政策协同、项目合作的有序有效，进而实现基层治理工作的联动联通，形成党建引领多方协同的良好治理格局。

2.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是乡村治理的必然选择。乡村治理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涵盖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诸多内容。唯有推动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才能稳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推动乡村整体发展。黄勇指出，塑造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格局，关键要明晰各主体的角色与职责：政府负责制定建设规划、提供政策支持、引导资金投入等；企业负责投资兴业、带动就业、提供技术支持等；社会组织负责提供技能培训、法律援助等服务；农民则以核心主体的角色参与乡村治理的各个环节。

3.妥善协调利益关系，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妥善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关系至关重要。黄勇强调，只有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并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经济激励，才能处理好现代乡村中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因此，要进一步学习“余村模式”等乡村治理范例，通过明晰利益分配原则、完善利益分配机制、构建信息共享平台、定期开展沟通协商等措施，打造“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充分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最终凝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合力。

（二）走“三治融合”乡村治理道路

叶兴庆指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是浙江省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探索成果，已经普及推广至全国各地的乡村工作中。2019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也要求，“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促进“乡村社会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②]。

1.“三治融合”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必然选择。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何剑与王建兵指出，乡村不可避免地存在因收入差距拉大、政策覆盖不均、土地与房屋财产纠纷等因素引起的各类

[①]《习近平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920/c64094-31867961.html。

[②]《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6/23/content_5402625.htm。

矛盾。几十年来，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坚持走“三治融合”道路，从“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将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基层。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成为浙江省推动基层共建共治共享、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一张金名片。

2.巩固农民主体地位，让自治成为乡村运行的基本依托。村民自治，就是让“村民的事村民议，村民的事村民定”。因此，把乡村治理的权力真正交给农民群众，就是乡村有效自治的核心要义。以浙江省象山县的“村民说事”为例，通过“说、商、办、评”四个环节，赋予群众参事议事权力，在“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的过程中，让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真正激发乡村治理的内生活力，真正实现乡村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3.以法治提供行为准则，确保乡村治理规范有序。与会专家认为，应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建设”“提升基层党员、干部法治素养，引导群众积极参与、依法支持和配合基层治理”[①]。要学习枫桥镇大力投入法制宣传教育的做法，完善乡村普法教育体系，培育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思维。同时，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②]，使基层成为社会稳定的“压舱石”。

4.既塑形也铸魂，促进乡村德治“春风化雨”。黄承伟指出，坚持“塑形铸魂”是“千万工程”的重要经验。通过强化农民道德素养、改善农民精神风貌，走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的德治之路，为乡村自治、法治提供有力的价值支撑。与会专家强调，基层党组织要带头加强党风政风建设，并深入开展“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主题宣讲活动；同时，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凝心铸魂，强化正向引导激励，加强家教家风建设，扎实推进乡村移风易俗，维护好乡村的公平正义和公序良俗。

（三）繁荣发展乡村文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③]。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将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列为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四大任务之一。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繁荣发展乡村文化不仅是塑形铸魂、乡村德治的有效路径，更是丰富人民生活、传承乡村文明、赋能乡村发展的重要桥梁。

1.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满足农民群众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关键要落实《决定》关于“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的要求。浙江省的相关案例较多：庆元县月山村连续四十多

[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人民日报》2021 年 7 月 12 日 01 版。

[②]习近平，2021：《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求是》第 5 期，第 4-15 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 年 7 月 22 日 01 版。

年开展“村晚”活动，被誉为“中国式乡村过年之文化样本”；江山市二十余年来坚持举办新春“村运会”，目前已经发展成为“百村万人”参与的体育盛事；浙江省开展未来乡村建设，配置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乡贤馆、百姓戏台，推动县级图书馆、文化馆在乡村设立服务点；等等。总结而言，通过“村”字号文化活动品牌建设、优质资源下乡、文化设施建设等措施，不断丰富并创新文化供给的形式和内容，是提升广大农民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2.以文旅融合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文化保护传承”是“千万工程”的重要工作条目，以文旅融合传承乡村文化、发展乡村产业是“千万工程”的典型做法。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乡村是农耕文明的主要载体，流淌着中华文明的重要血脉，促进乡村文化不断焕发新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决定》提出，要“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而浙江省正是以文旅融合深入挖掘乡村文化符号、盘活乡村文化资源，实现社会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典型地域。丽水学院李莉指出，“千万工程”建设期间，浙江省莲都区沙溪村结合本土畲族文化，打造地域文旅品牌，建设畲族风情旅游福地；浙江省平阳县厚垟村传承瓯越水乡文化，打造初见厚垟、古街追忆、沉香丛堂、书院文创街等沿河产业带，成功吸引大批游客到访。与会学者研讨认为，文旅融合是兼顾文明传承和乡村发展的好路子，可以将其进一步推广至其余有条件的地方，在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中为人民谋福利、增福祉。

三、全域共富的基本观点与战略选择

共同富裕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应然、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中央明确提出 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以及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与会专家认为，必须秉承全域共富理念，建立常态化帮扶长效机制，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确保共同富裕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一）全域共富的基本观点及先行探索

1.全域共富的基本观点。魏后凯指出，全域共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空间体现，主要包括城乡共富和区域共富两方面内容。共同富裕的核心在于缩小城乡、区域和群体这“三大差距”，而群体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蕴含于城乡区域差距之中，因此，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是推动全域共富的主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必须“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①]。这表明，城乡融合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是促进城乡区域共同富裕的主要实践路径，即通过充分发挥城乡和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与主体功能，推动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居民收入均衡化和生活质量等值化，实现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的持续缩小。

[①]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10 月 26 日 01 版。

2.全域共富的先行探索。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的省域先行范例，是践行全域共富理念的生动样板，是展示全域共富理念实践成果的重要窗口。2021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浙江省建设“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的战略定位[①]。打造乡村振兴样板区以来，浙江省又提出 2027 年基本构建全域共富格局、2035 年基本实现省域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对此，魏后凯总结并指出，促进城乡区域共同富裕，关键要加快乡村全面振兴和欠发达地区发展。

以乡村全面振兴富裕农民农村，浙江省走在城乡共富道路的前列。“八八战略”和“千万工程”有效破解了乡村发展问题和城乡二元结构性矛盾，农民就业增收效益显著，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2003－2023 年，浙江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 2.33 降为 1.86，发展成效显著优于多数省份。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以来，浙江省继续把“加快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作为重要工作内容[②]，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千万工程”也迭代发展至“千村未来，万村共富”阶段，着力谱写“城乡和美”新乐章，构建“全域共富”新格局。

21 世纪以来，浙江省通过“一县一策”、山海协作工程等举措，将欠发达地区“山区 26 县”的发展历程成功转化为推动区域共富的典型范例。“一县一策”，是指为每个山区县量身定制发展方案和支持政策。而被纳入“八八战略”的山海协作工程，则是通过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多种类型“飞地”等方式，促进山区县和沿海发达地区结对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宗素娟进一步指出，近年来，浙江省积极推进“山海协作升级版”，山区县成功迈入经济增长快车道。如今，“山区 26 县”的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已经成为浙江省推动全域共富的强力支撑，其宝贵的建设经验，也将为其他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然而，推进共同富裕整体进程，尤其是在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方面，仍然面临诸多挑战。黄勇指出，中西部普遍存在农民收入较低、内部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县域城乡融合缓慢等问题。不少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其农村地区，内生发展能力相对欠缺，加快乡村全面振兴和地区整体发展的任务略显艰巨。为此，与会学者进一步探讨了“建立过渡期后常态化帮扶机制”和“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通”等推进城乡区域共同富裕的重要实践路径。

（二）以常态化帮扶推动全域共富

2021－2025 年是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设立的五年过渡期，主要任务是从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着力“提升脱贫地区整体发展水平”“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③]。过渡期即将结束，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研究推动防止返贫帮扶政策和

[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6/10/content_5616833.htm。

[②]《忠实践行“八八战略” 奋力打造“重要窗口”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https://www.zjzx.gov.cn/zxyw/content_100685。

[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人民日报》2021 年 3 月 23 日 01 版。

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政策衔接并轨”“推动建立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此外，《决定》也明确提出，要“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2024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统筹建立农村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和低收入人口、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①]。对此，魏后凯认为，过渡期内和过渡期后，援助帮扶的政策对象将从脱贫人口和脱贫地区转向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政策目标将从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转向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政策工具将从非常态化帮扶转向常态化帮扶。同时，黄勇进一步指出，过渡期后“帮扶谁”“怎么帮扶”等问题仍有待明确，与会学者就此展开了进一步的探讨。

1.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②]，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势在必行。一是建立统一的农村低收入人口监测帮扶机制。农村防止返贫致贫体系监测的对象往往是最困难的农民群众，其必然也是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体系的帮扶对象。为了提高常态化帮扶机制的精准识别能力和可持续性，必须整合这两套体系，统筹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的识别、监测和帮扶等工作。二是科学划分低收入人口类型。黄勇提出，要着力解决帮扶对象不明、原因摸排不准等难点，可以按照绝对困难（低保、特困人员）、相对困难（低保边缘家庭、支出型贫困家庭）和其他困难（遭遇特殊、突发困难的农村人口）的划分方法，精准识别不同类型的低收入人口。三是开展低收入人口分层分类常态化帮扶。低收入人口的内生发展能力和条件相差较大，要进一步明确帮扶的原则和策略：对于绝对困难群体，要坚持兜底保障，以救济式帮扶为主，以发展性帮扶为辅；对于其他类型低收入人口，要着眼于稳就业、增收入的目标，以发展性帮扶为主，以救济式帮扶为辅。

2.建立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机制。一是继续将县级行政区作为划定和帮扶欠发达地区的基本单元，保障脱贫地区政策的顺利转型和相互衔接。二是尽快明确欠发达地区的识别标准。魏后凯提出，在人均 GDP、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三项指标中，有两项及以上指标位于全国倒数 1/3 位序的地区，即可被认定为欠发达地区；同时，在老少边地区，可以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60%作为欠发达地区的认定标准。三是合理划分欠发达地区类型。魏后凯认为，可以根据人均 GDP 和农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的排序，并综合考量生态保护、政策倾斜等因素，将欠发达地区进一步划分为居前型、一般型和落后型三种类别。四是开展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在精准识别和划分欠发达地区的基础上，要推广先行地区结对帮扶、“一县一策”等经验，制定差别化的支持政策，分层分类帮扶，确保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期稳定向好。

（三）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要素合理配置是释放经济增长潜能、提升内生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发展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破除城乡要素流动体制机制障碍，一直都是党中央

[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习近平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2/content_6993406.htm。

[②]习近平，2021：《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第 20 期，第 4-8 页。

的重要工作方向。近年来，城乡间“人、地、钱”等要素的流动日趋活跃，但依旧存在不少突出问题。与会专家围绕学习《决定》精神，热烈讨论了如何“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迈向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1.完善城乡人口要素双向流动制度保障体系。钱文荣指出，当前农村的治理体系相对封闭，外来人口融入农村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障碍，亟须完善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与融合制度保障体系。一方面，虽然户籍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不断深入推进，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依然相对滞后；另一方面，乡村较为缺乏对于人才的吸引力，高素质劳动力即使具有下乡就业创业的意愿，也难以真正融入乡村、振兴乡村。与会专家建议，为解决这两方面问题，必须着力畅通城乡人口要素双向流动渠道。一是要落实《决定》相关要求，“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并增强农业转移人口在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对于迁入地的认同感。二是要学习“千万工程”经验，清除人才入乡的各类障碍。叶兴庆指出，从2017年起，浙江省松阳县松庄村总计吸引十名左右“新乡人”，带动二十余名“归乡人”返乡，切实助推了当地群众的增收致富，“新乡人”也被浙江省列入未来乡村的三大建设主体。对此，叶兴庆进一步提出，促进人才融入乡村，关键要扩大农村集体产权结构开放性、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村社区自治组织成员权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分离，有效保障“青年入乡”后的各类合理权益。

2.探索城乡土地要素双向流动制度保障体系。土地要素城乡双向流动，也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农村宅基地存在大量闲置、使用权流转受限等问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存在价格形成体系不健全、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同时，现有的土地制度也不利于人口、资金等要素向乡村的自由流动，例如，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流转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得单独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对此，与会专家认为，必须落实《决定》的要求，积极探索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有效实现形式，“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着力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同时，进一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在稳步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进程中，尊重群众意愿，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的作用。

3.健全城市资金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体制机制。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进入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农产品价格支持等举措，有效促进了资本要素向农业农村的流动。但现阶段依旧存在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农村动力不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贵、慢”等问题。对此，与会专家认为，必须贯彻《决定》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的指示，建立对接乡村全面振兴的财政强农惠农富农支持体系，尤其要提升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水平。同时，要进一步通过改进农村土地产权抵押制度、推广数字普惠金融等措施，以多层次、广覆盖、普惠性为方向深入优化农村金融支持体系，并健全社会资金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体制机制，持续改善乡村营商环境，鼓励社会资本入乡投资兴业。

四、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现代化

农业是农村的发展基础和农民的收入源泉，农业现代化是乡村全面振兴的中心任务和必由之路。《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要求，与会学者围绕加快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

自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以来，学术界对其理论内涵、形成逻辑和发展路径等内容进行了较为充分的阐释。但是，有关文献往往更为关注现代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仍在逐步拓展深化中。深入领会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为根本指引。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上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①]。与会学者认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将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带来全新机遇，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农业新质生产力有利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大幅提高。农业新质生产力以农业生产力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力要素质态的提升。农业劳动者越发具备与新科技革命相适应的创新思维、专业技能和经营经验；农业劳动资料由于生命科学、数据科学、智能制造等前沿学科的助力，不断迎来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技术赋能的原材料、无形的数据要素等新型劳动对象，不断拓展农业的生产边界。二是农业生产力要素组合的优化。通过适度规模经营、畅通要素流动渠道等方式，实现既有要素的再配置（组合）；通过科技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实现既有要素、新型要素的新配置（组合）；最终，不断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获取新的容纳载体，不断推动农业资源配置效率挖掘新的增长空间。可见，农业新质生产力有助于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的全面改进，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特征的农业现代化由此得以不断推进。

2.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在农业领域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关键举措。作为推动增长动能转换、迈向更高阶段的关键力量，新质生产力是新发展理念，尤其是创新发展与绿色发展理念的实践表达。上海社会科学院郭岚认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将为传统农村产业改造升级、农业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农业未来产业布局建设以及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完善提供前所未有的创新支撑。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法稳、青岛市社会科学院林珊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有力推动农业绿色化转型。总体而言，农业新质生产力凭借其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将为农业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①]习近平，2024：《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月2日01版。

（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与现实挑战

与会学者的观点和会议论文，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材料。一些学者从生产力要素及其组合四个维度出发，结合熵值法、组合评价法等工具，构建农业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估了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时空发展状况。还有学者以某省（区、市）的地方实践为例，综合理论分析和数据统计，展示了各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整体情况、现实问题和培育思路。

1.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状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彭玮和王美惠发现，2013－2022 年，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稳步增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虞洪指出，2012－2022 年，粮食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基本稳定，其中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业新质生产力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上。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尤为突出，成为全国的先锋。例如，郭岚指出，上海市郊区正在不断加快对现代都市绿色农业与生物绿色农业的布局发展，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赵锦春指出，江苏省通过创新乡村产业用地机制、健全财政金融配套体系等措施，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政策环境。

2.农业新质生产力面临的现实挑战。当前，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发展差距较为显著，整体水平的提升也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彭玮和王美惠指出，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布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特征，其中青海、新疆、西藏等地的发展水平相对滞后。这些地区面临自然环境脆弱、生产要素流通不畅、产业发展同质化以及人才支撑不足等诸多问题，制约了当地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仍存在诸多不足。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高江涛等学者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要素发展基础有限，难以满足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要素的需求；二是体制机制支持作用较弱，未能充分调动各方资源与积极性；三是科技创新潜力激发不足，难以有力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见，深入探讨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策略与路径，对于缩小区域差距、推动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路径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围绕这一主题，与会学者展开深入研讨，从科技创新与应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等关键领域提出了诸多建设性观点。

1.科技创新和应用是根本。科技创新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支撑，其核心在于通过科技赋能，推动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郭岚指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构建是一个多维度、深层次的变革过程，需要深度融合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等前沿科技元素。对此，高江涛、赵锦春等学者从健全农业科技创新机制的角度展开讨论，提出以下关键路径：一是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二是在生物育种、智能农机等核心领域加强协同攻关，突破技术“卡脖子”瓶颈；三是建立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联动的多元化投入体系，强化资金支持力度；四是优化科技人才评价体系，着力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与复合型人才。2024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推进农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加快科技成果大面积推广应用”，进一步明确了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凸显科技创新与应用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2. 全面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关键。全面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所在。《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会学者认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一个不断涌现新型生产力要素、持续优化与创新要素组合的过程，这就要求相关体制机制必须与时俱进。因此，核心任务是健全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畅通新型生产要素的流动渠道。与会专家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决定》的要求，通过“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不断破除制度障碍、激发市场活力、培育创新生态，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持久发展动能，进而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

五、结语

全国社科农经协作网络大会是20世纪90年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起、各省（区、市）社会科学院轮流举办的全国性“三农”学术交流和研究平台，旨在通过整合全国社科院系统与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力量，围绕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协同攻关与深入研讨，为推动“三农”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本次会议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这一核心议题，全面总结了“千万工程”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从整体上把握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对于全国各地提升“三个乡村”水平、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针对乡村治理这一“千万工程”工作的基石，与会专家从党建引领多方协同、促进“三治融合”以及繁荣发展乡村文化三方面内容，为推动乡村有效治理指明了实践路径。聚焦全域共富及其浙江样板经验，与会专家系统阐述了全域共富的理念，并就构建常态化帮扶机制、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进行了系统思考。在关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对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大意义的同时，大会还抓住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的前沿课题，系统分析了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的理论逻辑，并梳理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现状和培育路径。

在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相继出台的背景下，本次大会的研讨成果对贯彻落实文件精神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在研讨过程中，专家学者十分注重结合地方案例、总结地方经验，不仅加强了各地社科院的交流联系，还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贡献了地方思想、地方智慧，彰显了全国社科农经协作网络大会的特色与优势。未来，应继续依托全国社科农经协作网络大会等学术平台，充分探讨和总结各地的前沿探索经验，提炼更多脚踏实地的发展良策，为构建中国特色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黄　易）